再造失去的王國

俄羅斯的帝國雄心500年史

浦洛基 Serhii Plokhy——著
梁永安——譯



Lost Kingdom

the Quest for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Russian Nation, from 1470 to the Present

俄羅斯正面臨最終抉擇。
要當純粹的民族國家,
還是重回帝國的光榮?

輔大歷史系周雪舫教授專文——導讀
中研院文哲所陳相因副研究員——推薦

- 頂尖東歐史權威、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中心主任最新力作
- 出版一個月,即獲邀至美國智庫CSIS專題演講
- 「何謂俄羅斯民族」絕不僅是學術問題,關係到歐洲東部的戰爭與和平!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再造失去的王國

俄羅斯的帝國雄心500年史

浦洛基 Serhii Plokhy——著
梁永安——譯



Lost Kingdom

the Quest for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Russian Nation, from 1470 to the Present

**俄羅斯正面臨最終抉擇。
要當純粹的民族國家,
還是重回帝國的光榮?**

輔大歷史系周雪舫教授專文——導讀
中研院文哲所陳相因副研究員——推薦

- 頂尖東歐史權威、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中心主任最新力作
- 出版一個月,即獲邀至美國智庫CSIS專題演講
- 「何謂俄羅斯民族」絕不僅是學術問題,關係到歐洲東部的戰爭與和平!

猫头鹰书房

有些书套着严肃的学术外衣，但内容平易近人，非常好读；有些书讨论近乎冷僻的主题，其实意蕴深远，充满阅读的乐趣；还有些书大家时时挂在嘴边，但我们却从未看过……

如果没有人推荐、提醒、出版，这些散发着智慧光芒的杰作，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错失——因此我们有了猫头鹰书房，作为这些书安身立命的家，也作为我们智性活动的主题乐园。

猫头鹰书房——智者在此垂钓

国际好评

浦洛基在本书表现出只见于大歷史家的身手：用活灵活现的方式把古今联繫起来。他说明了俄罗斯歷经多个世纪打造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如何导致普丁入侵乌克兰和兼併克里米亚的行动。本书详细又丰富多彩地诉说了歷史和神话之火是如何从第一个沙皇、彼得大帝、布尔什维克、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燃烧至苏联的崩溃。在天天都有俄罗斯新闻和人人都是俄罗斯专家的今日，本书是那些想透过报纸头条之外了解俄罗斯的人不可不读。

—卡斯普拉沃，着有《冬天正在来临》

本书是对俄罗斯民族主义一个渊博的阐述。俄罗斯的歷史显示，其民族主义充满矛盾，既兼容又排他，既普世又强调认同，而且这些矛盾时而快速彼此转换，时而同时并存。作为本领域的行家，浦洛基说明了俄罗斯想要变成一个对其人民和邻国来说更好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韦斯托德，着有《冷战》

博学、深入且符合时代需求，本书以引人入胜的笔触缕述了俄罗斯民族走过多个动盪世纪所经歷的故事，从其出现的最早期一直谈到现今的普丁政权。浦洛基是国际知名歷史学家，对自己专研领域的掌握少有人能出其右。有着成竹在胸的自信和一双利眼，他把俄罗斯歷史中的反讽、偶然性和悲剧一一道来。任何想要了解今日俄罗斯的人都应该一读这本书。

—史密斯，着有《拉斯普丁》

浦洛基雄辩地回顾了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歷史起伏……这个透彻分析让我们得以稳稳地从歷史脉络理解普丁总统在二十一世纪的外交政策。

—《出版社週刊》「星级推荐」

一部出现得合时和无可挑剔的作品，说明了俄罗斯是如何在强大起源神话的驱策下，矢志夺回失去的领土……浦洛基再一次显示，他是这个领域的大师。

—《科克斯书评》

导读
民族的分裂与再打造–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合与分

周雪舫 / 辅仁大学歷史系教授

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克里米亚併入俄罗斯

二○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乌克兰国会取消俄罗斯语作为地区官方语言。二十七日，也就是在索契（Sochi）冬季奥运结束四天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议会在一批俄罗斯武装分子在场的情况下，选出亲俄的新总理阿克萧诺夫（Sergei Aksenov，一九七二~）；三月初，俄罗斯应邀派军进驻半岛。十六日，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与在该共和国境内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直辖市举行公投，以超过百分之九十的选票贊成加入俄罗斯。十八日，俄罗斯总统普丁（Vladimir Putin，一九五二~）与克里米亚代表共同签署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的条约。1乌克兰、美国和欧盟不承认此次公投，至今四年余，乌克兰政府仍无法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克里米亚半岛。

何以俄罗斯公然派军干涉克里米亚的选举与公投，在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看来是俄罗斯「兼併」（annexation）克里米亚，而非俄罗斯认定的「重新统一」（reunification,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е）？普丁于三月十八日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国会议员代表说明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时，提及东正教的信仰使得俄罗斯、乌克兰和白罗斯有着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而将基督教传入「基辅罗斯」（Kyivan Rus'）的大公弗拉基米尔（Prince Vladimir，九七八至一○一五）于九八八年正是在克里米亚的克森尼索（Chersonesus, Херсонес）受洗，2普丁强调：「克里米亚从前是，永远也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

二○一五年三月十八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一週年的庆祝会上，普丁说：「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一个民族，我始终抱持这种说法。」4所谓俄罗斯民族的认同是怎么一回事？本书说明同是东斯拉夫人的大（Great）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小〔Little〕俄罗斯人）和白罗斯人的分合歷史，探讨三个民族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是帝俄时期大（big）俄罗斯国家的核心民族，作者尤重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的探讨。

从合到分：基辅罗斯到蒙古统治时期

时间回到八六二年，留里克（Rurik，八六二至八七九）率领一群来自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的维京人，在俄罗斯平原建立第一个政府，被统治者是东斯拉夫人，首都位于诺夫哥罗德（Novgorod），八八二年迁都于基辅，故称之为「基辅罗斯」，至一二四○年十二月被蒙古人灭亡，基辅成为废墟。基辅罗斯改由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统治，实则仅统治昔日疆土的东北部，包含莫斯科公国在内的地区。至一四八○年起莫斯科公国伊凡三世（Ivan　III，一四六二至一五○五）不再向汗国缴纳贡赋。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不受蒙古统治，但需缴纳贡赋。基辅罗斯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含基辅）陆续被立陶宛大公国兼併，这就是后来称之为白罗斯和乌克兰的地区。

立陶宛大公国受到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的威胁，雅盖洛大公（Jageillo，一三七七至一四三四）娶波兰公主为妻，受洗为天主教徒后成为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新组成的「波兰立陶宛联盟」（一三八六至一五六九）拥有强大实力抵挡骑士团。双方更进一步的联合是一五六九年的「卢布林联合」（The Union of Lublin），称为「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Rzeczpospolita），5此因立陶宛受到莫斯科公国的威胁，亟需波兰的保护。原立陶宛统治的南部地区转入波兰辖下，形成今日的白罗斯地区继续由立陶宛统治，乌克兰地区转为波兰统治。

乌克兰农民为了脱离农奴身分而逃往聂伯河（Dniepr　River）中下游地区，那里是地主贵族尚未到达之处。来到这里的农民虽然获得自由、平等和土地，却面临游牧民族鞑靼人侵略的威胁，因此造就他们成为骁勇善战的骑兵，这群人称为「哥萨克」（Cossacks），6有自由民、轻骑兵、盗匪……等多种涵义。聂伯河下游的札波罗热（Zaporozhia）塞契（Sich，意为要塞）是乌克兰哥萨克的军事与行政中心。初期，每一位哥萨克有权参与议会（Rada，或译为「拉达」），选举或被选为领袖「盖特曼」（Hetman），他们自视为自治共同体，甚而行使外交权。

一五七二年，国王齐格蒙特二世（Sigismund　II，一五四八至一五七二）正式僱用三百人编制的哥萨克军，称为「註册哥萨克」（Registered Cossacks），由盖特曼统治，他们获得特权

如薪资、土地和农民为其耕种、免除纳税与免服劳役，仍享有独立的军事、外交、行政和司法权。

一五九六年的布列斯特（Brest）宗教会议达成妥协性的「联合教

会」（Uniate Church），乌克兰人仍使用斯拉夫语和东正教礼仪做礼拜，但是接受天主教教义并奉罗马教宗为最高权威。乌克兰东正教会自此分裂为东正教会派和联合教会派，前者势力渐微，乌克兰贵族逐渐转向联合教会派，一些农民为了追求宗教信仰的自由，往南迁徙成为一名哥萨克。

乌克兰「哥萨克国」的建立

哥萨克会因宗教信仰领导乌克兰农民揭竿起义，而註册哥萨克的人数随着国王的需求时增时减，失去此身分的哥萨克同时也失去许多特权，会在盖特曼领导下以暴动的方式向国王争取更多的註册哥萨克人数。规模最大一次的暴动是由赫梅利尼茨基（Bohdan Khmel'nyts'kyi，一五九五至一六五七，一六四八起为盖特曼）领导成功的「一六四八年暴动」，次年八月与国王签订「兹博罗夫条约」（Treaty of Zboriv）7，建立起直接由盖特曼统治的「盖特曼政权」（Hetmanate, the Hetman State），或称「哥萨克国」（the Cossack State），其有明确的辖区，如基辅、布拉茨拉夫（Bratslav）、切尔尼戈夫（Chernihiv）等地区，面积达三十一万余平方公里，8波兰不得在此境内驻军，税赋改由盖特曼全权处理，包含关税和酒税，另拥有独立的司法权、外交权。此次暴动的成功使乌克兰人有了政治实体与明确的疆域，追求自由与平等为其核心精神。

条约签订后，波兰贵族认为他们失去太多，乌克兰农民则不解何以战胜却须回原地主处继续耕种，于是群起暴动。此后，哥萨克国持续六年的战争，加上饥荒、瘟疫，以及处于四大强权之中—波兰、莫斯科公国、鄂图曼帝国、克里米亚汗国9，欲维持自治权极为困难。赫梅利尼茨基决定选择莫斯科以维护自治权，此因双方在民族、文化、语言方面大致相同，尤其是有着共同的东正教信仰，此时的莫斯科国力强盛足以抵抗波兰。一六五四年三月，双方签订「佩列亚斯拉夫条约」（Treaty of Pereyaslav）10，哥萨克国享有自治权，有自己的领土、军队、行政、司法和外交权（波兰和鄂图曼帝国除外）。

从分到合（一）：东乌克兰併入俄罗斯

莫斯科将边界延伸至聂伯河左岸，恢復了昔日基辅罗斯部分疆土，故称之为「罗斯的重新统一」（The Reunification of Rus'），沙皇阿列克谢（Aleksei，一六四五至一六七六）以「全罗斯君主；大罗斯和小罗斯」（The Sovereign of All Rus': the Great and the Little）的头衔签署条约，之前已恢復原属于白罗斯的斯摩棱斯克（Smolensk），一六五四年六月又占领原属于白罗斯的波洛茨克（Polotsk）11，故改称：「全罗

斯君主；大罗斯、小罗斯和白罗斯」（The Sovereign of All Rus’: the Great, the Little and the White）12。

佩列亚斯拉夫条约签订后，沙皇成立「外交厅」与盖特曼联繫，表示双方是宗主国与附庸国的关系，至一六六三年由「小俄罗斯厅」取代之，此意味着乌克兰事务不再是俄罗斯的外交事务，而是国内事务。

俄罗斯与波兰于一六六七年签订「安德鲁索沃停战条约」（Andrusovo Armistice），13将乌克兰以聂伯河（Dnieper River）为界一分为二，左岸（河东）与右岸（河西）的基辅归俄罗斯统治，其他地区由波兰统治。至一六八六年双方签订「永久性和平条约」参见 L. R. Lewitter, “The Russo-Polish Treaty of 1686 and Its Antecedents,” Polish Review, Vol. IX, No. 3(Summer 1964): 5-23, and Vol. IX, No. 4 (Autumn 1964): 21-37.，确认前次条约，并将札波罗热改为隶属俄罗斯。

沙皇视盖特曼为其臣民，盖特曼则认为与莫斯科仅是军事结盟，在莫斯科保护之下享有自治权，是沙皇的封臣（vassal），双方对条约的理解大相迳庭14。无论如何，此后哥萨克国的自治权逐渐减少，此在盖特曼马泽帕（Ivan Mazepa，一六三九至一七○九，一六八七至一七○八年为盖特曼）时极为明显。在俄罗斯与瑞典进行「大北方战争」（The Great Northern War，一七○○至一七二一）中的一七○八年，马泽帕密与瑞典国王查理十二（Charles XII，一六九七至一七一八）签订条约，后者允诺若俄军入侵，双方组联军共同抵抗，战后乌克兰得以独立。彼得一世（Peter I, the Great，一六八二至一七二四）随即获知消息，急赴哥萨克国的首府巴图林（Baturin），处死马泽帕的支持者，宣判马泽帕是「叛国者」（traitor），开除其教籍，派十个龙骑兵团（Dragoons light cavalry）驻扎乌克兰。

一七○九年的「波尔塔瓦战役」（Battle of Poltava）俄罗斯大胜瑞典，马泽帕退至摩尔达维亚（Moldavia）境内，三个月后去世。彼得一世下令乌克兰哥萨克军改由俄罗斯将领直接指挥，并赏赐乌克兰土地和农民给予俄罗斯有功大臣，鼓励俄罗斯人移入。一七二二年，亦即在大北方战争结束一年后，俄罗斯成立以六名俄罗斯军官为主的「小俄罗斯委员会」（The Little Russian College）取代「小俄罗斯厅」15，他们常驻乌克兰，掌管军事、司法和财政权，并于一七二五年开始在乌克兰直接徵税，更加剥夺哥萨克国的自治权。

从分到合（二）：西乌克兰併入俄罗斯

由拉达议会选出来的盖特曼阿波斯托尔（Daniel Apostol，一七二七至一七三四年为盖特曼）于一七三四年去世，其后盖特曼一职空悬十六年，伊丽莎白女皇（Elizabeth，一七四一至一七六二）于一七五○年恢復，到了一七六四年被凯萨琳二世（Catherine II, the Great，一七六四至一七九六）废除，改派一名总督统治。一七八一年，哥萨克国被划分为三个总督区—基辅、切尔尼戈夫（Chernihiv）、诺夫哥罗德 - 谢韦尔斯基（Novgorod-Siverskyi），总督区与俄罗斯其他省分地位相同，由俄罗斯政府直接统治。

十八世纪末，凯萨琳三次瓜分波兰，将白罗斯（一七七二年）和聂伯河右岸的乌克兰（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五年）纳入版图，如此昔日乌克兰除了加利西亚（Galicia）之外几乎全部回归俄罗斯统治。右岸的乌克兰随即被划分为三个行省—基辅、沃里尼亚（Volhynia）和波多利亚（Podolia）。

乌克兰人居住在俄罗斯其他几个较大地区，有「新俄罗斯」（New Russia），是凯萨琳发动两次（一七六八至一七七四年、一七八七至一七九二年）对鄂图曼帝国的战争胜利后获得的新领土，同样是建为行省，至一八○二年亚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一八○一至一八二五）划分「新俄罗斯」为三个行省—卡捷琳诺斯拉夫（Katerinoslav）、陶里达（Taurida）、赫尔森（Kherson）。另一个是一七九六年建省的斯沃博达乌克兰省（Sloboda Ukraine），一八三五年改为哈尔科夫省（Kharkov），莫斯科早在十七世纪初即鼓励乌克兰人移民至此，给予免税与免服兵役的优惠，直至十八世纪末取消。

从外部的合到内部的合：乌克兰社会融入俄罗斯社会

哥萨克军以其善于骑马被赋予守卫边境之责，阻挡波兰、克里米亚汗国和鄂图曼帝国的入侵。在彼得一世进行军事改革现代化后，新成立的龙骑兵团兼具步兵与骑兵的功能，每名骑兵配有短毛瑟枪和军刀（sabre），每团配备榴弹，加上新型的筑城技术能有效抵挡火炮，使哥萨克军以长刀为主的传统相形见绌。凯萨琳于一七八三年将原有十个乌克兰哥萨克军团改编为隶属俄罗斯军队的十个正规军骑兵团，又改配新的卡宾枪，虽然保留旧名称，但是哥萨克军不再以盖特曼为效忠的对象，转变为效忠沙皇。一七八九年的徵兵法徵自包括乌克兰农民在内的所有纳税人，此打破哥萨克军仅来自哥萨克阶层的旧俗，这一连串的改革使得哥萨克军失去独立性与特殊性。

凯萨琳于一七八五年颁布「贵族法案」[16]确认俄罗斯贵族的权利，乌克兰贵族[17]亦享相同权利，此表示双方的界线消除了，乌克兰贵族被

整合併入俄罗斯贵族阶层，不再被视为特殊的贵族。至于乌克兰小贵族，在凯萨琳进行改革后，他们携家带眷前往首都圣彼得堡定居，又提携亲朋好友进入中央政府机构服务，使用俄罗斯语，被整合至俄罗斯社会结构。

平民哥萨克在军队中为辅助兵的身分，俄罗斯政府视其为农民，为此爆发冲突事件，平定暴动后被移民至新边界成为国家农民，国家农民没有自由迁徙权。随着帝俄的扩张，哥萨克国的疆域已非俄罗斯的边疆，于是哥萨克多半被移至库班（Kuban）加入「黑海哥萨克军」，继续扮演其传统守卫边境的角色。哥萨克贵族的土地可以卖给任何人，但是平民哥萨克的土地仅属于他们及其后裔，随着哥萨克人口渐增但拥有的土地未曾扩大，生活日益贫困，于是有的为贵族或拥有土地的哥萨克耕种，有的选择移民至新俄罗斯、顿河流域、高加索山和克里米亚半岛等地区。

乌克兰教士来源不限于教士家庭，无论是贵族、哥萨克或农民出身都能够成为教士，此与俄罗斯教士採世袭制度不同。凯萨琳时期规定乌克兰教士必须接受神学院的培育，而神学院只接受教士之子就读，神学院系以俄语教学，学生亦以俄语交谈，以后又限制以俄语传教。

乌克兰农民位于社会最底层，在一六四八年暴动之后，赫梅利尼茨基解除其农奴身分，但并非所有的农民都获得自由，在修道院以及为贵族耕种的农民不受政府统治，此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受僱于一般地主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五，农民负担渐增加，实际上形同农奴。凯萨琳二世在一七八三年下令规定乌克兰农民必须永久居住在前一年人口调查时的登记处，此表示农民失去了自由迁徙权，与俄罗斯农奴无异。18

乌克兰的教会併入俄罗斯东正教会

俄罗斯东正教会于一五八九年提升为牧首区（Patriarchate），其地位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平等，互不相隶属，独立管理其辖区教会。东乌克兰併入俄罗斯之后，君士坦丁堡牧首于一六八六年将乌克兰东正教会转由俄罗斯牧首管辖。凯萨琳在俄罗斯实行教产世俗化，同时亦在乌克兰实行，教会的财政由中央政府控制，堂区、修道院与教士人数的多寡由政府决定。在一七九六年第三次瓜分波兰获得右岸乌克兰，随即废除基辅联合教会大主教一职，改由「俄罗斯东正教会」管辖。

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于九八八年迎娶拜占庭帝国皇妹安娜，接受了基督教，此后脱离多神信仰，基督教成为国教，俄罗斯的文化发展与基督教密不可分，专制政权的发展亦来自教会的支持，一五一○年产

生的「第三罗马[19]」提升莫斯科作为拯救全人类的救世主，具有宗教和政治理论双重性，统治者有责任保护教会，保护所有的东正教徒。

一六五四年阿列克谢接受赫梅利尼茨基的请求保护哥萨克国，沙皇愿意与波兰发动战争，保护波兰统治下的白罗斯和乌克兰的东正教徒为原因之一，正是宗教原因促使乌克兰和俄罗斯「重新统一」。凯萨琳三次瓜分波兰，官方再度宣称「罗斯重新统一」，昔日基辅罗斯的领土几乎恢復，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把联合教会信徒转化为东正教教徒，返回「父祖的信仰」（见本书第一二八、一三○页）。这个工作到了一八三九年在波洛茨克召开的宗教会议而大致完成，由右岸乌克兰人联合教会主教谢马什科（Iosif Semashko，一七九八至一八六八）执行。（见本书第一六四至一六八页）然而毕竟未能将所有的联合教会信徒改宗，波洛茨克主教纳德森（Alexander Nadson，一九二六至二○一五）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说道：「扑灭联合教会不是宗教行动，而是政治行动……白罗斯长期保留联合教会，俄罗斯化的政策注定是失败。」[20]而乌克兰的联合教会信徒在二○一六年统计高达四百六十三万人，占全世界联合教会信徒百分之二十九%[21]。

无可逃脱的合：苏联时期中央集权

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于一九一七年二月结束，「临时政府」短暂统治数月，十月革命后政权转移至布尔什维克党（Bolsheviks），乌克兰得以脱离俄罗斯，其后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加入苏联，实则以俄罗斯联邦为主的中央集权统治。此后直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苏联解体期间，形式上可说是乌克兰、白罗斯和其他十二个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合为一个国家─苏联，俄罗斯语是苏联的官方语言。乌克兰虽然长期受到俄罗斯化，然而哥萨克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精神成为乌克兰民族与歷史的重要因素。赫梅利尼茨基是乌克兰的国父，马捷帕被乌克兰人视为仅次于赫梅利尼茨基的民族英雄，他们抵抗专制为自由而战。

二战初期，史达林（Joseph Stalin，一八七八至一九五三）藉由《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与纳粹德国瓜分欧洲，当德军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入侵波兰揭开二战序幕，苏联军队随后于十七日占领波兰东部，该区百分之四十四为白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经由公民投票贊成加入苏联，十一月一日分别加入白罗斯和乌克兰共和国，总面积达二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为一千百万[22]。在二战末期的一九四四年七月，苏联又占领波兰一些领土划归这两个共和国，住民以白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居多，在隔年二月的雅尔达会议中获得承诺，史达林又力主有个不完全独立的波兰，是由苏联掌控的波兰[23]。

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中，乌克兰的面积仅次于俄罗斯和哈萨克，人口仅次于俄罗斯，其重要性还在于与俄罗斯同为东斯拉夫人，有「共同」的歷史与文化传统。实则乌克兰想脱离苏联的想法在各共和国之中最为强烈，苏联时期移民加拿大和美国的乌克兰人在大学里成立乌克兰研究中心，[24]出版期刊杂志、书籍或报纸[25]，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关注。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乌克兰率先宣布独立，白罗斯于隔日跟进；十二月一日，乌克兰经由公民投票通过脱离苏联而独立[26]。

会有再一次的合─「重新统一」吗？

克里米亚半岛自一七八三年纳入俄罗斯版图，黑海舰队主要基地即位于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港口。一九五四年，为庆祝俄罗斯与乌克兰「重新统一」三百年，赫鲁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一八九四至一九七一）将半岛划归乌克兰管辖，此举在中央集权的苏联仅是形式上的改变，俄罗斯未感受到失去一块领土。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自顾不暇，但致力于恢復大国的地位。在普丁长期统治下，[27]俄罗斯逐渐强盛，对于苏联解体后散布在前苏联其他共和国境内的俄罗斯人或以俄罗斯语为母语的居民，此以乌克兰东部尤其是高达百分之九十七居民说俄罗斯语的克里米亚半岛，其又兼具战略地位而最为显着。[28]俄罗斯「重新统一」在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因克里米亚的加入达到一定的要求，速度之快令人称啧。[29]

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不到两个月的五月十二日，乌克兰东部的卢干斯克州（说俄罗斯语者占百分之八十九）和顿内茨克州（说俄罗斯语者占百分之九十三），经由公民投票以百分之九十六的选票贊成独立，各自成立「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和「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俄罗斯未接受其加入联邦，但是乌克兰政府也未能完全控管此二州。二○一七年二月十八日，普丁下令承认这两国的护照。[30]

早在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当日，普丁信誓旦旦说不想看到乌克兰分裂，也不需要这么做，至于克里米亚则被认为始终是俄罗斯的。是否真的会如「超级普丁[31]」（SUPERPUTIN）所说的，俄罗斯对于乌克兰不再有领土的要求，不会发生「重新统一」之事？就在不久前─二○一八年七月十六日，美、俄在赫尔辛基举行的高峰会议上，普丁向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一九四六～）说道让东乌克兰（顿内茨克与卢干斯克）举行决定其未来的公民投票[32]。未来的发展会如何？只能静观无法预测，但可知乌克兰曾经长期与俄罗斯分离，其与俄罗斯歷史的发展有所不同。

1 有关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併入俄罗斯的过程，参见《乌克兰变局真相》编写组编，《乌克兰变局真相》（北京：新华出版社，二○一四年四月第一版）

2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в Кремле перед. депутат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членами Совета Федераци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и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 (accessed 10 August 2018)；中文译本参见弗拉基米尔．普京着，吴石磊译，〈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收入张国有主编，《俄罗斯的政治视角与文化视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五年十二月第一版），附录一，页一八一至一九三。

3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в Кремле перед. депутат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членами Совета Федераци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и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 (accessed 10 August 2018)

4 Путин: попыткиосложнить России жизнь--бесполезное занятие," ТВЦ 18 марта 2015 года, http://www.tvc.ru/news/show/id/63891. (accessed 10 August 2018)

5 Rzeczpospolita一词源自波兰语，意为「共和国」，一五六九年之后立陶宛仍保留大公国名称，波兰称为王国，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拥有共同的国会、货币与外交政策。

6 有关哥萨克的涵义与乌克兰哥萨克人的形成，参见周雪舫着，《在夹缝中生存的乌克兰哥萨克人：从自治到归併于俄罗斯》（台北县新庄市：辅仁大学出版社，二○○六年八月初版），第一章，〈夹缝里的生命力–哥萨克人的形成〉，页一三至四三。

7 兹博罗夫条约全文参见 Pierre Chevalier, A Discourse of the Original, Country, Manners, Government and Religion of the Cossacks, with another of the Precopian Tartar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wars of the Cossacks against Poland, trans. by Edward Brown (London: Hobart Kemp, 1672), 99-100.

8 Paul Robert Magocsi, A History of Ukraine (Toronto: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231.

9 克里米亚汗国自一四七五年起臣属于鄂图曼帝国。

10 佩列亚斯拉夫条约全文参见 John Basarab, Pereiaslav 1654: A Historiographical Study (Edmonton, Alberta: The 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1982), Appendix I, 230-236.

11 波洛茨克于一六六○年十月又被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夺回，此后至一七七三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才回归俄罗斯。

12 自阿列克谢沙皇于一六五五年使用「全罗斯君主：大罗斯、小罗斯和白罗斯」头衔，直至彼得大帝于一七二一年才改称「俄罗斯皇帝」。

13 「安德鲁索沃停战条约」原始文本已失传，不完整的条约内容，参见 C. Bickford O'Brien, Muscovy and the Ukraine: From the Pereiaslavl Agreement to the Truce of Andrsovo, 1654-1667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115-116.

14 由于赫梅利尼茨基一行人前往莫斯科签订条约时所携带的乌克兰文原始条约版本失传，以后依赖的是莫斯科译为俄罗斯文的版本，依此译为乌克兰文交由使者送达哥萨克，部分文字内容与原始版本有异，史家对于是否该条约使得哥萨克国逐渐失去自治权有不同的看法。参见 Andriy Yakovliv, "Bohdan Khmel'nytsky's Treay with the Tsar of Muscovy in 1654," The Annals Ukraini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IV, No. 3(13)(Winter-Spring 1955): 904-916.

15　此为彼得一世的行政改革，废除自伊凡三世设立的「厅」，改以「委员会」取代，名称改变但是维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变，且更强化中央的集权。

16　一七八五年「贵族法案」颁布的背景与影响，参见 Robert E. Jones,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Russian Nobility 1762-178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273-299；亦见周雪舫，〈从「贵族解放令」与「贵族法案」来看十八世纪俄国的贵族〉，收入王任光教授七秩嵩庆论文集编委会编着，《王任光教授七秩嵩庆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初版），页四○九至四二五。

17　乌克兰贵族泛指传统的乌克兰贵族和哥萨克贵族，后者源自註册哥萨克，担任哥萨克军团的高阶官员，「平民哥萨克」指担任哥萨克军团的低阶官员。

18　俄罗斯农民因「一六四九年法典」（Ulozhenie）的颁布而失去自由迁徙权，农民世代义务为地主耕种，直至一八六一年沙皇亚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一八五五至一八八一）才颁布法令解放农奴。

19　参见周雪舫，〈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念〉，收入《庆祝校长罗总主教卓赵先生晋牧廿五年晋铎五十年双庆论文集》（台北县新庄市：辅仁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五月初版），页一七○至一八四。

20　Fr Alexander Nadson, “The Belaruslan Greek Catholic (Uniate) Church: short history,”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0619194726/http://www.belarusians.co.uk/catholic/history-church.html. (accessed 10 August 2018)

21　Ronald G. Roberson, “The Eastern Catholic Churches 2016,” http://www.cnewa.org/source-images/Roberson-eastcath-statistics/eastcatholic-stat16.pdf. (accessed 10 August 2018)

22　乌克兰新获得的土地如利沃夫（加利西亚东部），白俄罗斯获得如布列斯特（Brest）、斯洛尼姆（Slonim）和格罗德诺（Grodno）。

23　参见浦洛基（Serhii M. Plokhy）着，林添贵译，《雅尔达：改变世界命运的八日》（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一年九月初版一刷），第十三章，〈乌克兰人会怎么说？〉，页二四○。

24　例如在哈佛大学有「哈佛乌克兰研究中心」（Harvard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加拿大的亚伯达（Alberta）大学有「加拿大乌克兰研究中心」（Canadian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25　学术期刊如 Journal of Ukrainian Studies,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The Ukrainian Review, The Annals Ukraini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报纸如 The Ukrainian Weekly。

26　乌克兰公投后正式脱离苏联而独立，没有乌克兰的苏联难以想像，俄罗斯总统叶尔钦（Boris Yeltsin，一九三一至二○○七）见大势已去，一星期后（十二月八日）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签署协议建立「独立国协」，并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际法中实体以及一个地缘政治现实的苏联已经不存在」，苏联实际上不復存在。

27　普丁于二○○○至二○○八年任总统、二○○八至二○一二年任总理、二○一二年至今任总统。二○○八年起总统任期改为六年一任，可连任一次，故普丁的总统任期至二○二四年结束。

28　乌克兰境内俄罗斯居民或使用俄罗斯语为母语的人民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南部，超过该地区半数居民以上的省分有：克里米亚（占百分之九十七）、哈尔科夫、卢干斯克（Luhansk）、顿内茨克（Donetsk）、札波罗热、敖德萨（Odessa），参见 Emmet Tuohy, “Language law: liberial rhetoric, radical agend,” Kyiv Post: Ukraines’s Global Voice, Published Aug. 22. 2102 at 8:30 pm, ,https://www.kyivpost.com/article/opinion/op-ed/language-law-liberal-rhetoric-radical-agenda-311915.html. (accessed 10 August 2018)；分布图见 “Russian spreads like

wildfire in dry Ukrainian forest," https://www.kyivpost.com/media/images/2012/08/22/p1757mh9mi6k01aim5ca54b16lh4/original.jpg. (accessed 10 August 2018)

29 在德国居住近三十年的俄裔 Wladimir Kaminer 是这样形容：「我的家乡併吞了乌克兰的一部分–克里米亚半岛，併吞的速度之快，就像吃东西没咀嚼就吞下肚一样。」参见维米尔．卡米纳（Wladimir Kaminer）着，王芷华译，《俄罗斯，连冰箱都可以战斗》（台北：大是文化有限公司，二○一八年二月初版），〈併吞克里米亚，乌克兰你可好？〉，页○三○。

30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繁体中文》说明：「由于自行宣布成立的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遭到基辅当局的封锁，无法办理乌克兰的护照，也无法将护照延期。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总统完全是出于人道考虑才签署的这种命令。」21:37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日，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702201021912666/. (accessed 10 August 2018)

31 二○一六年十二月六日至隔年的一月十五日在莫斯科UMAM博物馆举行一场主题为「超级普丁」的艺术展览，三十件普丁的绘画和雕刻把普丁描绘成「现代超级英雄」。参见陈正雄译，〈中英对照读新闻：一项艺术展将普廷描绘成超级英雄〉，《自由时报》，A12国际新闻版，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图片参见 Reuters Staff, "'SUPERPUTIN' exhibition gives Russian leader a pop-art make over" ARTS December 7, 2017 / 8:13 PM 8 MONTHS AGO,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russia-putin-art/superputin-exhibition-gives-russian-leader-a-pop-art-make-over-idUSKBN1E11L5. (accessed 10 August 2018)

32 Klya Arkhipov, "Putin Tells Diplomats He Made Trump a New Offer on Ukraine at Their Summit," Bloomberg, POLITICS- Jul 19, 201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7-19/putin-said-to-have-made-trump-a-new-offer-on-ukraine-at-summit. (accessed 10 August 2018)

大事纪

猫头鹰编辑室

　八六二年　维京人留里克在俄罗斯平原建立第一个政府，统治东斯拉夫人。

　八八二年　迁都基辅，称之「基辅罗斯」。统治范围约等于今日俄罗斯、乌克兰、白罗斯。

　九八八年　弗拉基米尔引入基督宗教。

一二四○年　蒙古灭基辅罗斯，建金帐汗国，统治范围仅基辅罗斯东北部。

一三二六年　莫斯科公国兴起，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教座移至莫斯科。

一四七二年　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公主。

一四八○年　莫斯科公国脱离金帐汗国，并逐步统一俄罗斯。但基辅罗斯西部（今白罗斯）和南部（今乌克兰）被立陶宛大公国兼併。

一五一○年　莫斯科为「第三罗马」。

一五四七年　伊凡四世（恐怖伊凡）正式加冕为「沙皇」，其统治国称「沙皇俄罗斯」（沙俄）。

一五六九年　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成立，形成今日白罗斯地区由立陶宛统治，乌克兰地区由波兰统治。

一五八九年　 俄罗斯东正教会提升为牧首区，与君士坦丁堡牧首地位平等。

一五九六年　「联合教会」成立，乌克兰东正教会分裂成东正教会派和联合教会派。前者式微。后者使用斯拉夫语和东正教礼仪做礼拜，但接受天主教教义并奉罗马教宗为最高权威。

一六一三年　开启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

一六四九年　哥萨克（上世纪乌克兰农民移居聂伯河下游者）在盖特曼（领袖）赫梅利尼茨基领导下，建立「哥萨克国」，享有自治权，宗主国是波兰。

一六五四年　哥萨克国经由「佩列亚斯拉夫条约」接受莫斯科的保护，仍享有自治权。沙皇恢復了昔日基辅罗斯部分领土，故称为「罗斯的重新统一」。

同年，莫斯科又占领白罗斯土地，沙皇改称「全罗斯君主：大罗斯、小罗斯和白罗斯」。

一六六七年　俄罗斯与波兰签订「安德鲁索沃停战条约」，以聂伯河为界，左岸（河东）和左岸（河西）的基辅归俄罗斯统治，聂伯河下游的札波罗热由俄、波共治，其余归波兰统治。

一六八六年　札波罗热归俄罗斯统治。

乌克兰东正教会转由俄罗斯牧首管辖。

一七○○～一七二一年　俄罗斯与瑞典进行「大北方战争」。

一七○八年　盖特曼马捷帕秘与瑞典结盟，彼得一世获知后称其为背叛者。

一七○九年　俄国与瑞典进行「波尔塔瓦战役」，俄胜。

一七二一年　彼得一世改称俄罗斯皇帝，其统治国改称「俄罗斯帝国」（帝俄）。

一七二五年　俄罗斯开始在乌克兰徵税，剥夺哥萨克国自治权。

一七七二、一七九三、一七九五年　三次瓜分波兰。昔日乌克兰除了加利西亚之外几乎全部回归俄罗斯统治。

一七八三年　克里米亚半岛纳入俄罗斯。

一八一二年　拿破崙进攻俄罗斯。

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　俄罗斯与鄂图曼帝国爆发克里米亚战争，俄败。

一八六一～一八八一年　亚歴山大二世推行大规模改革。

一九一四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一九一七年　三月，二月革命（俄历为二月），罗曼诺夫王朝结束。

一九一七年　十一月，十月革命（俄历为十月），由布尔什维克党执政。

一九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日，苏联成立。

一九三九年　九月一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九月十七日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其后划入乌克兰和白罗斯两个共和国。

一九五四年　赫鲁雪夫将原属俄罗斯联邦的克里米亚半岛，转为乌克兰辖属。

一九九一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苏联解体。

二○○○年　普丁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

二○○四年　普丁连任俄罗斯联邦总统

二○○八年　普丁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理。总统任期改为六年。

二○一二年　普丁第三次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

二○一四年　三月十八日，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爆发乌克兰 - 俄罗斯危机。

二○一八年　普丁第四次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

地图

1. 失去的王国：基辅罗斯（一○五四年前后）。来源：Zenon E. Kohut, Bohdan Y. Nebesio, and Myroslav Yurkevich,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Ukraine (Lanham, Maryland; Toronto; Oxford, 2005).

2. 中世纪罗斯各公国。来源：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Russi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ambridge, 1994),

3. 莫斯科的崛起。来源同上。

4. 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来源：Encyclopedia of Ukraine, ed. Volodymyr Kubijovyc and Danylo Husar Struk, vol. 4 (Toronto, 1993).

5. 瓜分波兰（一七七二至一七九五年）。来源：Paul Robert Magocsi, A History of Ukraine: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Toronto, 2010).

6.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东欧。来源：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2010).

7. 一九三三年前后的苏联。来源同上。

8. 一九三三年欧洲各国边界。来源同上。

9. 一九四○年苏联的新边界。来源同上。

10. 一九四一年德苏战争。来源同上。

11. 一九四五年前后苏联西境和东欧。来源同上。

12. 俄罗斯 - 乌克兰战争（二○一四至二○一七年）。来源：Serhii Plokhy, 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 (New York, 2015).

基輔羅斯的邊界（1054年）
弗拉基米爾大公兼併的西方領土（980年-1015年）
拜占庭帝國邊界
0 100 200 300 400 500 公里
0 100 200 300 英里

1. 失去的王国：基辅罗斯（一○五四年前后）

0 500 km
0 250 mi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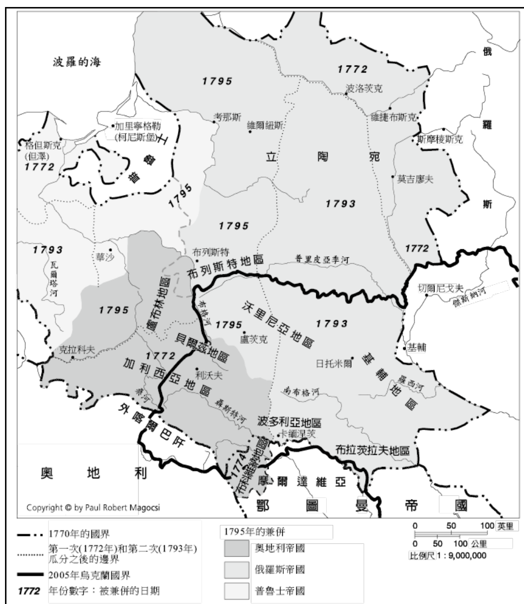
2. 中世纪罗斯各公国



3. 莫斯科的崛起



4. 波兰－立陶宛共和国



5. 瓜分波兰（一七七二至一七九五年）



6.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东欧



7. 一九三三年前后的苏联

译注：S.S.R.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S.F.S.R. 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A.S.S.R. 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歐洲

8. 一九三三年欧洲各国边界



根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而形成的歐洲新形勢
（1940年7月）

9. 一九四○年苏联的新边界



10. 一九四一年德苏战争



11. 一九四五年前后苏联西境和东欧



12. 俄罗斯 - 乌克兰战争（二○一四至二○一七年）

导论

在莫斯科市的最中心地带，克里姆林宫松林门斜对面的广场上，矗立着俄罗斯首都最高的一座纪念碑。人物雕像高十八公尺，穿着中世纪服饰，一手抱十字架，一手持剑。今日的俄罗斯人称他为弗拉基米尔大公，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则称他为沃洛基米尔。从九八○至一○一五年，他以基辅[33]为中心，统治着一片被称为「基辅罗斯[34]」的辽阔国土━西至喀尔巴阡山脉，东至伏尔加河。他影响最深远的遗产是让自己和他的子民皈依基督宗教。

传说一一四七年建立莫斯科城的多尔戈鲁基大公在市内亦有纪念雕像，但无论高度或坐落位置都不如弗拉基米尔巨像。许多莫斯科人相信，竖立这座巨像的真正目的不是尊荣大公本人，而是尊荣和他同一名字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丁。这种猜想不无道理，因为竞图比赛举行得很仓促，评选委员会主席正是大修道院院长吉洪，而盛传他是普丁的告解师。另外，巨像的选址位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歷史区内，有需要得到莫斯科市议会的特别批准，而要得到批准，又少不了普丁的眷顾。

但即使这种猜测正确，仍只能部分解释弗拉基米尔为什么会那么被看重，乃至于要把他的巨像放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更重要的理由是，它比任何事物都更能强调基辅罗斯是俄罗斯的歷史源头，是当代俄罗斯人民族身分认同所不可或缺。否则你很难解释为什么要在俄罗斯首都那么显眼的位置纪念一位基辅人物，基辅可是邻国乌克兰的首都。巨像建成的时间进一步显示出它是为了凸显乌克兰对俄罗斯歷史和政治的重要性。它的第一块奠基石是二○一五年俄罗斯刚兼併克里米亚之后放下，而且该石头是在俄 - 乌战争方酣之际取自克里米亚的拜占庭古城克森尼索，即传说中弗拉基米尔大公在九八八年的受洗地点。

弗拉基米尔纪念碑在二○一六年十一月四日正式揭幕━当天是俄罗斯的法定假日「民族统一日」。揭幕仪式由普丁本人主持，他旁边站着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牧首基里尔和俄罗斯最着名民族作家索忍尼辛的遗孀。普丁在致词时赞扬弗拉基米尔是「俄罗斯土地的开拓者和保护者[35]，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为一个强大、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国家奠定了基础。因着他，一些平起平坐的民族、语言、文化和宗教得以统一在一起。」普丁又指出，拜这位大公选择基督宗教作为国教之赐，「俄罗斯人民、白罗斯[36]人民和乌克兰人民得以拥有共同的精神源泉，为那些至今还界定着我们生活的道德观与价值观打下基

础」。

不管教科书或官方声明怎样说，俄罗斯都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按欧洲标准衡量的话尤其如此。它正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歷史未满六百年，而这歷史是由第一个自称沙皇的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在一四七○年代挑战蒙古可汗的宗主权中揭开序幕。这场斗争不仅攸关莫斯科公国的独立，还攸关它能否控制其他罗斯土地，特别是诺夫哥罗德。在那之后，它是靠着一个强大的起源神话摆脱自己的蒙古背景和塑造自己作为拜占庭继承人的形象。在这个起源神话里，莫斯科公国的统治家族和教会被说成是源出基辅罗斯。

俄罗斯发起过的大多数征战都是针对邻近的东斯拉夫人37，自称这是在行使作为基辅罗斯和拜占庭合法继承人的权利。就连苏联边界在二战期间向西扩张也常常是本着罗斯诸大公的名义。虽然俄罗斯有一部长远的征服史，但由伊凡三世揭橥的「收復罗斯全域」愿景却要到一九四五年方告实现，而且只维持到一九九一年，前后不到半个世纪。在其上升为超级大国的那些年间，莫斯科的统治鞭长及于基辅古国38的最西陲：乌克兰的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

近代伊始，俄罗斯菁英改而更多地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而非从「王朝世系」和「宗教」的角度理解他们对基辅罗斯的继承。随着俄罗斯帝国在十八世纪接受了民族性（nationality）观念，它创造出一个包含今日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在内的「俄罗斯民族」（Russian nationhood），其中还包括一些不是斯拉夫裔但政治和文化上俄罗斯化的帝国菁英。俄国革命拆解了这个「俄罗斯民族」的过程：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被认定是各自不同的民族。不过，苏联的民族政策最缺乏的就是一贯性：在一九九一年承认国内民族各自不同的同时，莫斯科又把决策权一把抓、推动苏联全境使用俄罗斯语、积极在文化上把非俄罗斯人俄罗斯化，凡此都为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创造出条件。把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从这种新帝国主义解放出来成了这国家的主要挑战。

今日，俄罗斯在协调俄罗斯人自我认同的心灵地图和俄罗斯联邦的政治地图一事上遇到了巨大困难。换言之，它拙于回应现代民族主义的关键要求–用盖尔纳的着名定义来说，这个要求就是「政治单位和民族单位的符合一致」39。俄罗斯今日的政治边界和俄罗斯民族的边界是否重叠？答案取决俄罗斯菁英和大众是怎样想像他们的民族。何谓俄罗斯民族和他们地理范围何在的问题绝不仅是学术问题，因为它们关系着今日欧洲东部接壤地区的战争与和平，会影响到接下来的几代人。

有必要重新定义自己的政治、文化和民族边界的情况并非俄罗斯独有。在上一个世纪，许多被迫把属地割捨出去的帝国亦碰过类似情况。其中之一是幅员广阔的哈布斯堡王朝，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分割，缩小到只剩下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国家，让许多日耳曼裔和匈牙利裔的公民成了异国人。当更大的鄂图曼帝国崩溃后，其中很多操土耳其语或信奉伊斯兰教的居民变成了生活在由非土耳其人和非穆斯林支配的土地。最后，还有二战后以渐进方式解体的英国和法国帝国，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原有的殖民地一一独立，而住在这些地方的拓垦者后代和殖民地官员则大举离开，返回祖国。

但俄罗斯还面临着从前大部分帝国，特别是海上帝国不用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俄罗斯民族本身要如何定义。英国歷史学家霍斯金说过：「英国曾经拥有一个帝国，但俄罗斯却曾经是个帝国─而且大概至今还是帝国。」40传统的观点认为，俄罗斯人的身分认同难题源于它还没有成为一个民族之前便成为了一个帝国。这话十之八九也适用于许多帝国，包括英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帝国，但俄罗斯人的独特处境在于，其他帝国无一与它们的外国子民分享相同的歷史根源和起源神话，反观俄罗斯在帝国时期的大部分岁月却是如此。

如果以血统和文化作为判准，那么所谓的俄罗斯民族是仅包括俄罗斯联邦国内外的俄罗斯裔，抑或还有其他东斯拉夫人，即包括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这是俄罗斯菁英阶层和大部分群众在后苏联世界设法重塑自身时碰到的关键问题。这亦是本书所进行的研究的核心要素。在某种意义下，本书属于一个常见的研究范畴：民族的「发明」。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和俄国都有这方面的研究着作。本书和它们不同之处在于其所要研究的那个民族是抽象的。这个「泛俄罗斯民族」不会在任何地图上找到，也从未以政治实体的形式出现，但它却存在于俄罗斯政治和文化菁英的头脑里，如果相信民调的话，它也存在于数以千万计的俄罗斯人的脑袋里。它的政治影响力超过很多可以轻易在世界政治地图上找到的真实民族。

本书是一部俄罗斯民族主义史，特别着眼于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俄罗斯帝国主义交错的部分。它从俄罗斯在十五世纪下半叶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谈起，一路谈到当前，范围涵盖俄罗斯和东欧的大片歷史和大片土地。本书的第一篇指出，在十八世纪，俄罗斯帝国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成功地把中世纪的「王朝世系」和「宗教」概念结合于新兴的民族意识，建构出一种帝俄民族的观念。不过，正如第二篇所示，这种建构很快就受到波兰人欧洲现代民族主义的挑战：波兰人虽然在战争中被打败，却拒绝放弃对乌克兰和白罗斯土地的权利主张，这些土地是在十八

世纪末叶三强「瓜分波兰」时被俄罗斯帝国兼併。

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帝国不得不调整它的民族认同模式，以抑制现代民族主义在东斯拉夫人中的兴起。正如第三篇会详细说明的，俄罗斯朝廷为容纳不断上升的乌克兰民族主义 ，提倡三位一体的俄罗斯民族概念，即主张「俄罗斯人」是由大俄罗斯人（Great Russian）41、小俄罗斯人（Little Russian，即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White Russian，即白罗斯人）三支构成。朝廷也设法打压非大俄罗斯文学语言和高级文化的发展，并取得成功。

一九○五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本书第四篇的主题）摧毁了三位一体的民族观念。自此，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被承认为各自不同的民族，也开始彼此对抗（俄罗斯和乌克兰尤其如此）。本书第五篇分析苏联领导人的民族政策，显示他们如何想尽办法让这三个作为苏联核心的民族保持聚合。他们的努力最终被证明无济于事，而苏联亦于一九九一年解体。本书的最后将讨论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如何企图透过恢復一些帝俄遗产，打造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并因此导致了二○一四至二○一五年的俄罗斯—乌克兰战争。

从莫斯科公国如何从蒙古帝国的废墟中崛起，一直谈到俄罗斯联邦如何在苏联解体后重塑俄罗斯民族，本书勾勒出俄罗斯菁英阶层努力让「失去的王国」（lost kingdom）恢復领土统一—这里「失去的王国」是指中世纪的基辅罗斯，它是所有东斯拉夫人的重要文化根源。在欧洲歷史上，追寻一个「失去42王国」的现象并非仅见于俄罗斯。中世纪的查理曼和近现代早期的哈布斯堡王朝都曾试图重建罗马帝国。不过，俄罗斯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失去的王国」的追寻持续至今，同样持续至今的还有它对领土扩张和大国地位的追求。正是为了实现这种愿景让它找不到通向现代民族性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下，它本身已变成一个「失去的王国」。

33 基辅（Kyiv／Kiev），Kyiv 为乌克兰语拼写，Kiev 为俄语拼写。本书以「／」符号作为区隔，「／」前为乌克兰语拼写，「／」后为英语拼写。

34 东斯拉夫人在东欧建立的第一个政权称为「罗斯」（Rus’），其地域大约相当于后来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罗斯。因为该政权是以基辅为中心，后人又称之为「基辅罗斯」（Kyivan Rus’）。

35 “Tseremoniia Otkrytiia pamiatnika kniaziu Vladimiru,” Prezident Rossii, November 4, 2016, http://kremlin.ru/events /president/news/53211.

36 以往习惯译为白俄罗斯（Belarus），二○一八年三月十六日白罗斯大使馆发文要求改用「白罗斯」为正确国名，以此表明他们的国家非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盖「Belarus」即Bela（白）、Rus（罗斯），故译「白罗斯」。

37　Rus'（罗斯）系以希腊语音译，Russia（俄罗斯）则以拉丁语音译，二者义同。「俄罗斯」一词是伊凡三世（一四六二至一五○五年在位）与西方接触后採用的称啰。东斯拉夫人包含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

38　即基辅罗斯。详见第一章。

39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d ed. (Ithaca, NY, 2009), 1.

40　Geoffrey Hosking, “The Freudian Frontier,”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rch 10, 1995, 27.

41　大俄罗斯人即今日俄罗斯人，指蒙古统治原基辅罗斯的东北地区，该地区的罗斯人与北方的芬人混血，称为大俄罗斯人。

42　这里的「lost」作迷路解。

第一篇　创造俄罗斯

第一章　沙皇国诞生

一四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是个寒冷秋日，这一天，三十二岁的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索菲娅。初披婚纱的新娘二十三岁，父亲是摩里亚君主托马斯．帕拉奥洛戈斯[43]。这是伊凡的第二次婚姻。婚礼在克里姆林宫一座木造教堂举行，旁边是尚未竣工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后来的俄罗斯编年史家对于婚礼是由都主教抑或一位普通的大司祭主持记载不一[44]。虽然婚礼各方面都显得低调，本身却意义非凡，象徵着莫斯科的统治者成为拜占庭皇帝的亲戚和延续者。索菲娅的伯父君士坦丁十一世在一四五三年五月鄂图曼人进攻君士坦丁堡时被杀，拜占庭帝国随他一道逝去，但莫斯科统治者的帝国野心并没有因此消失。透过迎娶索菲娅，伊凡三世自认为继承了拜占庭皇帝的衣钵。

索菲娅和罗马渊源甚深，而这八成就是伊凡三世何以会起用一批义大利建筑师为克里姆林宫建筑城墙之故–克里姆林宫是歷代大公的居所，在伊凡手中变为一座城堡。一四八五年抵达莫斯科的义大利建筑师鲁福为克里姆林宫建造了许多宫殿和教堂，又和另一位义大利建筑师索拉里一道筑造了多棱宫，是个美轮美奂的宴会场所。索拉里是一四八七年来到莫斯科，主要负责监督克里姆林宫塔楼的修建，其中包括救世主塔楼[45]。救世主塔楼是莫斯科和俄罗斯的象徵标志，落成铭文留存至今。内门铭文使用俄语，外门铭文使用拉丁语，前者写道：「六九九九年〔一四九一年〕[46]七月，在上帝的恩典下，此塔楼是由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下令建造。在其在位至今的十三年间，他是全罗斯[47]（all Rus’）的最高主宰，也是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特维尔、尤格拉、维亚特加、彼尔姆和保加尔等地的大公。主持造塔楼事宜的是米兰的索拉里。」

伊凡的头衔列举出他的所有领土，其中有新有旧。虽然他的婚姻和雄心勃勃建设计画是指向帝国的未来，但他的头衔，「全罗斯」的统治者和某些其他土地的有权者，却是根植于过去，更具体地说是根植于他的王朝和国家的中世纪源头。学者指出，莫斯科大公的权力来自双重源头，同时有着「可汗」（khan）和「巴西琉斯」（basileus，拜占庭人对皇帝的称呼[48]）的功能，即同时扮演着世俗君主和宗教领袖的角色。但这种把焦点放在双重权力源头的做法往往忽略了大公头衔的重要性–这个头衔对伊凡三世和他直到十六世纪中叶为止的继承人一直具有核心意义。凭着这个头衔，莫斯科大公得以和入土已久的基辅罗斯的统治者扯上关系，让他们可以声称自己对南至黑海、北至波罗的海的罗斯全域拥有最高主权。

伊凡自称是留里克王朝的后人，而这是他统治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诸城的合法基础。留里克王朝有斯堪地那维亚血统，起源可溯自传说中的维京人国王留里克。

留里克王朝建立的基辅罗斯是一个强大国家，国力在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初叶间臻于鼎盛。在歷代的基辅大公中，最大名鼎鼎的是九八○至一○一五年在位的弗拉基米尔，主要成就是把拜占庭基督宗教引入罗斯土地，后来也因此获得东正教教会封圣。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弗拉基米尔的儿子「智者」雅罗斯拉夫（一○一九至一○五四年在位），是他下令在基辅市中心兴建圣索菲亚大教堂。根据传说，雅罗斯拉夫还推出了第一部罗斯法典和奖励修编年史。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另一位弗拉基米尔，在位期间（一一一三至一一二五年）的最大功绩是让基辅罗斯摇摇欲坠的统一性恢復完整。他因为是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的外孙而承袭了外公「莫诺马赫」的外号49。

留里克王朝对基辅罗斯的统治在十三世纪中叶戛然而止，当时，被罗斯人称之为鞑靼人的蒙古人在突厥草原部落的协助下，征服了罗斯各公国。一二三七年秋天，成吉思汗孙子拔都遣使到罗斯东北，要求弗拉基米尔城邦的尤里大公投降，为大公所拒。接下来几个月，蒙古人围攻摧毁了梁贊和若干其他罗斯城镇。尤里大公在一二三八年三月战死。一二三九年冬天，蒙古人洗劫了切尔尼戈夫和佩列亚斯拉夫等城镇。次年，他们向基辅推进。因为基辅拒绝投降，蒙古人进行围攻，使用巨大木桩破坏城墙。

编年史家记载：「拔都把一批攻城槌放在波兰门附近，因为有一座茂密森林延伸到那里50。他下令日夜不停地用攻城槌撞击城墙，最终把城墙撞破。」51十二月初，蒙古人越过冰封的护城河，涌入城市。随着冬天短暂的白天结束，蒙古人占领了城墙和栅栏，在那里待了一夜，等待天亮。对城中守军来说，那一定是他们人生中最可怕的一晚。歷史学家相信，罗斯战士和剩下的居民撤退到圣母升天教堂，这座基辅的第一座石造教堂遂成为不肯投降的拜占庭人的最后避难所。编年史家这样描写发生在一二四○年十二月七日的最后抵抗：「不断有人跑到教堂，带着财物去到它的屋顶。教堂墙壁因为不堪重负，垮了下来，整座堡垒遂被鞑靼战士占领。」52

基辅的居民和守军很少能够在城市陷落之后存活下来。拔都接着挥军向西，征服其余的罗斯土地，再入侵波兰和匈牙利。蒙古人之所以能够战胜，部分是因为一度统一在基辅之下的罗斯土地不再团结，亲王们各自为政，为争夺权力和影响力而内斗不休。在蒙古入侵时，大部分罗斯东北部，即今日俄罗斯中部的亲王奉弗拉基米尔大公等为君主，而包

括基辅在内的罗斯西南部由加利西亚 - 沃里尼亚亲王统治，至于东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则完全独立，与其他罗斯土地没有统属关系。如果说蒙古人的入侵对这种局面有带来任何改变的话，那就是加剧了基辅罗斯的政治分裂。蒙古人对现今被称为乌克兰和白罗斯两地的统治主要是间接性的，也仅仅维持了几十年，它们最终落入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的控制。在更北和更东部，情况有所不同。蒙古人对东北罗斯进行严格控制，假以时日，它将成为「俄罗斯土地」的主要部分。

虽然在蒙古人入侵之时，罗斯的统一已是非常遥远的往事，但全罗斯土地上的亲王，从西南部的基辅和佩列亚斯拉夫到东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和弗拉基米尔，仍然有着一种同源感。他们还继承了基辅罗斯让人动容的法律、宗教和文学遗产，也都是以罗斯人自居。这种和基辅罗斯的连续性在莫斯科公国扮演的角色比起任何其他地方都吃重。莫斯科公国是基辅罗斯东北部的其中一个公国，奉蒙古人为宗主国。蒙古人对包括诺夫哥罗德的罗斯土地控制是透过拥有弗拉基米尔大公头衔的罗斯附庸国执行。获得此一头衔的罗斯亲王拥有声望、权力和财富，其忠诚和工作能力使蒙古可汗（后来称为钦察可汗）信服。但大公有责任向所属人民收税，献给可汗。

用弗拉基米尔大公头衔作为诱饵，蒙古可汗鼓励罗斯亲王彼此竞争，避免有任何一个亲王独大的局面。但时间证明这种政策无法行之永久。十四世纪期间，莫斯科崛起，成为蒙古罗斯土地上一个新的权力中心。蒙古人在一二三八年入侵东北罗斯的时候，莫斯科还只是个小小的公国，甚至没有自己所属的亲王家族。它是在蒙古人统治的时期才得到大公头衔。莫斯科亲王属于留里克王朝的幼系后裔，但拜他们的公国位于不同商路交错之处和高明政治手腕所赐，他们最终成为东北罗斯最强大的亲王家族。一三一七年，莫斯科亲王迎娶金帐汗国可汗的妹妹为妻，因而获得了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头衔，拥有了作为可汗在罗斯代表的权力。

和莫斯科争取该头衔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特维尔，那是一个实力比莫斯科强大许多的公国，位于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之间。但是，莫斯科公国的首都要更接近弗拉基米尔，即弗拉基米尔大公原来的根据地，也更接近蒙古人所控制的草原，所以最终有效地挫败了竞争对手。让莫斯科能够出人意表地稳定崛起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全罗斯的都主教在世纪之交从基辅搬到弗拉基米尔，然后又迁至莫斯科，让莫斯科成为他幅员广阔的都主教教区的新首府。[53]这个都主教教区除了涵盖蒙古人控制的所有罗斯土地，还涵盖立陶宛人控制的罗斯土地。莫斯科大公和罗斯都主教都宣誓效忠金帐汗国，而两者的结盟帮助了莫斯科上升成为

东北罗斯的真正首府。

到了十五世纪中叶，作为金帐汗国在罗斯主要代理人的莫斯科大公开始威胁到主子在罗斯土地的霸权地位。随着金帐汗国被内部斗争削弱和进入分崩离析阶段，莫斯科大公开始推进自己在罗斯土地的霸权。第一个踏出这一步的大公是瓦西里二世，外号「瞎子」，因为他的政敌想要让他失去继位资格而把他的眼睛刺瞎。不过，莫斯科真正取得独立是在他儿子伊凡三世在位之时。伊凡是一位高瞻远瞩的统治者，一四六二年继位，一五○五年驾崩。

在伊凡的经营下，莫斯科公国控制了整个蒙古罗斯。为巩固自己独立于蒙古人的地位和对一些不听话的罗斯土地的统治者，他除了诉诸武力，还诉诸有力的法律论证和歷史论证。「王朝世系」和「祖产」观念—即主张莫斯科的统治者是基辅罗斯的继承者，是其沙皇国的关键意识形态基础。这种史观和憧憬成为帝国的愿景将会在十五和十六世纪互相强化，对于莫斯科人的国家认同和身分认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四七一年，即伊凡三世迎娶索菲娅的前一年，莫斯科公国在建立霸权一事上取得重大胜利：伊凡的军队占领和征服了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该共和国是当时罗斯土地上最大且最富有的政权。

很多学者都认为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是俄罗斯歷史上一个民主范式，与莫斯科大公国所代表的专制范式形成鲜明对比。从十二世纪开始，诺夫哥罗德领土西至波罗的海，北至白海和巴伦支海，东至乌拉山脉，是由民众大会所选出的官员统治。诺夫哥罗德亲王是军队指挥官，但必须看市民的脸色，更精确地说是看世家大族的脸色。共和国的财富不仅来自土地，还来自贸易；因为它是波罗的海地区一大商业强权，出口毛皮和其他森林产品，进口纺织品，有些自己消费，有些卖给其他罗斯地区。

一四七○年，一群世家大族在前任市长遗孀也是现任市长的母亲玛尔花．鲍列茨卡亚主导下，诺夫哥罗德和波兰国王暨立陶宛大公卡西米尔四世达成结盟协议（波兰和立陶宛在一三八五年结为一体）。卡西米尔四世派遣基辅亲王奥列尔科维奇协防诺夫哥罗德。但这是他提供的仅有帮助，而奥列尔科维奇也在翌年便离开诺夫哥罗德。一四七一年夏天，莫斯科的军队在一支为伊凡三世服务的鞑靼骑兵助阵下进攻诺夫哥罗德。前进过程中抓到的每一名俘虏，都会切去其鼻子和嘴唇，再予以释放，他们用这个方法吓唬居民。

一四七一年七月，双方在舍隆河河畔展开决战，由兵力较少但纪律

较好且战斗经验丰富的莫斯科军队胜出。鞑靼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伏击诺夫哥罗德的军队，协助追击和杀死撤退的部队。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的编年史对战争过程的细节有不同记载，但这场战争的结果和意义明确无疑：诺夫哥罗德维持自治的努力被粉碎。市长鲍列茨基在战斗中被俘，伊凡下令把他处决。据估计，有一万两千名诺夫哥罗德人死于战场或是在撤退过程中被杀。诺夫哥罗德被迫缴纳鉅额贡金（数目是莫斯科向金帐汗国缴纳的两倍以上），并放弃和立陶宛大公国的联盟关系。自此，这个共和国只能任人宰割。

伊凡的强大军力固然让他能够征服诺夫哥罗德和击退庞大的大帐汗国，成为金帐汗国的继承者，但莫斯科大公国的新地位和它继续兼併新领土的行动需要正当理由。据莫斯科书吏的说法，他们在一四七二年弄出一部新的俄罗斯编年史，伊凡三世会占领和惩罚诺夫哥罗德，是因为它不尊重他的祖产继承权，而这种权利可上溯至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据说，莫斯科派出的使者这样告诉诺夫哥罗德人：「从古代起，你们诺夫哥罗德人便是我的祖产。这种权利可以上溯至我们的祖父和我们的祖先，再上溯至弗拉基米尔大公—他是留里克的曾孙，也是让罗斯土地受洗的第一位大公。从留里克直至今日，你们一直只承认一个统治家族……我们是他们的后人，一直统治着你们，施恩于你们，保护着你们，所以当你们不按照古老的传统承认我们的地位，我们也有权惩罚你们。」54

这番话中提到的「古老传统」是莫斯科政治文化一个相当新的元素。在伊凡三世征服诺夫哥罗德之前，编年史家几乎不曾提过莫斯科统治家族的基辅血统。在此之前，莫斯科大公都是透过讨好金帐汗国的可汗，以在与特维尔和其他强大亲王的竞争中取得上风。可汗是蒙古帝国创始人成吉思汗的子孙，向他们提自己有着基辅罗斯和留里克王朝的血缘毫无用处。但这种情况随着金帐汗国的持续解体发生了改变。在伊凡征服诺夫哥罗德的同一年，他也击退了可汗阿合马的鞑靼人部队。当时，阿合马因为对莫斯科的日益强大感到不安，挥军进入莫斯科的边界，但莫斯科人做出有效防御，让阿合马的军队无法越过奥卡河。鞑靼人只好撤兵，至此莫斯科不再对金帐汗国缴纳贡金，从属地位从此结束。随着诺夫哥罗德战败和鞑靼霸权地位的不再，莫斯科的霸权基础就此奠定。

但是，诺夫哥罗德和蒙古人带给伊凡的麻烦还没有结束。五年后，一四七一至一四七二年的戏码再次上演，三个主要角色再一次是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和金帐汗国。一四七七年十月，诺夫哥罗德人不满伊凡三世强加给他们的条约和臣属地位，决定毁约。大公兵临城下，迫使其

市民再次宣誓效忠。一四七八年一月，伊凡三世进入该城，诺夫哥罗德自此不再是一个共和国。诺夫哥罗德民主制度的象徵，那用来召唤市民参加民众大会的大钟被送往莫斯科。反抗运动的领导人玛尔花．鲍列茨卡亚被带到莫斯科后再被带到下诺夫哥罗德，在那里被迫许下誓愿成为修女。诺夫哥罗德都主教、修道院和世家大族的土地全数被抄没。反抗运动的各领导人全家遭流放，时值隆冬，很多人因而没能活下来。他们的土地被赏给莫斯科大公的侍从之臣。

在伊凡三世于一四七八年征服诺夫哥罗德之后，金帐汗国再一次出兵莫斯科，要求恢復进贡。这一次，阿合马可汗和卡西米尔四世结成联盟─这位波兰国王暨立陶宛大公会答应结盟，是因为对诺夫哥罗德的陷落和莫斯科在立陶宛边界与日俱增的威胁感到忧心忡忡。立陶宛军队答应在鞑靼人攻击莫斯科时从旁协助。一四八○年秋天，阿合马进抵莫斯科公国边界上的乌格拉河准备开战，但立陶宛军队始终没有出现。原来，立陶宛的南方，主要是乌克兰人居住的土地，此时正受到金帐汗国另一个继承人克里米亚汗国的攻击。少了立陶宛人的支援，阿合马不敢贸然越过乌格拉河，最后只好退兵。这撤退在俄罗斯歴史上非常着名，被认为是莫斯科摆脱「鞑靼枷锁」和确立主权长久努力的决定性事件。自此，莫斯科以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的身分展开自己的歴史。

到了一四八○年，伊凡已经建立起他在蒙古罗斯的霸权，但他的头衔「全罗斯的最高主宰和独裁者」却透露出他的野心不仅止于此，如同十二年后，由义大利建筑师建造的克里姆林宫塔楼内外门铭文所描述的一样。一四七八年，即诺夫哥罗德完全臣服的一年，莫斯科的外交官开始谈到莫斯科对一些立陶宛领土的权利，这些领土包括波洛茨克和斯摩棱斯克。到了一四九○年，伊凡的大臣开始以莫斯科大公是基辅罗斯后裔作为理由，把他的主权要求延伸至基辅本身。在写给哈布斯堡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的信中，伊凡三世谈到他打算在上帝的护佑下「夺回我们的祖产，即基辅大公国，它目前是由波兰国王卡西米尔和他几个儿子统治着」。一四九四年，立陶宛大公在无奈下承认了莫斯科统治者的新头衔，包括他是「全罗斯」最高主宰这部分。在一五○三至一五○四年，俄罗斯使节向立陶宛提出收回基辅祖产的要求：「现在我们拥有的城镇和土地不是我们祖产的全部。我们的祖产涵盖全罗斯的土地，包括基辅和斯摩棱斯克和其他城镇……出于上帝的恩典，这些土地从古代起便是我们的祖产，是我们祖先所留下。」55

莫斯科胆敢把立陶宛大公国境内的罗斯土地说成是它的祖产，是十五世纪末叶和十六世纪初叶一连串战争胜利的直接结果。双方在一四八○年代开始发生边界冲突。第一场实际的战争发生在一四九二至一四九

四年，然后依次是一五○○至一五○三年、一五○七至一五○八年、一五一二至一五二二年、一五三四至一五三七年—加起来歷时近半世纪。在这些战争中，莫斯科公国大多数是占上风的一方，直至十六世纪初叶才首尝败绩。到了这时候，莫斯科公国的边界已深入至立陶宛大公国的领土，包括取得了切尔尼戈夫和斯摩棱斯克。就像诺夫哥罗德人碰到的情况那样，很多斯摩棱斯克的居民都被迫东徙，土地被莫斯科大公的臣民占去。

莫斯科人得以占上风，除了因为伊凡三世军力强大，还因为他的对手卡西米尔四世不愿意容纳基辅大公的后人继续掌管他们祖先统治的土地，包含现在的乌克兰和白罗斯。随着伊凡三世吞併了一个又一个公国和用他的基辅罗斯血缘合法化这种行为，卡西米尔决定废除当时仍然存在于立陶宛大公国版图内的唯一罗斯公国，即基辅公国。他是在一四七○年这样做，而这个决定直接导致立陶宛在一年后「失去」诺夫哥罗德。前此，基辅公国一直是由奥列尔科维奇家族统治，而这个家族的血缘可以上溯至立陶宛最早统治者之一的阿尔基尔达斯，所以其地位即使不能与立陶宛大公相提并论，仍相当接近。一四七○年曾到诺夫哥罗德协防的基辅亲王便是这个家族的成员。他会在一四七一年离开诺夫哥罗德，部分是为了争取继承父亲在基辅留下的爵位。但让他吓一跳的是，卡西米尔不但没有让他继位，反而取消了基辅公国，改派属下官员治理该地区。

基辅诸亲王永远不会原谅卡西米尔四世抹除了他们的公国，让他们的梦想破灭。一四八○年，卡西米尔得到消息，几位基辅亲王阴谋行刺他，取代他的大公位阶。事情败露后，有些密谋者被捕，有些逃到了莫斯科。但这一插曲加上克里米亚鞑靼人对立陶宛大公国的进攻，都让卡西米尔无法调兵支援在乌格拉河和莫斯科人对垒的阿合马可汗。卡西米尔早前是因为害怕莫斯科大公国的强大而没有支持诺夫哥罗德，这一次则是几位基辅亲王的反叛而未能帮助金帐汗国对付莫斯科。

卡西米尔在一四九二年去世，随后的政权真空让伊凡三世获得绝佳机会去推进他对「全罗斯」的权利要求，发起一场对立陶宛大公国的全面性战争。立陶宛边区的亲王只能自求多福，因为立陶宛军队不是无法驰援就是不够强大，不足以保护这些附庸国。在这种情况下，边区众亲王认为自己不必再承受忠于立陶宛大公的誓言束缚。其中一个「叛徒」沃罗滕斯基在写给立陶宛新任大公亚歷山大的信上说：「阁下，您的父亲曾在我面前亲吻十字架，保证捍卫我的祖产，但阁下却没有对我行行好……没有站出来捍卫我的祖产。」56亚歷山大57同时运用军事力量和外交手段阻止莫斯科的推进，但只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不得不承认伊

凡的新头衔，因而又失去一些重要领土，包括基辅附近的切尔尼戈夫。

亚歷山大的统治开启了一个新纪元，此后的立陶宛大公和波兰国王全都对莫斯科在东部的攻势採取比卡西米尔更严肃以待的态度。亚歷山大不得不放弃卡西米尔四世的中央集权化改革，与大公国内的王公氏族结成联盟。他承认王公会议的权威性，承诺在任免重要官员时会先与王公会议的成员协商。他还与鲁塞尼亚人（即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亲王建立起密切关系。一五一四年，莫斯科军队在奥尔沙之役被一位鲁塞尼亚人亲王率领的立陶宛 - 鲁塞尼亚联军打败，前此几乎从未间断的向西扩张第一次受到抑制。这场战争暂时确定了「全罗斯」的边界：包括斯摩棱斯克和切尔尼戈夫，但不包括基辅和波洛茨克（分别位于今日乌克兰和白罗斯境内），后两者仍然处于立陶宛大公国的控制之下。莫斯科在一五○五年伊凡三世驾崩和继承者瓦西里三世在一五三三年驾崩之后都发生内部倾轧，让莫斯科向西扩张的势头暂缓下来，但他们对取回立陶宛大公国境内「祖产」的野心始终存在。

莫斯科与立陶宛的战争，一开始是由争夺诺夫哥罗德所引发，然后是在要收回基辅罗斯祖产的名义下持续，这让莫斯科成为东欧政治舞台的要角。它不再只是为独立而战，还一心想把边界扩大至蒙古势力的原有边界之外。

一五二○年代，莫斯科的知识分子炮制出一本新的宗谱，称为《弗拉基米尔诸大公的故事》，用它把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从前的弗拉基米尔诸大公和罗马帝国的开创者奥古斯都连结在一起。这种连结是靠着一个传说人物普鲁斯作为中间环节达成。普鲁斯据说是奥古斯都的弟弟，如此一来，罗马帝国的创始人和莫斯科的统治者便有了共同祖先。但弗拉基米尔诸大公（和后来的莫斯科诸大公）又是怎样和普鲁斯扯上关系的？宗谱编撰者採取的解决方法非常简单：用另一个传说人物作为中间环节，而这个人就是基辅罗斯的奠基人留里克。根据罗斯编年史的记载，留里克是来自北方，而该地区据说又是奥古斯都分封给普鲁斯的。

就像担心这种血统关联还不够强有力似的，宗谱编撰者还用更有歷史根据的方式把莫斯科和罗马扯上关系。这一次是以拜占庭为中介。它把弗拉基米尔诸大公和莫斯科诸大公都说成是十二世纪基辅罗斯统治者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后继者，而因为他的外公是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君士坦丁九世又和奥古斯都有着血缘关系，如此，莫斯科便与罗马帝国连结在一起。总之，莫斯科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说成是罗马的继承人。根据《弗拉基米尔诸大公的故事》所述，君士坦丁九世把他的全套皇帝衣冠传给了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后来这套衣冠又为莫斯科

大公所继承，其中包括一顶「莫诺马赫之冠」，其性质相当于东罗马皇帝的皇冠。但这东西实际上是十四世纪之物，来自中亚，有可能是金帐汗国可汗所赐的一件礼物，意在象徵莫斯科大公的附庸地位。经过重新想像，这件蒙古人所送的礼物如今变成了皇权的象徵。

「莫诺马赫之冠」和「奥古斯都 - 普鲁斯 - 莫诺马赫 - 莫斯科统治者」一脉相承的说法，将会在莫斯科的政治思想中占据极大的分量。两者都被纳入伊凡四世（又称「恐怖伊凡」）的加冕典礼。他是第一个被称为沙皇的莫斯科统治者—「沙皇」是斯拉夫语，衍生自拉丁语「凯撒」，意为「皇帝」或「万王之王」。伊凡四世的加冕典礼举行于一五四七年，「莫诺马赫之冠」被用作加冕的王冠。设计这一套的是都主教马卡里，他在加冕典礼上把神圣权力赋予了新沙皇，强调这个王朝的基辅源头和更前面的罗马源头。接下来几十年，奥古斯都传说都是官方宗谱学的核心元素，被写入莫斯科沙皇国第一部官修史书《皇室宗谱》。此书是恐怖伊凡一五六○年下旨编修，在都主教的宫廷里撰写。奥古斯都神话也被画入莫斯科的宫殿和大教堂的壁画。曾在一五一九年出使莫斯科的哈布斯堡特使赫伯斯坦，在一五四九年发表的出使记中表示，他遇过的莫斯科人莫不相信留里克和当前的统治者带有罗马帝国皇帝血统。

多了这一层和罗马的关系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好处。在国内，它可以让统治家族的地位高于其他王侯家族；在国外，它可以让沙皇和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平起平坐。恐怖伊凡的地缘政治目标显然不同于他的父亲和祖父，他把外交政策的重心从夺取更多罗斯土地改为夺取金帐汗国的土地。一五五二年，他击败和吞併了喀山汗国58。该城市的居民被赶走，由俄国沙皇的臣民取而代之—这种政策先前在诺夫哥罗德和斯摩棱斯克都曾使用过。一五五六年，伊凡的军队击败了金帐汗国另一继承者阿斯特拉罕汗国59，莫斯科自此控制了无比重要的伏尔加贸易路线。这也是一次意识形态上的重大胜利，因为在此之前，莫斯科编年史一直称这两个汗国的统治者为「沙皇」，併吞它们让伊凡的沙皇国的权威更加扩大。在他的外交信函里，他都会分别提到自己统治了莫斯科沙皇国、喀山沙皇国和阿斯特拉罕沙皇国多少年。

如果说伊凡自称是奥古斯都后裔让他可以和哈布斯堡王朝平起平坐，那么，他对两个伏尔加汗国的征服则大大改善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地位，给了他作为一个皇帝的实质基础。一五五七年，即征服阿斯特拉汗国翌年，伊凡写信给东正教最高领袖，君士坦丁堡牧首，要求对方在他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的基础上承认他是沙皇。他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引用同样的论证。但对于伊凡要求别人承认他为沙皇或皇帝的要求，

各方反应不一。君士坦丁堡牧首因为乐于看见有一个信仰东正教的新皇帝可以作为他的潜在保护者，在一五五八年向伊凡保证：「这位沙皇的名字会就像从前的拜占庭沙皇〔皇帝〕那样，每个星期天在普世教会被提起。」60但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的态度却是有所保留，因为莫斯科统治者的新头衔会削弱他们权威的普遍有效性。因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二世在一五七六年建议伊凡，不妨称自己为东方的皇帝–这可能是一种拜占庭的传统，或「全罗斯」的皇帝，一个和伊凡的祖先不同的头衔。

一五五八年，伊凡因为看见他的沙皇头衔得到君士坦丁牧首承认却不被西方国家承认，愤而挥兵西进。这场利沃尼亚战争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至一五八三年结束，一开始是攻击衰落中的地方强权利沃尼亚骑士团，这是由条顿骑士团所建立的国度，领土涵盖部分爱沙尼亚、部分拉脱维亚和小部分立陶宛土地。伊凡四世的军事活动一开始很顺利，但他对骑士团的摧毁却让四邻国家感到威胁。立陶宛大公国自十五世纪末叶便对莫斯科的咄咄逼人有切肤之痛，所以出兵襄助骑士团，结果惨败。一五六三年，恐怖伊凡拿下波兰城市波洛茨克，其位于今日白罗斯境内，莫斯科曾在一四七八年征服诺夫哥罗德后马上声称对其拥有主权。一五六九年，在波兰城市卢布林，形势困窘的立陶宛大公国被迫重新和波兰王国结合，形成两个国家的永久联盟，自此失去了独立性。它也把乌克兰拱手让给波兰，自己只剩下白罗斯。波兰和立陶宛的结合，加上瑞典的相助，终于把莫斯科的侵略势头遏止住。

莫斯科沙皇发现自己落入下风。一五七一年，克里米亚鞑靼利用莫斯科在西方用兵的机会，占领了莫斯科61，让伊凡不得不结束他的恐怖统治，这恐怖统治体现在他用于清洗贵族的「特辖制62」。但他在西方的战争继续节节败退。新任波兰国王巴托雷在一五七九年率领波兰 - 立陶宛联军重新夺回波洛茨克。两年后，瑞典人把莫斯科军队赶出纳尔瓦，纳尔瓦是波罗的海的贸易重镇，自一五五八年之后便是由莫斯科控制。一五八二年，伊凡为情势所迫，签下和平条约，收起他想获得另一个波罗的海「沙皇国」的野心。这位沙皇被臣民视为全世界东正教的保护者，但在求和过程中却不得不求助于教皇出面调停。这是让自称拥有罗马帝国皇帝血统的伊凡最为丢脸的事情。

恐怖伊凡死于一五八四年，即他与瑞典缔结和约结束利沃尼亚战争的一年后。其子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继承大统，而费多尔将会是坐在莫斯科御座上最后一个留里克「子孙」。他继承的是一个经济破败和饱受战争及恐怖蹂躏但更中央集权化的国家。他也继承了父亲的沙皇头衔和「莫诺马赫之冠」（现在沙皇头衔受到所有外国领导人的认可）。这顶

王冠和依附在它上面的传说体现着俄罗斯沙皇国及其菁英阶层在十六世纪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复杂身分认同。王冠上镶有中亚的黄金和珠宝，还编织着三层看不见的歷史神话：第一层是基辅神话，然后是拜占庭神话，最后是罗马神话。在设法把自己连结于罗马时，莫斯科无论是取道波罗的海和普鲁士或是取道黑海和君士坦丁堡，都无法绕过基辅，亦即第一批留里克王朝大公的根据地，没有它，莫斯科能够提出主权主张的土地便只剩下蒙古人的遗产。

在莫斯科从一个附庸国变成主权独立国家再变成帝国的过程中，基辅神话变成了莫斯科意识形态的奠基石。它的统治者后来将会发现，他们想要摆脱这个起源神话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仍旧是难之又难。

43 托马斯．帕拉奥洛戈斯为拜占庭帝国皇子，封地在摩里亚，位于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

44 都主教是当时全罗斯东正教会最高领袖，受君士坦丁堡牧首管辖。

45 救世主塔楼（Spasskaia Tower / Savior’s Tower）为克里姆林宫东侧城墙的主要塔楼，也是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入口，在这里可以俯瞰红场。

46 俄罗斯早期以上帝创造天地的西元前五五○八年为纪元之始，彼得一世改用儒略历法（Julian Calendar），宣布自一六九九年（七二○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直接跳到一七○○年的一月一日，此为新年之始，不再以九月一日为元旦。

47 即基辅罗斯全域。

48 这个字原是希腊人对国王的称谬。

49 「莫诺马赫」（Monomakh）是「单打独斗者」之意。

50 似乎是指那里有大量木材可供制造攻城槌。

51 Ipat’evskaia letopis’ (St. Petersburg, 1908), col. 785.

52 同上。

53 由于基辅成为废墟，都主教于一二九九年移至弗拉基米尔，一三二六年在莫斯科大公力邀之下并建造一座大教堂，此后都主教永驻莫斯科。

54 Serhii Plokhy, 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 Premodern Identiti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 (Cambridge, 2006), 137.

55 V. T. Pashuto, B. N. Floria, and A. L. Khoroshkevich, Drevnerusskoe nasledie i istoricheskie sud’by vostochnogo slavianstva (Moscow, 1982), 172.

56 Mikhail Krom, Mezh Rus’iu i Litvoi: Pogranichnye zemli v sisteme russko-litovskikh otnoshenii kontsa XV-pervoi treti XVI veka (Moscow, 2010), 100.

57 即使亚歷山大是伊凡三世的女婿，也未能消除伊凡争夺祖产的企图心。

58 喀山汗国（Khanate of Kazan）系金帐汗国可汗后裔于一四三六年建立，位于今喀山一带。

59 阿斯特拉罕汗国（Khanate of Astrakhan）系金帐汗国可汗后裔于一四六六年建立，位于伏尔加河下游注入里海处。

60 Mikhail Zazykin, Tsarskaia vlast’ v Rossii (Moscow, 2004), 57.

61 克里米亚鞑靼人虽然攻入莫斯科，但没有攻破克里姆林宫，而且很快被赶走。

62 「特辖制」（Oprichnina）主要是恐怖伊凡使用祕密警察（称为「特辖军」）残酷整肃贵族而做的一种设计。特辖制始于一五六五年，至一五七二年结束。

第二章　第三罗马

一五八六年六月，莫斯科宫廷来了一位不寻常的贵宾：安提阿牧首约阿希姆五世。安提阿是东方基督宗教（即东正教）五个最古老和德隆望尊的牧首教区首府之一。这时，沙皇费多尔已继承皇位两年。他穿着全套皇帝衣冠，在几十个御前大臣的陪同下接见约阿希姆。他从御座上站起来欢迎这位贵宾，向前足足走了两公尺，以示他对牧首崇高地位的尊崇。接受过约阿希姆祝福后，费多尔又邀请他一同用膳，这是另一项罕见的殊荣。

莫斯科习惯接受东方各牧首的资金援助请求，但在一五八六年之前从没有接待过一位牧首。莫斯科东正教教会的地位一向低于拜占庭的教会，从它的领袖是一位都主教而不是牧首可见一斑，尤有甚者，这位都主教甚至不被「四大牧首」—君士坦丁堡、亚歷山卓、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的牧首承认。虽然约阿希姆的来访让沙皇有机会提升自己在东正教世界的地位，但这个机会也包含着一个挑战。他要怎么证明莫斯科教会比东方的教会更胜一筹？沙皇把这个艰难任务留给他的都主教季奥尼西去伤脑筋。与约阿希姆用过餐后，费多尔建议他先去见见都主教，后者在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大教堂等候。当牧首进入大教堂，季奥尼西不顾东正教的惯例，抢先给了牧首祝福。约阿希姆大吃一惊，表示由他来祝福都主教才是合适的做法。但不管怎样，季奥尼西已经抢得先机，赢得外交战的第一回合胜利。其余的事情便由沙皇和他的顾问处理。

他们要求约阿希姆把莫斯科都主教教区提升为牧首教区。听到这个让人吓一跳的要求，他决定採取拖延战术。他一方面亟需沙皇的布施，不愿冒两手空空离开莫斯科的风险；另一方面，创立牧首教区的权力是在大公会议63，不是他能够单方面作主。根据莫斯科人的文献记载，约阿希姆回答说，他认为莫斯科有自己的牧首教区是好事，但他必须先和其他牧首商量，在大公会议上做出决定。他承诺一回到自己教区就会去游说其他牧首。费多尔对这个回答感到满意，送给他丰厚礼物，又託他转送礼物给君士坦丁堡和亚歷山卓的牧首。

莫斯科有志成为拜占庭继承人和世上仅存的东正教帝国的憧憬形成于十六世纪初。但只要莫斯科一天没有自己的牧首，这一憧憬就无法充分实现。所以。沙皇必须不断向东方的各个牧首寻求精神支撑和合法性。这也是恐怖伊凡为什么需要请求君士坦丁堡牧首承认他的沙皇称号。一五八一年，他的儿子，也是继承人伊凡死亡—同时代人声称他是被父亲在一阵盛怒下杀死。恐怖伊凡派使者前往东方，要求各教会为儿

子的灵魂得安息祈祷。

在在看来，约阿希姆的承诺都让莫斯科成为一个真正东正教帝国的宿愿即将实现。在十六世纪的西欧和中欧，最重大的事件是基督新教改革、天主教改革，以及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对莫斯科而言，首要之务是让它的教会在东正教世界取得更高地位。十七世纪的前半叶将测试莫斯科世俗和宗教的既有关系，以及测试莫斯科对自己和它周遭世界的看法。

莫斯科教会和东方各牧首的关系在十五世纪中叶破裂，当时，罗斯的都主教希腊人伊西多尔被关进莫斯科一座监狱，罪名是倡议东正教和罗马教会的统一。

伊西多尔是一四三七年到莫斯科履新，后来前往佛罗伦斯参加大公会议。在大公会议上，他是主张教会统一最不遗余力的人之一。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裂发生在十一世纪，当时，操拉丁语的西方–以罗马教皇为代表，和操希腊语的东方–以拜占庭的皇帝和牧首为代表，中断了交流。基督宗教这两个分支是因为对圣灵（Holy Spirit）的神学见解有差异而发生冲突：东方基督徒相信，圣灵唯独出自圣父（God the Father）；西方基督徒却相信，圣灵以同等程度出自圣父和圣子（God the Son）。这个争论和其他许多神学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谁应该掌握教会的终极权威？是罗马教会抑或君士坦丁堡教会？政治差异和文化差异也把这两个曾经同属罗马帝国的地区推向不同方向。在东方，教会服从于皇帝，皇帝同时拥有世俗和宗教最高权力；但在西方，教皇却不得不与世俗统治者竞争，由此产生出一种比东方多元的政治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将会让它的东方对手黯然失色。

在一四三九年的佛罗伦斯大公会议上，由教皇授意，双方讨论并通过了东正教和天主教的统一。东正教的代表同意接受天主教的神学教义，但保留自己传统的拜占庭礼拜仪式和容许教士结婚的制度–这种立场后来被称为联合教会64。拜占庭的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会接受这个统一，是因为希望罗马会出手帮助他抵抗鄂图曼帝国的步步进逼，结果希望落空。伊西多尔在一四四一年返回莫斯科后，马上被伊凡三世的父亲「瞎子」瓦西里二世下令逮捕。他成功逃狱，瓦西里二世也没有追捕他。因为如果抓到他，根据教会的规定，必须把这个叛教者「活活烧死或活埋」。

为什么莫斯科在一四四一年会拒绝教会重新统一？一个解释可以在瓦西里写给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信中找到：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之间的神学差异不可抹杀。但考虑到这些信件的署名人是大公而不

是莫斯科教会，我们也许可以假定，他的决定至少部分是出于政治考量。莫斯科教会之所以在莫斯科崛起为一个独立国家之际脱离君士坦丁堡教会独立绝非偶然，因为君士坦丁堡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一直是金帐汗国的盟友。我们知道，瓦西里想要自己任命罗斯的都主教，甚至曾把钦点的人选送到君士坦丁堡寻求批准，却遭到拒绝。后来这个职位落在了伊西多尔身上。后者被捕后，瓦西里再次要求君士坦丁堡准许他自行提名人选，但再次遭到拒绝。

佛罗伦斯会议的教会统一决议给了这位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一个与君士坦丁堡切断关系的绝佳藉口，从此得以自行任命莫斯科都主教。一四四八年，东正教主教会议选出沙皇指定的候选人约拿为都主教，莫斯科自此和君士坦丁堡切断所有关系。所以，早在拜占庭帝国首都于一四五三年秋季被攻陷前，莫斯科都主教教区便是独立或自治。它这种孤立于东正教世界其他部分的状态将会持续近一个半世纪之久。但莫斯科大公继续自称是拜占庭遗产的继承者，也继续想办法和罗马建立有利的联繫。伊凡三世和索菲娅的婚姻便是这种态度的一种表现。

在俄罗斯歷史上，一四四八年（即莫斯科教会与君士坦丁堡切断关系的一年）和一四七二年（伊凡迎娶索菲娅的那年），属于相当不同的阶段。在前一阶段，莫斯科备受内部纷争困扰，想尽办法摆脱金帐汗国独立。但在后一阶段，它已取得实质上的独立，控制了原属金帐汗国的所有罗斯土地。伊凡娶索菲娅有助于莫斯科打开通往外面基督宗教世界的出口，因为这桩婚事的月老不是别人，正是教皇本人。索菲娅婚后固然必须皈依东正教，莫斯科也没有改变拒绝教会统一的立场。但莫斯科统治者在罗马的协助下娶一位联合教会女子为妻的做法，仍然标志着他的地位受到西欧和中欧政治和宗教高层的承认。

一四九○年代初期的俄罗斯宗教菁英抱持以下这些观念：莫斯科沙皇是拜占庭皇帝的继承人；莫斯科是第二个君士坦丁堡；莫斯科和罗斯土地是拜占庭帝国的延续。这些观念在一四九二年由莫斯科都主教佐西马首次清楚表达。那一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莫斯科的东正教信徒则是忙着为世界末日预作准备。根据东正教教历，以上帝创造天地的那一年算起，一四九二年正是第七千年，也是世界终结的时候，所以莫斯科的东正教信徒认为一四九二年将是他们和其他人类生存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年。他们感谢上帝让他们拥有正信，得以在世界末日得救。

但让莫斯科教会人士吓一跳的是，世界并没有在一四九二年结束。世界继续存在让罗斯教会碰到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怎样计算变动不居的復活节的日期？都主教佐西马接下了这个挑战，制定出《復活节循环週期探论》一书。他和很多莫斯科人都相信，新的年历和新的东正教时

代是随着世界权力结构的变化而肇始。在这个层级结构的最顶端，拜占庭的东正教帝国被莫斯科公国取代，拜占庭皇帝被莫斯科沙皇取代。根据佐西马，上帝已经在新君士坦丁堡安立了伊凡三世作为「一位新的沙皇，一位新的君士坦丁，他是莫斯科和整个罗斯和许多其他土地的最高主宰」65。佐西马除了把莫斯科称为新君士坦丁堡，又把君士坦丁堡称为新罗马（在某些副本中，又称之为新耶路撒冷）。

在十五和十六世纪，莫斯科同时被想像为一个新耶路撒冷和一个新罗马，但最引起歷史学家注意的却是莫斯科作为「第三罗马」的观念，因为这个比喻启发了一种教会 - 皇帝关系的新模式。莫斯科被称为「第三罗马」首见于十六世纪初叶的一些信函，而写信人被认为是普斯科夫一间修道院名叫菲洛费的僧人（此时的普斯科夫已被莫斯科兼併）。在一次上书瓦西里的时候，他提醒这位大公不可忽略甚至损害教会的利益。菲洛费指出，罗马教会因为异端邪说的入侵而失陷，而第一罗马衰亡后继承帝国和属灵（spiritual）权力的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后来又被穆斯林接管。所以，莫斯科变成了第三罗马，担负着保存纯真信仰（true faith）的责任。菲洛费在书信开头即表达了这个观念，书信末尾又再提一次：「所有的基督宗教王国如今都集结在您一人之下。前两个罗马已经陷落，第三罗马将永世长存，不会有第四罗马出现，您的基督宗教王国将不会被另一个所取代。」66

莫斯科作为第三罗马的观念一度在恐怖伊凡统治期间几乎被完全忘掉，但在他死后又热烈復活，表现在莫斯科努力争取自己的都主教教区升格为牧首教区。一五八八年夏天，即安提阿牧首约阿希姆五世离开莫斯科的两年后，沙皇费多尔接获消息，得知这位牧首的游说已经起到预期的效果。这时，斯摩棱斯克官员又发来报告，说是从东方来了一位新贵宾：君士坦丁堡牧首耶利米二世。沙皇派出一名大臣去欢迎他，询问他大公会议是否已经决定创立莫斯科牧首教区。让莫斯科方面失望的是，耶利米表示他对莫斯科的升格要求一无所知，也没有带来任何决议。耶利米此行的唯一目的是前来募集布施，以改善过去称为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坦堡东正教会的财务状况和建造一座新的牧首教堂，因旧的教堂如今已由鄂图曼土耳其接管。

虽然莫斯科当局为进入莫斯科的耶利米安排了肃穆的入城仪式，但都主教并没有出现在欢迎会上，而沙皇也过了八天才接见耶利米。他坐在一头驴子背上进入皇宫，大概是象徵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但沙皇迎接他时只踏出之前迎接安提阿的两公尺距离的一半，原因要不是沙皇不确定耶利米是否为货真价实的牧首，要么由于不高兴耶利米没有带来好消息。沙皇也没有邀请耶利米共膳，却改让他与朝廷的顾问碰面。他们问

他东正教在鄂图曼帝国治下的处境。之后，耶利米就被送回住处等候消息。

这位东正教牧首接下来形同囚犯。根据他的一名随行人员记载：「在他们软禁耶利米的地方，任何本地人都不容许见他，他也不容许外出。只有随行的僧侣有需要时可以在沙皇的人马陪同下前往市场。这些僧侣全程都会被监视，直到回到自己的住处为止。」67先前，牧首约阿希姆在莫斯科待了不到两个月，但这一次耶利米却待了将近一年：从一五八八年七月待到一五八九年五月。他最终完成了莫斯科的心愿，给它创立了一个牧首教区并在成立典礼上主持祝圣。

祝圣仪式在一五八九年二月初举行。不出意料之外，被选出的莫斯科新牧首是原来的都主教约伯。同年五月，沙皇费多尔给耶利米放行，又送给他一笔厚礼。但他获释是以同意创立一个牧首教区作为代价，此举违反了所有的既有教会章程。不过，几年后，东方各牧首因为愈来愈穷和愈来愈依赖沙皇的布施，追认了耶利米擅作主张的决定。

于是，莫斯科终于成为东正教一个牧首教区的首府。它的资歷当然是最浅，远不及君士坦丁堡、亚歷山卓、安提阿和耶路撒冷四个歷史悠久的牧首教区。不过，论实质，它却是东正教世界最大、最富有且最有权势的牧首教区。它的权势来自于沙皇，它的真正主人也是沙皇。新的莫斯科牧首约伯不但没有参与和耶利米的谈判，甚至没有在祝圣仪式之前和耶利米见过面。创建莫斯科牧首教区的牧首谕令明确提到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旧罗马因为被亚波里拿留主义68的邪说蛊惑而跌倒，第二罗马━即君士坦丁堡━又已经被夏甲的后代69占领，也就是被目中无神的土耳其人占领。虔诚的沙皇啊，您的伟大罗斯沙皇国，您的第三罗马，已经在虔诚上超越了它们，而所有虔诚的信徒都已被统一在您的沙皇国里。在穹苍之下，在全宇宙之内，唯有您一人被称为基督徒沙皇。」70

耶利米在其他文件中都没有把莫斯科称为第三罗马。这强烈显示，诏令是莫斯科方面拟稿，耶利米只是负责签字。歷来第一次，这个形成于世纪之初的观念被拿来促进莫斯科教会和国家的目标。当初，菲洛费提出这观念是为了保护教会，让它免于被世俗权力侵犯，但现在，它却被改为用于加强新创建牧首教区及其实际控制者沙皇的地位。莫斯科已准备好为自己在东正教世界争取首位。

创建莫斯科牧首教区的关键人物不是沙皇费多尔，而是他的妻舅兼智囊戈都诺夫。前面提到安提阿的约阿希姆和君士坦丁堡的耶利米，两位东方牧首分别于一五八六年和一五八八至一五八九年到访莫斯科，都

是由他一手安排。莫斯科都主教约伯因为和戈都诺夫走得非常近，得以在一五八九年成为第一任莫斯科牧首。戈都诺夫出身外省小贵族之家，靠着在恐怖伊凡的祕密警察「特辖军」建功而往上爬，最终成了这位沙皇最亲密的助手之一。

沙皇费多尔在一五九八年一月驾崩，得年四十岁，没有留下继承人：他的异母弟德米特里早在七年前的一五九一年五月死亡，死因可疑。费多尔死后，权力落在妻子伊琳娜手里，然后又落在她本来就权大势大的哥哥戈都诺夫手里。留里克王朝世系自此绝嗣，恐怖伊凡相信自己是留里克后人，这种信念或宣称也是莫斯科能够跟基辅、君士坦丁堡以及罗马扯上关系的基础。戈都诺夫的家族相传是鞑靼人，不是基辅公国的统治者。但由于他政治手腕高明，让改朝换代的过程相当平顺，获国民大会71选为沙皇（国民大会是由莫斯科社会各阶层代表组成的谘询机构，最初是由恐怖伊凡召集）。

根据莫斯科公国的历法，一五九八年九月一日是元旦（要到十八世纪初叶，彼得一世才把元旦改为一月一日）。这一天，莫斯科的显要齐集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出席新沙皇的加冕典礼。戈都诺夫在一队侍臣的护卫下现身。一个侍臣端着「莫诺马赫王冠」，一个端着沙皇权杖，还有一个端着「金球」—一个镶在十字架顶端的球体，被当时的莫斯科文献称为「苹果」。戈都诺夫登上御座，由他忠心的牧首约伯授予他皇室徽章。就这样，十六世纪随着一支崭新政治和宗教团队的出现而结束。这种有序的权力转移似乎预示着一个光明的未来：有一个新的沙皇和新的牧首坐镇，这个东正教帝国的辉煌未来看来指日可待。

但十七世纪初莫斯科公国遭遇了无数的困难。一六○五年四月，戈都诺夫在一片社会动盪中突然死亡，让国家陷入了旷日废时的血腥政治危机、内战和国际冲突。被称为「混乱时期」，这段时期歷时八年之久，换了几位沙皇。头一个是奥特列比耶夫，他本来只是个被解职的僧侣，却公然冒充恐怖伊凡已死的最小儿子德米特里，并成功骗过大多数人。但他在位不到一年，一六○五年六月至一六○六年五月，就被真正有着留里克血统的新沙皇舒伊斯基的支持者所杀。舒伊斯基又在一六一○年七月被瓦迪斯瓦夫四世的支持者赶走。瓦迪斯瓦夫四世是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之子，因为觊觎沙皇之位出兵占领莫斯科。混乱时期在一六一三年结束，波兰人被赶走，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被选立为沙皇，一个新王朝自此诞生72。

混乱时期对形成于上一个半世纪，即蒙古统治结束之后的莫斯科歷史、政治和文化认同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这个危机开始于把沙皇与他统治的国家分离开来的过程，因此奠定了近代俄罗斯国家的基础；

另一方面，驱逐入侵者波兰人的爱国热情也让效忠沙皇和效忠教会及祖国（fatherland）变得密不可分。在该时期的官方论述中，不忠于三者的其中之一被等同于同时对三者不忠。

在用来动员莫斯科驱逐入侵者的主要意识形态论据中，捍卫东正教变成是最重要的一项。在一个没有统治王朝或合法世俗机构治理国家的状态下，教会变得特别重要。于是，教会领袖从本来只是从属于政治领袖的角色，在莫斯科公国的政治变得举足轻重。这个角色由牧首赫尔莫根扮演，他是莫斯科第三任牧首。但他看起来不像是能担此大任的人，因为在一六○六年七月，他已经七十五岁，按当时的标准非常高龄。

赫尔莫根的牧函反映出，莫斯科的宗教和世俗菁英，在回应混乱时期的挑战时，世界观有了改变。在牧函中，赫尔莫根拒绝承认那些背叛新沙皇舒伊斯基的人是真正的基督徒：

> 我现在转向你们—不同学歷、年龄和职位的前东正教基督徒。但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称嗯你们，因为你们已经对上帝转过身，对真理怀有仇恨，远离了普世和使徒的教会，离弃了沙皇瓦西里．伊凡诺维奇73—他的花圈是上帝所赐，王位是经由圣油所膏立。你们已经忘记你们对东正教信仰的誓言，忘记了你们是在这信仰中出生、受洗和长大；你们已经放弃了你们对十字架的亲吻和你们曾发誓会为捍卫至圣圣母的教会和莫斯科国家而死，改为效忠于你们那个冒称沙皇的沙皇。74

赫尔莫根坚持，一个爱国的莫斯科人和真正的基督徒也必须同时效忠沙皇，这种主张是十七世纪头几十年莫斯科文学的一个基调。

混乱时期结束于一六一三年，当时国民大会选出十六岁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族长是新沙皇的父亲费多尔，他曾在最后一位留里克王朝沙皇（也是叫费多尔）驾崩后竞逐过沙皇宝座。费多尔落败，戈都诺夫当选后把他放逐到北方一家修道院，强迫他为僧。戈都诺夫死后，费多尔获得平反，回莫斯科之后被立为罗斯托夫的都主教，并改名菲拉雷特。他在一六一○年被波兰人逮捕，接下来八年被软禁在波兰－立陶宛共和国。

波兰和莫斯科在一六一九年签订停战协议后，菲拉雷特得以回到莫斯科。当时，他儿子已登上沙皇宝座六年。翌年，菲拉雷特当选牧首，因此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地位本来在牧首之上的沙皇变成了是牧首的儿子。理论上，两人各有不同的职司，但明显的是，专横的牧首支配着他温顺的儿子。拜占庭的模式，即牧首受皇帝支配的模式，就此

被逆转了。

这位新牧首对沙皇国之外的东正教世界毫无好感。菲拉雷特在波兰当俘虏那段期间的所见所闻让他深信，乌克兰和白罗斯的东正教因为受到天主教君主统治和常常被迫和非东正教的教会打交道，灵性已经腐化。更严重的问题是共和国强迫部分的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统一。一五九六年布列斯特会议创立新的联合教会，承认教皇拥有至高无上地位，并接受天主教教义，只保留传统的拜占庭礼拜仪式。菲拉雷特指控联合教会「脚踏两条船」，又认为即使是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境内那些拒绝教会统一的东正教会，仍算不上货真价实的东正教徒和基督徒。

从一六一九年当上牧首直至一六三三年去世为止，菲拉雷特都是莫斯科的实质统治者。在他的主导下，国家和教会融合为真正东正教的最后堡垒。不过，他虽然质疑莫斯科以外每一个基督徒的资格，却热中和非东正教的统治者缔结政治联盟，为的是打败他恨之入骨的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和夺回在混乱时期被其夺去的土地。菲拉雷特在俄国与共和国发生另一场战争期间死去，这场战争又是以莫斯科战败收场。在霸气的父亲死后，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成了莫斯科唯一的统治者。但把牧首视为最高主宰的传统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消失。而且，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之间的紧张也继续存在。这种不利于沙皇的局面一直要到三十年后才获得全面解决。

在欧洲天主教国家和基督新教国家大打出手的「三十年战争」（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中，莫斯科巴不得和基督新教国家结盟，共同对付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但又处处受到东正教会掣肘，东正教会拒绝承认其他基督教会拥有完整统治权。这一限制在一六四四年以让人尴尬的方式清楚地表现出来。当时，丹麦的瓦尔德马王子前往俄罗斯迎娶沙皇米哈伊尔的女儿伊琳娜，受到莫斯科盛大欢迎。这场婚礼被认为可以落实莫斯科和丹麦之间酝酿已久的联盟关系，瓦尔德马和伊琳娜早在一六四○年便已订婚，但最后却以破局收场。受到来自教会高层的压力，沙皇坚持瓦尔德马娶伊琳娜之前必须转皈依东正教。但王子并不打算留在莫斯科或要求其王位，所以一口拒绝。沙皇不让他离开，结果，王子一直被软禁到米哈伊尔在一六四五年驾崩、皇子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登基为止。

伊琳娜和阿列克谢非常亲密，她的婚姻泡汤向新沙皇和他的顾问们表明，东正教教会已经成为一块政治石头。进一步证据，来自莫斯科的东正教神学家在和瓦尔德马王子带来的路德宗传道人辩论基督宗教教义和婚姻问题时，没有能守住阵线。但教会之内有一个改革运动正在壮大，致力于提高神职人员的教育程度和消灭腐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

「虔诚狂热派」，成员之一的修道院院长尼康在一六五二年成为莫斯科牧首。尼康在获得沙皇的同意后，在沙皇的头衔中加入「最高主宰」一词。就职以后，尼康对教会发起了雄心勃勃的改革，以回应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改革所带来的挑战。他的改革路线基本上是追随基辅都主教莫吉拉不久前在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所进行的改革。

莫吉拉是摩尔达维亚统治者之子，一六三三年成为基辅都主教后不遗余力改革乌克兰和白罗斯的东正教，以顺应新时代的潮流。他一开始先是加强神职人员的教育。一六三二年，他把原有的两所东正教学校合併成为基辅学院，其结构和课程是仿效耶稣会办的学院，是乌克兰第一家採取西方模式的教育机构。由罗马教廷在特伦特大公会议（一五四五至一五六三年）发起的天主教内部改革，成为莫吉拉改革波兰 - 立陶宛境内东正教的灵感来源和楷模。

天主教的影响力明显见于这位都主教的礼仪革新和他制定的信纲，在这之前，东正教并没有自己的信纲。在莫吉拉的监督下，一批知识分子于一六四○年代编订了一部东正教自己的「教义问答」，经基辅的宗教会议通过后推行。一六四三年，这部教义问答得到东方四大牧首批准，从此成了整个东正教世界对教义和信条的官方解释，唯一显着例外是莫斯科。

基辅兴起成为东正教世界学问中心的这段时间，莫斯科和其教会却是把自己几乎完全孤立起来，对其他东正教教会面对的挑战浑然不觉。但年轻沙皇阿列克谢改革教会的愿望改变了莫斯科对基辅和其教义的态度。把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的莫过于在出版领域。一六四九年，莫斯科出版商以莫吉拉的东正教信纲为底本，编辑和出版了《信条教导扼要全书》。就这样，莫斯科东正教会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东正教会重新发生连结，共同以基辅的神学教义为基础。

这样的发展不无讽刺。莫斯科一直努力修补因为他们的教会孤芳自赏所产生的问题，方法是回到东方教会父老[75]未被窜改的着作，以之作为信仰基础。但这需要检查希腊语原典的老旧莫斯科译本是否有误，必要时甚至得要重新翻译。莫斯科方面没有胜任的译者，只能从基辅引进，但这样做的同时却也引进了基辅对希腊语原典和东正教教义的整体理解。假以时日，基辅教会改革的愿景和莫斯科传统主义者的观点将会发生冲突，在莫斯科教会和社会引起深远分裂。

就在莫斯科教会出现基辅转向的同时，有一股新势力在乌克兰崛起，它不仅想要和莫斯科发生紧密的宗教连结，还想发生密切的政治连结。这股新势力是哥萨克人和他们创建的哥萨克国。一六四八年春天，

乌克兰被一场新的哥萨克人起义所震撼—这是哥萨克人自十六世纪末叶以来第七次起义。哥萨克人一开始在十五世纪的时候只是些猎兽者和土匪，但到了这个时候却上升成为一股重要战斗力量，不断向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政府要求权利和特殊待遇。到了一六四八年，他们又进一步要求政治独立。

一六四八年十二月，起义领导者亦是哥萨克老将的赫梅利尼茨基进入基辅。他受到基辅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夹道欢迎—他们把他视为罗斯人的摩西，为他把他们从波兰人的牛轭解放出来而欢呼喝彩。基辅的东正教都主教也在欢迎赫梅利尼茨基的行列。更重要的是，都主教身边伴随着一个重要的教会高层：耶路撒冷牧首帕纳吉。牧首本来是要去莫斯科向沙皇寻求布施，路上却遇到哥萨克叛军，在赫梅利尼茨基的命令下被带到基辅，让他在哥萨克人攻克基辅之后参与欢迎赫梅利尼茨基进城的盛大仪式。

帕纳吉并不介意自己的行程受阻。他把赫梅利尼茨基称为杰出的王公，并赐给他祝福，稍后又建议他组织一个全世界东正教势力的联盟—由莫斯科和乌克兰的联盟打头阵。赫梅利尼茨基需要一点点加油打气。当他一六四八年六月第一次致函莫斯科沙皇时，他把哥萨克人起义说成是对「古代希腊信仰」压迫的反抗，并说：「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土地有一个像沙皇陛下一样的独裁君主，一个信奉东正教的基督徒沙皇。」76赫梅利尼茨基希望莫斯科能够出兵支持哥萨克人。他央请准备动身前往莫斯科的帕纳吉为其说项。牧首乐见一个新的东正教联盟的成立，答应帮忙。见到沙皇之后，帕纳吉恳请沙皇基于同教情谊，提供军事援助，「把哥萨克人纳入他的长手臂之下」。

沙皇阿列克谢态度保留。他向牧首解释，身为基督徒，他不能答应赫梅利尼茨基的请求，因为莫斯科和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在一六三四年签订了和平条约。所以，除非哥萨克人能够保障自己的自由，他才能提供保护。不过，如果他们受到波兰人迫害，基于哥萨克人的东正教信仰，他也会准许他们迁徙至莫斯科。沙皇看来陷入宗教的两难处境，要么违背他对另一个基督教徒的誓言，要么保护同属东正教的基督徒弟兄。接下来四年，他都置身于乌克兰的冲突之外。莫斯科不准备攻打一个过去几十年来不止一次打败它甚至占领过它首都的国家。

及至一六五一年春天，眼看共和国无法有效镇压哥萨克人的起义，莫斯科才开始准备对它作战。莫斯科的外交官开始为违反和平条约找理由，声称赫梅利尼茨基会揭竿而起，是为了对抗宗教迫害，是因为波兰人逼哥萨克人「接受罗马的信仰，关闭他们的教堂，把统一强加给东正教教会—总之是用尽各种方式压迫他们。」77国民会议在一六五三年六

月至十月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同意开战。与会代表认为，基于「东正教信仰和上帝神圣教会」的缘故，沙皇有权把哥萨克人和他们的土地纳入他的「长手臂」（保护）之下。

一个使节团被派去通知赫梅利尼茨基，莫斯科准备好和他并肩作战。在穿过乌克兰土地的沿途，使节团到处看见有宗教游行和举行教堂庆典庆祝两群东正教人民重新统一。得到消息后，赫梅利尼茨基在基辅东南方的佩列亚斯拉夫举行哥萨克军官会议，向在座人士提出三个可能选择的方案：一是回头接受笃信天主教的波兰国王统治；二是承认穆斯林苏丹的宗主权，苏丹统治着克里米亚汗国，也有兴趣把势力向北推进；三是接受信奉东正教的沙皇保护。他自己主张最后一个方案，理由是俄国沙皇「和我们有着一样的信仰，用一样的希腊仪式礼拜」78。大家支持这位盖特曼79的主张，高喊他们想要投效「东方的东正教沙皇」。

东正教联盟于焉诞生。发生在西欧和中欧的「三十年战争」已在一六四八年结束，但东正教和天主教在东欧的战争规模反而扩大。莫斯科人和哥萨克人在佩列亚斯拉夫举行谈判时，有一些重要问题谈不拢，包括沙皇的义务和他的新子民的义务。后来，因为莫斯科的使节拒绝代表沙皇就谈定的条件宣誓─哥萨克人习惯了波兰官员代表国王宣誓，也引发了一场小危机，但因为赫梅利尼茨基不想因此危及联盟关系，旋即让步。这种地缘政治议程差异和政治文化差异最后用东正教兄弟情谊的修辞掩盖起来。

「第三罗马」的比喻，是在莫斯科都主教教区升格为牧首教区之时，进入莫斯科的官方论述。这个比喻相当有弹性，能够适应莫斯科人在十七世纪前半叶对自己和对世界一些观点的重大变化。「第三罗马」的核心观念是，俄国沙皇为拜占庭陷落后仅存的东正教沙皇。它既可以被用来强调莫斯科是一座被围困的堡垒─菲洛费在十六世纪初叶就是这种用法，又可以用来强调莫斯科教会的特殊地位甚至是首要地位。一位博学的莫斯科僧人在一六五○年写给牧首帕纳吉的信上说：「太阳底下唯一虔诚的沙皇从前是住在君士坦丁堡……但现在，取代那位沙皇的地位，我们在莫斯科有了一位虔诚的沙皇，他是太阳底下唯一的虔诚沙皇。」80一六五三年的《领航书》（一部教会法和民法的汇编）向更大的听众群提醒莫斯科在东正教世界的特殊地位，其中包括，耶路撒冷牧首耶利米在创立莫斯科牧首教区时，曾把莫斯科称为第三罗马。

到了十七世纪中叶，莫斯科已经把混乱时期的震盪完全克服。它带着新的自信回到国际舞台，深信自己在东正教世界肩负重要使命。重新认定乌克兰和白罗斯的东正教徒是货真价实的东正教徒，并愿意为他们

之故对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发起战争━这种态度标志着莫斯科对外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这种改变既和宗教战争的新时代同步，也和新教改及天主教改革所带来的国际政治新局势同步。至此，「第三罗马」论述在莫斯科从一种防守策略转变为进攻策略，接下来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愈来愈甚。

63 联合教会（Uniates）与天主教统一后的东正教因为保留东方的礼拜仪式，又称为「东仪天主教会」。

64 联合教会（Uniates）与天主教统一后的东正教因为保留东方的礼拜仪式，又称为「东仪天主教会」。

65 Iakov Lur’e, Ideologicheskaia bor’ba v russkoi piublitsistike (Leningrad, 1960), 378.

66 Pavel Miliukov, Ocherki po istorii russkoi kul’tury (Moscow, 1995), 31.

67 Makarii (Metropolitan), Istoriia russkoi tserkvi (Moscow, 1996), vol. 6, 34.

68 亚波里拿留主义（Apollinarianism），西元四世纪创立，否认基督的人性。被正统派视为试图产生「第三性」（耶稣既不是神也不是人）的异端。

69 旧约圣经《创世记》第十六章记载，夏甲（Hagar）是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的妾，所生的儿子为阿拉伯人的族祖。诏令中显然把鄂图曼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混为一谈。

70 Donald Ostrowski, Muscovy and the Mongols: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Steppe Frontier, 1304-1589 (Cambridge, 2002), 239.

71 这个国民大会（Assembly of the Land）有贵族、神职人员、市民、商人、农民、哥萨克的代表，由恐怖伊凡创立，一五五○年首次召开大会，最后一次是在一六五三年。

72 这个「罗曼诺夫王朝」一直维持至二月革命推翻末代沙皇为止，米哈伊尔的姑婆是恐怖伊凡的第一位皇后。

73 即舒伊斯基，在位时间是一六○六至一六一○年。

74 Makarii (Metropolitan), Istoriia russkoi tserkvi, vol. 6, 98.

75 教会父老（church fathers）是指教会早期的着作家。

76 Serhii Plokhy, The Cossacks and Religion in Early Modern Ukraine (Oxford, 2001), 306.

77 同上，312.

78 同上，319.

79 盖特曼（hetman）是乌克兰哥萨克经由大会（rada, council）选出来的军事领袖。

80 Makarii (Metropolitan), Istoriia russkoi tserkvi, vol. 6, 357.

第三章　帝俄民族

一六五四年一月八日，乌克兰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和他的军官在佩列亚斯拉夫当着沙皇特使布图尔林面前宣誓效忠–此举是向着帝国史家所谓的「罗斯的重新统一」或苏联史家所谓的「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重新统一」迈出一大步。不过，这个日后所谓的「重新统一」，乃是透过签署一份强调分歧而非统一的文件达成。此后，每逢赫梅利尼茨基写信给沙皇，都不是按当时一般习惯称沙皇为「全罗斯的最高主宰」，而是称之为「大罗斯和小罗斯的最高主宰」。这种做法八成是事先和布图尔林商量过，因为沙皇未几也把自己官方头衔上的「全罗斯」改为「大罗斯和小罗斯」。

这两个名称是出现在十四世纪初叶蒙古人入侵之后。当时，一个称为「小罗斯」的都主教教区在乌克兰小城加利奇成立，全罗斯都主教教区遂一分为二。81「大罗斯」与「小罗斯」的说法会在十六世纪末叶復活，是由那些取道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境内的罗斯土地前往莫斯科寻求沙皇布施的中东教会高层促成。在新的用法中，「小罗斯」指受到基辅管辖的东正教土地，「大罗斯」指莫斯科公国全境。在签订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时，这两个宗教术语被赋予了政治意涵。

到了一六五五年，沙皇的头衔又多了「白罗斯」几个字。这些变化反映着新的军事和政治形势。这时候，原本用来称呼基辅都主教区管辖的「小罗斯」一词改为用来称呼乌克兰。换言之，是用来称呼波兰王国内的罗斯土地。这些土地要么受到哥萨克人控制，要么被哥萨克人声称拥有，全都享有沙皇答应过哥萨克盖特曼的额外权利和特殊待遇。这些权利和待遇并不适用于白罗斯，因为白罗斯原是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境内立陶宛大公国的一部分，后来莫斯科是靠武力占领，沙皇并没有授予其居民特权。信仰东正教的白罗斯人也没有从自己的信仰得到好处：白罗斯的东正教教区直接受莫斯科司法管辖，而乌克兰教区仍然是从属于基辅。

就像沙皇的书吏坚持大罗斯、小罗斯和白罗斯有所不同，后两地的知识分子也维持着自己的身分认同，不认为小罗斯人和白罗斯人是大罗斯人。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在都主教莫吉拉辖下的基辅学院接受教育，考虑身分认同时不是以王朝和宗教的原则思考，而是根据新出现的民族观念思考，所以认为自成一个罗斯民族。有一点会让今日的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他们称自己为「俄罗斯人」（Rossian82，相当于今日英语中的Russian），又不愿意把大罗斯的居民纳入「俄罗斯人」范畴。

一六五六年七月五日，基辅学院着名毕业生波洛茨克人西缅，率领学生欢迎一位显赫贵宾莅临他们位于白罗斯北部的小城[83]。这位贵宾就是莫斯科沙皇阿列克谢。然而，在西缅师生眼中，阿列克谢虽是不折不扣的东正教徒君主和罗斯土地的合法主人，却不是他们民族的一员。一个学生在献诗中说：「长久渴盼的民族安慰，如今赐予了被迫害的俄罗斯族。」[84]这不啻是说，本来被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统治的罗斯人才是俄罗斯人。另一个学生也在献诗里说：「全俄罗斯、白罗斯和小俄罗斯，都要亲吻陛下／感谢在陛下的信仰光辉之下所得到的启蒙。」对西缅的学生来说，阿列克谢是一位东方的沙皇或说东正教的沙皇，是从一个称为「北国」的地方来到他们的「俄罗斯」土地。

阿列克谢和扈从看来并不介意波洛茨克的市民没有把他们看作同一民族的同胞。在当时，「民族」（ethnicity）观念还不包括它后来在民族国家时代获得的政治意涵。莫斯科人都是从一种君主国、祖产和愈来愈宗教性的角度思考，极少从民族的角度思考，即使会这样思考，也不会把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境内的罗斯人口看成自己民族的一部分。相反地，鲁塞尼亚人[85]（即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的菁英分子却习惯从民族的角度思考，只不过他们也不认为莫斯科人是自己民族的一员。

这两群人都需要花一些时间调整自己的思考方式，以适应新的政治现实，进而认为彼此不仅受到同一个最高主宰统治，还构成同一个民族。对这个过程最有促进作用的，莫过于莫斯科与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及鄂图曼帝国就乌克兰和白罗斯土地所进行的激烈争夺。

莫斯科发现很难把在一六五四至一六五五年之间占领的乌克兰和白罗斯土地维持完整。根据谈判了三年才在一六六七年于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个村庄签订的《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莫斯科把白罗斯东部的土地割让给波兰－立陶宛共和国。虽然乌克兰东北部的切尔尼戈夫继续处于莫斯科控制之下，但这种控制只是间接的—因为它是哥萨克国的一部分，该国接受沙皇的宗主权。莫斯科一直建议哥萨克人把切尔尼戈夫交由其直接控制，但哥萨克人置若罔闻。当时，聂伯河左岸（东岸）的乌克兰地区完全落入哥萨克人的控制下，其余地区仍然是由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统治，包括大部分基辅地区、沃里尼亚、波多利亚和加利西亚，它们全都是基辅人传统认定的小罗斯的一部分。

基辅，昔日罗斯亲王的首府，也是波洛茨克人西缅和他的基辅教授及学生心中的俄罗斯中心，发现自己的处境危殆。这个城市位于聂伯河右岸，所以沙皇和他的顾问们准备好要放弃它，以确保与华沙的和平。根据《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基辅会在协定签署的两年后移交波兰人。但莫斯科后来没有遵守承诺履行这个约定—哪怕要在河的另一边保

护基辅这个据点有多么地困难重重。移交会被阻止，部分是基辅东正教教士的游说功劳。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挽留沙皇的保护。

一六七四年，眼见基辅可能会受到鄂图曼的攻击，它的知识分子开始改弦易辙，鼓吹基辅应该留在沙皇的势力范围。这种观点主要是体现在一本名叫《大纲》的歷史文献汇编。《大纲》有一个很长的副书名：《一部歷史概要，涵盖斯拉夫 - 俄罗斯民族的起源、天佑之城基辅第一批大公的史蹟、神圣而虔诚的基辅暨全俄罗斯大公，也是第一位独裁君主弗拉基米尔，一直到我们显赫而有德的最高主宰，即沙皇暨大公阿列克谢，他也是由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和白罗斯构成的全俄罗斯的独裁君主》。

这本书由基辅的「山洞修道院」印行，一般认为是出自修道院院长吉泽利之手。《大纲》延续基辅罗斯的编年史写作传统，关注的是基辅的歷史、罗斯教会的起源和民族议题。该书在基辅和其他地方引起读者极大兴趣，一六七八年和一六八○年都有新版本出版。不让人意外，《大纲》的史观高度以基辅为中心，核心思想是把莫斯科理解为第二基辅。基辅对于把莫斯科建构为第三罗马一直具有关键重要性，但直到《大纲》出版前，它的锋头一直被君士坦丁堡盖过。为了把这种局面扭转过来，《大纲》的作者强调基辅对罗斯和莫斯科的歷史具有核心重要性。

在《大纲》一书中，基辅被说成俄罗斯王朝、国家和教会的发祥地。另一个不遑多让的重要性是作为「俄罗斯」民族的发祥地。谈基辅起源的一章题为〈论最负盛名的城市基辅—它是整个俄罗斯民族至高无上的首要城市〉。这个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大纲》作者把它算作斯拉夫民族之一，称之为「斯拉夫 - 俄罗斯人」，其成员包括生活在中世纪基辅罗斯领土的所有人。这对传统的乌克兰编年史是重大偏离，因为后者都是按照波兰人的史观，把莫斯科人和罗斯人看成两个不同的民族（narody / nations）。

后来，《大纲》在十八世纪成为了俄罗斯帝国第一部俄罗斯歷史教科书，到十九世纪初叶为止再刷十六次或出新版。由于版本和印数众多，《大纲》促进了莫斯科人自视为一个民族。不过，这个民族并不单单是由莫斯科人所构成，因为根据《大纲》的描述，如果没有基辅和当时被称为小罗斯和白罗斯的土地，就不会有后来的莫斯科公国。《大纲》鼓励读者不要把沙皇的属土只看成一个王朝国家或东正教国家，还应该把它看成一个民族。这是一个革命性观念。

虽然《大纲》大力鼓吹俄罗斯民族的歷史以基辅为中心，又把沙皇

治下的莫斯科公国人民和前不久还被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统治的罗斯人拉在一起，但这个新观念会不会被接受完全无法保证。在莫斯科，这个观念有一个强大竞争对手，那就是「旧礼仪派」信徒[86]秉持的另一种「俄罗斯」观念—这些传统主义者反对莫斯科东正教会推行的基辅路线创新，又阴谋推翻支持这种革新的在位沙皇。

阴谋集团的一位领袖是大司祭阿瓦库姆，他一直吆吁沙皇维持和强化自己传统罗斯人的身分认同和使用母语：「陛下您毕竟是俄罗斯人，不是希腊人。请说自己的母语，不要在教会、家里或任何地方贬低它的地位。上帝爱我们的程度并不亚于爱希腊人。」[87]阿瓦库姆对基辅知识分子引入莫斯科的天主教元素反对得尤为激烈。这些知识分子的其中之一便是西缅，他在一六六四年定居莫斯科，成为阿瓦库姆最重要的对手之一。阿瓦库姆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唉，可怜的罗斯人啊，为什么你们要学习拉丁的风俗习尚而轻视你们的真正基督徒律法？」[88]

如果说阿瓦库姆的「俄罗斯」拒绝接受沙皇的至高无上地位，波洛茨克的「俄罗斯」却是刚好相反。除了把宗教革新和民族意识引入莫斯科，基辅的知识分子还带来了西方世俗文化的元素，体现在教育、文学、戏剧和视觉艺术。在彼得一世（这位沙皇在俄罗斯和西方歷史文献中被称为彼得大帝）之前，这些新元素从未受到沙皇这样大力的支持。

一七○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乌克兰哥萨克的波尔塔瓦附近的一片原野，两万四千名瑞典军队和五万两千名俄罗斯军队短兵相接，前者有六千名哥萨克和波兰骑兵助阵，后者有两万多名哥萨克和卡尔梅克骑兵助阵。俄罗斯军队的主帅是精力旺盛的沙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他是一六九六年开始成为莫斯科唯一的统治者，在那之前，他和异母兄伊凡五世共同执政。瑞典人的主帅是年轻但作战经验丰富的国王查理十二世。这场对战将会决定「大北方战争」（一七○○至一七二一年）的最后胜负。在这场战争的过程中，瑞典和俄罗斯不断变换盟友，使出浑身解数争夺波罗的海地区的霸权。这一战也会决定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帝国的未来。

一七○○年，即「大北方战争」的第一年，查理率领一支仅仅一万出头的部队，在纳尔瓦附近与一支近四万人的莫斯科部队对垒。他旗开得胜，损失不到一千人，俘掳了两万多名莫斯科战俘，莫斯科方面则损失九千人。一七○八年夏天，查理在中欧打败其他敌人之后，再次挥军西向。一开始，他打算取道萨克森直扑莫斯科，但随着冬天快速逼近和补给品快速消耗，大军转而向南，朝乌克兰推进，希望在那里取得大量补给物资和过冬的住宿处。给他出这个主意的人是盖特曼马泽帕。马泽帕原是沙皇的忠实盟友，直到一七○八年十月才因为不满彼得一世对待哥

萨克乌克兰的方式，倒戈改投查理阵营。其余的哥萨克军队答应几天或几星期内与他会合。但彼得抢先一步，出兵乌克兰，占领了哥萨克国的首都巴图林，对居民进行一番屠杀后另立一个忠于莫斯科的盖特曼。

在整个一七○八年冬天和一七○九年春天，查理、彼得和两位乌克兰盖特曼—亲瑞典的马泽帕和亲莫斯科的斯科罗帕斯基—都热烈投入宣传战，争取哥萨克军队和乌克兰民众的归心。这场宣传战透露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价值观和目标存在着重大分歧。沙皇彼得把马泽帕的行径诠释为附庸国对宗主国的背叛。马泽帕在回应中指出，他的效忠对象是家乡土地而不是沙皇。根据他的诠释，当前的政治冲突不是发生在宗主国与附庸国之间，而是发生在两个民族之间。「莫斯科人，也就是说大俄罗斯民族，总是恨我们小俄罗斯民族。他们居心险恶，长久以来都是以把我们的民族推向灭亡为目的。」89马泽帕的另一个效忠对象是「小俄罗斯祖国」。彼得和他的书吏从不会从这个角度看待莫斯科。在在看来，只有小俄罗斯有一个民族和一个祖国，而沙皇和他的人民并没有这两种东西。但这种情况即将改变。

改变随着俄罗斯一七○九年六月在波尔塔瓦取得胜利而到来。这一次，俄军不仅在兵力上占优势。在决定与查理摊牌的几年前，彼得便开始打造一支更专业的军队。这批新军训练有素而有朝气，反观瑞典军队却是人困马乏，他们在乌克兰过冬时天气冷得异乎寻常，而且常常受到亲莫斯科的哥萨克人和农民偷袭。更不利的是，查理十二世几天前在一次侦察任务中受伤，无法亲自上阵。由于领导混乱，瑞典人迷了路，最后也打了败仗。战争结束后，查理和马泽帕逃往鄂图曼的附庸国摩尔达维亚寻求庇护。

彼得为这场胜利举行了几次庆祝大会，每次都包含精心策画的仪式。第一个正式的祝捷大会在基辅举行，时为一七○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地点是古老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大会上，基辅学院校长普罗科波维奇发表了欢迎彼得的致词，近五十年前，西缅曾对沙皇阿列克谢致词，一七○九年这一次换成另一位基辅学院的毕业生对阿列克谢的儿子彼得致词。他在致词中提到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但对这些词的理解要比西缅宽泛得多。在普罗科波维奇口中，「俄罗斯」是指沙皇统治的全境：「从我们的聂伯河开始南至黑海海岸，东边从那里直至里海，甚至到达波斯王国的边界，然后从那里最远到达中国……北至北冰洋海岸。」90

在谈到君主国、国家和民族时，普罗科波维奇一律以「俄罗斯」称之。他又提到「全俄罗斯」（obshchenarodnoe ／ all-Russian）都因为波尔塔瓦大捷而欢腾。对普罗科波维奇而言，俄罗斯也是祖国，但这个祖国的范围不再局限在马泽帕的小俄罗斯祖国或彼得在波尔塔瓦大捷之

前所理解者。更重要的是，普罗科波维奇称彼得为这个新祖国的父亲。早几年前，普罗科波维奇也用同样的词来称呶马泽帕（称之为「小俄罗斯人祖国的父亲」）。在致词中，普罗科波维奇称彼得这位沙皇为「俄罗斯参孙91」，把俄罗斯祖国从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成就非凡，值得感念（他没有像西缅那样，把彼得看成是远道而来的「东方沙皇」）。

彼得毫无疑问欣赏他听到的这番致词。几年后，他邀请普罗科波维奇加入他的一项军事行动。到了一七一七年，普罗科波维奇在圣彼得堡，已经成为俄国沙皇西化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和推动者之一。他在朝廷上的影响力尤胜沙皇的另一位联合教会顾问，波洛茨克人西缅。彼得是一个学得很快的学生，而且对普罗科波维奇的许多观念和想法并非完全陌生。彼得的书信和诏书显示出他对「祖国」（patria）一词的理解发生了转变─在十八世纪的头几十年，祖国的意义从沙皇的个人祖产变成为一种所有莫斯科人共有的财产。

一七二一年，因着「大北方战争」的最后胜利，「参政院」和「宗教事务管理总局92」─两者都是彼得创立的谘询机构─授予沙皇「全俄罗斯皇帝」的头衔，以及「大帝」和「祖国的父亲」两项称号。「全俄罗斯的沙皇」现在成为「全俄罗斯皇帝」。另外两个称号，「大帝」和「祖国的父亲」（国父），和沙皇的成就相称。由全体参政员签署的奏摺表示：「陛下对我们祖国和全俄罗斯子民的造福世所共知。」彼得在回覆时提到了「民族」和「全体利益」的概念，宣称：「我们必须努力争取上帝摆在我们眼前的普遍福祉和繁荣，包括内部和外部的，那将可大大改善人民的命运。」24

从强调「祖国」、「民族」和「公共利益」的观念观之，彼得和他的副手显然精通国家论述的三昧。普罗科波维奇─他是第一个把这一类观念引入朝廷的人─不仅出席了授予彼得新头衔的典礼，还朗诵了和瑞典签订的《尼斯塔德和平条约》的内容，发表了一篇讲道。随后主持礼拜仪式的也是来自基辅的莫斯科代理牧首亚沃尔斯基。基辅人已经成功地把他们的西方观念灌输给彼得和他的朝廷。

彼得在一七二五年突然驾崩。他虽然在漫长的「大北方战争」取得胜利，却来不及完成打造一个帝国型的新国家和具有民族意识的政治菁英阶层。朝廷几乎立刻废除了他一些最大刀阔斧的改革。一七二八年，彼得大帝的孙子彼得二世在顾问团的建议下把首都从圣彼得堡迁回莫斯科；圣彼得堡是彼得大帝在一七一二年所建造，是他追求西化的雄心壮志的一大体现。大约同一时期，哥萨克盖特曼的职位也在乌克兰恢復过来。这些都是俄罗斯贵族想要回到前彼得大帝时代的指标。但潮流是无法逆转的，在俄罗斯走向西化这件事情上尤其如此。彼得二世在一七三

○年去世，膝下无子，一众朝臣把赌注押在彼得一世哥哥伊凡的女儿库尔兰公爵夫人安娜身上。她被「最高枢密院」━沙皇的谘询机构，现在负责选择新统治者的事务━邀请她登基，但前提是她要答应某些条件。

安娜对那些以为自己可以限制沙皇权力的人不以为然。沙皇干纲独断的本质很快恢復过来，随之恢復的是圣彼得堡作为帝国首都的地位，以及统治者对欧洲政治和文化模式的浓厚兴趣。在俄罗斯人的歷史记忆里，安娜在位的十年期间（一七三○至一七四○年），朝政是由一批外国顾问主导，最突出者是冯比伦，他在女沙皇还待在库尔兰的时期便是她的情人和宠臣。有关这个人及其家人有多么无法无天的传说在安娜统治结束很久之后继续流传。

安娜的统治让朝廷的权力菁英普遍出现怨恨和反西方情绪。随着安娜的驾崩和彼得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在一七四一年登上皇位，反西方的态度变成滔天巨浪。伊丽莎白为自己塑造出一个典型俄罗斯公主的形象，而把她推上权力高峰的则是「俄罗斯的忠实诸子」，即近卫军的军官。有一件简单事实清楚标志着这种风向的改变：伊丽莎白虽然就像安娜一样终身未婚，但她最宠爱的情人并非「日耳曼人」，而是「俄罗斯人」。这人名叫罗祖姆，是乌克兰的哥萨克人，按照当时的术语则是小俄罗斯人。他是靠着歌唱才华得以到圣彼得堡发展，在伊丽莎白登上皇位前便深受宠爱。她一登基便把罗祖姆封为伯爵，后来又封为元帅，他也把原来的哥萨克名字改为拉祖莫夫斯基。与冯比伦不同，拉祖莫夫斯基对朝政兴趣缺缺，作风低调。朝廷中人称他为「晚上的皇帝」。

伊丽莎白在位期间，任职朝廷的外国人数目大幅下降。率先起用外国人的沙皇是阿列克谢，到了他的继承人彼得一世和安娜之时，朝廷的外国人更是多如过江之鲫。与政府不信任外国人态度相随的是俄罗斯民族自信的空前升高。有关帝国歷史和文学语言的讨论正是发生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而歷史和语言是近代欧洲早期所有国家「民族打造」工程的两大要素。在彼得大帝的「全俄罗斯帝国」之外，将会出现一个「全俄罗斯民族」、一套「全俄罗斯歷史」和一种「全俄罗斯语」，这些过程都是发生在伊丽莎白一朝 。

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缪勒在圣彼得堡科学院发表题为〈俄罗斯人民和名称的由来〉的演讲。缪勒是日耳曼人，是在彼得一世所创立帝国科学院的一七二五年应聘来到圣彼得堡。缪勒的演讲并不顺利，因为他指出，「罗斯」这个名称和罗斯王朝都是源自斯堪地那维亚。这个结论应该会受到前几个世纪许多莫斯科的统治者欢迎，包括恐怖伊凡，他认为自己的血缘可以透过留里克王朝上溯至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也认为自己是日耳曼人。但在一七四七年，缪勒的论证被认为不仅不爱国，

还有损俄罗斯的威望。学院不让他按照预定时间把演讲讲完，又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他的研究。缪勒的演讲掀起有关俄罗斯歷史的第一次学术辩论，辩论结果将会影响俄罗斯的发展长达数十年，甚至数百年。

圣彼得堡的爱国热情在俄罗斯对瑞典的另一场战争（一七四一至一七四三年）之后更加高涨。但科学院对缪勒观点的负面态度所反映的不仅是一次短命的爱国主义高涨。自伊丽莎白即位开始，帝国官员便非常关注科学院的爱国程度。一七四○年代初期，学院大量裁员，被裁的大都是日耳曼人，他们去职后往往前往欧洲发表他们待在俄罗斯帝国期间所做的研究。这对科学院的威望是重大打击，对俄罗斯学术研究品质的打击尤甚。一七四四年，当局在科学院各大楼设置警卫，不让外国人接近图书馆、档案库和研究资料。外国人不再受到信任。

两年后，朝廷任命一位新院长干预学院事务。新院长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是女沙皇最宠爱的情人的弟弟93，才刚从哥廷根大学毕业，受任命时只有十八岁。在在看来，他年纪轻轻便被委以重任，是因为他和女沙皇关系亲近，另外还因为他是科学院第一位「俄罗斯人」院长94，在他之前的四任科学院院长都是外国人，而且科学院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由外国人主持、控制和管理。

于是，解决「歷史学危机」的责任便落在了基里尔和他的亲密顾问捷普洛夫头上，后者曾师从普罗科波维奇并在科学院兼职。他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和辩论缪勒的研究结果。在一七四九年秋天至一七五○年春天之间，委员会开了二十九次会。这些会议上，反对缪勒最力的人是罗蒙诺索夫。他是俄罗斯北方渔民之子，主要成就是在化学方面，但全民动员的新时代要求多才多艺，他于是从科学研究走向歷史研究和语言学研究，成为本土派一个业余但大有影响力的支持者。罗蒙诺索夫指责缪勒只知歌颂「斯堪地那维亚人或说瑞典人」，而「对我们的歷史几乎一无阐明」。在这个有关罗斯人起源的史学争议上，基里尔站在罗蒙诺索夫一边。缪勒已印好的论文被销毁。

罗蒙诺索夫反对缪勒的论据主要来自一六七四年在基辅出版的《大纲》一书。这本书内容过时又常常有欠精确，但让它之所以重要的却是它的观念而非它陈述的「史实」。这本论罗斯人民族起源的书最终不仅在俄罗斯找到出版者，还大受读者欢迎。俄罗斯读者欣赏它把焦点放在民族的起源，不像其他作品只着重国家和王朝的起源。罗蒙诺索夫建议科学院採纳《大纲》作为标准歷史教科书。在接受它对罗斯人起源的歷史解释以外，罗蒙诺索夫还热烈欣赏它的歷史神话部分：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有着一体性，两者都是中世纪基辅罗斯的继承者，因此和西欧判然有别。

新的「全俄罗斯民族」不仅需要一部共同歷史，还需要一种共同语言。彼得一世实行的改革让西方影响力长驱直入，一个明显表徵就是大量吸收西方的语言（主要是德语）。另一项较不明显的西方舶来品是以白话文创作文学的做法。在这之前，文学使用的基本上是「教会斯拉夫语」，它是中世纪向斯拉夫人传教的基督宗教传教士所创造，后来被用作东正教斯拉夫土地上的宗教仪式语言和纯文学语言；所谓的东正教斯拉夫土地包括莫斯科公国和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境内的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地区。这种语言让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和白罗斯连结在一起，但它是一种属于过去而非未来的语言。彼得创立的官僚组织需要一种新的世俗化的语言来治理国家。原有的官僚系统使用的语言，同样主要以教会斯拉夫语为基础，无法符合这个要求。因此，彼得一世推出了一种简化的（民用的）字体，又常常鼓励下属和西方作品的翻译者行文尽可能浅白，避免教会斯拉夫语的高古风格。

但在女沙皇伊丽莎白时代涌出的爱国热情却挽救了教会斯拉夫语的衰落：一夜之间，它从一个顽固守旧的形象变成了民族身分的堡垒和真正俄罗斯人本色的象徵。就像有关罗斯人起源的歷史争议那样，科学院也对俄罗斯语言的未来进行了辩论。辩论两造的主要代表都是俄罗斯文学大家，一位是特列季亚科夫斯基，一位是苏马罗科夫，两人都身兼诗人和剧作家身分。充当裁判的是院长基里尔。特列季亚科夫斯基本来贊成俄罗斯书面语的现代化和白话化，但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却改变了主意。他这样质问：「既然我们拥有斯拉夫－俄罗斯语这么丰富宽宏的语言，为什么要自甘接受法语的贫乏和局限性？」95苏马罗科夫则对俄罗斯文学中的教会斯拉夫语遗产─事实上等于基辅遗产─大肆挞伐。在谈到普罗科波维奇的时候，他这样写道：「这位贤人，天生／有着斯拉夫人的美好品质／但论文采／却没写出过任何像样的诗。」96

一七四八年秋天，苏马罗科夫把剧作《哈姆雷特》提交给科学院，接受出版前审查。身为科学院的教授，特列季亚科夫斯基指出这齣戏剧的风格瑕疵多多。他写道：「风格的参差不齐明显地贯穿全剧，那就是，有时表现出比斯拉夫语还高的戏剧性，有时则是降格为比悲剧还悲剧性的市井俚语。」97这次的审查让苏马罗科夫和特列季亚科夫斯基之间的冲突公开化，攸关的是两人在新兴的俄罗斯文坛的巅峰地位和未来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会用何种语言创作。特列季亚科夫斯基捍卫根植于教会斯拉夫语的高古风格，苏马罗科夫则想要一种尽可能贴近大俄罗斯白话的文学语言。

在这场争论中，罗蒙诺索夫採取的是折衷态度。他先是主张继续使用教会斯拉夫语作为发展俄罗斯文学的基础。就像特列季亚科夫斯基那

样，他认为俄罗斯语的根本是在基辅罗斯的语言，称赞它是一种丰富、美丽和有力的语言。另一方面，罗蒙诺索夫虽然捍卫斯拉夫语和与之相关的文学传统，他同时也想方设法容纳以白话创作的趋势。透过发展出一套「三种文学风格」理论，他成功调和了两种不同文学语言的方法：第一种风格称为「高古风格」，用于写史诗、颂诗和诗歌，应该用教会斯拉夫语和俄罗斯文学常用词汇创作；「中间风格」，用于戏剧作品，应该以白话创作，但要避免俗语；第三种风格是「较低风格」，用于喜剧，容许使用市井之徒和农民的语言。

罗蒙诺索夫在出版于一七五七年的斯拉夫语语法书的序言里指出，俄罗斯语同时兼具「西班牙语的庄严，法语的活泼，德语的稳重，义大利语言的美，以及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丰富精准」98。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新意，因为它几乎是照抄卡鲁在《论英语的卓越》（一六○五）一书里对英语的礼赞。然而，与卡鲁不同的是，罗蒙诺索夫所称赞的语言是一种正在挣扎着要迎接现代世界挑战的语言，语法和语汇仍处于低度发展。然则，他对俄罗斯语未来的乐观心态是从何而来？答案从他对日耳曼歷史的评论明显可见：「只要拉丁语一天是日耳曼礼拜仪式的用语，德语就必然会继续贫乏、简陋和无力。后来，随着日耳曼人开始读德语圣经和用德语做礼拜，德语的丰富性便以倍数成长，也出现了一些技巧高明的作家。」根据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推论，拜俄罗斯人语言和教会斯拉夫语紧密相关之赐，它用不着经歷德语经歷过的痛苦过程便可以脱胎换骨，因为教会斯拉夫语让俄罗斯人从未臣属于某种外国语言而且使它变得伟大。

十八世纪中叶有关语言的讨论和一个问题直接相关：大俄罗斯语和小俄罗斯语—今天分别称为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何者应该在俄罗斯帝国的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苏马罗科夫认为应该是前者，他因此指责特列季亚科夫斯基不应按小俄罗斯语的习惯把姓氏拼写为Tred’iakovskoi，而是应该拼写为 Tred’iakovskii。他声称，特列季亚科夫斯基此举是给「自己的世系名字一个小俄罗斯语的结尾」。另一个重要争论是字母r的正确发音。教会斯拉夫语对这个字母的发音更接近乌克兰语的 /h/，俄罗斯语的发音则接近 /g/。罗蒙诺索夫为此写了一首诗，教导读者哪些单字的r字母应该发 /g/ 音，哪些应该发 /h/ 音。

就像罗蒙诺索夫其他妥协的部分一样，这项妥协的效果为时短暂。大俄罗斯的语法、词汇和语音都发展缓慢，但它仍然让小俄罗斯语在俄罗斯文学语言的接受度远低于十八世纪初叶。当然，在朝廷服务的乌克兰人例如萨莫伊诺维奇、波莱特卡和其他基辅学院的毕业生，想要驾驭新的俄罗斯文学语言一点都不困难，但那样做的话，他们便不得不放弃

自己习惯的语言，从而动摇了两个语言传统一向以来和平共处的局面。

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基辅知识分子的心态已经和当初波洛茨克人西缅在其城市称颂沙皇阿列克谢，并首次将他称为一个解放「俄罗斯民族」的「东方沙皇」时相去甚远。在这个世纪的进程中，他们成功地把西方元素，往往是民族论述或说准民族论述注入官方论述中，最终也注入了莫斯科权力阶层的思维方式中。他们同时协助创造出一套「全俄罗斯」的歷史论述，并对一种「全俄罗斯」的帝国语言的形成有所建树。他们正是在莫斯科公国把自己重塑为俄罗斯帝国之时做这件事。帝国和民族的混为一谈，以及不同族群共用一把「俄罗斯民族」大伞的现象，将会持续几个世纪。

81 「小罗斯都主教教区」于一三○三年设立，加利奇是「加利奇和沃里尼亚公国（一一九九至一三四九年）」的首府，统治者尤里二世于一三三五年自称小罗斯公爵，一三四七年废除此封号。

82 这个词衍生自「罗斯」（Rus’）。

83 指波洛茨克。这个小城很长时间是由立陶宛统治，一五六三年由恐怖伊凡取得，一五七九年被波兰夺回，一六五四年三月被俄军「解放」。

84 Simeon Polotskii, Virshi, eds. V. K. Bylinin and L. U. Zvonareva (Minsk, 1990), 27-33.

85 这个字词是对波兰王国境内「罗斯人」（Rus’ people）的称惚。

86 「旧礼仪派信徒」（Old Believers）指一六五○年代拒绝尼康牧首进行含教义和仪式修改的宗教改革，坚持旧礼仪的信徒。

87 Pavel Miliukov, Ocherki po istorii russkoi kul’tury (Moscow, 1995), 53.

88 Vasilii Kliuchevskii, Russkaia istoriia (Moscow, 2013), 184.

89 Serhii Plokhy, 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 Premodern Identiti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 (Cambridge, 2006), 337.

90 同上，272.

91 参孙是圣经中的以色列大力士，曾经摧毁敌人，拯救了自己的民族。见《士师记》十六章。Elena Pogosian, Petr I—Arkhitektor rossiiskoi istorii (St. Petersburg, 2001), 226.

92 一七二一年，彼得大帝在时任莫斯科牧首阿德里安（Adrian）过世后取消了牧首一职，设置宗教事务管理总局（Synod）取代其职能。该机构由沙皇任命的多位主教和俗人官员组成。

93 以下为区分他和他哥哥，提到他的时候都称为基里尔。

94 前面提过，严格来说他们家是乌克兰的哥萨克人，或说小俄罗斯人。

95 Vasilli Trediakovskii, Izdrannye proizvedeniia (Moscow, 1963), 523.

96 A. P. Sumarokov, Izbrannye proizvedeniia (Moscow, 2015), 27.

97 Boris Uspenskii, Izbrannye trudy (Moscow, 1994), vol. 2, 294.

98 Mikhail Lomonosov, Ob obrazovanii i vospitanii (Moscow, 2014), 168.

第二篇　罗斯的重新统一

第四章　开明女皇

一七六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苏菲亚．弗雷德里卡．奥古斯塔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女皇凯萨琳二世。事情开始于当天一大早：当时她听说某个阴谋推翻彼得三世和拥立她的军官被捕。所以，她自己照理也会很快被逮捕，甚至有可能被处决。她和顾问团决定立即採取行动，发起计画已久的政变。彼得三世不在圣彼得堡，所以凯萨琳立即离开位于圣彼得堡近郊的彼得霍夫行宫，驰往首都。她在圣彼得堡受到近卫军的欢迎，因为他们的司令官都参与了推翻彼得三世的阴谋。军队站在她这一边。几天后，凯萨琳的不幸丈夫彼得三世被效忠皇后的军队包围，别无选择下只得逊位。他在不到十天后死亡，死因可疑。

虽然政变是经过充分准备而且取得成功，但仍然需要有站得住脚的理由。凯萨琳毕竟是个十五岁才嫁来俄罗斯的日耳曼公主，甚至说话仍然带着德语口音，违反了每一条继位的规定。所以，她必须证明自己可以比丈夫–彼得大帝的外孙–更加胜任当个沙皇。六月二十八日，一份代表凯萨琳说话的宣言声称，她发动政变是为让俄罗斯不致陷入灭顶之灾：「俄罗斯祖国的正直诸子都完全意识到，整个俄罗斯国家正面临着一个深重危机。」99宣言的执笔者主要是依靠宗教论据，声称凯萨琳乃是比彼得更为真诚的东正教基督徒。彼得三世被说成计画把国教从东正教改为路德教派。「如果改变在俄罗斯歷史久远的东正教，採纳一种异端信仰，我们的希腊教会就会暴露在最大的危险之下。」

根据凯萨琳自己的说法，这篇宣言是临时起草。但也有学者认为，它是早就准备好的。不管是哪种情况，它都反映出当时俄国人思维方式的一些重要成分：有鑑于俄罗斯国家和东正教教会关系紧密，对两者任一的威胁都让「祖国的诸子」有权推翻一个本来有着合法性的君主。想要避免重蹈丈夫的覆辙，凯萨琳二世有必要证明自己对俄罗斯忠诚和有用。她以让人佩服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并因此赢得海内外称她为「大帝」。

凯萨琳统治俄国长达三十五年（一七六二至一七九六年）。彼得一世和伊丽莎白时代稍具雏形的帝俄民族，在这段期间有了新的动力和特徵。可以预见，凯萨琳既然是个外国出生的公主，她登上皇位后自然会更强调俄罗斯人身分认同中的公民成分而不是民族成分。民族、国家和祖国这些概念向亲西方和留学外国的女皇顾问小圈子之外传播。公民观念也在凯萨琳统治期间进入俄罗斯的论述。在伊丽莎白时期形成的以民族为中心的俄罗斯人身分模式被转化为公民对帝国的忠诚。启蒙运动的

观念（凯萨琳是这个运动的学生和仰慕者）转化了众人对帝国的理解，不再视之为由世袭特权保障的一些领土的拼凑，而是视之为倚赖管理一致性来维繫的中央集权国家，哪怕它仍然以民族和宗教多样性自豪。

凯萨琳在一七八五年发表的另一篇宣言里道出她对帝国和民族的关系的观点，确认了俄罗斯贵族有权不为国家服义务役。宣言称：「在帝国的真正光荣和伟大中，尝到了我们子民努力耕耘的果实滋味—他们是服从、勇敢、无畏、进取和强大的俄罗斯人民。」100这篇宣言对谁才是俄罗斯祖国的真正「诸子」说得明明白白：「从它创建至今的八百年来，俄罗斯一直在自己的诸子中找到指挥官和领导者。不管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在上帝的帮助下，俄罗斯贵族都表现杰出，让自己有资格成为杰出的领导阶层。」因此，贵族是俄罗斯民族的先锋队，而俄罗斯民族是帝国的主导力量。

在一七六二年帮助凯萨琳登上权力巅峰的真正的祖国诸子之一是帝国科学院院长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他现在也是聂伯河左岸哥萨克国的盖特曼。没有人不知道基里尔的政治忠诚对象，因为凯萨琳政变后的第一篇宣言就是由科学院印刷和发行。当新登基的女皇论功行赏时，他是第一批获得封赏的人。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代表科学院要求一些什么，但知道他为自己的哥萨克国求了相当多恩典。在哥萨克本地官员的支持下，他计画加强哥萨克国的自治和机构。哥萨克国的很多居民都预期他们的自治政体会迎向光明的未来。

一七六二的秋天，即凯萨琳加冕几个月后，哥萨克国书吏迪沃维奇在首府格卢霍夫写了一首长诗，题为《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谈话》。其中一段如下：

大俄罗斯：

你知道你正在与谁说话吗，抑或你已经忘记了？

我毕竟是俄罗斯，难道你可以不把我当一回事吗？

小俄罗斯：

我知道你是俄罗斯，但那也是我的名字。

你为什么要威吓我？我一直设法摆出一张勇敢的脸。

我不是臣服于你而是臣服于你的最高主宰，

你是在其荫庇下由你的祖先所生。

不要以为你是我的主人：

你和我都是受同一个最高主宰统治。

这首诗表现的愿景是：那个被称为小俄罗斯的哥萨克国和巨大的俄罗斯帝国将会只是名义上统一在一起，而从彼得一世开始几位沙皇加诸它的自治权压缩会统统解除。这种愿景没有给一个共同的国家、共同的民族或共同的祖国留多少余地。在哥萨克国的首府，人民对这种前景满怀希望，而他们的这种希望最初看来也是有凭有据。凯萨琳统治初期对忠心耿耿的基里尔和小俄罗斯的菁英阶层做出少许让步，包括在一七六三年恢復传统的宫廷制度。但哥萨克的官员会议要求更多，而基里尔还提出了额外要求：他希望盖特曼职位改为世袭，永远由自己的子孙继承。

凯萨琳虽然感激基里尔的拥戴之功，但这种感激不是无限的。她对他的要求反应迅速。一七六四年，她把基里尔召到圣彼得堡，随即解除他的盖特曼职位，但稍后又给予他元帅称号作为补偿。她更重要的手段是完全废除盖特曼职位。这是对哥萨克首领职位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清算，前两次分别发生在彼得和安娜时期。凯萨琳将要再花上二十年才能消灭哥萨克国的所有机构，包括其军管区系统，但这位女沙皇有的是时间和决心。对她来说，重中之重在于她能否打造出一个完全由中央发号施令和根据启蒙运动原则统治的帝国。在漫长歷史过程中累积出来的各种惯例和特权将要屈服于井然有序和均质化的官僚规范。

虽然雄心勃勃，但凯萨琳知所谨慎，採取渐进步骤去落实她的新法。一七六四年二月，即取消盖特曼职位的几个月前，凯萨琳写信给帝国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参政院的院长和她的政治警察（祕密警察）头子维亚泽姆斯基：「小俄罗斯、利沃尼亚和芬兰都是享有特权的省分，不宜马上废除。但称它们为外国土地和根据这个基础与它们打交道则不仅大错特错，更是蠢不可及。对这些省分和斯摩棱斯克的俄罗斯化应该尽可能柔和，好让它们不会像狼那样望向森林……废掉小俄罗斯的盖特曼之后，应该尽一切努力去抹掉众人对盖特曼时期的记忆。另外找个人来当盖特曼更是万万不可。」101

凯萨琳先是把哥萨克国改为小俄罗斯省，然后又把它分割为基辅、切尔尼戈夫和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三个总督辖区（vicegerency）。废除哥萨克国和逐步取消它的各种机构意味着几代乌克兰知识分子的梦想━小俄罗斯和大俄罗斯平起平坐━寿终正寝。一旦併入帝国的行政体系，原来的哥萨克国在巨大的俄罗斯国家的映照下顿时成为侏儒。在十八世纪末叶，帝国一共有五十个总督辖区，其中只有三个原属哥萨克

国。随着哥萨克政体特殊地位的丧失，它的官员阶级也被整合到俄国贵族之中，被认为应该致力于为「全俄罗斯民族」的利益服务。小俄罗斯人继续依恋自己的传统家园，也继续称之为「祖国」，但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忠于自己的歷史祖国和忠于俄罗斯帝国不再构成一种矛盾。

因此，原哥萨克国继续为帝国提供干部。许多年轻的哥萨克官员受到凯萨琳重用，在圣彼得堡位居要津，别兹博罗德科和札瓦多夫斯基都是个中例子。别兹博罗德科担任女皇的祕书，最终成为帝国外交政策的设计者之一；札瓦多夫斯基成为主管帝国教育系统的最高官员。女皇一样少不了基辅学院的毕业生，这批人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就一直主张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不过，被彼得一世召唤到首都的都是神职人员，凯萨琳青睐的却是世俗菁英。因为基辅学院的毕业生精通拉丁语，所以被认为是接受医生训练的理想人选。凯萨琳时代的御医有百分之六十是乌克兰人。

在帝国的知识菁英之中，乌克兰人占有显着比例。科齐特斯基、鲁班和图曼斯基都是在哥萨克国土生土长，后来成为俄罗斯第一批期刊的出版者。科齐特斯基是凯萨琳的祕书之一，曾经代表女王创办期刊《万象》（一七六九至一七七○年）；鲁班创办了《古与新》（一七七二至一七七三年）；图曼斯基在更后来出版了俄罗斯帝国境内第一本歷史期刊《俄罗斯杂志》（一七九二至一七九四年）。他们都是最早的「民族主义者」，有功于打造冒起中的俄罗斯民族认同，拥抱新的俄罗斯文学语言并让民族与帝国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有些学者估计，在促进俄罗斯民族观念的「俄罗斯人」当中，有多达一半是「小俄罗斯人」或说乌克兰人。

一七七二年秋天，军事学院校长切尔内绍夫率领俄罗斯陆军越过波兰／俄罗斯边界，沿着聂伯河和道加瓦河占领了一些新的据点。其中，诸如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姆斯齐斯拉夫和莫吉廖夫之类的小城从十七世纪中叶之后就没有见过俄罗斯部队，但此时却忽然地落入俄罗斯的统治之下。这个对白罗斯东部的占领，其实是一场更大军事行动的一部分：该军事行动史称「第一次瓜分波兰」，是由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在那一年联手炮制。

瓜分波兰之举在一七六二年便有苗头。当时，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硕果仅存的东正教大主教科内斯基从莫吉廖夫去到莫斯科，参加庆祝凯萨琳加冕的活动。庆祝活动的最后一日（一七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在致词时为自己被迫害的教会请命，指出上帝会饶过凯萨琳一命，除了为了让她可以捍卫俄罗斯的信仰和祖国，还为了让她可以捍卫俄罗斯以外的东正教徒。他又这样说：「陛下的子民都在庆祝您让人欢欣的加

冕，而白罗斯人同样要透过我—您的一个子民—向您献上最竭诚的祝福。」102当时，俄罗斯帝国和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的东正教为一体的观念在帝国的官方论述里已经牢牢确定，但「白罗斯人民」也是女皇「真正或潜在子民」这种观念却是新东西，意义完全不同。这种观念是十七世纪中叶才首次见于俄罗斯的论述：当时沙皇的头衔里加上了「白罗斯」三字。

科内斯基期盼「白罗斯民族」获得保护，在俄罗斯军队一七七二年占领白罗斯东部之后获得了实现。在莫吉廖夫，教堂钟声连续响了一天一夜，以代表对凯萨琳宣誓效忠。一七七三年三月，人在圣彼得堡的科内斯基向凯萨琳献上感激之意：「我发现自己犹如那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员，犹如那些获释回到锡安的巴比伦囚徒一员，犹如君士坦丁时代的基督徒一员。」103凯萨琳不仅对波兰控制下的「白罗斯民族」提供保护，还直接把他们置于她的统治之下，使科内斯基和他的同胞都成了俄罗斯子民。但他其实感谢错人了，因为真正把他的人民从「埃及囚徒」状态解放出来的不是俄罗斯的凯萨琳二世，而是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

自从波尔塔瓦战争（一七○九年）之后，俄国就实质上控制了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的事务。所以，如果它有任何领土受到其他强权吞併，都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但是，瓜分波兰－立陶宛却断然符合其他欧洲强权的利益。普鲁士国王一直热烈希望可以得到波兰控制的西普鲁士，以便把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连接起来，所以，他在十八世纪初叶首先建议瓜分波兰。波兰积弱不振，是接壤强权的眼中肥肉，而虽然俄罗斯帝国一直反对瓜分波兰的主张，但最终形势比人强。

转折点出现在一七七一年。当时，奥地利惊见俄罗斯连连打败鄂图曼帝国，决定与后者结盟。为了避免和奥地利发生冲突，圣彼得堡决定屈服于普鲁士的压力，同意三分波兰－立陶宛共和国。一七七二年二月十七日，普鲁士和俄罗斯在圣彼得堡签订协议，相约瓜分波兰部分领土。同年八月五日，奥地利也在俄罗斯首都签署了三方协议。协议中，普鲁士分得它最想要的西普鲁士，奥地利分得加利西亚东部，奥地利将中心城市利沃夫改称伦贝格，俄罗斯分得立陶宛和白罗斯部分土地。

一七九三年第二次瓜分波兰时，俄罗斯仍然是个勉为其难的参与者。不过，残余的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的发展（一七八○年代和一七九○年代初期还在华沙控制下），对俄罗斯在该国的利益构成了明显威胁。话说还是一七九○年的时候，波兰和普鲁士签署了一份把俄罗斯排除在外和对俄罗斯潜在不利的共同防御协定。该协定终结俄罗斯作为波兰王国保护人的地位。雪上加霜的是，成立四年的波兰议会（一七八八年在

华沙成立），推出了多项旨在现代化波兰的国家改革，并在一七九一年五月三日通过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加强了国王的地位和权力，取消了议会必须采取全数决的规定，并确立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上的三权分立。这些消息对俄罗斯来说都不是好事，因为波兰实行的改革不仅削弱了俄罗斯操纵波兰政治的力量，还会促进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后一个威胁让凯萨琳忘记了很多她在启蒙时代的举措，而变得对任何会危及其专制统治的事情都采取敌视态度。

第三次「瓜分波兰」发生在一七九五年，离第二次仅仅两年，动机是镇压由科斯丘什科率领的波兰起义。科斯丘什科是波兰军事指挥官，在白罗斯土生土长。俄罗斯派出最好的军事指挥官苏沃洛夫镇压叛军。普鲁士人也派出部队，科斯丘什科在这两个强权的联手下被打败。战后，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了波兰剩下的领土。这一次，俄罗斯的战利品再次明显多过普鲁士和奥地利━后二者分到的面积加起来不到五万平方公里，俄罗斯分到的却是十二万平方公里。三次加起来，俄罗斯一共得到前波兰百分之六十六以上的领土。它的新边界包括立陶宛的全部，这包含其首都维尔纽斯及其波罗的海海岸线、白罗斯的布列斯特，以及乌克兰沃里尼亚小城卢茨克和弗拉基米尔。至此，几乎所有的乌克兰和白罗斯土地都落入圣彼得堡控制之下，唯一例外是乌克兰的加利西亚，它仍然被维也纳掌握在手心。

在俄罗斯帝国的官方史书里，瓜分波兰通常被称为「罗斯的重新统一」━言下之意是，除立陶宛之外，所有在「瓜分波兰」中被俄罗斯兼併的土地原都是由东斯拉夫人定居，而他们在许多世纪以前曾是基辅罗斯的子民。俄罗斯帝国会按族群标准选择併吞这些土地完全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反映着俄罗斯的「民族想像」在凯萨琳统治期间发生了变化。

即使凯萨琳是为情势所逼才会参与瓜分波兰，但她所选择兼併的领土仍然可以反映出俄罗斯权力菁英阶层这时的歷史、宗教和民族认同。

俄罗斯第一次瓜分波兰时没有任何歷史考量，纯粹是为了得到一条清晰分明和容易防守的边界。这条新边界由聂伯河、道加瓦河和它们的支流构成，而取得它的构想是军事学院校长切尔内绍夫在一七六○年代早期所提出。但俄罗斯和普鲁士在一七七二年一月签订的瓜分协议却是引用歷史理由而非战略理由要求得到这批土地。用俄罗斯语和普鲁士语双语写成的协议有这么一段话：「全俄罗斯的女皇陛下和普鲁士的国王陛下承诺对彼此做出最正面的协助，以便利用当前的环境为他们在这些波兰地区取得他们古老的权利。」104

奥地利女皇玛丽亚．德蕾莎一样是用歷史理由作为领土要求的基

础：「女皇陛下命令她的军团进入波兰，指示他们占领那些可以恢復她原有权利的地区。」105德蕾莎讨厌「瓜分」这个字眼，认为它暗示整件事情没有正当性，所以想办法寻找歷史根据。然后她查到，中世纪的匈牙利诸王曾声称加利西亚 - 沃里尼亚（Galicia-Volhynia）公国为其世袭财产。由于奥地利的皇帝被认为是匈牙利诸王的继承人，新获得的领土遂被称为加利西亚 - 洛多梅里亚（Galicia-Lodomeria）王国。Lodomeria 是 Volodymeria 的拉丁化拼法，而 Volodymeria 是指沃里尼亚的首都沃洛基米尔。当时，沃洛基米尔仍然处于波兰控制，还没有被夺去。

够奇怪的是，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瓜分都没有诉诸歷史权利。然而，俄罗斯在这两次兼併到的土地恰恰是它最有资格诉诸歷史权利的部分。只要可能，这两次的兼併也尽量以河为界，不过也加入了歷史、宗教和族群的考量。在第二次瓜分波兰之后，凯萨琳下令打造纪念章志庆。纪念章上有着帝国纹章的双头鹰，两只鹰爪各抓着一幅俄罗斯地图，一幅包含一七七二年兼併的土地，另一幅包含一七九三年兼併的土地。顶部附有铭文：「朕恢復了那些被强夺去的部分。」言下之意是，凯萨琳只是要回了一些原属俄罗斯但一度被人用武力夺去的土地。

凯萨琳会认为俄国拥有这些土地的主权，是基于她对俄罗斯歷史的研究。这一点清楚显示在她为两个孙子所写的《俄罗斯歷史笔记》一书—这两个孙子一个是亚歷山大（未来俄国沙皇），一个是康斯坦丁（未来的波兰国王106）。书中涵盖了一大段基辅罗斯的歷史，又颇为详细地交代了罗斯诸王公和波兰人的关系，包括双方之间的许多次战争。毫无疑问，凯萨琳希望获得从前基辅罗斯的所有领土，包括加利西亚，虽然该地区已经在第一次瓜分波兰时被奥地利分去。第二次瓜分波兰没多久之后，她对她的一位祕书表示：「假以时日，我们应该从皇帝那里把加利西亚交换回来：加利西亚对他没有用。」107不过，她自始至终没有得到加利西亚，但坚持在第三次瓜分中要得到沃洛基米尔。此举等于不让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得到沃里尼亚，而奥地利人一直声称沃里尼亚是他们继承自匈牙利诸王的遗产（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的一部分。最后，奥地利人只得到了包括克拉科夫和卢布林在内的「小波兰」，但他们声称这些土地实际上就是「西加利西亚」。

看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瓜分波兰期间，凯萨琳看事情的角度起了某些重要变化。在第一次瓜分，她不介意奥地利得到加利西亚。但在第二次瓜分，她却想要把加利西亚据为己有。对罗斯的歷史有更多认识断然是她改变心思的原因之一（这位女沙皇是在一七八○年代某个时间写出《俄罗斯歷史笔记》）。不过，可能还有其他原因。现在，凯萨琳不

仅从歷史和宗教角度看待新获得的土地，还从民族的角度看待。一七九二年十二月，在同意第二次瓜分波兰的提议之后，她写信告诉驻华沙大使，她的目标是「解放曾经属于俄罗斯的土地和城镇，它们是由我们的亲族和有着相同信仰的人所建立和居住，而他们一直受到腐败和压迫的威胁」108。所以，她不仅主张夺回原属于俄罗斯的土地，还要拯救有着相同宗教背景的同胞族人脱离迫害。

诚然，凯萨琳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方式变得众所周知，也成为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官方政策。俄军敉平科斯丘什科的叛乱之后，圣彼得堡举行了大肆铺张的庆祝，这一次除了有宗教仪式之外，还鸣放礼砲；第二次瓜分的庆祝仪式并不包含礼砲。凯萨琳二世相信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的东正教人口（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和俄罗斯人同出一源，但她对波兰人却没有同胞感情。在一七九二年十二月写给驻华沙大使的同一封信中，凯萨琳对于同宗的斯拉夫人的态度非常正面，但对波兰人却极尽痛骂之能事：「揆诸过去的经验和当前见于波兰的状况和态度，亦即它所表现的轻浮和反覆，它对我们流露的敌意和仇恨，又特别是它对发生在法国的堕落和暴力事件109的肯定态度，我们除非把它削弱至极度的软弱无能，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爱好和平或者用不着担心的邻居。」110

在苏沃洛夫一七九四年十一月占领华沙之后，这种视波兰人为敌人和视乌克兰人及白罗斯人为自己人的观点在俄罗斯的论述里变得具有主导性。一七九二年十二月，政府发布一个宣言，其执笔者虽然是女皇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别兹博罗德科，却反映（有时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反映出）凯萨琳在上述信件表达的观念。宣言说：「女皇陛下已经恢復了自古便属于她的帝国的领土，它们是在混乱时期被波兰人中一些奸恶之徒强夺去━今日一样有这样的波兰人，意在让俄罗斯不得安宁。这些土地的居民和我们有着相同血统和相同信仰，前此一直因为他们的虔诚信仰备受压迫。」111对于波兰人，别兹博罗德科这样写道：「波兰人的阴险完全显露在他们企图消灭俄罗斯部队，哪怕俄罗斯部队只是根据联盟的条约和平地驻扎在华沙。全体波兰人，不分老少，在这凶恶的罪行中人人有份。」

御用诗人全都踊跃表态。第二次瓜分后曾经称波兰人为「俄罗斯密友」的诗人彼得罗夫此时改口，把他们称为嗜血的怪物：

践踏过神圣的权利之后，

他们又威胁要掠夺和夷平礼拜堂，

好用外国人的财产满足他们

贪婪的手、贪婪的嘴和贪婪的胃。112

在凯萨琳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俄罗斯人都是用宗教标准定义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的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即把他们定义为东正教徒。不过，在俄罗斯人新获得的波兰土地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白罗斯民族」却不是东正教徒。不仅波兰或波兰化贵族和犹太人是这样—前者是天主教徒，后者完全不是基督徒，就连大部分东斯拉夫人都是联合教会信徒。俄罗斯在第二次瓜分所得到的土地上，只有三十万人信奉东正教，超过两百万人是联合教会信徒。至于第三次瓜分得到的土地甚至几乎没有东正教徒。

一七九四年四月，凯萨琳为纠正这种局面，发起一场官方运动，要把联合教会信徒转化为东正教徒。她这个决定是由二十八个右岸乌克兰113村庄代表联名的陈情书所触发—自一七六八年的起义之后，右岸乌克兰就是东正教和联合教会的战场，他们表示想要放弃联合教会信仰，改皈依东正教。凯萨琳不仅答允请求，还建议在其他联合教会堂区比照办理—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力。一封应她的要求发出的牧函这样说：「在俄罗斯的混乱时期，有一大批它的子民在波兰人的牛轭下被强夺原有的希腊东正教信仰……是歷来对信仰自由的最大压迫。」114牧函又宣称，凯萨琳已经拨乱反正，「把这些与俄罗斯人同属一族的人民归回到她的统治之下」。

在发给管辖新兼併土地总督的诏书上，凯萨琳把新政策的目的说得更白。她指出：「最适合消灭联合教会信仰的方法」是斩草除根，而非仅以有少数堂区自愿改教为满足。凯萨琳预期清算联合教会将会引起大规模骚乱和抗议活动，要求总督做好准备。在警力的协助下，总督必须做到「防止任何的混乱和麻烦发生，不让任何一个地主或天主教及联合教会神职人员胆敢制造最小事端。任何企图反对和不服从我们意志的行为都应被视为刑事罪行，必须受审和没收财产，直到法院做出判决为止」115。

这位女皇曾经以宗教宽容的名义捍卫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境内的东正教，并因此得到伏尔泰赞美，但现在却完全变了个人，对另一个宗教进行迫害。这该怎样解释呢？虽然上述牧函把联合教会信徒说成俄罗斯人同族人这一点可以部分解释凯萨琳的动机，但更直接的原因却应该往别处寻找。凯萨琳认为波兰的新宪法是对帝皇权力的一种法国式攻击，及至一七九四年，为回应法国大革命和新宪法，她已抛弃许多原先相信的观念。剷除联合教会信仰的诏书是在科斯丘什科起义时期发出，而有

鑑于当时有许多信仰联合教会的农民支持起义，剷除联合教会的政策也许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付叛乱的措施。凯萨琳信得过前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的东正教教士，却信不过那里的联合教会教士。

另外，凯萨琳也没有丢掉昔日保护宗教宽容的那一套，改用另一套理由来支持不宽容。她现在声称，她所做的事只是为了纠正东正教徒一直受到的不公道对待。他们曾经被波兰当局强行转变为联合教会信徒，她现在只是设法把他们带回到他们祖先的信仰。这个在官方论述中被称为返回「父祖的信仰」的运动在右岸乌克兰取得高度成功：到了一七九六年，那里几乎不剩任何联合教会的堂区。不过，愈往西部和西北部走，就有愈多的联合教会教士和堂区拒绝改教，无论受到多大压迫仍不为所动。白罗斯中部和沃里尼亚基本上仍然以联合教会信徒占多数。在第三次瓜分波兰之后，俄罗斯的联合教会信徒数目进一步增加。凯萨琳在一七九六年驾崩，宗教的「重新统一」运动随之终止。当时，乌克兰和白罗斯的联合教会信徒仍有一百四十万人之众。

帝国与民族结合过程是开始于彼得大帝，至凯萨琳之时达到一个高峰。她利用启蒙运动的理性政府构想去消除地区和民族的特殊性，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除了重塑国家的行政结构和机构，她的帝国打造工程还包括炮制出一套歷史神话、发展一种共同语言和重新思考东正教在一个多民族政体里的地位。

在俄罗斯人的身分认同和自我意识方面，凯萨琳的统治也带来了一种对帝俄民族的新理解。随着愈来愈强的中央集权，区域的忠诚和自治飞地—例如哥萨克国纷纷被打破，随之出现的是一种「全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社会规范同样发生了改变：俄罗斯人现在不仅是有责任乖乖为国家服务的「祖国诸子」，还是被赋予了权利的公民。俄罗斯帝国此时仍然像伊丽莎白时代那样反对西方，但已经不那么仇外。

凯萨琳以东正教保护者自居的态度促使俄罗斯比从前任何时期更喜欢干预天主教和东正教在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境内的冲突，但起初凯萨琳认为那里的东正教徒只是教友，不是同宗的同胞。对她来说，俄罗斯民族的边界和俄罗斯国家的边界同一范围，只是到了她的统治后期，因为瓜分波兰而把几百万主要是非东正教徒的人口纳入了俄罗斯版图，俄罗斯的官方论述才开始重视这些人的族群归属问题。凯萨琳和她的顾问团从不接受把族群性作为定义她的新子民的主要范畴，但这些子民却奠定了下一世纪一种对俄罗斯人身分认同的新理解。

瓜分波兰挑战了启蒙时代俄罗斯帝国的身分认同模型。就像伊凡三世在十五世纪时的做法一样，凯萨琳二世在十八世纪对新领土的所有权

声称是诉诸她从基辅罗斯继承的歷史权利。但要把这些土地整合到俄罗斯里面来的时候，她面临着比伊凡三世艰鉅得多的任务。三次瓜分波兰把几百万东斯拉夫人（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带进了俄罗斯帝国，而凯萨琳在信件和诏书中不仅把他们视为教友，还视为同宗的同胞。不过，她后来发现，这些人原来大都是联合教会信徒，而因为朝廷拒绝採纳多元宗教构想，所以发起强迫联合教会信徒改皈「父祖的信仰」的运动。

这个运动主要是由科斯丘什科率领的波兰起义激发，为朝廷提供了一个处理边区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的早期模型。这些人在接下来几代会继续挑战帝国的稳定和统一。

99 Evgenii Gusliarov, Ekaterina II v zhizni (Moscow, 2004), 151.

100 Rossiiskoe zakonodatel’stvo X-XIX vekov (Moscow, 1987), vol. 5, 23.

101 Andreas Kappeler, 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Harlow, UK, 2001), 107.

102 Sergei Solov’ev, Sochineniia v vosemnadtsati knigakh (Moscow, 1994), vol. 13, 123.

103 V. Sheremetevskii, “Georgii,” in Rosiiskii biografcheskii slovar’ A. Polovtsova, vol. 4, s.cv.

104 “Peterburgskaia konventsiia mezhdu Rossiiei i Prussiei,” Pod stiagom Rossii (Moscow, 1992), 132.

105 同上。

106 实则为「总督」。一八二五年建立的波兰王国系俄国的保护国。国王由沙皇兼任，另由沙皇指派一位皇族为总督，常驻在华沙。康斯坦丁先是担任波兰军队总司令，一八二六年担任总督。

107 Vsevolod Solov’ev, Istoriia padeniia Pol’shi (Moscow, 2015), 219.

108 Sbornik Russkogo istoricheskogo obshchestva (St. Petersburg, 1885), vol. 47, 473.

109 指法国大革命。

110 同上。

111 K. V. Ratnikov, “Istoricheskie formy otrazheniia pravitel’stvennoi politiki v bshchestvennom soznanii,” Al’manakh sovremennoi nauki i obrazovaniia (Tambov, 2016), no. 6, 157.

112 Andrei Zorin, Kormia dvuglavogo orla: Literatura i gosudarstvennaia ideologiia v Rossii v poslednei treti XVIII-pervoi treti XIX veka (Moscow, 2001), 155.

113 「右岸乌克兰」指聂伯河以西的乌克兰地区，基辅包含在其内。聂伯河大体上把乌克兰切分为东西两部分。

114 Barbara Skinner, The Western Front of the Eastern Church: Uniate and Orthodox Conflict in Eighteenth-Century Poland, Ukraine, Belarus, and Russia (DeKalb, IL, 2009), 204.

115 同上，203-204.

第五章　波兰的挑战

伏尔泰打趣说过：「一个波兰人恰恰好，两个波兰人吵不休，三个波兰人━变成了烫手山芋。」116透过法国启蒙思想家所热烈支持的联合瓜分行动，俄罗斯帝国获得超过三个波兰人，有如接到烫手山芋般，面临愈来愈大的挑战。凯萨琳二世不认为有必要给予这些新兼併的土地特殊待遇，所以抛弃了俄罗斯沙皇歷来的习惯：过去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俄罗斯都是容许新获得的土地，例如哥萨克国和波罗的海各省高度自治。但被兼併的波兰土地却没有获得特殊地位，这让帝国中心和它的新领土之间关系紧张。

许多建立圣彼得堡帝国的菁英，包括被派去波兰统治的那些菁英，同情波兰的贵族，认为瓜分行动不公道且轻率，有违俄罗斯在欧洲的最佳利益。对一个被征服邻国的这种内疚心理在帝国菁英是新鲜事物，也对统治者构成特殊威胁。波兰一直是一个区域强权，对自己的帝国使命有着强烈意识，也拥有一批忠于国家和祖国的菁英。作为一个充分成长的民族国家，它并不准备放弃独立国格（就像十七世纪哥萨克国的菁英阶层那样），波兰贵族自认为比征服者优越，而他们的心怀怨怼也对俄罗斯帝国的传统作业方式带来了额外的难题。它的一贯策略是只和地方菁英打交道，不理会低下阶层，以这种方式建立自己的霸权。俄罗斯对波兰也是如法炮制，但这一次，地方菁英并没有完全配合，偶尔还会完全不合作。

俄罗斯帝国面临的波兰问题从来不纯粹是个理论问题，即不仅止于让知识分子伤脑筋罢了。波兰人不止一次武装起义，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可以谈判，而是要把俄罗斯人完全赶走，恢復三次瓜分之前的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版图。对俄罗斯人来说，波兰人是危险的敌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推进，还有它对语言和民族身分的强调，都构成了俄罗斯想要整合这些新土地的另一层障碍。波兰贵族不仅受到反独裁主义的政治文化薰陶和信仰一种俄罗斯菁英极度不信任的宗教，而且作为西斯拉夫人，他们在种族上也不同于帝俄民族核心的东斯拉夫人。另外，波兰贵族也不断以独树一帜的歷史、政治文化、语言、文学和宗教作为基础，打造一种现代波兰人的身分认同。

因为无法用传统的权宜之计解决波兰问题，因为同化不了被征服土地的菁英阶层，俄罗斯帝国的菁英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身分认同。他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把效忠独裁君主和东正教会的传统与新出现的民族性观念结合起来。后来的史书称这种三位一体结构为「官方民族性」。

在十八世纪余下的时光里，它将会是俄罗斯的帝国民族打造工程的核心。

拿破崙在一八一二年入侵俄国的行动被法国官方称为波兰战役—更精确的说法是第二次波兰战役。在第一次波兰战役（一八○六至一八○七年），拿破崙打败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后，得到普鲁士在瓜分波兰时分到的华沙公国。根据官方说法，第二次波兰战役的目标是恢復波兰王国，包括收復俄罗斯在三次瓜分中夺去的土地。但很多人相信，拿破崙的真正目的是要切断俄罗斯帝国和英国的贸易，从而紧缩法国对英国的经济封锁。但经济问题几乎无法作为鼓舞法国军队或地区内潜在盟友的战斗口号，因为他们得到的命令或要求是直捣莫斯科。只有以还波兰一个公道为藉口，才足以振奋战斗精神，让大量波兰人愿意加入拿破崙的阵营，并赋予这场战争正当性。

虽然波兰在第三次被瓜分之后已经从欧洲大陆的政治地图消失，而参与瓜分的三位君主亦同意不把这个国家的名字用于自己的头衔或用于被他们兼併的土地上，但波兰仍然留在许多欧洲人的心灵地图上，尤其是波兰人自己。相传，波兰起义的领导者科斯丘什科在一七九四年被俄罗斯人打败之后，曾经绝望吶喊：「波兰的末日到了！」但他后来否认说过这样的话，而许多波兰人也拒绝相信他们的国家已经完了。他们有些人加入拿破崙的革命军，在西印度群岛、义大利和埃及与这位未来的皇帝并肩作战。他们所唱的进行曲后来成为被恢復过来的波兰国歌，第一句歌词是：「只要我们还活着，波兰就不会死去。」

拿破崙永远不会忘记波兰军团的忠诚和他们奋起战斗的最终目标。一八一二年六月，在入侵俄罗斯前夕，这位法国皇帝在华沙公国议会发表演讲，赞扬了波兰部队的勇敢，又表示自己已准备好为他们的大业奋斗。「我爱你们的民族。过去十六年来，你们的战士在义大利和西班牙的战场和我并肩战斗。我为你们的勇敢鼓掌。我贊成你们的目标，会尽我一切力量支持你们的意图。如果你们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那么你们就可望透过迫使敌人承认你们的权利，实现你们的愿望。」117

拿破崙所说的愿望和权利，其内容反映在波兰议会几天前准备好的陈情书：

我们要恢復波兰是基于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基于我们与我们祖先的联繫，基于举世公认的神圣权利，因为那是人类的洗礼盆。不是只有我们才能品尝到波兰復活的甜美滋味，住在不同土地和等着它解放的人一样能品尝到这种滋味……尽管他们长时间与我们分隔开来，但是立陶宛、白罗斯、乌克兰、波多利亚和沃里尼亚的居民都是我们的兄弟。他

们就像我们一样是波兰人，也有权利称自己为波兰人。118

拿破崙告诉波兰议员，他不能违背他对奥地利做出的承诺，撤回与他缔结的和平，因此，恢復波兰被奥地利拿去的土地是不可能的；但要取回俄罗斯拿去的土地却没有问题。「但愿立陶宛、萨莫吉希亚、维捷布斯克、波洛茨克、莫吉廖夫、沃里尼亚、乌克兰和波多利亚表现出我在大波兰所见到的精神，那样的话，天意就会为你们的神圣大业和成功加冕。」119

当月稍后，拿破崙的大军越过俄罗斯边境，在凯萨琳二世从波兰吞併来的土地上行军，剑指俄罗斯腹地。在华沙的波兰人看来，这场战争是为了恢復他们的祖国，和让他们可以与落入俄国统治的国人同胞重新统一。近十万波兰人投入拿破崙麾下—每六名征俄士兵中就有一名是波兰人。不让人意外，两军的第一次重要交锋在一八一二年六月下旬，不是发生在法国和俄罗斯部队之间，而是发生在波兰和哥萨克骑兵之间。双方在他们熟悉的土地—前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东部省分—重演他们歷史悠久的厮杀。虽然哥萨克人获胜，但没有乘胜追击，反而撤退。他们的整个操作只是为了争取时间，让俄军主力部队可以撤回内陆。俄军的不断撤退让拿破崙最终可以去到莫斯科的大门。

莫斯科在一八一二年九月的波罗底诺战役结束后投降。拿破崙的入侵和莫斯科的投降激起了俄罗斯人的爱国情绪，也激起俄罗斯社会的反法国和反波兰情绪。掌管俄罗斯宣传事务的是海军上将希什科夫，他既是新任国务大臣，也是朝廷中「俄罗斯党」的首领。希什科夫卖力寻找爱国的榜样人物，并在混乱时期反抗波兰入侵的人物中找到他们。沙皇亚歷山大一世在诏书中吆吁「俄罗斯的忠实诸子」和「作为英勇斯拉夫人英勇后裔的俄罗斯人民」奋起抵抗侵略者。为诏书执笔的希什科夫这样写道：「在每个贵族中，让他120遇到波札尔斯基；在每个神职人员中，让他遇到帕里琴；在每个市民中，让他遇到米宁。」121他提到的这些人物都是一六一二年对抗波兰人入侵的反抗军领袖。随着一八一二年拿破崙拿下莫斯科，这是混乱时期之后两百年来第一次有外国军队进入俄罗斯首都122，他会被拿来和一六一二年占领莫斯科的波兰人相提并论自然是无可避免的事。

一八一二年九月看似俄罗斯的末日—莫斯科即将向法国军队投降，结果却是拿破崙帝国末日的开端。他本来预期，俄罗斯人将会投降，双方会进行谈判，但这并未发生。俄罗斯人採取的是西徐亚人在五一二年用过的招数：面对来袭的波斯大流士，他们只是在庞塔斯草原上不断撤退，从不正面交锋。俄罗斯还把本来只用于村庄和小镇的焦土政策扩大到莫斯科。俄罗斯间谍在城中纵火，迫使法国人不得不保护克里姆林

宫，让其免于受到大火波及。拿破崙大吃一惊，以为这是一种耍赖表现。但事实上，他已落入陷阱。

一大堆难题向他扑面而来：他找不到俄罗斯军队决战，补给品短缺并最终用罄，首都圣彼得堡对疲惫和人数显着减少的法军来说遥不可及。冬天渐渐逼近，而法国军队的冬衣还在巴黎。十月中旬，拿破崙下令部队往俄罗斯边界撤退。俄军指挥官库图佐夫用他以逸待劳和补给充足的军队迫使拿破崙採取挺进莫斯科时的同一条路线撤退。沿线地区在当初拿破崙路经之时便已经被摧毁，完全无法提供法国军队任何补给。他们挨饿受冻，饱受哥萨克人和游击队的骚扰。十二月中旬，即占领莫斯科三个月后，当初入侵俄国的六十万大军只剩不到两万两千人得以全身而退。其他人或是被杀，或是被俘掳，或是走散。征俄大军不再是大军。

一八一二年十二月，俄国沙皇亚歷山大在诏书中称波兰人为近乎兄弟的近亲，又赦免了那些曾为拿破崙在俄国作战的波兰人。他说：「我们希望，这种爱子女和无私的宽恕可引起衷心的忏悔，并向这些地区的所有居民证明，他们从古代起就是和俄罗斯人有着共同语言与血缘的同族人民，也只有跟强大和宽宏大量的俄罗斯完全融为一体，他们才会最安全最开心。」123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是兄弟这种泛斯拉夫人观念最初是由俄罗斯宫廷诗人彼得罗夫在一七九三年第二次瓜分波兰时首先提出，现在它被重申，并透过语言的亲和性加强。

亚歷山大相信自己知道要如何重新笼络波兰人的心。他的解决方案是建立波兰王国（用俄罗斯语来说是「波兰沙皇国」），而这个倡议也在维也纳会议（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获得批准，该会议是划定后拿破崙时代欧洲各国边界的国际会议。新的波兰王国是用普鲁士兼併的波兰土地创造，首都设在华沙。亚歷山大没有放弃俄罗斯皇帝的头衔，但给自己另外冠上波兰沙皇的头衔，由此创造出一种王朝联合的印象，让俄罗斯有正当理由可以继续统治波兰王国。这也是迈向波兰人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旧梦的第一步：亚歷山大自知不可能在俄罗斯当立宪君主，但心想说不定可以在波兰过过这种瘾。他允许波兰王国拥有一部相当自由的宪法、一个议会、一个独立的政府和行政结构，甚至拥有一支军队。换言之，他摒弃了凯萨琳追求帝国同质化的政策，改为偏好特殊主义—这种特殊主义如今受到波兰宪法的保护。亚歷山大希望，有朝一日，帝国其余地区亦会有各自的宪法。事实证明，那得要再等九十年。

亚歷山大在华沙被誉为波兰国家地位的恢復者。波兰人保留了大部分拿破崙给予他们的领土。但他们对亚歷山大的爱戴为时短暂，因为事实证明，波兰王国并不能控制自己的预算、军队和国际贸易。此外，沙

皇派到波兰的官员常常越权，而沙皇的弟弟康斯坦丁大公，他是波兰军队总司令，也因为行为不检点而名声欠佳。最重要的是，华沙对于俄罗斯在瓜分波兰时分到的土地毫无权力。年轻一代波兰活动家开始建立祕密组织，目标包括恢復波兰被瓜分前的版图。俄罗斯当局用雷霆手段打击这些阴谋，让波兰王国的普遍不满情绪更加高涨。

亚歷山大的宪政实验并不顺利，无论是在波兰王国还是帝国的其余部分都是如此。俄罗斯社会的保守势力压根儿反对君主立宪的理念。进步人士则抱怨波兰有一部宪法而俄罗斯却没有。一直有传言说亚歷山大计画把俄罗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兰所兼併的土地归还波兰王国，这同时引起了保守派和进步派的抗议。

一八一九年，这些担忧由俄罗斯当时最着名的歷史学家卡拉姆津道出。在一封题为〈一个俄罗斯公民的意见〉的公开信中，卡拉姆津提醒沙皇要注意一个可称之为「瓜分俄罗斯」的趋势：「他们会说她（凯萨琳）瓜分波兰是不合法的吗？如果你想透过瓜分俄罗斯本身去消除她的不合法，那你的行为就更加不合法。」124他接着指出，用歷史来论证事情有时会很弔诡。「政治里没有旧的堡垒，否则我们将有责任恢復喀山王国、阿斯特拉罕王国、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梁贊大公国等等。此外，即使是按照旧堡垒的标准衡量，白罗斯、沃里尼亚、波多利亚和加利西亚也一度是俄罗斯的财产。如果你还给他们，他们就会得寸进尺，要求交还基辅、切尔尼戈夫和斯摩棱斯克，因为这些地方毕竟也曾属于我们敌对的立陶宛一段很长时间。」

卡拉姆津也是多卷本《俄罗斯国家的歷史》的作者（这本书在一八一六至一八二六年于圣彼得堡出版），在那封公开信中他并没有仅从歷史立论。他还强调，同是统治着俄罗斯和波兰的沙皇必须选择站在「你的真正祖国」的一边，即站在「美好强大的俄罗斯」一边。谈到被兼併土地上的波兰菁英时，他写道：「立陶宛和沃里尼亚希望看见波兰王国，但我们希望看见俄罗斯帝国。」把这些领土让予波兰王国将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那样的话，波兰人便会在法律上被承认为一群独立和有主权的人民，这样，他们将会比波兰－俄罗斯人对我们更危险。」最后，卡拉姆津表示自己不想成为当时流行的泛斯拉夫论述的一部分：「陛下，波兰人将永不会是我们的真正兄弟或信得过的盟友。现在他们衰弱和无足轻重：弱者不会爱强者，而强者会鄙视弱者。所以，如果你让他们变强，他们就会想要独立，而独立的第一步是脱离俄罗斯—他们当然无法在陛下有生之年做到，却会指望在那之后做到。陛下明鑑！」

歷史的发展证明卡拉姆津有先见之明：在亚歷山大有生之年，波兰王国都没有发生起义。但他在一八二五年驾崩，五年后，波兰人执起了

武器。一八三○年十一月，一群年轻的波兰人军校生企图暗杀总司令康斯坦丁大公，由此点燃了一场日后被称作「十一月起义」的革命。大公逃过一劫，假扮成女人逃出了府邸，但俄罗斯和波兰的王朝联合的门面自此倒塌。在革命分子的要胁下，波兰议会不得不宣布波兰王国脱离俄罗斯帝国独立，并设法收復在三次瓜分时失去的波兰领土。反抗军派部队增援立陶宛、白罗斯和乌克兰，又派代表到圣彼得堡声索这些领土。

尼古拉一世在一八二五年继位，一登基就碰上由一批自由派俄罗斯军官发起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由于认为波兰的起义威胁到自己的权威和权力，尼古拉一世拒绝谈判，反而派军队进剿叛军。但波兰军队出乎意料地难对付。勐攻几个月之后，俄军仍然没能攻克华沙。在立陶宛，俄军也仅止于守住维尔纽斯，击退了波兰人的攻击。在白罗斯，还有在乌克兰的波多利亚和沃里尼亚地区，波兰贵族发动游击战，骚扰俄罗斯分遣队和破坏通信路线。

一八三一年六月，尼古拉改派帕斯克维奇．叶里温斯基将军为波兰前线总司令。帕斯克维奇是哥萨克国的一个军官之子（曾在一八二七年从鄂图曼人手中夺得叶里温，因此获得荣誉勋章），后担任驻高加索俄罗斯军队总司令。因为得到尼古拉一世的信任和获得额外的军队，帕斯克维奇成功扭转战局。一八三一年八月，他把华沙重重包围起来。波兰人表现出英勇气概，拒绝投降。其中一个将军在回覆俄罗斯人的投降要求时这样说：「你们的砲弹曾经在波罗底诺炸掉我一条腿，现在我无法退后半步。」他指的当然是他曾在波罗底诺战役和拿破崙并肩作战。但帕斯克维奇攻破波兰人一道又一道防线，最终在一八三一年九月八日攻入了华沙。他在写给沙皇的奏摺上说：「华沙已经跪在陛下脚下。」[125]一个月后，最后一个波兰守军的据点被击破。现在问题变成是：下一步要怎样做？如果说沙皇在「十一月起义」之前曾经想过要给波兰人更大自治权和一部宪法，如今这种想法已不復存在。

攻陷华沙的消息在圣彼得堡引起一阵欢腾，多位着名诗人透过诗集《占领华沙》庆贺这一重大胜利。其中一首诗出自俄罗斯最德隆望尊的诗人茹科夫斯基，两首出自他的晚辈普希金。后者比前者更有才华，但较不为朝廷所信任。诗集出版前，普希金的诗经过沙皇尼古拉御览和批准。

茹科夫斯基把征服华沙视为俄罗斯帝国的又一次胜利。在他看来，夺得华沙类似帕斯克维奇将军几年前在高加索击败波斯人和鄂图曼人。普希金的两首诗一〈致俄罗斯的诽谤者〉和〈波罗底诺战役纪念日〉则採取另一种的基调，更精确地说是各採取一种不同基调。前一首诗谴责法国和欧洲煽动仇恨俄罗斯的情绪，第二首诗专门谈波兰。在普希金看

来，波兰问题同时是俄罗斯问题。波兰叛军所要求的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歷史和领土。这些领土包括基辅，它被认为是古代罗斯的首都和罗斯各城市的母城，也包括自哥萨克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之后归附于俄罗斯的乌克兰人土地。普希金在诗中问了读者一些问题：

沃里尼亚将会归谁管辖？

波格丹的遗产126该谁来继承？

自认为有叛乱的权利，

立陶宛将会摆脱我们的统治吗？

俄罗斯诸城的祖先—

残破金顶的基辅

是否会拿陵墓中的所有圣物

去和轻率鲁莽的华沙结成亲戚？127

普希金把「十一月起义」和俄罗斯对它的镇压界定为「一场斯拉夫人内部的争吵」。引起这场冲突的核心因素是俄罗斯计画重新统一斯拉夫人诸部。「斯拉夫人的百川会匯入俄罗斯大海吗？抑或它将会干涸？」这就是普希金认为是「妄自尊大的波兰人」和「忠诚可靠的俄罗斯人」之间待解决的问题。与茹科夫斯基不同，普希金的目标并不仅止于建立帝国，还包括捍卫泛俄罗斯民族，以及创造一个泛斯拉夫民族。对他来说，俄波斗争关乎的是斯拉夫国度的未来：所有斯拉夫人最终都必须在政治上成为俄罗斯人。就此而言，他呼应了彼得罗夫在第二次瓜分波兰之后所写的那首诗—从那首诗看来，彼得罗夫认为波兰人只是最先匯入普希金所谓的「俄罗斯大海」的溪流。

波兰在拿破崙时代的民族动员，以及随后在一八三○至一八三一年的波兰起义，都促使俄罗斯为帝国的新身分认同寻找政治、文化和民族的根源。这个过程开始于拿破崙入侵俄国期间，在亚歷山大于波兰王国推行宪政实验期间加速，然后又因为被后来史家称为「官方民族性理论」的出现获得了新的推力。这个理论是新上任的俄罗斯教育部长乌瓦罗夫所提出。他声称，俄罗斯的教育乃至俄罗斯人的身分认同都应该是建基于三条主要原则：东正教、君主专制和民族性。其中，「民族性」（narodnost’ ／ nationality）观念是乌瓦罗夫的主要创新，最后也成为了三条三位一体原则的总称。

乌瓦罗夫的三条政治意识形态原理第一次是出现在一八三二年三月

呈给沙皇尼古拉的一份备忘录，当时他还只是教育部副部长。在晋升部长后的几个月，即一八三三年的十一月，他呈上了他的最后定本。在备忘录中，乌瓦罗夫声称他的目标是拯救俄罗斯，免其经歷欧洲所经歷过的社会和宗教机构崩溃，他将此崩溃归咎于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当务之急是恢復和保持俄罗斯的民族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之前几十年即便没有实际被摧毁，也是被严重地边缘化。不过，也有必要把这些价值观调适于「当前的思想取向」。

乌瓦罗夫是从哪里找到这套想法的灵感？在拿破崙战争爆发之前，他是驻巴黎的外交官，非常仰慕基佐；基佐是一八三○年推翻法王查理十世并让路易．菲利普一世掌权之「七月革命」的关键人物，也是后来法国自由派阵营中保守派的领导者之一。如果说凯萨琳二世是以伏尔泰和其他法国启蒙思想家为师，是根据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原则转化自己的帝国，那乌瓦罗夫就是靠着基佐的启发，摸索出一个介于保守主义和革命这两种极端立场的位置。他密切观察基佐在法国建立国民教育系统的努力（两人凑巧同一时期担任教育部长），但又拒绝承认法国人宣称的他们创造了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教育模式。

因为认为法国人对欧洲其他地方毫不了解和漠不关心，乌瓦罗夫把目光转向德意志，寻求一个对法国普遍主义的替代选项。他在歷史学家、语文学家和诗人施勒格尔的作品里发现了他想要的东西，因为这位诗人一向强调民族文化和传统的重要性。施勒格尔是最早主张民族乃奠基于共同语言和共同习俗的作家之一。在这方面，他是受到赫德的影响，后者是浪漫主义民族观念的创造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奠基于民族精神，而每个民族都有权利创立自己的国家。施勒格尔预期，一个日耳曼民族国家将会以奥地利为中心建立起来，因为奥地利把中世纪的王朝制度、贵族制度和宗教保存得最好。乌瓦罗夫于一八○七至一八○九年驻维也纳期间曾经和施勒格尔见过面，当时俄、奥两国是亲密盟友，共同对抗拿破崙。

既受到基佐创造法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启发，復受到施勒格尔的民族国家观点的启迪，乌瓦罗夫着手为俄罗斯的民族教育制定原则。他设法找出一个方法，让俄罗斯可以从欧洲传统的各种最佳元素受惠。他在写信给沙皇的奏摺上说：「该如何在这里建立一种符合我们自己看世界的方式又是欧洲精神不陌生的大众教育体系呢？在与欧洲启蒙运动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应该遵守何种原则，才能让我们在吸收不可或缺的那些欧洲观念的同时，又不致被它们有害的成分威胁？」128乌瓦罗夫向沙皇指出「在寻找俄罗斯人之所以为俄罗斯人的本质（每片土地及每个人都拥有这样一尊帕拉斯神像129）」时，他找到了这三大元素：东正教信

仰、君主专制和民族性。

「就像一个人一样，一个民族如果不爱自己祖先的信仰，就一定会灭亡。」乌瓦罗夫写道。他认为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和无可辩驳的真理，遂没有加以申论。但在谈到君主专制的必要性时，他的论证要比较缜密，这是因为君主专制原则不仅在国外受到攻击，也在俄罗斯国内受到攻击，后者又特别是受到沙皇亚歷山大的君主立宪思想启发。他这样说：「君主专制是俄罗斯在当前状态下政治生存的基本条件。只有作白日梦的人才会骗自己说，他们找到什么模糊的证据，可证明事物的秩序是符合他们的理论或偏见。这些人因为不认识俄罗斯，不了解它的状况、需求和欲望，才会对自己的主张心安理得。」乌瓦罗夫声称，企图限制沙皇的权力将会让国家内部的种种关系变得不稳定，并且对俄罗斯的发展构成障碍。他深信，大部分俄罗斯人都像他一样，认为削弱君主专制的原则充满危险。

虽然乌瓦罗夫引入的民族性观念在俄罗斯的官方信仰体系是一个新元素，但在他自己的思想体系里却只排行第三，分量远不如前面两个原则。他也不认为它等于近代的民族主义。在他的理解里，「民族性」是一种根植于俄罗斯歷史发展的本土传统，可以把教会和沙皇连结起来，确保两者的稳定。

从现在的观点看，有一件事情颇为讽刺：乌瓦罗夫的民族打造纲领是用法语写成。但要知道，在当时，法语仍然是俄罗斯菁英阶层的主流语言。乌瓦罗夫提到「民族性」时使用的是法语单字 nationalité，后来他的下属将之翻译为 narodnost’。把这个俄罗斯概念翻译成英语的话，最接近的译法是「民族生活方式」（national way of life）。就我们所知，narodnost’一词最早出现在俄罗斯诗人维亚泽姆斯基笔下，他在一八一九年所写的一封信中这样说：「为什么不把 nationalité 翻译为 narodnost’ 呢？毕竟，波兰人都是称之为 narodowość。波兰人不像我们那么拘谨，如果一个单字不是他们的语言本来所有，他们就会抓住它的头髮硬拖出来。」130这封信是从华沙发出，当时维亚泽姆斯基在那里推行亚歷山大一世的宪政工程。

narodnost’一词很快就在俄罗斯被接受。一八二五年，普希金指出，这个词语既流行又缺乏清楚定义：「我们使用 narodnost’ 已经一段时间，既主张文学作品应该表现 narodnost’，又抱怨文学作品难得看见 narodnost’，可谁都没有想过，他所谓的 narodnost’ 该怎样定义。我们其中一个评论家似乎认为所谓的 narodnost’ 就是由我们可以在我们国家歷史里随便挑出来的东西所构成，另一个评论家则认为 narodnost’ 表现在语言，也就是说，他们乐于用俄罗斯语表达自己，乐于使用俄罗斯的

表达方式。」[131]

根据乌瓦罗夫，「民族性」就是俄罗斯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它可以在一个受到欧洲新观念塑造的时代确保另外两个关键元素—即宗教和君主专制—的稳定。在欧洲，民族的观念是和民众代表制的原则紧密相连，因而会对君主专制构成威胁，但同样情形却被认为不会发生在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的民族观念被认为是支持传统的沙皇制度。乌瓦罗夫不想用君权神授思想来支持沙皇的专制统治，这种论证在当时司空见惯，也没有企图用教会作为沙皇权力的法理基础。取而代之，他把君主专制和民族性拉在一起，主张「两者同出一源，在俄罗斯人民的歷史的每一页都是携手同行」[132]。不过，他没有更进一步主张沙皇的独裁权力来自俄罗斯民族。

乌瓦罗夫在把西方的民族性观念引入俄罗斯的时候，显然不是照单全收。他不理会施勒格尔对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重视，只专门强调传统制度的重要性。由于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帝国，民族特殊性的观念会对它构成威胁，这一点是波兰人一八三○年反抗俄罗斯压制所进行的民族动员证明过的。而且，西方民族观念也可能会让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的利益不同于君主的利益。乌瓦罗夫致力于连结帝国和民族性，是希望后者可以强化前者。在备忘录的结论里，他提到自己觉得对「上帝、最高主宰和祖国」负有责任[133]。「上帝、最高主宰和祖国」这个铁三角也是拿破崙时代俄罗斯首席宣传官希什科夫所强调者，表明了乌瓦罗夫的构想和已确立的帝国论述传统息息相关。

不管乌瓦罗夫的动机有多保守，他把「民族性」一词引入俄罗斯政治之举还意味着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传入俄罗斯帝国。彼得一世的首席意识形态理论家普罗科波维奇首先提出「祖国」的观念，它现在已经蜕变成「民族」的观念（这一点在一六七四年出版的《大纲》早已有所预示，因为其中的「民族」一词也是传统意义而非革命意义）。到底「民族性」观念在实践上会带来什么后果，当时还不清楚，无论是对乌瓦罗夫而言或对沙皇来说都是这样。它的政治意涵需要几代人才能完全挖掘出来。俄罗斯「民族性」的范围为何？它是否单凭本身便足以让一个帝国子民对沙皇和东正教产生效忠之心，抑或需要其他元素的配合？在波兰起义还余波盪漾之际，最需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的地方，莫过于被兼併到俄罗斯帝国的前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的土地上。

116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Oxford, 2005), vol. 1, 386.

117 V. I. Picheta, “Pol’skaia konfederatsiia v 1812 godu,” in Otechestvennaia voina i russkoe obshchestvo (St. Petersburg, 1812), vol. 3, 159.

118 同上，157.

119 同上，159.

120 指拿破崙。

121 Otechestvennaia voina 1812 goda: Sbornik dokumentov i materialov, eds. Evegneii Tarle and Anatolii Predtechenskii (Moscow, 2015), 30.

122 当时首都其实是圣彼得堡。

123 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 (St. Petersburg, 1830), vol. 32, 481-482.

124 Nikolai Karamz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Moscow, 1998), vol. 18, 11.

125 Boris Tarasov, Nikolai I: Rytsar' samoderzhaviia (Moscow, 2006), 355.

126 波格丹即哥萨克国第一任盖特曼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波格丹的遗产」指左岸乌克兰。

127 Serhii Plokhy, 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 (New York, 2015), 153.

128 Reka vremen (kniga istorii i kul'tury) (Moscow, 1995), vol. 1, 70.

129 帕拉斯（Palladium）为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此指每个民族都有其守护神。俄罗斯的守护神即下述三元素。

130 P. A. Viazemskii, Estetika i iteraturnaia kritika (Moscow, 1984), 23.

131 Aleksandr Pushkin, Sobranie sochinenii v desiati tomakh (Moscow, 1959-1962), vol. 7, 267.

132 Aleksandr Andreev, Istoriia gosudarstvennoi vlasti v Rossii (Moscow, 1999), 160.

133 Reka vremen, vol. 1, 72.

第六章　为边界战斗

一八三一年夏天，即「十一月起义」的高峰阶段，尼古拉一世曾答应把一些在维斯瓦河另一边的波兰土地让与奥地利和普鲁士。但后来，随着起义被粉碎，他改变了主意。他用来解决新波兰问题的方法在一八三二年二月发布的《组织法》揭晓，其中勾勒出他对波兰王国的未来规划。《组织法》收回亚历山大一世赋予波兰的自由：波兰沙皇的职位、波兰议会和独立的波兰军队全部废除。大元帅帕斯克维奇公爵被封为波兰亲王，负责统治波兰，目标是把波兰整合到俄罗斯帝国之中。

把波兰王国整合到俄罗斯帝国的决定，大大影响到帝国在后来被称为「西部省分」的地域的政策考量。「西部省分」是官方说法，指凯萨琳时代被兼併的乌克兰人、白罗斯人和立陶宛人土地，它们介于波兰王国和帝国的核心地区之间。在「十一月起义」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俄罗斯的统治者对于要怎样对待这些地区一直摇摆不定。尼古拉也不例外。就像他的父亲保罗和哥哥亚歷山大一样，他不相信瓜分波兰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但又负担不起把这些土地归还波兰的后果。他在一八二七年写给弟弟康斯坦丁的信上说：「只要我活着一天，就绝不允许任何鼓励波兰兼併立陶宛的想法。」不过，他又相信这不妨碍他「在当一个好俄罗斯人的同时，也可以当一个好波兰人」134。这样说的时候，他心里想着的八成是怎样才能够同时把他作为俄罗斯皇帝和波兰沙皇的责任尽好。当一八三○年十一月波兰起义爆发后，波兰金融部长曾经打趣说：「波兰沙皇尼古拉如今正在和俄罗斯皇帝尼古拉开战。」135「十一月起义」被敉平之后，是哪个尼古拉打赢了战争再无疑义。波兰将要不回它从前的领土。

一八三一年九月十四日，即华沙陷落仅一週后，俄罗斯政府创立了一个后来被称为「西部省分委员会」的专门机构。该委员会根据尼古拉的口谕祕密成立，负责「审视各种有关如何处理从波兰重新取回省分的建议」。自从瓜分波兰以来，这是俄罗斯政府第一次建立一个系统性处理兼併波兰土地的权责机关。其目标是迅速让这批土地完全整合到帝国之中，比起整合波兰王国的更快速完成。凯萨琳二世在一七六三年曾对斯摩棱斯克省和哥萨克国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如今成了俄国对前波兰土地的官方政策。它包括了行政、法律和社会三方面的措施，务使这些地区能够和帝国的其他省分看齐。

过去，俄罗斯整合被占领土地的方式都是透过收编地方菁英阶层，但这一招已经证明在兼併自波兰的土地上不管用。波兰人的起义以深刻

的方式让帝国的菁英阶层明白到这个道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改弦易辙。绝大多数的波兰民众都是东斯拉夫人，不过他们信仰的是天主教的联合教会，不同于俄罗斯的东正教。正因为这样，波兰贵族在反抗俄罗斯朝廷的斗争中，常常因为宗教上的亲和性而得到他们的乌克兰和白罗斯子民的支持。有见于此，朝廷决定要在菁英阶层和被统治者之间建立藩篱。为此，它使出各种可使用的手段，到最后包括祭出乌瓦罗夫伯爵制定的「官方民族性」观念。

一八三二年十一月，西部省分委员会发出一封敕令，要求减少西部省分有权行使贵族权利者的人数，这些权利包括购买土地和农奴的权利，目的是动摇波兰贵族的地位。在一八四○年代，尼古拉又下令缩减农民对地主的义务，说此举是为了爱护「俄罗斯人」农民。总之，在一个以贵族为基础的帝国所容许的程度下，朝廷命官尽可能站在乌克兰和白罗斯农民一边以对付波兰贵族。其他政策包括废除城市自治和地方性法律条文，这些条文源自波兰和立陶宛统治这地区的时代。凡是在曾经属于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的地域，这些政策都一体适用。所以，连哥萨克国亦包含在其中，哪怕这时候它对朝廷的忠诚已经不容怀疑。

政府还推出促进前波兰地区在文化上俄罗斯化的政策，其中包括创造出一套新的歷史叙事以此号称新兼併土地原为俄罗斯所有、建立新的大学和学校、鼓励白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皈依东正教或进入教会出任神职。在对波兰土地所进行的努力上，就以这三组政策最为影响深远，它们不仅改变了这些地区的面貌，还让俄罗斯的菁英阶层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以及用不同方式看待自己国家的地理、社会和文化边界。

早在亚歷山大推行自由化改革的时期，俄罗斯的菁英阶层便已经开始思考帝国西部省分的未来，那里的居民以东斯拉夫人为大宗。十二月党人起义（一八二五年）的一个领导者佩泰尔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有充分认识。在为起义写一份宣言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复杂的问题：他称为「俄罗斯法」的未来俄罗斯国家宪法，其实是暗指中世纪基辅国的法典。他一方面想要保存和强化俄罗斯帝国，另一方面又相信任何有着民族性的人群都有权独立建国。显然，帝国里有许多不同民族。在佩泰尔所开列的不完整清单中，这些民族家园除了俄罗斯和波兰以外，还包括「芬兰、爱沙尼亚、利夫兰[136]、库尔兰、白罗斯、小俄罗斯、新俄罗斯、比萨拉比亚、克里米亚、乔治亚、整个高加索、吉尔吉斯的土地和所有的西伯利亚人民」[137]。佩泰尔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较小的民族必须放弃独立的权利，成为一个人数更多和更强大民族的一部分。他写道：关于小型民族「他们如果能在精神和社会层面与一个更大的国家合而为一，且完全融入统治者的民族性，使自己仅仅成为

其中的一部分，不要再徒劳地梦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他们会发现这样对其自身会更有好处」。

佩泰尔计画让波兰王国独立，但仍对凯萨琳瓜分波兰时获得的土地进行俄罗斯化。理由是，后者的居民都是俄罗斯人—在他的定义里，俄罗斯人是一个斯拉夫部落，不过有着自成一格的语言、宗教和社会结构。他把俄罗斯民族分为五个亚群：住在帝国核心省分的大俄罗斯人、住在聂伯河左岸的小俄罗斯人、住在哈尔科夫四周称为斯沃博达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人、住在聂伯河右岸以及沃里尼亚和波多利亚的卢森尼亚人、住在俄国在第一次瓜分波兰时获得的土地的白罗斯人（佩泰尔不认为格罗德诺省和明斯克省的居民是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而且极有可能是打算把这两个省分让给波兰王国）。他主张，西部省分的俄罗斯人—相当今日的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只是因为特殊的行政区划才显得和俄罗斯核心省分的俄罗斯人有所不同。佩泰尔写道：「所以，应该建立这样一条原则：把维捷布斯克、莫吉廖夫、切尔尼戈夫、波尔塔瓦、库斯克、哈尔科夫和基辅、波多利亚和沃里尼亚各省的居民一律视为不折不扣的俄罗斯人（true Russians），不要再用任何特殊名称把他们排除在俄罗斯人之外。」

把「不折不扣俄罗斯人」的不同分支统一起来的工作是在波兰起义之后，落在了尼古拉一世的教育部长乌瓦罗夫肩上。在把西部省分的东斯拉夫人口视为俄罗斯人一事上，乌瓦罗夫和佩泰尔有志一同，但他不认为，他们和俄罗斯人的差异只是特殊的行政区划造成。他相信西部省分的居民和俄罗斯人还有着较实质的差异，例如文化上的差异不是马上可以克服，而是得再等上一代人。但光是等待并不足够，还需要一个正确的教育计画从旁协助。他在给沙皇的奏摺上写道：「从罗马人到拿破崙，所有想要把被征服民族统一于战胜民族的显赫统治者，莫不是把全部希望和努力成果寄託在后来世代而非当前一代。」138

乌瓦罗夫有很好的理由保持谨慎态度，只把希望寄託在未来。在西部省分，他面临着一个巨大障碍：波兰的语言、歷史和文化。在一八三○年的起义失败之后，与俄罗斯相较，波兰有更多人懂得读书写字。就像在他之前的普希金和佩泰尔那样，乌瓦罗夫不是把波兰问题视为一场发生在帝国中心和外省之间的冲突，或是发生在一个多民族帝国和它其中一支民族之间的冲突，而是视之为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最终只能透过教育解决。

为了把西部省分整合到帝国里面，早在一八三一年，乌瓦罗夫便开始寻找一个可以提供相关歷史理据的写手。他的这个念头是因一名上书教育部的格罗德诺省官员所触发。该官员主张，有一种「和俄罗斯人总

体民族性非常接近的民族特性在西部省分復活、传播和建立」。在他看来，解决该地区民族问题的方法是把它的歷史融入帝国的歷史，透过开设教会斯拉夫语语言课程来促进语言同化，教会斯拉夫语在十八世纪大部分岁月里都是东斯拉夫人的共同文学语言。

乌瓦罗夫把寻找一套新的歷史叙事的工作紧记在心。他对西部省分歷史的看法和佩泰尔并无不同。佩泰尔曾经主张，西部省分「从古代起便属于俄罗斯，后来却在不利的环境下被人夺去」139。根据他的看法，当凯萨琳后来让西部省分「和它们的身体重新统一，俄罗斯得以恢復古老的尊严。更可贵的是它自此可以向俄罗斯国家的摇篮致敬—这个摇篮在北部是诺夫哥罗德省和周边省分，在南部则是基辅地区，包括了切尔尼戈夫、基辅、波尔塔瓦、波多利亚和沃里尼亚各省，它们是俄罗斯国最古老的核心地带」。

这种思路和凯萨琳二世及别兹博罗德科亲王在第二次瓜分波兰之后建立的论述符合一致，却在亚歷山大的开明统治期间受到质疑。在这段期间，对俄罗斯歷史的国家主义式诠释—以卡拉姆津的大部头着作《俄罗斯国家的歷史》为代表—受到了波兰和俄罗斯歷史学家鼓吹的民族性原则挑战。在一八二九至一八三三年，着名的歷史学家波列伏依的六册俄罗斯人民史（也可称俄罗斯民族史）相继出版，其中表现的歷史观和卡拉姆津天差地远。这个对国家主义式诠释的挑战，凑巧发生在波兰起义的同时，而这个巧合极大改变了俄罗斯的史观，也让重新发现西部省分的「俄罗斯歷史」的任务被排上了日程。

乌瓦罗夫最先选中的写手是莫斯科大学歷史教授波戈金。波戈金热情接受委託，又向教育部长保证，他会像帕斯克维奇将军在一八三一年痛击波兰叛乱分子那样，痛击波兰的歷史学家。他在一八三四年十一月动笔，一年后交稿，期间乌瓦罗夫不断向沙皇报告写作的进度。但事实证明，波戈金是一个很好的歷史学家，以致无法满足教育部长的需要。在书中，他指出东北罗斯（或俄罗斯）的歷史不同于西南部罗斯（即乌克兰和白罗斯），但这样一来，乌瓦罗夫想要用歷史论述来无缝连结西部省分和俄罗斯的目的便告泡汤。乌瓦罗夫向沙皇解释，会出现这个失败是因为用单一叙事涵盖俄罗斯、波兰和立陶宛各省的做法太过于新颖，难以一下子达成。

但乌瓦罗夫没有气馁。他悬赏一万卢布给可以把俄罗斯和西部省分的歷史共冶于一炉的作者，然后又情商另一位歷史学教授执笔。这个人是圣彼得堡大学的乌斯迪亚洛夫，他在一八三六年十二月交出预定共四册的俄罗斯史的第一册。乌瓦罗夫在一个月后批准出版，他向全国各学区的下属推荐使用这本歷史着作作为标准教科书。一八三九年，乌斯迪

亚洛夫把他的四册俄罗斯史浓缩为一册，由乌瓦罗夫呈给沙皇御览。翌年，乌瓦罗夫取消了写作最佳俄国史教科书的竞赛，把奖金颁给乌斯迪亚洛夫。

乌斯迪亚洛夫的大作《俄罗斯史》最吸引乌瓦罗夫之处，是它把收復基辅公国原有领土的任务说成是俄罗斯歷史的主旋律。乌斯迪亚洛夫写道：「俄罗斯沙皇国的歷史主要是追求逐渐收復原是〔智者〕雅罗斯拉夫统治下的所有俄罗斯人土地……我们跟波兰、利沃尼亚和瑞典的所有冲突……都是源自此一任务。」140根据乌斯迪亚洛夫的诠释，立陶宛国家和莫斯科的敌对是两王朝间的敌对，不是两民族间的敌对，主张立陶宛统治者和他们的「俄罗斯人」子民关系变坏，只是波兰人在十四世纪占领立陶宛后才发生。乌斯迪亚洛夫的《俄罗斯史》共有三个不同版本，全部加起来印了二十六次。

在一八五七年的版本中，乌斯迪亚洛夫声称基辅罗斯的人口自成一个民族，因此完成了以民族性原则补充卡拉姆津的国家主义诠释的过程，扩大了俄罗斯史的地理涵盖范围。至此，俄罗斯史已不仅是俄罗斯国家的歷史，还涵盖歷史上属于俄罗斯人但不属于俄罗斯国家的土地。

除了歷史，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也成为政府在边区实施的新政策的主要工具。以俄罗斯语作为教学语言可以阻止波兰年轻人产生独立的民族意识。最终，新的教育体制和政策也被施行于帝国的西部省分。

国家需要一批新血推介这些政策。当朝廷一八○二年第一次创立教育部的时候，被委以部长重任的是札瓦多夫斯基。札瓦多夫斯基是前哥萨克官员，更重要的是，他是基辅学院的毕业生，又曾经在白罗斯城镇奥尔沙的耶稣会神学院念书，那年头奥尔沙还是属于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札瓦多夫斯基那些在帝国西境负责教育事务的下属都是波兰贵族。其中之一是恰尔托雷斯基，他曾任亚歷山大一世的顾问和当过外交部长一段时间，在一八○三和一八一七年之间掌管维尔纽斯学区。这学区涵盖从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兼併而来的立陶宛人、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土地。同一时期，环绕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学区是由另一位波兰贵族波托茨基掌管。波兰人对于教育事务比俄罗斯人有经验，而这是因为波兰的教育制度发展得更早—早在一七七三年，被第一次瓜分过的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便成立「波兰教育委员会」，致力于在国内包括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的省分建立公共教育体系。

但波兰人掌管的大学和中学并非仅是普通的教育机构，它们还推广波兰文化和传播反帝国主义思想—最明显的一次是在一八三○年，当时的维尔纽斯大学成了波兰起义军新进人员的重要来源。一八三二年五月，

朝廷下令关闭这所大学（它要等到罗曼诺夫王朝倒下才会重新开张）和解散维尔纽斯学区。但单单关闭大学并不能让帝国取得多大进展，关闭波兰教育机构所留下的真空必须用帝国的教育机构来取代。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尼古拉一世批准乌瓦罗夫的建议，在基辅市创办一所新的大学——几年前，普希金曾担心这样的大学可能会落入波兰人的控制。事实上，如果不把基辅的山洞修道院和一些东正教教堂算在内，这座城市业已受到波兰文化所宰制。观光客在大街上听到波兰语的机会要多于听到俄罗斯语或乌克兰语。在基辅省，波兰贵族的人数是四万三千，俄罗斯贵族的人数却只有一千出头。所以，基辅的公众面貌是由波兰人所主导。

在基辅兴办一所大学的建议在一八○五年便有人提出过，当时札瓦多夫斯基试图说服该市的都主教，协助他把基辅学院升格为大学。但这位教育部长没有得到都主教很多支持。波兰贵族也不表支持，而他们是唯一有钱资助成立大学的一群人。当时另有一位波兰知名教育家克萨基卖力游说贵族捐助成立一家高等教育机构。为避免有和基辅互别苗头之嫌，他把自己想要成立的机构称为文科中学而不是大学，并主张把它设在沃里尼亚小城克列梅涅茨。因为得到沃里尼亚地区学监恰尔托雷斯基的支持和一批波兰贵族的捐赠，克萨基如愿在克列梅涅茨创办他的学校，这学校又在一八一九年升格为学院。一八三○年波兰起义期间，它是孕育叛乱分子的温床，所以起义失败后迅速被当局关闭。这时轮到基辅时来运转。克列梅涅茨学院近三万五千册的藏书，还有它的化学实验室和植物园，全被打包运往基辅的新大学。有些教授也转到那里任教。

克列梅涅茨的波兰人学院自此走入歷史，但基辅的俄罗斯人大学的故事才要开始。它以圣弗拉基米尔的名字命名，这位十世纪的大公一向被视为俄罗斯国家的奠基者及第一位东正教徒统治者。揭幕仪式在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五日的圣弗拉基米尔日举行。新大学也象徵着俄罗斯帝国对原由弗拉基米尔统治的这座城市的收復。在创校诏书中，尼古拉一世形容基辅「对全俄罗斯都无比珍贵，是我们祖先神圣信仰的摇篮，也是他们的公民个体性的第一个见证」[141]。教育部长乌瓦罗夫伯爵称这大学为「精神堡垒」。如果是堡垒，它要保护谁和对抗谁不问而知。教育部长指出新大学的目标是「尽可能抹平让波兰年轻人有别于俄罗斯人的尖锐棱角，特别是防止有独立民族特色在他们之中产生，把他们愈来愈拉近于俄罗斯的观念和习俗，灌注他们俄罗斯人民共有的精神」[142]。

首任校长是前哥萨克国在地人马克西莫维奇。他本是莫斯科大学植物学教授，但因为有多方面才能，在乌瓦罗夫的请託下在新大学承担政治重要性多得多的教职：俄罗斯语语文学教授。马克西莫维奇的任命反

映出圣彼得堡选择什么策略，以在新兼併的领土对教育系统进行俄罗斯化。新政策下的步兵甚至有些战地指挥官都是来自前哥萨克国的干部。当局为什么会採取这种用人政策，其理甚明：他们熟悉波兰的语言、文化和环境，而且有着仇视波兰的心态。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对前哥萨克国人民的重用将会变得尾大不掉。到了一八四○年代晚期，这地区的居民将会发展出一种全新的民族目标，对帝国形成意料之外的威胁。不过，至少在基辅大学创办初期，来自前哥萨克国的乌克兰人确实竭尽所能去剷除波兰文化的影响力。

基辅和它的新大学从此成为打造俄罗斯人身分认同的施工现场。从十九世纪初叶开始，到基辅朝圣便在俄国知识分子和官员中间蔚为风气，人人都想来这里亲炙俄罗斯歷史的源头。不过，在一八二○年代，基辅罗斯时代的遗物已经寥寥无几，充其量只剩几间古老教堂，所以，热忱之士开始从事考古挖掘工作，想要发现这城市失落的遗产。一八三二至一八三三年之间，在地业余考古学家洛赫维茨基对基辅的「黄金之门」进行了多次挖掘。黄金之门是基辅古城的入口，是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在十一世纪上半叶所建，意在模仿君士坦丁堡的「黄金之门」。尼古拉一世曾参观挖掘工作，给予洛赫维茨基赏赐，并答应提供经费供其进行更多的挖掘。

当时的基辅主要是波兰人和犹太人居住的城市。对它的俄罗斯化工作名副其实是从被埋在地下的古代遗址做起，这些遗址统统被说成是基辅罗斯的遗物。所以，基辅大学的首任校长还要身兼导游，先后带领过数以十计显赫贵宾参观「古代俄罗斯」的世界。这些贵宾的头两位是果戈里和莫斯科大学俄罗斯史教授波戈金，最后两位是未来沙皇亚歷山大二世和他的老师茹科夫斯基—前普希金时代最着名的俄国诗人。

一八五三年，基辅当局举行典礼，庆祝一件盛事：弗拉基米尔大公纪念碑143的揭幕。这是一项进行了二十年工程的最高潮：竖立铜像的建议是基辅总督在一八三三年提交给沙皇。连接聂伯河左、右两岸的铁链大桥也是在同一天揭幕。到了当时，基辅已经有一个称为「古文献委员会」的特别机构，负责充实俄罗斯对拥有整个右岸乌克兰的权力声称。该机构在总督的监督下成立于一八四三年，两年后发行第一本古文献汇编，内容被认为可以证明本地区原属俄罗斯所有。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它所发行的数以百计珍贵档案汇编将会证明，本地居民的身分不同于俄罗斯人。

波兰起义被粉碎后，帝国当局得再一次面对联合教会的问题。这时

它的联合教会信徒已达一百五十万人，主要居住在第三次瓜分波兰后划入俄罗斯帝国的土地。至于住在第二次瓜分波兰时被纳入的联合教会教徒，则大部分已在凯萨琳二世时期改信东正教。

当帝国西部省分的波兰贵族在一八三○年和一八三一年吆吁起义时，他们获得许多联合教会教士的同情，有时甚至得到他们热烈欢迎，来自修道院的支持尤其强烈。根据政府估计，在立陶宛人省分中，联合教会所属的圣巴西勒修会中，有近三分之二僧侣是罗马天主教徒。完全支持起义的包括沃里尼亚的波恰耶夫修道院的圣巴西勒修会僧侣–这座修道院原本是东正教的一座要塞，但在十八世纪初叶被转化为联合教会。修道院印刷了一份传单，吆吁乌克兰居民加入起义。修道院不仅在一八三一年四月欢迎一支起义军进入该修道院，甚至还有八名僧侣加入起义行列。他们穿着苦行僧长袍骑在马背上，腰间配剑，在所过之处高声吆吁群众奋起为祖国作战。该修道院前后共有四十五人投入起义阵营。有见于联合教会农民是否忠诚变得事关要紧，政府马上採取行动。一八三一年九月，应军事和民事首长的要求，尼古拉一世签署了一项法令，解散波恰耶夫修道院。它的建筑被移交给东正教教会，后来变成一间东正教修道院。在一八三○年之前，帝国境内共有九十五间联合教会修道院，但在起义失败后，大约有一半被关闭。

尼古拉一世另外也透过设计一个在制度上统一联合教会和东正教的机制，他加快把全部联合教会人口转化为东正教徒的计画。就像许多帝国菁英分子那样，他相信信仰联合教会的乌克兰和白罗斯农民本质上都是俄罗斯人，当初只是出于波兰人的压力和诡计，才会抛弃原有的东正教信仰，并因此在民族认同上发生变化。在登基之前，尼古拉曾是西部省分的军事指挥官，所以对于联合教会教士和他们的教会有多么贫穷印象深刻。因为得不到国家或天主教徒地主的支持，一些联合教会神职人员甚至早在波兰起义之前便寻求「回归」东正教。尼古拉找到了一个完美人选去达成他的目的：二十九岁的谢马什科。他既是联合教会教士，又是圣彼得堡圣灵学院的一员，该学院负责监督帝国境内天主教和联合教会的活动。

谢马什科是右岸乌克兰人，出生于一七九八年，当时该地区刚被划入俄罗斯版图没有几年。他父亲是联合教会教士，因为拒绝改教而失去堂区。小时候的谢马什科更多是到村庄的东正教教堂做礼拜，这是因为天主教堂距离较远，而且邻近地区剩下的联合教会教堂寥寥无几。自小聪慧的他首先是被送到波多利亚小城涅米里耶一所学校念书，然后又进入了维尔纽斯大学的「联合教会 - 天主教神学院」学习，出于维尔纽斯学区主管恰尔托雷斯基的刻意栽培，这两所学校都是波兰教育和文化的

中心。年轻的谢马什科必须精通波兰语，而正如他后来所忆述，波兰贵族的子弟在涅米里耶的学校享有特权，维尔纽斯大学则是瀰漫着波兰爱国主义和反俄情绪。在维尔纽斯大学，他和一个同学只因为读俄罗斯杂志，便被视为民族叛徒。

不过，直到谢马什科被派去圣灵学院任职，他才决定把自己的未来和东正教连结在一起。帝国首都的金碧辉煌和圣彼得堡东正教教会的富裕让他印象深刻，反观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对联合教会神职人员的傲慢态度则让他震惊。被迫只能在波兰人或俄罗斯人身分二择其一的情况下，他看不出有其他选项，谢马什科决定选择当俄罗斯人，也因此必须归附俄罗斯的教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把他的联合教会俄罗斯化。换言之，是东正教化。

他日后回忆说：「广大无边的俄罗斯，它由单一信仰和单一语言结合在一起，追求的是一个蒙福的目标，变成了一片让我深受吸引的祖国。我把为它服务和促进它的福祉视为己任。」144一八二七年，他给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勾勒出他逐步把联合教会转化为东正教的计画。沙皇看过后大加赞赏。

谢马什科的计画许多方面都是延续亚歷山大一世时期对待联合教会的官方政策。凯萨琳二世强迫联合教会信徒改教的做法已不再时兴。这不仅因为亚歷山大较为宽大为怀，还因为强迫改教的政策并未收到预期效果。事实上，这种政策在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反而导致大约二十万本来是联合教会信徒的农民加入了罗马天主教。一八○五年，亚歷山大下令，在圣灵学院成立一个监督联合教会的部门，先前这学院仅止于负责监督罗马天主教徒的活动。联合教会的都主教欢迎这种对其教会的官方承认，并且在政府的支持下，致力于消除联合教会礼拜仪式中的天主教元素。

然而，谢马什科想要的不仅是终止联合教会信徒改信天主教的趋势。作为联合教会和东正教统一的准备，他建议建立一间联合教会的圣灵学院，以及创办一间以东正教精神培养联合教会神职人员的神学院，为两教的未来统一储备干部。有见于联合教会的圣巴西勒修会是拉丁和波兰影响力渗透右岸乌克兰的主要管道，谢马什科建议把它划归联合教会主教管辖，以防止天主教僧侣加入该修会。一八二八年四月，尼古拉一世颁布了一道内容紧贴谢马什科建言的敕令。翌年，谢马什科被封为联合教会主教，主持帝国内硕果仅存的两个联合教会教区之一。

波兰起义让联合教会的问题第一次引起政府高度关注，也让它成为了公众注目和辩论的对象。因此，谢马什科觉得有必要加快联合教会和

东正教统一的时程。一八三二年，尼古拉一世批准了谢马什科的请求，让已经独立于天主教学院[145]的联合教会学院划归宗教事务管理总局管辖。但这个政策没能落实。这是因为在舆论的支持下，东正教当局把转化个别联合教会堂区而不是整个联合教会列为优先任务。心灰意冷之余，谢马什科请求允许他皈依东正教。东正教教会没有批准，但承诺帮忙为转化整个联合教会铺路。

自此，谢马什科加倍努力，除推动联合教会教区的「东正教化」以外，还推动它们在文化上俄罗斯化。他后来声称，他一直是以一种思想为指导原则：「把联合教会转化为重生后的俄罗斯东正教。」[146]谢马什科卖力说服联合教会教士在教堂里设置东正教风格的圣像壁（分隔内殿和圣所的一面屏帏或墙壁）、用俄罗斯祈祷书取代老旧的祈祷书，并鼓励联合教会教士蓄鬍—这是东正教教士的习俗。採用俄罗斯祈祷书意味着把俄罗斯语引入联合教会的教堂。这是一场艰苦战斗，因为联合教会教士更加习惯使用波兰语，他们也是用这种语言和谢马什科通信。其实，谢马什科虽然自认为比许多以俄罗斯语为母语的人更俄罗斯化，但他对俄罗斯语的掌握仍然有所不足，并为此感到羞愧。

谢马什科另外还在手下教士中间发起一场反波兰的宣传活动，设法把他们的鲁塞尼亚人（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身分认同转换为俄罗斯人身分认同。他在一八三七年写道：「为了能够用俄罗斯精神温暖联合教会神职人员的心，应该利用每个可能的机会唤起他们对自己根源的记忆，让他们回想起波兰人对他们有过的压迫，以及俄罗斯政府是多么关怀他们的福祉。」他认为自己的努力已经取得一些成果：「先前，以俄罗斯姓名和遗产为荣是一种陌生的观念，但如今，我相当比例的下属已经知道要珍惜它们。」[147]

不过，总的来说，谢马什科被自己碰到的种种困难压得透不过气。因为一方面，东正教当局怀疑他是反对直接改教和暗中在壮大联合教会；另一方面，罗马天主教的教士又视他为寇雠。更重要的是，即使那些被他努力带回他们「俄罗斯」根源的教士同情他，他一样受到地主和农民的抵制：地主信仰的是天主教，又控制着村庄里的资源，而农民生性保守，根本不想有任何改变。谢马什科拥有的唯一权力只是指派贊成他政策的人去取代反对他政策的人，让后者失去收入。他大肆运用这种权力，又结合民政当局和警察对付那些抵制他政策的联合教会教士。他是一个狂热分子，对自己所做的事毫不后悔或毫不怀疑，最终得到朝廷的全力支持。

到了一八三○年代中期，尼古拉一世及其政府想要剷除联合教会的态度更为明确。一八三五年，谢马什科应邀加入一个负责两教统一事宜

的祕密政府委员会。两年后，谢马什科把联合教会置于宗教事务管理总局管辖的老构想终于落实，这个构想曾在一八三二年获得沙皇批准。两位联合教会重要人物的去世——一个是年迈的都主教布尔加克，另一个是一直反对统一的主教，结果使得谢马什科在教会内大权一把抓，铺平了他实现俄罗斯民族宗教统一夙愿的道路。

在东正教当局和帝国政府的支持下，谢马什科召开了一个联合教会会议，处理这个问题。按照谢马什科的原定计画，会议将会向沙皇呈递他本人起草的一封诉愿书，里面指出：「立陶宛在混乱时期脱离俄罗斯，后来又被波兰兼併，它的俄罗斯东正教居民受到迫害……从此，这些民众被分离于俄罗斯的广大人民，不断受到狂热政策迫害，目的是让他们与俄罗斯人成为陌生人……有一百五十万联合教会信徒就语言和血缘上来说是俄罗斯人……如果不想办法，他们仍会多多少少和其亲兄弟俄罗斯人形同陌路。」148

宗教会议在一八三九年二月举行，地点是白罗斯小城波洛茨克，此为十七世纪西化主义者西缅的家乡。为这个会议做准备时，谢马什科在当局的帮忙下，从联合教会蒐集到一千三百零五份声明书，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加入东正教会。尽管面对逮捕和放逐的压力，仍然有五百九十三名教士拒绝签署声明。因为预期会有农民暴动发生，当局派出一支哥萨克军团前往维捷布斯克省。一八三九年二月十二日，波洛茨克宗教会议採纳「统一法案」，又向沙皇呈递谢马什科准备好的诉愿书，要求他接纳近一千六百个联合教会堂区和近一百五十万名信徒加入东正教会的请求。谢马什科在波洛茨克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主持过一场礼拜仪式后把诉愿书带到首都。圣彼得堡的宗教事务管理总局—东正教会的统治机构—欣然批准所请，不仅为联合教会信徒的归附高兴，也为一部分俄罗斯部族能回归同胞之中感到欢喜：「一个曾被打断的古老统一重归于一，重建了完美的合一……过去曾经有几百年时间，联合教会信徒是因着血缘、祖国、语言、信仰、仪式和教会高层跟我们统一在一起。」149

尼古拉一世效法凯萨琳二世，打造特别的纪念章以示嘉勉。纪念章铭文呼应凯萨琳二世在第二次瓜分波兰之后打造的纪念章150，这样说：「因武力所逼而分开（一五九六年），因爱而復合（一八三九年）。」就像凯萨琳一样，尼古拉此举也是对一场波兰起义的回应，希望透过把乌克兰和白罗斯农民转化为东正教徒，让他们不再想加入什么起义。但是，尼古拉的政策还有一个重要的新元素。他不仅想拿回他相信歷史上是属于罗曼诺夫王朝的东西，还努力想恢復俄罗斯民族破裂了的统一性。从此，君主专制、东正教和民族性将会成为三股相辅相成的元素，携手为把西部省分融入帝国而服务。不过，一八三九年的既成事

实也埋下了未来纷争的种子。那些「因爱」而跟东正教和俄罗斯民族復合的省分，很快将会挑战由波洛茨克宗教会议发起人所推动的民族模式。

134 Russkii biografcheskii slovar’, vol. 11, part 1, 45.

135 Dmitrii Oleinikov, Nikolai I (Moscow, 2012), 254.

136 利夫兰（Livland）即利沃尼亚（Livonia）。

137 Konstitutsionnye proekty Rossii: 1799-1825 (Munich, 2007), 139.

138 Aleksei Miller, “Triada grafa Uvarova i natsionalizm,” Istoricheskie zapiski, no. 11 (2008): 191.

139 Konstitutsionnye proekty Rossii, 156.

140 Stephen Velychenko, National History as a Cultural Process (Edmonton, 1992), 98.

141 Kievskii universitet: Dokumenty i materialy, 1834-1984, eds. M. Belyi and V. Zamlinskii (Kyiv, 1984), 14.

142 Sergei Uvarov, Gosudarstvennye osnovy (Moscow, 2014), 51.

143 纪念碑高二十点四公尺，其中人物雕像高四点四公尺，基座高十六公尺，竖立在圣弗拉夫基米尔山山顶，面临聂伯河。

144 Aleksei Chaplin, “Russkoe imia i russkaia vera Ukrainy,” in Moskva 10 (2016): 231.

145 指原先的圣灵学院。

146 Zapiski Iosifa mitropolita Litovskogo (St. Petersburg, 1883), vol. 2, 14-15.

147 同上，18.

148 同上，83-84.

149 同上，91.

150 凯萨琳的纪念章铭文作：「朕恢復了那些被强夺去的部分。」

第三篇　三位一体民族

第七章　乌克兰的出现

他们两人原订在一八四七年三月三十日星期天结婚，但婚礼的两天前，警察却突然出现在新郎的公寓，将他逮捕，让婚期被推迟了二十八年之久。被捕者是二十九岁的基辅大学歷史教授科斯托马罗夫。三月三十一日晚上，本该举行婚礼的第二天，科斯托马罗夫被押解到圣彼得堡。逮捕命令是由帝国的最高层发出。

命令的签发者奥尔洛夫伯爵是御前办公厅第三厅厅长，负责政治侦防事务。未来的沙皇亚歷山大二世听取了相关简报，事情涉及一些基辅的知识分子、政府官员、教师和学生。其中一个涉案人是以乌克兰语写作而受欢迎的诗人舍甫琴科，他是在四月五日抵达基辅时被捕，接着也是被押解到圣彼得堡。接下来还有更多人被捕并押解到首都。而首都的自由派人士对于当局的行动还茫然不解。

基辅、波多利亚和沃里尼亚三省的总督比比科夫当时人在圣彼得堡，任务之一是报告在基辅一栋建筑物墙壁上发现的这个吆吁：「兄弟父老们，一个伟大的时刻已经来临！藉这个时刻，你们将可洗雪我们永恆敌人的脏手加诸我们祖先骨灰和我们故土的不名誉。你们中间又有谁会不愿意为这伟大的事业出力？上帝和善良的人民与我们同在！你们永远是乌克兰的忠诚诸子，是卡斯塔皮人（『卡斯塔皮人』是对俄罗斯人的蔑称）的死敌。」151

这吆吁的反俄色彩呼之欲出，却不是用波兰语而是用俄罗斯语书写，而且说话对象也不是当时主宰着基辅社会的波兰贵族，而是「乌克兰的忠诚诸子」，他们在朝廷眼中是俄罗斯民族的一员。比比科夫回波兰之后奉命接管基辅学区的学监之职。在一个和大学师生举行的会议上，他警告他们不要「胡思乱想」，扬言：「我既然有办法让五百万人屈膝，必要的话一样有办法让你们屈膝：到时要不是你们死就是我亡！」他提到的五百万人是指右岸乌克兰的居民—他们是由比比科夫管辖，但波兰的叛乱分子却声称这些居民是叛乱的追随者。

毫无疑问，不忠的发源地正是那些朝廷建立来确保地区内居民向沙皇和帝国效忠的教育机构。科斯托马罗夫是基辅大学的教授，而舍甫琴科也是基辅大学新聘的绘画讲师，之前是在古文献委员会服务。该委员会致力汇编可证明右岸乌克兰原属俄罗斯的档案文件，但在在看来，它的努力起了反效果：不但未能巩固政府和西部省分的「俄罗斯」民众的关系，反而促进了一个独立民族的发展。这个民族将会在接下来几十年主张，他们拥有与帝国核心地区的大俄罗斯人平起平坐的权利。一个新

的乌克兰民族正从小俄罗斯人身分脱茧而出，而帝国政府也将会尽一切努力打压这种发展，把乌克兰精灵收回小俄罗斯人的瓶子里152。

第三厅对科斯托马罗夫和舍甫琴科等人的调查揭发了一个祕密组织的存在。该组织称为「圣西里尔与圣美多德兄弟会」，目标是创立一个以乌克兰为核心的斯拉夫民族联邦。政府圈子里面的人把这个兄弟会称为「斯拉夫会社」，后又改称为「乌克兰人斯拉夫会社」。

当局起初认为这个祕密组织是一个更大思想运动的一部分，也有理由这样认为。在一八四○年代，政府官员给一群主要以莫斯科为基地的知识分子贴上「亲斯拉夫派」的标籤。这群知识分子的特色是对民族性的议题非常认真，但他们对民族性的看法只有一部分和政府的观点重叠，政府的版本就是乌瓦罗夫的版本，即主张俄罗斯民族性体现在东正教、君主专制和民族性这个铁三角。亲斯拉夫派对东正教极为敬重，但对政府却没有太多热情。他们还相信，彼得一世西化政策已经让俄罗斯几乎完全失去原有的独特性。

亲斯拉夫派是在反对有些俄罗斯知识份子和政治菁英鼓吹西化的背景下浮现，反对西欧可以作为俄罗斯的发展楷模。他们的观点首次充分表达在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一书，书中指出俄罗斯因为东施效颦，以致落在西方之后。这本书写成于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的几年间，一八三六年出版，出版后既招来政府的激烈反应，政府关闭了发表这些书信的杂志社，又引起刚诞生的亲斯拉夫运动强烈共鸣。亲斯拉夫运动由着名神学家、哲学家和诗人霍米雅科夫率领：他和他的追随者深受德意志哲学家谢林影响，他是黑格尔的朋友和竞争对手，相信社会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所以着作里强调俄罗斯的歷史传统和教会的重要性，主张俄罗斯和西方的国情大相迳庭。

圣西里尔与圣美多德兄弟会一案的调查报告提到了一些亲斯拉夫运动的关键人物，其中包括波戈金和舍维廖夫，两人都是莫斯科大学教授。波戈金教歷史，他曾受乌瓦罗夫委託写一部把西部省分整合到帝国的教科书，舍维廖夫教的是语文学和文学。两人还共同主编《莫斯科人》杂志，这本杂志在一八四○年代成了亲斯拉夫运动的喉舌刊物。波戈金也是新兴的泛斯拉夫运动的领军人物，该运动认为不同的斯拉夫人是一个大家庭。因为强调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和自觉，亲斯拉夫派中都有泛斯拉夫主义的倾向，启迪了那些想要标榜自己民族独特性的非俄罗斯的斯拉夫人，让他们认为他们的民族也有权要求自治和独立。

早期，乌克兰在亲斯拉夫派的想像里占有特殊地位。波戈金和舍维廖夫尤其对乌克兰的文化和歷史极感兴趣，不过他们是把乌克兰称作小

俄罗斯。一八三○年代，当科斯托马罗夫还是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大学的学生时，上过舍维廖夫的课，深受影响。舍维廖夫在课堂上提到小俄罗斯时称之为大俄罗斯的姊姊，极为强调民族性，并鼓励学生研究人民大众的文化。但此中有一个问题：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对「民族性」一词的理解并不相同153。后来，当科斯托马罗夫前往农村採集乌克兰人的民俗时，他发现自己只能用乌克兰语和农民沟通。到了一八三九年，他开始用乌克兰语写作。科斯托马罗夫不是第一个崇拜民族性和从田野带回材料的人，但他带回来的东西是用一种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亲斯拉夫派看不太懂的语文写成。

用乌克兰白话文写成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出版于一七九八年。它出现在圣彼得堡，一家印刷厂印行了维吉尔的讽刺剧《埃涅阿斯纪》六部曲中的前三部，称为《艾涅伊达》。原史诗中的希腊人角色全被改为操乌克兰语的札波罗热哥萨克人。作者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父亲是住在前哥萨克国的哥萨克官员。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当过老师和军官，一八一二至一八二一年担任波尔塔瓦剧院艺术总监。期间，他写出第一部以现代乌克兰语创作的戏剧《来自波尔塔瓦的娜塔卡》。当时，第一部乌克兰语语法书和第一本乌克兰语民歌集都已经问世。

到了一八三○年代，哈尔科夫成了乌克兰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这时期尝试用乌克兰语创作的作家包括俄罗斯语文学家斯列兹涅夫斯基和贵族子弟克维特卡．奥斯诺维亚年科。一八三三年，克维特卡．奥斯诺维亚年科写出第一篇乌克兰语短篇小说。五年后，科斯托马罗夫创作出一部乌克兰语戏剧，取材自哥萨克人的歷史，然后又出版了自己的乌克兰语诗集。

但在一八三○年代晚期，对乌克兰文学贡献最大的人是科斯托马罗夫未来的同谋者舍甫琴科。就像科斯托马罗夫那样，舍甫琴科一出生便是农奴，但科斯托马罗夫十五岁便摆脱农奴身分，这是因为他妈妈虽是农奴，父亲却曾经是贵族。舍甫琴科仍要等到二十四岁才得到自由身。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他能够赎身，要归功于俄罗斯艺术界的帮助和朝廷的慷慨大方。一八三○年代早期，舍甫琴科的地主把他带到圣彼得堡，而他的艺术天分很快就受到俄罗斯艺术界和知识界最知名人物的赏识。他们设法帮助这个年轻艺术家获得自由，并最终成功。当时，优秀宫廷画师布留洛夫为最着名的诗人也是太子的教师茹科夫斯基画了一幅画像。画像在一八三八年的拍卖会上被一个皇室成员买去，而买主也知道，他付的这笔钱将会被用来购买一个二十四岁农奴的自由。

舍甫琴科的绘画天分在当时是公认的。一八三八年，成为自由人之后，舍甫琴科进入「帝国美术学院」就读，拜在他的恩人布留洛夫门

下。但舍甫琴科的真正天分却是在于诗歌和写作。他用俄罗斯语写散文，用乌克兰语写诗。正是诗歌使他成名但又惹上麻烦：他首先是引起俄罗斯文评家不悦，然后是引发朝廷不满。他的乌克兰语诗集首次出版于一八四○年，书名作《吟游诗人》，在俄罗斯的文学杂志和报纸受到广泛讨论。虽然有些评论家乐于看见有乌克兰语诗集出现，但其他评论家却质疑他的做法，认为一个天才诗人把聪明才智用在创作乌克兰语诗歌是一种浪费。

一个评论家在畅销杂志《供阅读的图书馆》这样写道：「在我们看来，小俄罗斯诗人对一个事实未予以充分关注，那就是他们常常用一种甚至不存在于俄罗斯的方言写作；他们只是不客气地把大俄罗斯语的单词和短语按照小俄罗斯语的方式改造，创造出一种从不存在的语言，创造出一种任何俄罗斯人−不管是大、小、红、白、黑俄罗斯人都不可能称之为自己所有的语言。」154另一位评论者在《北方小蜜蜂》杂志指出：「我们要奉劝他，应该用俄罗斯语来表达他的精緻情感。那样，他的小花朵，一如他这样称自己的诗句，会更缤纷、更馥郁和更能传之久远。」155

舍甫琴科并不是唯一因为用乌克兰语写作而被攻击的作家。当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艾涅伊达》在一八四二年出版后，也有同样遭遇。一个评论家在《供阅读的图书馆》表示：「对于未曾有机会在小俄罗斯及其周遭地区住过的俄罗斯读者来说，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先生写的诗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手边带着字典也是一样。」156不是所有俄罗斯文评家都贊同这一看法，不过，抱持这样看法的文评家也并非信口开河：乌克兰语作品确实让俄罗斯读者难以看懂。即使是果戈里用乌、俄双语对照写成的作品，一样需要附一张词汇对照表。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民族性差异不独显示在语言上。歷史是另一个争论的焦点。继当初帮教育部长乌瓦罗夫写《俄罗斯人民史》的作者波列伏依批评朝廷史官班特什．卡缅斯基在《小俄罗斯史》中没有考虑到乌克兰人的特殊身分认同之后，乌克兰人马克维奇也着手写一部新的乌克兰人歷史。他的五卷本《小俄罗斯史》在一八四二和一八四三年之间陆续出版。可作为他的思想缩影的是他用匿名写成的手稿《罗斯史》（约写于一八一八年），其中把哥萨克人的歷史独立开来处理。这部匿名作品在哈尔科夫得到斯列兹涅夫斯基的推广，在科斯托马罗夫的圈子里广为传诵，更加坚定了他们认为乌克兰史不是俄罗斯史的一部分的信念。

一八四六年，《罗斯史》一八一八年的手稿在莫斯科出版，出资者是莫斯科大学斯拉夫研究的教授博迪安斯基；他出生于乌克兰，是亲斯

拉夫派的一分子，名字也出现在那份调查圣西里尔与圣美多德兄弟会的报告。另一个嫌犯波戈金则进一步认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文化差异不仅止于语言和歷史两方面。他在一八四五年写道：「大俄罗斯人和小俄罗斯人毗邻而居多年，而且一直被认为分享着同一信仰、同一命运和同一歷史。但他们有多少分别只有天晓得！」157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亲斯拉夫派对于大、小俄罗斯一体性的信仰，还有他们把后者视为俄罗斯文化源头的做法，都受到了小俄罗斯人对自身民族性研究的挑战。受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爱谈民族性的人的鼓励，乌克兰人不仅把一种相当不同于俄罗斯语的语言带到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沙龙，还把一套跟俄罗斯人民和国家的歷史相当不同的歷史带到那里。有一点很快便昭然若揭：乌克兰的语言、歷史和文化不仅可以被用来构筑有别于俄罗斯人的过去，还可被用于构筑有别于俄罗斯人的未来。在这种新愿景中，小俄罗斯将会变成乌克兰━一个性质上既相当接近俄罗斯但又与之有着重大不同的实体。

圣西里尔与圣美多德兄弟会一案在一八四七年五月调查终结。御前办公厅第三厅厅长奥尔洛夫伯爵在递交沙皇的报告中写道：「透过基辅大学学生彼得罗夫提供的线索，我们揭发了一个斯拉夫会社━更精确的说法是乌克兰人斯拉夫会社。彼得罗夫是一个前警官的穷儿子，在兄弟会活动的同一座大楼租房居住。他无意中听到他们的一些讨论，又被邀请参加他们的一些会议。他在会议上听来的话让他向当局举报他的邻居。根据彼得罗夫所述，兄弟会计画发动一场民众起义，推翻统治当局，最终目标是团结所有斯拉夫民族，建立一个建基于大众代表制度的政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准备废除皇室。」158

不过，奥尔洛夫认为，从对兄弟会成员的盘问和对他们纲领文件的分析显示，最初的恐惧和担忧有些夸大其词。包括科斯托马罗夫在内，兄弟会只有三个成员。他们的熟人，例如舍甫琴科只会偶尔参加讨论，而且几个月后就退出了。兄弟会成员和他们的朋友没有准备起义，而且声称他们只打算在俄国沙皇的主持下统一斯拉夫各部族。「所以，幸运的是，这起政治罪恶并没有发展到最初报告所暗示的程度。」159

后来歷史学家认为，奥尔洛夫若非刻意就是因为无心之过低估了兄弟会构成的威胁，并歪曲或误解了其纲领文件的性质。事实上，当局担心的「政治罪恶」明明白白见于兄弟会的一些文件上，写得最详细的是《上帝的律法，又称乌克兰人民的创世记》。奥尔洛夫称这东西只是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作品的翻炒，而科斯托马罗夫在被盘问时亦声称它是一八三○年代初期由波兰人草拟。但事实上，科斯托马罗夫正是它的主要作者。《乌克兰人民的创世记》也包含很多兄弟会成员讨论过的观

念。

这部作品揭橥的政治目标确实就像当局在一开始所担心的那样，是要创立基于大众代表制的斯拉夫联邦，而这个联邦没有留位置给沙皇。它把皇室成员视为来自日耳曼的僭夺者，强把他们的专制统治加给热爱自由的斯拉夫人。未来斯拉夫国家的社会秩序应该基于平等原则和基督宗教伦理。根据《乌克兰人民的创世记》，新的联邦里没有沙皇，而是由天国的统治者统治。科斯托马罗夫只接受乌瓦罗夫所揭橥的铁三角其中两个元素–宗教和民族性，拒绝接受君主专制。不过，他是用非独裁的方式诠释宗教，而且《乌克兰人民的创世记》里面歌颂的并非俄罗斯的民族性，而是乌克兰人的民族性。

这份文件认定乌克兰人既有别于俄罗斯人，亦有别于波兰人，注定要在未来的斯拉夫联邦占据领导地位。乌克兰人之所以能够扮演这个特殊角色，乃因为他们是斯拉夫人之中最有平等和民主精神的一群。俄国人是由一个独裁的沙皇统治，波兰人则饱受地主和贵族阶级欺压，反观乌克兰人却是一个珍视自身哥萨克人民主传统的农业民族。除了他们的平等主义社会结构之外，乌克兰人还有哪些卓越特点呢？科斯托马罗夫的朋友和同谋库利什认为，乌克兰人的卓越还表现在语言和风俗。另一个同谋安德鲁什基则预期未来的乌克兰国不仅涵盖俄罗斯帝国中的乌克兰人土地，还涵盖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在科斯托马罗夫的设想里，未来的乌克兰国是一个共和国，与其他斯拉夫国家结为联邦，联邦中每个成员国都是平起平坐。《乌克兰人民的创世记》用以下的话作结：「乌克兰将成为斯拉夫联邦中一个独立共和国。届时，世界所有人民将会指着地图上的乌克兰说：它是当初被建筑者弃而不用的石头，但它将会成为奠基石。」160

奥尔洛夫建议用监禁和国内流放来惩处「亲乌克兰派」（Ukrainophiles）这个词是他自创，指兄弟会的核心成员和相关人等–例如舍甫琴科即被强迫从军。当局不相信舍甫琴科是兄弟会的同伙，却对他的诗感到困惑，因为这些诗不仅赞扬乌克兰，还指责皇帝和皇后剥削他的乡土。他对统治王朝的不知感恩让他们恼火：舍甫琴科的赎身钱可是由一位皇室成员所支付。

奥尔洛夫还担心舍甫琴科对哥萨克歷史的缅怀可能会对读者有不良影响。「因为喜欢这些诗，大家可能会误以为哥萨克国时代真的很美好，巧妙地把它恢復过来，以及误以为乌克兰有能力成为一个独立国家。」161奥尔洛夫写道。他认为库利什的散文也有着相同的害处。安德鲁什基想要恢復哥萨克国的梦想亦是当局的重大忧虑之一。有些学者认为，当局是把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新威胁误当成旧有的哥萨克分离主

义。

为避免对兄弟会的纲领起到宣传作用，当局说服科斯托马罗夫等人改变原来的供词，去配合官方说法。根据该官方版本，兄弟会不过是想在沙皇的旗帜下统一所有斯拉夫人。但这不表示兄弟会的犯行可以免罚：政府公布了兄弟会存在的事实，对其成员一一做出惩处。奥尔洛夫建议一定程度公开这案件，好让所有人知道，那些「胆敢违背政府的态度擅自搞什么斯拉夫国的人会有什么下场。此举也可以让其他亲斯拉夫派分子不敢做同样的事」162。判刑并不算特别严厉。兄弟会主脑科斯托马罗夫被判在圣彼得堡监禁一年，然后流放至伏尔加河畔小城萨拉托夫。其他人被判监一至三年不等，出狱后也是国内流放。大部分涉案者都只是被逐出乌克兰或是被转移到俄罗斯。

当局把兄弟会的活动视为波兰贵族争取右岸乌克兰效忠的阴谋之一。看过调查报告之后，尼古拉一世表示：「显然，那是以巴黎为基地所进行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相信有这种工作在乌克兰进行，但现在却是再无疑问。」163第三厅一个官员所写的备忘录也是这种调调，但他不赞成严惩涉案人：「严厉措施只会让他们更珍视自己的犯禁思想，还有可能让迄今顺服的小俄罗斯人产生一种对政府神经兮兮的态度，就像波兰人在起义失败之后那样。更适当的做法是不动声色，不让小俄罗斯人知道政府有任何理由怀疑有害观念已经被散播到他们之中。」164

不动声色不代表可以对小俄罗斯人的蠢蠢欲动置之不理。一份第三厅官员撰写的备忘录建议采取措施遏制亲乌克兰派观念的传播：「大众教育部长应该提醒所有教授、教师和审查官，他们在着作和讲演中应该自觉地避免提起小俄罗斯、波兰和其他俄罗斯国土等任何会潜在危及帝国完整与和平的课题。相反地，他们应该竭尽所能，透过所有学术和歷史着作让所有这些部族向俄罗斯保持忠诚。」165时序来到一八五四年，乌瓦罗夫提醒内政部长曾经有过这么一道谕旨：「作家在处理小俄罗斯的民族和语言问题时，应採取最小心谨慎的态度，以免让读者对小俄罗斯的爱压倒对祖国—即帝国—的感情。」166

面对波兰人在西部省分所构成的威胁，政府使用俄罗斯民族性的观念作为维持对该地区控制的武器，但它这样做的时候小心翼翼，避免让民族性观念动摇君主专制的原则和帝国的统一。这是一种极难达到的平衡状态，但当局明白牵涉其中的复杂性。

虽然当局不允许公众知道有这些和其他「破坏性观念」存在，但八卦工厂自会把谣言传开去。圣彼得堡一个文学作品审查官尼凯特恩科在

日记中写道：「政府在南方的基辅揭发了一个祕密会社，其目标是要效法美国，在欧洲建立一个所有斯拉夫人的民主制度邦联……据说，整件事情是奥地利政府的代表交涉揭露。」167

事态的发展让俄罗斯的西化主义者大乐。他们一直不信任小俄罗斯方案，认为它暗藏鬼胎，是要把白罗斯拉离开西化的道路，拉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时期，所以不断与亲斯拉夫派论战。他们一位领袖暨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对该政权表态声援，写道：「舍甫琴科被送往高加索地区当兵。我不可怜他，换作我是法官，一样会这样判。我对于他那样的自由派一向反感。他们是任何成就的敌人。他们鲁莽的白痴行为会激怒政府，让它变得多疑，在没有叛乱处看见叛乱，并对文学和教育採取致命性的严厉措施。」168

谈到库利什主张乌克兰应当从俄罗斯分离之说，别林斯基继续砲声隆隆：「那些乌瓜（对乌克兰人的蔑称）真是的！他们只是傻头傻脑的绵羊，却奉着猪脂肪饺子的名义追求解放！好吧，他们现在终于被禁止写任何东西了，自己搞砸了一切。但在另一方面，你又怎能怪政府？什么样的政府会允许有人用文字煽动它的其中一省独立？」169

莫斯科的亲斯拉夫派没有被捲入兄弟会的案子。当局原先怀疑作家又是亲斯拉夫派活跃分子的奇若夫是兄弟会成员，但没有将他起诉。这除了因为查无实据，据奥尔洛夫说还因为他「原来只是个亲斯拉夫派分子，是俄罗斯民族的捍卫者，对俄罗斯民族的理解一本莫斯科学者的精神」170。根据第三厅一位密探所写的报告，把亲斯拉夫派团结在一起的只是「一种朦胧和神祕的预感。根据这种预感，东方在思想上终会胜过西方。他们心繫古代，爱莫斯科，也因此对圣彼得堡怀有某种恶意」。他继续说：「没有一个涉嫌人怀有政治目的。他们的渴望和期待只是俄罗斯抛弃外国元素，走上民族独立发展的道路。」171他说得没错。亲斯拉夫派领军人物之一的霍米雅科夫听说了兄弟会的目标之后，这样写道：「小俄罗斯人最终受到了政治愚蠢的影响。听见他们的胡说八道和走回头路让人伤心难过……我们今天必须思考的是这个：道德斗争。」172

逮捕和判刑让俄罗斯的亲斯拉夫派疏远他们的乌克兰同道。就连莫斯科知识分子中的亲乌克兰派也是这种态度，一个例子是波戈金。根据政府一个线人的报告，自从逮捕事件之后，波戈金在谈到他的亲斯拉夫观念时，说法变得大为不同。这句话的意思可以从他对《罗斯史》的评论显示出来。《罗斯史》是匿名作品173，一八四六年在莫斯科出版，其中把乌克兰哥萨克人当成一个独立民族，把他们的歷史独立开来处理，而这种思考方式对科斯托马罗夫的圈子大有影响。一八四九年，波

戈金在《莫斯科人》杂志评论《罗斯史》时指出，这本书的弊病在于「把〔小俄罗斯人〕和强大的大俄罗斯人—俄罗斯国家的核心—统一所得到的好处统统略过不提」。不过，在他更早前读作者託名大主教科内斯基的《罗斯史》时，态度却大为不同。波戈金在一八四六年，即逮捕事件之前一年，写道：「我读了科内斯基的书，大感满意。」174又表示很贊成《罗斯史》作者在书中所描绘的：彼得一世和他的羽翼对乌克兰很不仁。

一八五一年，波戈金以书信体写成一篇文章，寄给杰出语文学家斯列兹涅夫斯基，前面说过，他曾是哈尔科夫浪漫主义运动健将。文中，他主张基辅罗斯的歷史是大俄罗斯歷史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也和他原来的不同，因为他以前都主张基辅罗斯的歷史是小俄罗斯歷史的一部分。他现在的观点标志着一场漫长辩论的开端。不过，在波戈金自己看来，他的新观点只是他从前有关斯拉夫民族和国家观点的自然发展。他相信，歷史是民族活动的产物，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只要俄罗斯人（大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小俄罗斯人）一天是不同的斯拉夫民族（诸如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捷克人都是有独立民族性的斯拉夫民族），基辅罗斯的歷史便只能属于它们其中之一。现在，基于同样理由，波戈金决定把这段歷史改判给大俄罗斯。

尚在一八三○年代中期，波戈金已然无法满足乌瓦罗夫关于把东北罗斯和西南罗斯的歷史结合在单一叙事里的要求。到了一八四○年代中期，波戈金进一步主张，早在基辅罗斯的时代，便有着语言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对应于十九世纪的大俄罗斯语、小俄罗斯语和白罗斯语的差异。基辅、切尔尼戈夫和加利奇那种人都是操小俄罗斯语，明斯克和维捷布斯克都是操白罗斯语，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都是操大俄罗斯语。他认为，包括俄罗斯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博戈柳布斯基在内，基辅罗斯的诸位大公都是小俄罗斯人，要等到博戈柳布斯基的后裔定居东北后才「土着化」，成为大俄罗斯人。博戈柳布斯基和他父亲—莫斯科的建城者多尔戈鲁基—都是小俄罗斯人。

波戈金对基辅罗斯的这种歷史解释等于砍去大俄罗斯歷史叙事中最被珍视的部分：基辅时代。但在写给斯列兹涅夫斯基的那封信中，波戈金决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信誓旦旦表示，在读早期基辅的编年史时，他完全看不见小俄罗斯语的痕迹，反倒是编年史所使用的语言显示它们和大俄罗斯语有明显相关性。又因为他把民族和语言视为一体两面，所以主张在基辅全盛时期住在那里和创造其歷史和史册的，不是小俄罗斯人，而是大俄罗斯人。只有在入侵的蒙古人把大俄罗斯人赶到北方之后，小俄罗斯人才出现在基辅一带。

这封信在五年后的一八五六年出版，马上引起他的旧识基辅大学首任校长马克西莫维奇的批评。马克西莫维奇在一系列公开信中指出基辅编年史作者使用的是一种以南斯拉夫方言为基础的教会斯拉夫语，因此，这种语言和基辅罗斯居民所用的语言无多大关系。他承认小俄罗斯语和大俄罗斯语在蒙古人入侵以前便存在差异，但认为两者仍是紧密相关。他还认为，北方罗斯和南方罗斯的歷史在蒙古人入侵以前也是紧密相关。这样说，他形同反驳波戈金把基辅罗斯的歷史归给大俄罗斯的说法，而去主张基辅罗斯的歷史充满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色彩。但马克西莫维奇不是分离主义者：在他的认定里，小俄罗斯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二合一的全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他在写信给波戈金的信上说：「我会比你更爱基辅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培养一种对全俄罗斯人的爱和一种对小俄罗斯人更亲密的爱的同时，我也因为基辅是我族人同胞的家园而爱它。」175

在圣西里尔与圣美多德兄弟会的成员被国内流放或转为低调之后，把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歷史拆开来的推手变成是莫斯科而不是基辅。争论的焦点也从哥萨克人的歷史（这是科斯托马罗夫的焦点），变成基辅罗斯的往昔。波戈金没有被马克西莫维奇说服。他继续否定自己的旧观点，即基辅歷代大公是小俄罗斯人之说，改把基辅罗斯的歷史乃至整部罗斯史都归给大俄罗斯。出版于一八七一年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罗斯史中，波戈金写道：「有一说认为，小俄罗斯人曾经随着多尔戈鲁基和博戈柳布斯基向北迁，到达苏兹达尔176。真是如此的话，他们理应会在当地的语言和习俗留下小俄罗斯人的印记。但我们却完全没有看见这样的印记，当时的北方毫无改变。所以，去了北方的不是小俄罗斯人，而是另一支大俄罗斯人。」177

在波戈金的其他作品和他游歷过斯拉夫诸土地后写给政府的报告中，他还是认为大俄罗斯人和小俄罗斯人有着不同的民族性（他写道，后者拥有「所有独立部族的识别标志」），但属于同一个俄罗斯人群体。他有时认为奥匈帝国治下的加利西亚居民与小俄罗斯人不同，有时认为他们是小俄罗斯人的一部分，但总是主张他们是更大的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在言行上，他支持发展他所谓的小俄罗斯方言，但反对把它提升到和俄罗斯语平起平坐的地位。一八五○年代中期，在主张应该让波兰在帝国境内享有自治地位时，波戈金建议帝国疆域内只应该承认两种语言：俄罗斯语和波兰语。「语言━是两群人之间的真正边界。波兰是说波兰语的地方，俄罗斯是说俄罗斯语的地方。还有什么原则能比这条原则更正确或更公道？」178

波戈金和马克西莫维奇的争论引出了一个问题：要如何划分俄罗斯

和乌克兰的歷史叙事？它挑战了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主宰着俄罗斯菁英阶级的思维模式。该模式认为，基辅罗斯属于全俄罗斯人的过去。波戈金比他之前的任何人更明确地把这个「过去」拆为大俄罗斯人和小俄罗斯人两部分。除了大俄罗斯人和小俄罗斯人之外，他也承认白罗斯人是一个独立体，但马克西莫维奇则坚持全俄罗斯民族只有大俄罗斯人（北俄罗斯人）和小俄罗斯人（南俄罗斯人）之分。虽然两人在辩论中没有触及全俄罗斯民族性的这种分歧，但它将会在下一个十年，即混乱的一八六○年代，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

波戈金的信是发表于一八五六年，这一年也是新皇帝亚歷山大二世统治的第一年。亚歷山大二世是茹科夫斯基的学生，以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着称。他的统治一开始充满新气象，引入了一些重要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改变，也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知识分子的会遇创造出新的机会。兄弟会成员在几年后获准从流放地回归故里，自此把活动基地从基辅转移到圣彼得堡。舍甫琴科获释后也是去了圣彼得堡。一八五九年，科斯托马罗夫当上圣彼得堡大学俄罗斯史教授。说来讽刺，这个教席一度是首倡「罗斯重新统一」范式的乌斯迪亚洛夫所据有。

如果说乌斯迪亚洛夫是最受朝廷喜爱的歷史学家，那科斯托马罗夫就是圣彼得堡激进学生和自由主义民众的宠儿。根据一个同时代人回忆，科斯托马罗夫发表就职演讲时「整个演讲厅挤满了人，所以有些听众只能坐在窗台，或是两个人坐一张椅子」。演讲结束后，他「被听众举了起来，抬着往外走」179。演讲中，科斯托马罗夫对有关民族性的争论重新定调，把重点改而放在人民群众身上，认为人民群众才是歷史该研究的主要对象。他这样说：「任何法律、任何制度本身对我们而言都不重要，它们唯独应用在人民的生活上时才会是重要的。那些把国家摆第一的歷史学家眼里视为不重要的事情，将会是我们的优先课题。」180辩论显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51 A. V. Smirnov, “Stranitsy zhizni I tvorchestva istorika,” in Nikolai Kostomarov, Russkaia istoriia v opisanii ee glavneishikh deiatelei (Moscow, 2004), 18.

152 这里是把乌克兰民族运动比作精灵，把小俄罗斯人身分认同比作阿拉丁神灯之类。

153 指「亲斯拉夫派」认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一个民族，乌克兰人却不这样认为。

154 Taras Shevchenko v krytytsi, ed. Hryhorii Hrabovych (Kyiv, 2012), vol. 1, 4.

155 同上，6.

156 Olga Andriewsky, “The Russian-Ukrainian Discours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Little Russian Solution,’ 1782-1917,” in Culture, Nation and Identity: The krainian-Russian Encounter, 1600-1945, eds. Andreas Kappeler, Zenon E. Kohut, Frank E. Sysyn, and Mark von Hagen (Edmonton, 2003), 191.

157 同上。

158 Kyrylo-Mefodiivs’ke tovarystvo: U triokh tomakh, eds. H. I. Marakhov and V. H. Sarbei (Kyiv, 1990), vol. 1, 62.

159 同上，64.

160 同上，169.

161 同上，67.

162 同上，68.

163 Aleksei Miller, Ukrainskii vopros v politike vlastei i russkom obshchestvennom mnenii (vtoraia polovina XIX veka) (St. Petersburg, 2000), 56.

164 Kyrylo-Mefodiivs’ke tovarystvo, vol. 1, 308.

165 同上，293.

166 Miller, Ukrainskii vopros, 58.

167 Petr Zaionchkovskii, Kirillo-mefodievskoe obshchestyvo (Moscow, 1959), 138.

168 Vissarion Belinskii,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Moscow, 1956), vol. 12, 441.

169 同上。

170 Kyrylo-Mefodiivs’ke tovarystvo, vol. 1, 63.

171 同上，294.

172 Alexei Miller, The Ukrainian Question: The Russian Empire and Nation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2003), 60.

173 前面指出过，这本书是乌克兰人马克维奇所撰。

174 Serhii Plokhy, The Cossack Myth: History and Nationhood in the Age of Empires (Cambridge, 2012), 318.

175 Mikhail Maksimovich, “Otvetnye pis’ma M. P. Pogodinu,” Russkaia beseda 2 (1857): 85.

176 位于基辅罗斯时代弗拉基米尔大公国之内。今莫斯科东北方。

177 Mikhail Pogodin, Drevniia russkaia istoriia do mongol’skogo iga (Moscow, 1871).

178 Mikhail Pogodin, Izbrannye trudy (Moscow, 2010), 341.

179 Memoir of E. F. Iunge, in Kievskaia starina 28, no. 1 (1890): 23.

180 David Saunders, “Mykola Kostomarov (1817-1885)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Ukrainian Ethnic Identity,” Slavonica 7, no. 1 (2001): 15.

第八章　大、小和白

一八五四年九月十一日是俄罗斯海军大大丢脸的一日，不过后来又被改写为俄罗斯的荣耀和牺牲的日子。当天，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指挥官奉命凿沉停在舰队基地塞瓦斯托波尔港的五艘战列舰和两艘护卫舰。这只是个开始。一八五五年八月，剩余的俄罗斯舰艇全部沉到港口海底。俄军旋即离开塞瓦斯托波尔，这个撤军行动标志着帝国在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败局已定。

俄国人要弄沉军舰，是因为它们根本阻止不了英国、法国和鄂图曼的联军入侵克里米亚。风帆船只完全不是蒸汽引擎推动的英法战列舰的对手，而俄罗斯在黑海并没有蒸汽动力战列舰。联军登陆那一天，俄国军舰更因为天不起风而动弹不得，唯一能做的只有用沉船来阻碍联军舰队开进塞瓦斯托波尔港。让帝国统治者难堪和让未来歷史学家津津乐道的是，联军透过建筑克里米亚的第一条铁路，避开了这个难题。铁路让补给物资从巴拉克拉瓦港运至塞瓦斯托波尔。

一八五六年在巴黎签署的和平条约被俄国视为奇耻大辱。俄罗斯人曾经在一八一四年征服巴黎，但他们四十年后重返这个城市却是为了同意一项有损帝国领土完整的安排。圣彼得堡被迫放弃在高加索和多瑙河地区的领土，十一年后又因为囊中羞涩而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它被容许保有克里米亚，但不得在黑海沿岸驻扎舰队或修筑要塞。更重要的是，这条约让帝国的大国颜面完全丢光。

所以，有必要採取什么行动来恢復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政府把首要之务放在建造一支新舰队和改革陆军，但这两项工作都需要大规模的社会改革来配合。新皇帝亚歷山大二世相信，他不需要释出太多独裁权力便可以把这件大工程做好。然而，他和他的顾问团都知道，实行某种程度的自由化在所难免。这一点在波兰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看来只有放松箝制，帝国才有可能跟它最有动员力和独立精神的治下民族搞好关系。

除了打败仗和国际地位受损，俄罗斯还得面对一八六一年二月解放农奴政策所引起的国内动盪。这动盪又让波兰社会大胆要求还他们失去的自由。前波兰王国境内和俄罗斯西部省分的波兰贵族都满怀希望地期盼，亚歷山大二世会恢復他叔叔亚歷山大一世的政策，让波兰恢復自由并拥有一部宪法。波兰王国在一八三○年的「十一月起义」之后失去主权，只剩下低度的自治权。但新政府却没有这样的计画，幻灭的波兰人于是再一次叛变。

这场新的波兰革命开始于一八六三年一月，史称「一月起义」。大批波兰青年攻击波兰王国各城市的俄罗斯军事单位，旋即得到立陶宛人、白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省分的响应。俄罗斯军队花了一年多才把起义敉平。当局接着清算起义的领袖和参与者，推出一个俄罗斯化这些边区的新运动。政府这时明白到，不对俄罗斯民族本身重新想像，波兰问题永无解决的可能。正是在亚歷山大二世统治第一年的公开辩论中，俄罗斯首次有了一个三位一体民族的特徵，这「三位」是大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和白罗斯人。

从波兰危机一开始，波兰王国之外的前波兰领土的未来便是朝廷和一般大众的主要关切。亚歷山大二世登基之初便已经向波兰人的舆论让步，取消了父亲的一项规定：波兰人官员都必须先在俄罗斯人省分服务，才可回到前波兰的土地任职。亚歷山大二世也解除非东正教徒不可在前波兰土地任官的限制。但「去波兰化」的计画并没有从政府的工作日程表中消失。

自亚歷山大在一八五○年代晚期实施改革开始，都主教谢马什科的支持者便瞧出了一个来自波兰的新威胁，他是在帝国的俄罗斯东正教伞翼下最后掌管联合教会者，相信一个不可分割的俄罗斯民族可作为对抗波兰的堡垒。当时，在右岸乌克兰的年轻贵族之间，出现了一群自称为「爱农民者」，他们的出现造成波兰人阵营的分裂，对俄罗斯帝国的威胁尤甚。「爱农民者」抛弃他们自小相信的天主教，皈依农民信仰的东正教。如果这些「爱农民者」宣布自己是俄罗斯人，那么他们改信东正教对帝国政府将会是一个好消息，问题是，他们选择的身分认同是南俄罗斯人，或说是乌克兰人。他们其中一人把名字从 Włodzimierz Antonowicz 改为 Volodymyr Antonovych（安东诺维奇）。日后，他将会是知名乌克兰歷史学家。

谢马什科的支持者宣称，亲乌克兰主义不过是波兰人的一个阴谋。一八五九年，基辅大学教授又是「泛俄罗斯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戈戈茨基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可以终结「乌克兰人运动」出现的行动纲领：

> （一）应立即採取措施，教育聂伯河两岸的人；（二）从现在起，应该支持俄罗斯三部族为一体的观念，没有这个观念，我们将会死得很快；（三）所有小学课本应该统一使用俄罗斯语。应该把信仰和语言用作维繫元素。但在我们简单的语言里加入一些东西不是坏事；（四）我们绝不可促进我们和大俄罗斯之间的不和。变革的渴望是可以透过别的方式表达。别忘了，我们的敌人是波兰人和罗马！

戈戈茨基口中的「俄罗斯三部族」是大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和白罗斯人。他的三位一体民族模型歷史根源久远，源头可回溯至一六五六至一七二一年，当时的俄罗斯沙皇都是自称为「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和白罗斯的最高主宰」。彼得一世在一七二一年把自己的头衔改为「全俄罗斯的皇帝」，但是他能控制的只有大俄罗斯的全部和小俄罗斯的一部分，至于白罗斯则早在五十年前便根据《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割让给波兰了。俄罗斯在一七七二年第一次瓜分波兰重新得到白罗斯东部，但不管是皇帝头衔抑或官方论述都是一仍旧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兰时，俄罗斯分到的新「俄罗斯」土地实在太多，包括右岸乌克兰、沃里尼亚、波多利亚和白罗斯西部，不烦一一列在皇帝头衔上。一八二三年，当十二月党人运动领袖佩泰尔坐下来写他的起义宣言时，他算在俄罗斯民族里的部族不是三个，而是五个。

一八二○年代开始发展至一九三○年代，俄罗斯学者对帝国西境的民俗和语言产生了强烈兴趣，但这种研究兴趣还是没能够回答俄罗斯到底包括多少族群的问题。被帝国学者认定是俄罗斯语的地方语言为数众多，甚至在大俄罗斯人自己本身之内也是如此。沙哈罗夫，这位医生是莫斯科大学校友，在其着作《俄罗斯人祖先家庭生活的谚语》（一八三六）一书中主张，大俄罗斯语有四大方言，每一种又分化为许多亚方言。小俄罗斯语则是包括三种亚方言。后来被记录在案的白罗斯语亦非常多，例如，一八五○年代，一批俄罗斯军官在白罗斯发现，当地人除了使用白罗斯语，还使用一种黑俄罗斯语的方言181，而白罗斯南部有些群体是使用小俄罗斯语方言。这个民族学研究的参与者多半认为，所有这些方言都是俄罗斯语的变体，而使用它们的人都是俄罗斯民族的一员。不过，这种新发现的「俄罗斯部族」语言多样性引起了一个问题：俄罗斯到底有多少种方言？又因为早期的民族学家相信，每种语言都对应于一种民族性，所以另一个问题便是：俄罗斯到底有多少种民族性和亚民族性？

率先主张俄罗斯民族由三个亚群组成的人也许是纳杰日金，他对俄罗斯民族的多样性和一体性同时深信不疑。一八四一年，纳杰日金从流放地回归故里之后，出版了恰达耶夫具有震撼性的《哲学书简》（一八三六年）182，而在他即将成为内政部刊物的主编之时，又发表了一篇书评，谈论维也纳斯拉夫主义者科皮塔尔的一部作品。文章中他勾勒出俄罗斯语方言的歷史演变状况，又认定它们一共是三种：第一种是庞塔斯斯拉夫语，即小俄罗斯语；第二种是波罗的海斯拉夫语，即白罗斯语；第三种是大俄罗斯语。纳杰日金相信，前两种方言的歷史最古老，大俄罗斯语则是前两者的混合，是在新殖民的地区发展出来，这些殖民地位于说前两种方言地区的东面。

纳杰日金的书评发表在德意志刊物，俄罗斯境内知悉的人不多，但同一种俄罗斯语言和人民的三分法很快就被介绍给俄罗斯读者。一八四二年，四十七岁的斯洛伐克审查官沙发利克在布拉格出版了一本名为《斯拉夫民族志》的书。沙发利克是当时最着名的斯拉夫主义者，在书中，他一丝不苟地追溯俄罗斯语言的演变，採取的架构非常类似纳杰日金；事实上，我们从纳杰日金一篇文章得知，沙发利克写书时请教过他。要知道，当时的人都认为「俄罗斯世界」浑然一体，所以沙发利克的三分说犹如抛出一枚震撼弹，最初是引发一场语言学地震，最终则会改变东欧的政治地图。

沙发利克把俄罗斯语分为三种方言：大俄罗斯语，其中包括诺夫哥罗德亚方言；小俄罗斯语，使用这种语言的不仅止于俄罗斯统治的乌克兰人，还包括奥地利所属加利西亚和匈牙利所属外喀尔巴阡的居民；白罗斯语，其使用范围包括白罗斯的东部和西部。沙发利克相信语言和民族性紧密相关，所以他把俄罗斯语分为三种，等于是把俄罗斯民族分成了大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和白罗斯人。虽然沙发利克没有对「俄罗斯语」方言做过民族学或语言学研究，他对帝国境内的相关研究却是十分注意，也和当时一些俄罗斯斯拉夫主义者有所接触。例如，他一八三五年在布拉格和波戈金见过面，后来又获得波戈金的金钱资助。

沙发利克的另一个俄罗斯相识是博迪安斯基。博迪安斯基在乌克兰出生，是莫斯科大学的「斯拉夫研究」教授，曾出资出版《罗斯史》183。他为沙发利克提供语言材料，在一八三七年寄给他一本用白罗斯语「改写」的《艾涅伊达》，还送他一幅乌克兰语和白罗斯语的方言地图。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博迪安斯基写信给斯列兹涅夫斯基，这样说：「我一直认为，普里皮亚季河是白罗斯人和小俄罗斯人的天然边界，这特别是因为，住在河两岸的所谓黑俄罗斯人构成了一个从霍霍尔人（即乌克兰人）到白罗斯人的过渡。如果说我指出的这条边界不同于沙发利克所指出者，那是因为我根据的记载是出自更早前便波兰化的白罗斯人。」184在以莫斯科为基地的亲斯拉夫派眼中，沙发利克是不容置疑的语言学权威，所以《斯拉夫民族志》一出版，博迪安斯基马上把它翻译成俄罗斯语。

一年后的一八四三年，他的翻译发表在波戈金主编的《莫斯科人》杂志。沙发利克对俄罗斯语的三分法—连同对俄罗斯人的三分法，此后成为波戈金重新诠释俄罗斯史的基础。他在一八五○年代与马克西莫维奇论战时即採取了大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和白罗斯人的三分法。不过尽管沙发利克的三位一体模型非常流行，但它会不会被俄罗斯帝国接受却无法保证。因为它很容易就会被看作不利于俄罗斯民族和国家。不

过，让人大出意外的是，抵制这个模型的声音不是发自大俄罗斯，而是发自小俄罗斯和白罗斯。

在哈尔科夫大学，当时帝国最德隆望尊的语言学权威斯列兹涅夫斯基提出了自己一套对「俄罗斯语」的划分方法。广泛游歴过斯拉夫人诸土地的一年后—亦即《斯拉夫民族志》俄译本出版的同一年，他在一八四三年把俄罗斯语分为两大群组：南方俄罗斯语（即小俄罗斯）和北方俄罗斯语（即大俄罗斯语）。在这一点上，他是追随马克西莫维奇的脚步：后者在一八三七年曾对俄罗斯民族做出类似区分。保加利亚语言和文化专家维涅林在差不多同一时期提出过类似看法。斯列兹涅夫斯基承认白罗斯方言的存在，但认为它只是大俄罗斯语的变体。

不过，说白罗斯语是大俄罗斯语的一个变体，就等于说白罗斯人是大俄罗斯人的一个亚群，也因此不具有独自的民族性。根据警察厅的档案纪录，有一些圣西里尔与圣美多德兄弟会的成员正是这样认为。更重要的是，在波兰起义前夕，一些兄弟会的前成员开始大谈乌克兰人（又称为小俄罗斯人或南俄罗斯人）具有独立民族性。

对帝国当局而言，「波兰问题」的再起让「乌克兰问题」有了新的紧迫性。今日被尊为俄罗斯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鼻祖的作家赫尔岑第一个指出，乌克兰是俄罗斯和波兰领土争夺战中的一个独立变数。一八五九年一月，他在伦敦出版的俄文杂志《钟声》中这样写道：「尽管我们採取了万全对策，但万一乌克兰人记起莫斯科人对他们有过的种种压迫……又同时记得（波兰 - 立陶宛）共和国的军人、地主和朝廷官员是怎么对待他们，以至于他们既不想当俄罗斯人又不想当波兰人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非常简单。那就是，承认乌克兰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185精灵就此跑出了瓶子。这还是有人第一次公然谈论乌克兰独立的可能性，赫尔岑等于说出了科斯托马罗夫在《乌克兰人民的创世记》里不敢直说的话—在该书中，他已经最先解决了此一问题；尽管如此，这份文件已经够让朝廷紧张，当时他们调查了圣西里尔与圣美多德兄弟会。不过，赫尔岑的建议只是修辞手段，是要在对俄／波边境未来划分法的热烈争论取得能见度，以及基本上肯定该地区的居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但在政治现实的层面，赫尔岑和科斯托马罗夫都偏好用联邦制度解决民族性的问题，而他在《钟声》杂志内的文章也基本上是这种立场。

科斯托马罗夫非常欣赏赫尔岑的立场，为此投书《钟声》，表示支持。他的文章题为〈乌克兰〉，以匿名方式刊登在该杂志的一八六○年一月号。他先是对赫尔岑致上感激：「你对乌克兰表达的意见，南俄罗斯的有识之士长久以来对此珍如拱璧。」186他把自己的故里称为乌克

兰，把自己的同胞称作乌克兰人或南俄罗斯民族，又表示对「小俄罗斯人」这个称啯有所保留。文章在许多方面都是对他自己早期思想的进一步发挥。透过强调乌克兰的哥萨克往昔的民主性质，他为乌克兰人是一个独立民族的观点提出了歷史理据。

一八六一年，科斯托马罗夫在〈两种罗斯民族性〉一文再往前走了一步。在这篇登在圣彼得堡《根基》杂志的文章中，科斯托马罗夫把「全俄罗斯民族性」的茧给拆开来，宣称其实有种相互独立的罗斯民族性：「除了那种主宰着门面的罗斯民族性，另一种罗斯民族性正在浮现出来，并要求在语言和思想的领域享有平等公民权。」187他主张，「罗斯」这个名称原属南俄罗斯人或说小俄罗斯人所有，是后来才被他们的北方邻居偷走。又因为这两个罗斯民族经歷过不同的歷史道路，他们也形成了相互不同的个性：「如果说南俄罗斯人看重的是个人自由、合议制和联邦制原则，那么北俄罗斯人看重的就是集体主义、国家和专制统治。」如果南俄罗斯人真有必要在归附波兰抑或归附俄罗斯之间做出选择的话，科斯托马罗夫认为应该是选择后者，因为他们从大俄罗斯人得到平等对待的机会大于从波兰人。

这篇文章将成为接下来几代「乌克兰运动」的集结点。由于〈两种罗斯民族性〉有署名和发表在帝国境内，文中没有使用「乌克兰」和「乌克兰人」的字眼，他一年前在《钟声》发表的匿名文章则有用这些字眼。这让后来世代的乌克兰活动家需要花工夫弄清楚他所谓的「两种罗斯民族性」是何所指。但文章明确表明帝国境内有另一个有资格与大俄罗斯民族平起平坐的民族，这是歷来第一次有人在公共媒体这样主张。科斯托马罗夫这种措词方式表面上只是追随马克西莫维奇在一八三○年代建立的传统。马克西莫维奇把罗斯分为两部分：北俄罗斯和南俄罗斯。科斯托马罗夫採取的一样是二分法，但与马克西莫维奇不同，他并不认为它们是同一个实体的两部分。在科斯托马罗夫看来，两者各自独立。此外，他又主张，南俄罗斯人在某些方面接近波兰人的程度要大于接近俄罗斯人：「如果说南俄罗斯人的语言在结构上远离波兰人而接近大俄罗斯人，那么，他们的民族特徵和民族性格的本质却更靠近波兰人。」188

科斯托马罗夫认为白罗斯人是大俄罗斯人的一个分支，但这个论点让很多身处帝国首都或白罗斯的读者都感到不舒服。

沙皇的头衔在十七世纪下半叶曾包含「白罗斯」几个字，至十八世纪初叶删除，但在一七七二年第一次瓜分波兰之后重新回到官方词汇，这是因为当时白罗斯东部的土地被兼併到俄罗斯帝国去。白罗斯的天主教大主教教区亦是在那时候创建。一七九七年凯萨琳去世后189，俄罗

斯东正教会建立了自己的白罗斯大主教教区。直到一八三○至一八三一年波兰起义之前，「白罗斯」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合理的称谓。

一八二八年，这个名称被用于这地区的联合教会大主教教区，又在一八二九年被用于范围涵盖白罗斯东部和西部土地的学区。但一八三○至一八三一年的波兰起义改变了这名称的政治内涵。波兰的知识分子原先都把他们的祖居地称为立陶宛，但起义之后却採纳了「白罗斯」的称啰，一个例子是在布列斯特土生土长的诗人密茨凯维奇。波兰语拼作 Białoruś，「白罗斯」在波兰人心目中是指波兰核心地区以东的土地，而这一带被认为歷史上、文化上和语言上都是属于波兰。会有这种改称，是因为研究常民语言和习俗的新兴趣让深具文化意识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不再愿意把白罗斯称作「立陶宛」：立陶宛居民使用的语言极不同于斯拉夫语。

这种民族学转向充分体现在雷平斯基一八三九年于巴黎发表的民俗文化演讲。雷平斯基是白罗斯维捷布斯克地区人，曾参与一八三○年的起义，失败后就像许多同胞一样流亡巴黎。在演讲中，他把白罗斯定义为一片波兰人土地，范围南至普里皮亚季河和平斯克沼泽，北至普斯科夫和大卢基。其居民的语言不同于俄罗斯、俄罗斯治下的乌克兰部分和奥地利所属的加利西亚所操的语言，而更接近波兰语。雷平斯基认定，使用白罗斯语的人自古以来便和波兰人有着血缘关系。这个演讲得到其他流亡巴黎的波兰人热烈回响，雷平斯基翌年把演讲稿扩充后加以出版。

一八四○年，即雷平斯基的小册子在巴黎出版的同一年，尼古拉一世禁止在政府文件里使用「白罗斯的」和「立陶宛的」两个词语，但这项措施无法在政府圈子之外执行，因为它太琐碎，也为时太晚。一八三五年，罗马天主教为白罗斯农民制作了一本用波兰语字母拼写的白罗斯语教义问答。到了一八三○年代晚期，一本用波兰语字母拼写的《艾涅伊达》白罗斯语译本开始在当地贵族之间流传。在一八四四至一八四六年之间，波洛茨克地区的白罗斯人巴斯斯卡泽斯基出版了四册自己的文学作品集，都是以波兰语字母拼写的白罗斯语创作。一八五○年代，杜宁．马尔辛基维兹带来了一场类似的小震撼，因为他发表了一些用白罗斯语创作的散文作品，又准备把密茨凯维奇的经典诗歌《潘塔德乌什》翻译为白罗斯语。

俄罗斯东正教当局和一些政府官员愈来愈担心这是一场「波兰人的阴谋」，意在教坏当地的「俄罗斯人」农民。创作和传播用波兰语字母拼写的白罗斯语文学作品的努力在一八五九年遭遇挫败。有些奥地利人和波兰人一直致力于在奥地利领土加利西亚出版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白罗

斯语出版品，之前这些一律用西里尔字母拼写，对此，俄罗斯当局的反应是禁止这类出版品输入。帝国内部出现的一些类似出版品一样被查禁，但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的白罗斯语文学作品没能填补由此造成的真空。还是一八四六年的时候，俄罗斯科学院曾以学术品质低劣为理由，不批准民族学家什皮列夫斯基出版他的白罗斯语语法书。到了一八六二年，在一个在地贵族的支持下，第一部白罗斯语语法书终于出版，但一八六三年的波兰起义引起帝国当局的警觉，完全禁止白罗斯语出版品在帝国境内流通。

一八六二年，维尔纽斯总督纳济莫夫曾经和下属讨论，是否要出版一本用当地白罗斯方言为语言的杂志。有两派不同意见，一派认为应该使用稍微迁就在地语法的俄罗斯语，一派认为应该使用白罗斯方言，总督支持后一派的意见。他向教育部长主张，应该用「在地的白罗斯语」对白罗斯天主教徒进行宗教教育，这些天主教徒都是从之前的「俄罗斯人」联合教会改宗。他认为这种语言也算俄罗斯语，但「更精确的称呣是白罗斯语。那是一种在地的鲁塞尼亚人方言，杂志印刷时会採用俄语字母」190。总督会有这种建议，是因为急于压制他的波兰人对手：这些对手由卡利诺斯基领军，出版的杂志《农民真理》因为是使用波兰语字母拼写的在地白罗斯方言，对农民深具吸引力。

不过，不管是纳济莫夫抑或创办《农民真理》的波兰人都不认为白罗斯人有任何民族性或者自成一个族群。纳济莫夫把本地农民视为俄罗斯民族一分子，而卡利诺斯基则呣吁他们为波兰人的大业战斗。两个人都不认为白罗斯人有独立的政治戏分，都想用在地的白罗斯方言摆布他们。虽然明知《农民真理》是一个威胁，圣彼得堡始终没有批准纳济莫夫创办一本使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的白罗斯方言的杂志。即便如此，纳济莫夫的建议仍然反映出，政府再也不能对于白罗斯人产生的文化自觉视若无睹。

如何处理这种始料不及的文化自觉，始终是个极具争议性的议题。在这个争论中，没有人的贡献要比科雅洛维奇更大，他是白罗斯西部人，父亲是曾经跟随谢马什科学习的联合教会教士。当谢马什科在一八三九年发动「重新统一」联合教会的工程时，米哈伊尔只有十一岁。他在东正教学校受教育，后来成为圣彼得堡神学院歷史教授，在一八六三年的波兰起义之前和期间都积极参与有关白罗斯的辩论。他相信俄罗斯民族的统一性，但又体认到有一个操白罗斯「方言」的白罗斯「部族」（tribe）存在。不过，他不认为独特的语言和族群性足以让白罗斯人在俄罗斯民族中成为独树一帜的群体。在他看来，民族性是由社会组织形式和共同歷史经验界定。所以，他把俄罗斯民族分为两部分，但和科斯

托马罗夫的南、北二分法不同，他是把罗斯人分为东、西两支。

今天，科雅洛维奇被认为是一种白罗斯政治思想趋势的鼻祖，根据这种思想，白罗斯是所谓的「西罗斯」这个更大实体的一部分。这种观念的根源歷史久远，因为它是基于蒙古人入侵后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罗斯土地划分法。到了十四世纪，大部分乌克兰和白罗斯土地都落入了立陶宛大公国，正是这些领土构成了科雅洛维奇所说的西罗斯。他是根据社会结构定义西罗斯的居民，不是根据族群归属或者宗教归属，这两个标准为同时代其他国家的民族打造工程师所接受。科雅洛维奇是一个早期的民粹主义者，一心只想要把低下阶层凝聚在一起，不在乎他们是斯拉夫人还是立陶宛人。

民粹主义是科雅洛维奇与科斯托马罗夫的共同取向，但科斯托马罗夫的民粹主义没有逾越民族国家的边界。两人对民族性的定义彼此相左，曾在报章上展开论战。科雅洛维奇一方面认为亲乌克兰派是西罗斯唯一货真价实的公共活动家，因为他们准备好和人民合作，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眼界狭隘，为此感到失望。

科雅洛维奇指出，亲乌克兰派「长于数字、普及教育和精力……但让人遗憾的是，我们很难指望他们能够对全部的西罗斯人民有什么重要贡献。从各方面看来，他们（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是严重自我主义者。事实上，因为小罗斯受到波兰文化和耶稣会荼毒没有那么大，那里的人都能够自己站起来」191。反观以民俗语言学方式思考的科斯托马罗夫则坚决主张小俄罗斯人和白罗斯人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他甚至论证白罗斯人是北俄罗斯或说大俄罗斯人的后裔，这种观念在当局于一八四七年从圣西里尔与圣美多德兄弟会成员取得的口供便已经可以看到。科雅洛维奇对这种说法勃然大怒，加以回击，在谈到基辅罗斯时代的克里维奇人—白罗斯人的前身192—时这样指出：「老克里维奇人的后代不可能是由北罗斯的后代所代表，后者在歷史上要较年轻。」193

科斯托马罗夫的亲乌克兰主义只是科雅洛维奇争取西罗斯被承认的障碍之一。他的另一个对手是俄罗斯的亲斯拉夫派。他指责他们想要把西罗斯或说西俄罗斯「俄罗斯化」是没有大脑的主张，吆吁他所有大俄罗斯人同仁「在面对西俄罗斯人时约束自己愚蠢的大俄罗斯人激情，改而用行为来赢得西俄罗斯人的爱」194。但他的对手不为所动，认为他只是在操作白罗斯分离主义，为此感到震惊。

俄罗斯的亲斯拉夫派阿克萨科夫在写给科雅洛维奇的信上说：「俄罗斯正在把白罗斯从灭顶之灾中救出来：重点在于摧毁波兰文化的影响力。不过，白罗斯就像自己已经安全了那样，不大在乎是否已经摆脱波

兰人的牛轭，反而关心起自己有哪些特殊性的问题！不过，它的特殊性可是少之又少。」195莫斯科大学前哲学教授卡季科夫在《莫斯科新闻报》把话说得更白：「他们从圣彼得堡写信给我们，说是某种亲白罗斯派正在诞生。圣彼得堡那边的各种社会力量过剩，以致它想要不惜一切代价为我们所有的方言施肥和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俄罗斯民族和语言。」196他预料波兰的「民族主义者」对于这种「在心灵上把白罗斯人土地从俄罗斯分离出去的企图」乐不可支。

总之，科雅洛维奇把俄罗斯民族分为东、西两支的构想四面楚歌。科斯托马罗夫坚持南、北二分法，而阿克萨科夫和其他亲斯拉夫派成员则继续是用三分法思考，把科雅洛维奇的白罗斯留在了俄罗斯民族的框框内。他对此非常不满，但有没有办法可以让自己的观点转而占上风。卡季科夫倡导的三位一体民族得到朝廷背书，因为它可以让帝国最终把自己转化为一个民族国家提供正当性。

在一八六三至一八六四年的波兰起义之后，三位一体民族的观念成为了俄罗斯民族工程的主导模式。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对付波兰民族主义和安抚乌克兰民族运动愈来愈高涨文化要求的一种手段。从纯粹的概念角度来说，它可以调和乌瓦罗夫在一八三二年揭橥的民族性原则和一个愈来愈被人知觉到的事实：俄罗斯民族其实相当庞杂，容许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想像。佩泰尔曾经认定俄罗斯共有五个分支，但俄罗斯人中的亲斯拉夫派和帝国的民族主义者在一八六三年之后只承认有三个分支。这三个分支所使用的白话被称为「方言」，所以，有必要打造一种号称是由三个分支共同创造的俄罗斯语或说全俄罗斯语。这种语言统一被认为攸关生死：只有向正在民族国家化的欧洲国家看齐，俄罗斯帝国才可能继续是一个可存活的政治单位。

从歷史的角度看，三位一体模型的根源可以回溯至十七世纪中叶，当时，莫斯科沙皇因为兼併了哥萨克乌克兰和征服了白罗斯东部，在自己的头衔上冠上大罗斯、小罗斯和白罗斯的字样。这是一个分两阶段达成的过程。「大罗斯」和「小罗斯」是最早冠上的字样，以表示莫斯科的版图已扩张至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境内的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土地。然后，「小罗斯」又被分成两部分：「小罗斯」和「白罗斯」，前者现在指乌克兰人的土地，后者指白罗斯东部土地。这种命名法是要反映这两个地区的不同地位：前者是莫斯科在一六五四年与哥萨克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签订协议后被纳入莫斯科的保护之下，后者是莫斯科用武力征服，所以不享有任何特殊待遇。总之，在十九世纪中叶，罗斯/俄罗斯的三分法再次得到认可，但这次的认可是以语言理由而不是以政治理由为基础。不过，承认这种差异不代表朝廷打算建立一个联邦政府，容许

其他两个部分获得自治。其最终目的是把三个分支统一在大俄罗斯的皇权、宗教和文化之下。

181 黑俄罗斯指白俄罗斯南部。

182 前面提过，这部书反对西化，认为俄罗斯落后其他欧洲国家是东施效颦所害。

183 前面指出，《罗斯史》主张哥萨克人的歷史不是俄罗斯歷史的一部分。

184 Quotation supplied by Nathaniel Knight.

185 Aleksandr Gertsen, “Rosiia i Pol’sha: Pis’mo vtoroe,” Kolokol, 1859.

186 Mykola Kostomarov, Pys’mo do vydavtsia “Kolokola” (Lviv, 1902), 15.

187 Nikolai Kostomarov, “Dve russkie narodnosti,” Osnova, no. 3 (1861): 34.

188 同上，78.

189 其实是一七九六年去世。

190 Mikhail Dolbilov, Russkii krai, chuzhaia vera: Ėtnokonfessional’naia politika imperii v Litve i Belorussii pri Aleksandre II (Moscow, 2010), 199.

191 同上，220.

192 早期斯拉夫人各部落沿河居住，定居在聂伯河流域的称为波良人（Polyanian），定居在伏尔加河上游、德维纳河（Dvina river）上游和聂伯河上游地区的称为克里维奇人（Krivichian）。

193 同上，221.

194 同上，212.

195 同上，221.

196 同上，222.

第九章　消灭语言

一八六三年七月十八日，俄罗斯内政部长瓦卢耶夫发布了帝国对东斯拉夫诸语言的新政策。他写在一份看似平常的文件里──一封写给书报审查官的信，却是经过沙皇亲自批准，所以意义绝不寻常。这信后来被称为「瓦卢耶夫通报」，将会对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打造工程产生强烈影响。从由内政部长来负责语言政策这一点，显示当局已经把各种非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勃兴视为对国家安全的一个威胁。

瓦卢耶夫的指令主要针对乌克兰知识分子而发，因为他们努力把乌克兰语言引入教堂和学校之举被认为是波兰人动摇帝国的阴谋的一部分。他在通报上说：「这个现象非常可叹且值得关注，因为从审查官收到的手稿和从大部分流传于小俄罗斯的文章都是出自波兰手笔的事实判断，一切都是波兰人在幕后搞鬼。」197瓦卢耶夫声称，那些鼓吹「小俄罗斯民族性」的人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把这一套灌输给普罗大众。这些人之中有许多正受到政府调查，将会以分离主义者的罪名起诉。

通报吩咐审查官特别注意乌克兰语出版品，不管那是在知识分子小圈子里流传或是供大众阅读的东西。瓦卢耶夫站在那些主张有所谓「全俄罗斯语」的乌克兰官员一边：「他们从根本上证明了，从不曾有过一种独立的小俄罗斯语。现在民众所使用的地方方言，不过是一种受波兰语污染的俄罗斯语。小俄罗斯人就像大俄罗斯人一样，可以听得懂全俄罗斯语198，它甚至比现在某些小俄罗斯人设计的小俄罗斯语还好懂，特别是比波兰人设计的所谓乌克兰语好懂。」

「瓦卢耶夫通报」旨在防止乌克兰语言文本在农民和普通民众之间流传。它禁止出版学校和教堂使用的乌克兰语文本，只有纯文学作品例外。虽然通报引入的只是临时措施，它对乌克兰文化和身分认同的影响却是既深且鉅。在瓦卢耶夫签署命令的一八六三当年，共有三十三件乌克兰语出版品面世，但到了一八六八年他卸任内政部长时，全年只有一件乌克兰语作品出版。政府有效地在帝国西境打压了一种替代性语言、文学和高级文化的发展，这种发展一直是当时乌克兰头号政治思想家科斯托马罗夫所期望看见的。但在一八六三年之后，便不再有任何白罗斯语出版品出现。

「在我们的时代，是否可以或应该以南俄罗斯语─亦即乌克兰语写作，是由实践本身来决定。」199这番话出自《根基》杂志的几个发行人，该杂志是亲乌克兰派的喉舌，一八六二年在圣彼得堡创刊。虽然他们接着又表示，他们对「用人民的语言来教学和宣教是否较有效」仍不

确定，但这只是一种门面说法。事实上，把乌克兰语引入教会和学校业已成为亲乌克兰运动的主要政治目标。俄国社会主义作家暨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肯定这种做法，并在《根基》创刊时为文表示欢迎：「在我看来，用小俄罗斯语来教育小俄罗斯人民和发展小俄罗斯语的大众文学，在一开始对小俄罗斯人来说是最方便和有用的目标，值得追求。」200

亲乌克兰派早在创办杂志宣示他们的计画之前，便已经忙着落实这计画。一八六二年，共有六本乌克兰语小学教科书在帝国境内贩售，其中一本是舍甫琴科所编，一本是库利什所编。科斯托马罗夫在圣彼得堡向乌克兰和俄罗斯民众募捐，用募来的钱出版了更多供应普通民众阅读的乌克兰语书本，还制作了一本乌克兰语的圣经译本，政府和教会在左右为难下通过了对译本的审查。对于这种现象，政府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对这些乌克兰语出版品採取什么态度。对圣西里尔与圣美多德兄弟会的活动限制已经解除，农奴已经获得自由，但要用什么方式教育这些民族的问题却悬而未决。先前，在一八五九年，政府禁止以拉丁字母拼写的斯拉夫语文本出版或进口，想以这种方法阻止波兰人的文化扩张，但要怎样处理包含白罗斯语的俄罗斯语「方言」的文本却未有定论（第一本白罗斯语法书在一八六二年出版）。

一八六一年，当亲乌克兰派央请基辅都主教阿尔谢尼帮忙推广舍甫琴科编写的小学课本时，都主教向朝廷请示意见。审查委员会建议他拒绝所请，理由是小俄罗斯语出版品可能会引起两个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分裂，破坏国家稳定。但总的来说，在审查委员会诸公眼里，亲乌克兰派的憧憬只是痴人说梦，即使不受阻挠一样成不了气候，所以无须对其设限或加以迫害，却不应该以政府之力提供帮忙。后来，政府政策会发生变化，导致瓦卢耶夫发出他的通报，是御前办公厅第三厅在一八六三年三月收到的一封信所引起。当时波兰起义才刚爆发。写信人没有署名，但自言是代表一批不愿具名的小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写信，目的是请求禁止一部《四福音》的乌克兰语译本出版。该译本当时正接受圣彼得堡宗教事务管理总局的审查。

这封信被转交给基辅总督安年科夫，他看过之后表示支持写信人的请求。他担心的是，那部《四福音》译本会把乌克兰语从方言提升到独立语言的地位，并因此产生政治后遗症。他在意见书里面写道：「有关小俄罗斯方言是否只是俄罗斯语的一种特殊变体，抑或根本就是一种独立语言，这个问题仍然处于争论之中。如果让一本小俄罗斯方言的圣经译本出版，支持小俄罗斯语的一方就会振振有词，认为这等于承认小俄罗斯语是独立语言。他们当然不会以此为满足，一定还会更进一步，以

他们拥有独立的语言为理由，要求给予小俄罗斯自治权。」201

沙皇读过安年科夫的意见后，指示第三厅负责人联络中央政府的相关官员处理这件事。这表示，他认为基辅总督的担心有理，其建议值得考虑。这个任务落在内政部长瓦卢耶夫头上，他又转过身联络宗教事务管理总局。最后，那部由乌克兰文化活跃分子莫拉切夫斯基翻译的《四福音》被禁，一起被禁的还有供一般民众阅读的乌克兰语出版品。新政策在瓦卢耶夫一八六三年七月十八日发出的通报中发布。在发出通报前的几个月，瓦卢耶夫显然经歴了一个演变：他本来极不情愿执行沙皇的命令，最后却变成禁制措施的强烈支持者。他拖了三个月才向第三厅回报，表示自己完全贊同基辅总督禁止新约译本在乌克兰出版的建议。然而，一旦做出决定，瓦卢耶夫便决心如铁。

在一八六○年代的俄罗斯政府里，瓦卢耶夫属于自由派，是一个谨慎的改革论者，一心想要引入一种初步的大众代表制度来加强君主专制。瓦卢耶夫最后会对乌克兰语出版品下重手是为情势所逼，因为第三厅发起了一场媒体宣传战，鼓吹基辅总督所建议的严厉措施。负责这场宣传战的是学院转报界的卡季科夫。卡季科夫和亲斯拉夫运动的保守派领导人相处愉快，起初认为亲乌克兰派的目标注定失败，所以对他们採取屈尊俯就甚至是纵容的态度。但他的立场因为波兰起义的爆发而彻底改变。

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即瓦卢耶夫签署通报的大约一个月前，卡季科夫发表了一篇文章：〈亲乌克兰派和波兰人的利益凑巧一致〉，其标题本身便非常有披露性。站在一个和谢马什科追随者完全一致的立场，卡季科夫指控亲乌克兰派不仅受到波兰人阴谋的利用，还受到耶稣会的阴谋利用。他这样说不啻是把乌克兰语的问题政治化和罪行化，也让瓦卢耶夫不得不在他的通报里把亲乌克兰派和波兰人说成是彼此挂钩。但长远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打压乌克兰文化和政治运动政策的思想基础，这种政策将会是接下来几十年的官方政策。卡季科夫这样指出：「乌克兰从未有过自己的歴史，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乌克兰人是道地的俄罗斯人，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是俄罗斯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少了他们，俄罗斯民族就很难维持原状。」202虽然承认「俄罗斯民族」的这两个分支有着语言和文化差异，他认为这种差异只属次要。如果俄罗斯民族想要得到发展和兴盛，地方方言就必须予以遏制。

他接着比较了俄罗斯帝国和法国、义大利、德意志的差异，指出「俄罗斯」各群体之间的方言差异比见于西欧国家者少得多。他说，在整个俄罗斯境内，不管旅行到哪里，要理解当地的语言都无太大困难。不可分割的俄罗斯民族的统一性是奠基于它的文学语言的统一。他批评

科斯托马罗夫不应该把俄罗斯民族分成两部分：「真是令人髮指和荒谬的诡辩！他把俄罗斯说成就像可以有两个民族性和两种语言，就像法国可以有两种民族性和两种语言！」203卡季科夫用最强烈的措词攻击科斯托马罗夫和亲乌克兰派：「他们无中生有地弄出一些英雄和半神，弄出一些崇拜的对象和民族性的象徵。新的『西里尔和圣美多德』，以最古怪的字母204做了他们的外观，和一些不存在的小俄罗斯语，是要混淆上帝的创造。」

卡季科夫的论证将会成为帝国政府接下来几十年处理乌克兰问题的基础。他是第一个把语言、族群和民族统一性说成是和俄罗斯国家战略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他继续把东斯拉夫人之间的差异归咎于波兰人和其他外国势力的入侵，就像泛俄罗斯歷史叙事首创者乌斯迪亚洛夫那样，他也把族群和语言元素带进了讨论。然而，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把大俄罗斯人有别于小俄罗斯人—波戈金在一八五○年代和马克西莫维奇论战时则有这种意图，而是为了强调俄罗斯国家在语言、民族和文化上都是一个单一实体。

查禁乌克兰语出版品的俄罗斯书报审查官和卡季科夫之辈的评论家也根据国际大环境立论，指出德意志、法国和英国也面临着非官方语言和地方方言的挑战：在法国，这种挑战来自奥克语；在英国，这种挑战来自苏格兰塞尔特语和爱尔兰语。不过，这种比较只凸显出俄罗斯和西欧国家的政策有多么大相迳庭。英国和法国因为可以靠完备的学校系统推广官方语言，并没有对「敌对」语言採取严厉措施，反观俄国政府却是採取打压手段，「忘记」任何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的积极行动，比如在帝国全境的小学里发展俄罗斯语体制。当局宁愿维持便宜但一边倒的政策，最终导致自己在语言的战场上败北。

打压乌克兰语政策的第一次松动出现在一八七○年代初期，即瓦卢耶夫通报出现的十年后。如果严格执行，他的指令将会让俄罗斯境内的一切乌克兰语出版品绝迹，例如一八六八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当年全年只有一部乌克兰语的文本出版。但瓦卢耶夫在该年的去职让乌克兰语出版品得以东山再起。这个再起过程开始得很缓慢，但到了一八七四年，一年内即有三十二本出版品通过审查，只比一八六二年即通报出现的前一年少一本。随着瓦卢耶夫走人，书报审查官有更大权力可以决定一本乌克兰语着作是不是纯文学作品，是纯文学作品就可以出版，是通俗读物就不可以。学术着作因为不在这两个范畴之内，所以一律可以过关。另外，有些书报审查官在受到游说之后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单是游说不管用，通常再送点钱就会奏效，基辅的审查官普济列夫斯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八七○年代出版的所有乌克兰语着作中，有

一大部分就是由他审查。

亲乌克兰派于是变得愈来愈大胆，声称亲乌克兰运动的发展已经过了「幕间」休息时间。在新一轮的辩论中，亲乌克兰派一边的关键人物是年轻而雄心勃勃的歷史学家德拉加曼诺夫。他是基辅大学的古代史教授，一八七○年代初期曾到过欧洲研究自己的专业领域和欧陆的民族问题。看见有一些乌克兰语读物终于可以在帝国境内出版让他欢欣鼓舞，认为这是好兆头，表示亚歷山大二世的改革将会带来进一步的自由化。不过，不久之后，他就成为了新一波对亲乌克兰派攻击的靶子。

就像一八六三年那次一样，这次的攻击是受到卡季科夫的大力支持。一八七五年二月，他旗下的《俄罗斯先驱报》刊出「基辅斯拉夫慈善协会」负责人里格尔曼的一篇长文。里格尔曼把砲口对准德拉加曼诺夫最近在加利西亚发表的一篇文章，其标题为〈俄罗斯、大俄罗斯、乌克兰和加利西亚文学〉。文中，德拉加曼诺夫主张，随着普通俄罗斯文学语言和高级文化的发展，他们的大罗斯和小俄罗斯同行也应该得到发展，主要是为了提供对普通百姓的教育和文化之需要。从这种主张，里格尔曼就像猫嗅到鼠味一般，发现到了大做文章的机会。

里格尔曼指控德拉加曼诺夫放出的不过是烟雾弹，是为了让小俄罗斯继续发展出独立的语言和文化：「各位亲乌克兰派先生们，你们好关心你们的人民，好害怕他们无知，想要启蒙他们。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你们选择了一条迂迴曲折的路线：把它的方言打造为文学语言，创造出一整批可以让小俄罗斯人自外于六千万俄罗斯人民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你们想要在俄罗斯世界里面创建一种精神上的特殊主义。」205里格尔曼这样作结：「任何真正的俄罗斯人，还有任何对自身真正利益有任何理解的斯拉夫人，都应该拼尽全力对付你们。」

对付行动果真发生。一八七五年五月，即里格尔曼的文章发表的三个月之后，教育部副部长致信函给基辅学区的负责人，信中附有德拉加曼诺夫和里格尔曼两人文章的副本，要求他交出亲乌克兰派教授的名单。德拉加曼诺夫因此失去大学教职。但反对小俄罗斯人身分认同的基辅人—领军人物为教育官员尤泽福维奇—不以此为满足，希望获得更全面的胜利。尤泽福维奇直接写信给第三厅厅长波塔波夫将军。我们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因为目前这封信还没有被找到，但祕密警察首脑波塔波夫读后想必印象深刻，否则他不会把尤泽福维奇的担忧报告给沙皇。一八七五年八月，亚歷山大二世下令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亲乌克兰派的持续活动和乌克兰文学的出版情况。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波塔波夫、宗教事务管理总局局长、内政部长和教育部长，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尤泽福维奇本人。

特别委员会在一八七六年四月开始审议，认定亲乌克兰派的持续活动是对三位一体俄罗斯民族的一种攻击。委员会的报告包括以下一段话：

> 亲乌克兰派是朝什么最终目标努力非常明显：他们正在试图逐步把小俄罗斯分离出去，方法是把小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学分离出去。如果容许用乌克兰方言创作的大众文学存在，将会让分离主义者深信，乌克兰想要在未来脱离俄罗斯是有可能的，不管那一天有多么遥远。在目前，把乌克兰语提升为文学语言的冲动还是微弱冲动，但如果政府听之任之，那就没有理由不允许白罗斯方言做出相同的分离，可是白罗斯人就像小俄罗斯人一样，都是帝国的一个大族。乌克兰人、小俄罗斯人和住在西俄罗斯的白罗斯人……所构成的大政治体乃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该委员会的立场是本于卡季科夫在一八六三年最先提出的想法。这个立场包括把亲乌克兰运动同时说成是波兰人的阴谋和对俄罗斯统一性的威胁，会给白罗斯人起不良示范作用。卡季科夫的思考方式再一次在帝国政府里的自由派和实用主义者中间流行起来。因此，除了亲斯拉夫派活动家如波戈金，和民族主义报纸人如卡季科夫以外，几位关键性的部长也准备好挺身捍卫俄罗斯民族不可分割的统一性。

一八七六年五月十八日，正在德国埃姆斯温泉区度假的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特别委员会所起草的皇帝诏书，日后被称为「埃姆斯敕令」（Edict of Ems）。皇帝诏书一开始即表示，朝廷决心「让亲乌克兰派的活动划下休止符，因为这些活动对国家非常不利」206。它除了把瓦卢耶夫通报中的禁令永久化，又加入了一些新的禁令，包括禁止把任何乌克兰语出版品输入帝国，以及禁止乌克兰语的纯文学作品出版，被禁止出版的还有乌克兰语宗教读物、语法书和大众读物。这项措施是要全方位封杀乌克兰文学的发展。学校图书馆收藏的乌克兰语出版品一律被清空。这次被禁的不仅止于书面文字，还包括乌克兰语的戏剧表演、歌曲和诗歌朗诵，它们被认为「本质上都是亲乌克兰派立场的展现」。唯一例外是民族学的出版品，不过它们的乌克兰语都是採取俄罗斯语拼字法。

亚历山大二世又下令对亲乌克兰派进行镇压。德拉加曼诺夫和另一位亲乌克兰派领导人丘宾斯基被逐出乌克兰，帝国地理学会的基辅分会—其为基辅思想和文化活动的中心也是亲乌克兰派的温床，和《基辅电讯报》皆被查封。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得萨学区的负责人奉命监视学区内的教师，一发现有难以信任的亲乌克兰派分子就向当局报告。新的教职一律只许大俄罗斯人担任，小俄罗斯人只许在大俄罗斯的中学和大学

教书。这是一种对亲乌克兰运动和其潜在支持者的一次全面性进攻。德拉加曼诺夫和丘宾斯基受到的处罚不若圣西里尔与圣美多德兄弟会的成员那般严厉，但当局这一次的措施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系统化，涵盖范围也更大。它们不像一八四七年那样仅针对一小撮知识分子，也不像一八六三年那样只针对出版品，而是全面性禁止乌克兰人的文化表达，书面语和口语的表达同在被禁之列。

「埃姆斯敕令」只有一个目的：阻止乌克兰文化和政治运动的发展。它把打压、禁止和限制共冶于一炉，但不包含一个推广全俄罗斯语的积极计画，因此也没有任何俄罗斯语学校、出版品和社团获得特别资助，唯一例外的是在奥匈帝国加利西亚省首府利沃夫发行的《文字报》。政府表示准备「支持《文字报》，它是在加利西亚出版，一向与亲乌克兰派针锋相对。政府至少会固定提供它一笔小津贴—钱虽少，但没有这笔津贴，它将无以为继」207。皇帝诏书明白指出这项措施是为了反制波兰人的宣传攻势：「亲乌克兰派在加利西亚的喉舌《真理报》完全与俄罗斯的利益为敌，其出版很大程度是得到波兰人的协助。」

这笔相当于两千荷兰盾的津贴是出于尤泽福维奇的建议，经过沙皇批准后实行。这是歷来第一次，政府决定要资助帝国境外的亲俄罗斯派对亲乌克兰派进行斗争。加利西亚，又称为「红罗斯」，其主要人口自称为罗辛人（相当于今日英语的「鲁塞尼亚人」），在亲俄罗斯派眼中是俄罗斯人，更精确地说是小俄罗斯人。这种观点是自沙发利克的《斯拉夫民族志》俄语译本于一八四三年出版后开始扎根。波戈金毫无疑问就是抱持这种观点，他曾经到过加利西亚，和当地的亲俄罗斯派建立密切联繫，为他们的活动提供资金。由里格尔曼领导的斯拉夫慈善协会，特别是它的基辅分会，也做着相同的事，把一些主要来自私人的捐款挹注该地区。但在一八七六年的诏书以前，政府对这种事兴趣缺缺。

直到那时，加利西亚的发展仍被认为归帝国外交部负责，而俄罗斯的外交官一直建议上级不要牵涉入加利西亚的事务。一八六六年，即「埃姆斯敕令」发布前十年，当奥地利因为和普鲁士的「七星期战争」而焦头烂额时，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斯塔克尔伯格建议外交部长戈尔恰科夫亲王不接受分割奥地利和兼併加利西亚省的主张。后来在普奥战争中败北的哈布斯堡王朝被逼把他们的帝国改为双君主制，与匈牙利人分享权力，又让波兰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一起管理加利西亚省。从此加利西亚落入波兰人的实质控制，引起鲁塞尼亚人菁英的极大不满。

这时候，斯塔克尔伯格再一次建议政府採取谨慎态度。他反对发起一场捍卫鲁塞尼亚人的媒体战，以免引起「奥地利对鲁塞尼亚人的关注，如果像维也纳内阁对波兰主义的粗心容忍那样，也许他们就会像成

熟的果子那样自动掉落到我们手里」208。戈尔恰科夫亲王同意大使的见解。虽然帝国境内的亲斯拉夫派媒体站在鲁塞尼亚人一边反对波兰人，但政府还是袖手旁观。时间证明了斯塔克尔伯格的预言正确。随着哈布斯堡帝国变成双君主制，即奥地利人权力分享给匈牙利人，和一名波兰人被任命为总督代表维也纳统治加利西亚，鲁塞尼亚人菁英认为自己被出卖了，让他们改而心向俄国和认同于俄罗斯人的变化就几乎无可避免。

那个后来被称为亲莫斯科派或亲俄罗斯的运动于焉诞生。它的领导者之一是《文字报》主编季迪斯基，该杂志也成了亲俄罗斯运动的喉舌报。季迪斯基是维也纳大学毕业生，在大学师从米克洛西奇学习斯拉夫语言和文化，也是另一位着名斯拉夫主义者科皮塔尔的亲密同事（纳杰日金在一八四一年评论科皮塔尔一部作品时提出三位一体俄罗斯民族的构想）。最初，季迪斯基读过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艾涅伊达》之后大受乌克兰文学的吸引─我们记得，《艾涅伊达》是用乌克兰语撰写的第一部重要文学作品，不过，他后来又对普希金和果戈里的作品着迷，决定用俄罗斯方案来解决鲁塞尼亚人的身分认同问题，即把这些奥地利的《艾涅伊达》看作俄罗斯民族一员而非乌克兰民族一员。

一八七一年，在哈布斯堡帝国宪法改革还余波荡漾之际，另一位亲俄罗斯派成员多布里扬斯基为亲俄罗斯运动草拟了一篇政治纲领，得到这运动的领导机构「罗斯理事会」的採纳。在多布里扬斯基心目中，委员会所代表和自己为之代言的「罗斯民族」并非仅包含加利西亚的罗斯人，还涵盖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的鲁塞尼亚人，以及在奥地利巴尔干领土的一些鲁塞尼亚人定居点。多布里扬斯基坚决主张，奥匈帝国的鲁塞尼亚人不仅自成一个民族，且是更大的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三百万在奥地利权杖下生活的鲁塞尼亚人只是同一个俄罗斯民族─其中包含小俄罗斯人、白罗斯人和大俄罗斯人─的一部分。我们和他们分享着相同的歴史、相同的传统、相同的文学和相同的风俗习惯，也因此有着所有的特徵和条件和他们完全统合在一起。换言之，它有权突出自己真正的民族归属。」209

多布里扬斯基口口声声说自己忠于哈布斯堡帝国，反驳波兰人的指控：因被说是俄罗斯大国的成员，使鲁塞尼亚人对忠于哈布斯堡王朝产生怀疑。不过，多布里扬斯基把他的大部分辩论热情保留给鲁塞尼亚人，特别是那些迷了路投向乌克兰运动的人。在评论亲乌克兰运动的基础时，他这样说：「以当前形式呈现的乌克兰问题是奠基于哥萨克乌克兰从前的独立性，更多的论据来自小俄罗斯语的歴史悠久和小俄罗斯文学最近的取得独立。它的最终目标是乌克兰的独立建国。」210但多布

里扬斯基认为，亲乌克兰派的歷史论证和语言论证都有缺陷，而他们的政治纲领–加入一个泛斯拉夫联盟或完全独立–则会威胁到国际秩序。

波兰贵族一八六○年代晚期在加利西亚的得势，发生在哈布斯堡王朝打输普奥战争并跟加利西亚的前主人波兰达成协议之后，激起了亲俄罗斯派和亲乌克兰派的不同反应。亲俄罗斯派是把希望寄託在威力强大的俄罗斯沙皇，希望加入俄罗斯民族，反观亲乌克兰派则是把注意力转向发生在俄治乌克兰的亲乌克兰运动。亲乌克兰派不像季迪斯基和多布里扬斯基那样，自视为六千多万俄罗斯人的一部分，而是自视为为数一千五百万的乌克兰人一部分。如果说亲俄罗斯派服膺一个保守的社会方案，而且和教会密切结盟，那么，被称为民粹主义者的亲乌克兰派则是一些激进分子，追随者包括世俗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拒绝接受《文字报》所鼓吹的保守议程和它所使用的矫揉造作语言。他们希望鲁塞尼亚人的文学语言尽可能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语言，又认为它和乌克兰语同出一源。

一八六○年代晚期和一八七○年代初期是奥匈帝国境内亲乌克兰运动的制度化阶段。先是，亲乌克兰派在一八六八年创办了一个称为「启蒙」的文化学会，用它向农民传播他们那套鲁塞尼亚民族主义。然后，一八七三年，他们又成立了一个亲乌克兰派的文学会社（用舍甫琴科的名字命名）。创办文学会社的动议和使它成为可能的资金都来自乌克兰的聂伯河地区，其中一个金主是梅洛拉多维奇．斯多罗帕德斯卡，出身显赫哥萨克世家，祖先出过很多上校和盖特曼。俄治乌克兰境内的亲乌克兰派不仅出钱，还主导了加利西亚亲乌克兰派的思想观念。禁止在俄罗斯帝国境内出版乌克兰语作品的敕令让加利西亚成为亲乌克兰派作家和活动家的一个主要舞台。俄国的亲乌克兰派还帮助加利西亚的亲乌克兰派创办新刊物。例如，一八六七年创办的《真理报》就是库利什出的力，他是圣西里尔与圣美多德兄弟会成员和乌克兰文化復兴运动的主要人物。被放逐到俄罗斯帝国境外的德拉加曼诺夫是为《真理报》撰文的亲乌克兰派活动家之一。

尤泽福维奇和「埃姆斯敕令」的草拟者都很有理由担心《真理报》会影响加利西亚和乌克兰的政治和社会意见。他们努力动摇这份报纸的影响力和亲乌克兰运动在帝国边境两侧的发展，方法包括发布对乌克兰语出版品的新禁令和在加利西亚资助亲俄罗斯的报章。但事实证明这种努力并不成功。新的禁令只有让更多乌克兰作家把作品投给加利西亚的报刊，从而强化亲乌克兰派在加利西亚的吸引力。

沙皇在诏书里答应拨给《文字报》的津贴有多年时间都没能到达亲俄罗斯派手中，原因要不是官僚系统的无能就是因为贪污腐败。《文字

报》主编在一八七九年告诉沙皇，他从未见过说好要给他的津贴。一八八○年代，俄国政府恢復它对亲俄罗斯派的支持，但为时已晚。在奥地利的亲俄活动家发现来自政府的压力与日俱增：维也纳当局因为和俄罗斯的关系愈来愈紧绷，所以认为亲俄罗斯派的威胁比亲乌克兰派更加严重。

俄罗斯当局欢迎来自奥匈帝国的亲俄罗斯派难民（他们愈来愈成为维也纳的眼中钉），宁可他们远离右岸乌克兰这片是非之地。所以，他们大都落脚在西北省分和前波兰王国的霍尔姆地区。这些地区原是帝国境内最后的联合教会重镇，曾经因为地处偏远而躲过了谢马什科及其支持者的东正教热忱，直到一八七五年才和俄罗斯东正教「重新统一」。

来自加利西亚的亲俄罗斯派教士和神学院学生从小便是联合教会信徒，他们会改而皈依东正教，是因为渴望成为俄罗斯民族一员，而他们也有效地在那些被迫改教的农民中间推广俄罗斯人身分认同。在一八八一年霍尔姆主教教区的两百九十一位东正教教士中，有一百四十三位，即近半数来自加利西亚，本来是联合教会信徒。他们从帝国政府拿到的工资大大高于他们在加利西亚的时候，而这是另一个吸引他们离开加利西亚战场而加入「俄罗斯世界」一个波兰人省分的诱因。

愈来愈多来自加利西亚的亲俄罗斯派移民反映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俄罗斯帝国在争取这个奥地利省分归心的战争中节节败退。新冒出的赢家是加利西亚的亲乌克兰派，他们的力量因着俄罗斯当局打压乌克兰语和乌克兰文化而加强。帝国政府也有些人看出了这些政策的缺点，其中包括新任的内政部长洛里斯．梅利科夫。他是个自由派，一八八○年八月甫一上任就和其顾问们忙着准备完全废除或大大修改「埃姆斯敕令」，以减轻乌克兰文化活动和乌克兰语出版品所受到的压力。洛里斯．梅利科夫想要恢復乌克兰人对政府的信任。只要皇帝诏书继续生效，这个目的就不可能在乌克兰人的土地实现，因为敕令甚至不把在舞台上唱乌克兰语歌曲列为非法，这一点让很多本来完全效忠帝国的小俄罗斯菁英分子一样非常不满。

有些歷史学家把这种调和乌克兰民族主义和全俄罗斯统一性与日俱增紧张关系的努力称为一种苏格兰模式。这是因为，英国曾经放任苏格兰发展出自己的身分和文化认同，但照样巩固了苏格兰贵族对政府的效忠。在俄罗斯帝国，一个相似的解决方案将会把乌克兰人的身分认同和文化放入一个「三位一体俄罗斯民族」的架构中。其中的措施包括在小学里教授乌克兰语，容许小俄罗斯的文化和语言与「全俄罗斯」（事实上是大俄罗斯）的文化和语言并行发展，在帝国境内的乌克兰人省分建立一个双语的教育系统和双文化的公共领域。这种妥协性做法本来就是

一些亲乌克兰派的领军人物如科斯托马罗夫建议过，也曾经在一八七○年代和一八八○年代早期获得一些有改革精神的官员欣赏。

许多人都预期限制乌克兰语的政策很快会改辕易辙。但随着亚歷山大二世在一八八一年三月遇刺身亡，俄罗斯政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去不返的不仅止于俄罗斯社会会朝宪政改革移动这个夸张的期望，还包括另一个较为不夸张的期望：取消对乌克兰人语言和文化的打压。政府官员确实对「埃姆斯敕令」做出了修改建议，也得到了新沙皇的批准，但修改微乎其微。一八八一年十月八日，亚歷山大三世签署了一封皇帝诏书，批准在省长同意下上演乌克兰语戏剧，但禁止设立单独的乌克兰语剧院，规定每齣乌克兰语戏剧的演出都要伴随着一齣俄罗斯语戏剧。

此后，「埃姆斯敕令」的效力又维持了二十四年。打压政策的持续让加利西亚对俄罗斯的亲乌克兰派更有吸引力，也让加利西亚的亲乌克兰派完胜他们的亲俄罗斯派对手，即便帝国当局在一八八○年代后期对亲俄罗斯派採取资助政策一样于事无补。在帝国境内，全面打压的政策让亲乌克兰派和政府完全没有可以对话余地。接下来的几十年，在亲乌克兰派的协助下，乌克兰将会变成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温床。至此，小俄罗斯人愿意妥协的时代已经结束，随之结束的是把小俄罗斯纳入全俄罗斯文化和空间作为三位一体民族一员的希望。自此以后，小俄罗斯知识分子只剩下两个选项：要么成为「真正的俄罗斯人」，要么拥抱一种独立的乌克兰人身分认同。

197 Aleksei Miller, Ukrainskii vopros v politike vlastei i russkom obshchestvennom mnenii (vtoraia polovina XIX veka) (St. Petersburg, 2000), 241.

198 这里所谓的全俄罗斯语就是指大俄罗斯语。

199 同上，79.

200 同上，82-83.

201 同上，100.

202 Mikhail Katkov, Imperskoe slovo (Moscow, 2002), 146.

203 同上，144.

204 指「圣西里尔与圣美多德兄弟会」于一八四七年已被镇压，但现在又冒出多种类似该兄弟会的论调；古怪的字母指乌克兰语字母。

205 [Nikolai Rigel’man,] “Sovremennoe ukrainofl’stvo,” in Ukrainskii vopros v russkoi patrioticheskoi mysli, comp. A. Iu. Minakov (Moscow, 2016), 179, 184.

206 Miller, Ukrainskii vopros, 241.

207 同上，243.

208 同上，201.

209 Proekt politicheskoi programy dlia Rusi avstriiskoi (Lviv, 1871), 9-10.

210 同上，12-13.

第四篇　民族革命

第十章　人民之歌

那是一场大灾难和一个极坏的预兆。庆祝二十八岁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的活动最后演变成人踩人事件，造成近两千名男女老幼死亡。

事情发生在一八九六年五月十八日。据估计，当天共有五十万人聚集在莫斯科附近的霍登卡野地，庆祝新沙皇的登基。许多人是听说有面包、香肠和糖果可拿而被吸引。当官员开始分发礼物时，人群涌向商店，撞烂沿途一切，又踩在摔倒的人身上。会有那么多人摔倒，是因为野地遍布沟渠，全部盖上了木板，但木板承受不住压力而折断。年轻的新沙皇想要取消庆祝活动，但他的臣子坚称万万不可。大多数聚集在霍登卡野地的人不仅被免费餐饮吸引，还想拿到有双头鹰图案的纪念杯。这些杯子在庆典前夕被放在莫斯科的商店展示，因此众人对庆典期望甚殷。等所有尸体被抬走后，群众合唱〈天佑沙皇〉欢迎沙皇的驾临，这首歌后来被称为〈人民之歌〉。至于尼古拉二世，在这场意外中毫髮无伤。

但沙皇的威望却没能在八年半之后发生的另一次事件中全身而退。一九○五年一月九日星期天，近两万名圣彼得堡的工人和家属聚集在城郊，向沙皇的冬宫（今为冬宫博物馆）前进。他们唱着〈人民之歌〉，手上抬着东正教圣像和皇帝肖像。他们没有要求免费食物。游行队伍的领袖是东正教神父加邦，他准备好一份请愿书，上面写着：「陛下，我们是圣彼得堡的工人，带着我们无助的妻子、儿女和父母，要向您寻求正义和保护。」工厂工人希望得到公民权利、较高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和罢工的权利。他们还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请您拆除您和人民之间的墙，让他们和您一起治理国家。」211

政府以开火回应示威者的要求。就在这时候，远东地区传来了坏消息：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军队被蕞尔小国日本打败。俄军已在一月二日撤出旅顺港。这个消息让革命分子变得更大胆，而发生在冬宫门前的示威就是证明。当局决定不示弱，反而用武力驱散示威者，终止他们的「革命」。几十人被杀，数百人受伤。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血腥星期日」—粉碎了沙皇和他的人民之间被高度理想化的关系。加邦神父骂沙皇是畜牲，吆吁报復。俄国的第一场革命遂告爆发。

接下来几天，圣彼得堡工人发起罢工，并得到全帝国工人的响应。农民起而效法，拒绝向国家和地主缴交地租。一九○五年夏天发生在战舰「波坦金号」的兵变把动乱引入陆军和海军。一九○五年二月，尼古拉命令内政部长筹备「杜马」（Duma）第一个真正俄罗斯议会的前

身，但这个杜马的功能不在于立法，而仅是为沙皇提供意见。举行杜马选举的消息在八月公布，但社会仍然不满，动乱继续蔓延。一九○五年十月十七日，在全国工人继续罢工的压力下，尼古拉发表了宣言，答应给予人民基本公民权利和男性投票权，赋予杜马立法权，并保证不会推出未经杜马同意的新法条。

俄罗斯帝国在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和军人兵变的压力下进入了一个大众政治的新时代。议会制的诞生让沙皇的绝对权力受到挑战。帝国政府这一次得以在革命的浪潮下存活下来，但不能不改辕易辙，追求新的合法性根据。要找到这个根据，最明显的入手处莫过于民族政策的领域。在在看来，皇权都需要俄罗斯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后盾。

由工人罢工肇始的革命也唤醒了整个帝国的非俄罗斯人政治党派领导人的意识。一如往常，领风气之先的是波兰人。在前波兰王国地区，它在革命的前几十年成为了帝国的一大工业中心，工人发动罢工，随之而来的是帝国象徵符号的破坏。学生跟随工人罢工而罢课，要求恢復用波兰语教学。

保守的波兰贵族想要得到平等，特别想要成立自治政府。这种平等早已存在于帝国其他部分，独不见于波兰人占大宗的地区，这是因为帝国政府信不过波兰的上层社会阶级。思想更激进的领导人要求让前波兰王国地区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这是由德莫夫斯基领导的「波兰民族民主党」的纲领。他的主要政治对手是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其领导人毕苏斯基想要发动起义，取得完全独立。

在一九○四年二月，日俄战争的爆发曾带给波兰政治家推进他们目标的新机会。就在圣彼得堡与日本在为争夺满洲和朝鲜而厮杀的同时，帝国西境也变得愈来愈不安定。毕苏斯基前往日本寻求支持，一九○五年夏天，他的追随者在波兰的工业中心罗兹领导了一场工人起义。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下来，但让前波兰王国地区自治的观念却获得杜马中自由派议员的支持，也将会在一九○五至一九○七年的革命期间和之后成为重新构思俄罗斯民族问题的一大因素。

如果让波兰自治，那应该把它的边界划在哪里？这是很多俄罗斯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又特别引起过去几十年领导和支持俄罗斯化波兰人土地者的关注。不过，这次的问题核心不是右岸乌克兰或白罗斯西部，而是前波兰王国的霍尔姆地区，它构成了卢布林和谢德尔采两省的东部边区。该地区原属基辅罗斯所有，居民在十九世纪之后被视为小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不过，因为曾被波兰统治几百年，它对俄罗斯来说形同一个民族、宗教和文化上的化外之地。

引发霍尔姆危机和让它的名字接下来七年老是出现在报纸头条的事件发生在一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即东正教復活节的第一天。当天，沙皇为安抚社会愈来愈大的不满情绪，发布了一道谕旨，容许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它允许人民选择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不会有政治惩罚，正是这一点引起了霍尔姆地区的宗教动盪；三十年前，当局在该地区强迫数以十万计乌克兰裔的联合教会信徒皈依东正教。事态会如何发展是圣彼得堡政府官员意料中事。他们曾经预测，谕旨发出后，该地区会有十万到十五万名东正教徒，约为总数的三分之一，向圣彼得堡的东正教宗教事务管理总局说再见，改投罗马教皇的怀抱。这个预测被证明正确无误，因为根据近期的推算，当日的改教者正好介乎这两个预测数字之间。

虽然中央政府相信，为了顺应宗教宽容的时代潮流，付出这种代价乃是无可避免，但此举却让那些毕生奉献于推广东正教和俄罗斯人身分认同的地区官员和东正教神职人员感到被出卖。有这种感觉的人包括霍尔姆的俄罗斯裔东正教主教叶甫洛吉（本姓 Georgievsky），他在一封写给宗教事务管理总局局长波贝多诺斯采夫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挫折感：「我们这些教士的信用已经破产。三十年来，他们反覆告诉人民，霍尔姆－波德拉谢永远会属于东正教和俄罗斯人，但完完全全相反地，现在大家却看到，这地方已被东正教徒和俄罗斯人的敌人恣意接管。」212

信寄出之后不久，叶甫洛吉和其支持者便前往圣彼得堡会见波贝多诺斯采夫，商量如何处理俄罗斯利益在霍尔姆受到威胁的问题。他们想要重绘帝国省分的边界，把霍尔姆从前波兰王国地区分割开来。在他们的设想中，新成立的霍尔姆省将会以「俄罗斯人」为核心，即包含三十万名乌克兰人—这些人在一八九七年的普查中表示自己的母语是小俄罗斯语。内政部的官员为这个行政区划的变革忙得鸡飞狗跳。法案最终被送到杜马，却引发极大争论，直至一九一二年才定案，期间动员了议会内外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

对霍尔姆的辩论把亲乌克兰派和主张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人拉在了一起，共同为反对波兰人的势力而战。但他们的结盟是为情势所逼，合作范围只限于这单一事项。在几乎其他所有事情上，亲乌克兰派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都是在为他们双方都认为是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语言问题一直是亲乌克兰派的核心关注议程。一九○四年十二月，随着对日战争的形势转坏和社会不满情绪急剧上升，帝国政府同意重新检讨「埃姆斯敕令」。检讨会议的讨论重点再一次放在那部《四福音》的译本，但这一次气氛截然不同。帝国科学院的院长康斯坦丁诺

维奇大公贊成废除禁令，让乌克兰语新约圣经出版。

一九○五年三月，科学院的一个委员会又讨论了是否应该解除对乌克兰语出版品的禁令。这个讨论是应政府的要求召开，也徵求了基辅大学、哈尔科夫大学和敖得萨大学的意见。四家学术机构都建议解禁，其中科学院的措词尤其强烈。科学院于一九○五年四月发出一份由语文学家沙赫马托夫和科尔什所研拟并得到许多自由派院士联名签署的备忘录，不仅建议废除禁令，还为承认乌克兰语为一种独立语言开了大门。

科学院备忘录的两位执笔者没有明说乌克兰语是一种独立语言，但说理方式让人一眼看出他们认为乌克兰语和俄罗斯语是平起平坐。他们达到这种效果的方法是丢弃一种「全俄罗斯语言」的观念。备忘录声称，拜俄罗斯作家努力把他们的文学语言拉近白话之赐，「到了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全俄罗斯文学语言已经充分地大俄罗斯语化，所以，我们的文学语言，包括受教育阶层的语言和各式各样的书面语在内，都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充分发展的大俄罗斯语」。除使用歷史论证和语言学论证外，该备忘录的执笔者还採取了政治论证。「当一个国家不知道如何保障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即用母语说写的权利，就不仅无法在公民心中唤起尊敬和爱的感觉，还会让他们为自己的生存感到无以名之的恐惧。这种恐惧又会引生不满情绪和革命愿望。」213这番话出现的时间点恰到好处：政府因为被几个月前爆发的革命吓呆，已经准备好聆听人民的声音。

这份一九○五年四月发出的备忘录印数有限（仅供政府内部参考），但随即对帝国内部和边界之外的政治争论发生重大影响。禁止乌克兰语出版品的禁令在一九○五年二月开始解除，首先获准出版的是乌克兰语宗教典籍，这是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推动的。然后，到了一九○六年春天，随着一套新的审查法规颁布，对乌克兰语出版品的全部禁令一律解除。但这种解禁只是手续上的，因为对乌克兰语报章的禁令业已在一九○五年十月废除，同一个月，沙皇颁布谕旨，授予人民基本公民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到了该年年底，三份乌克兰语报纸在帝国境内出版，在基辅一份，波尔塔瓦省两份。

新政策的受益人是白罗斯的活动家。一九○六年九月，第一份白罗斯语日报《咱们的命运》在维尔纽斯发行，但不久就因为太过左倾被关闭。取而代之的是一九○六年十一月创办的《咱们的田》。这报纸立场较温和，将会持续发行至一九一五年，期间造就了一批新的白罗斯语文学经典，有助于白罗斯语文学的普及。在一九○六至一九一五年之间，白罗斯语书籍的出版数量从几乎是零增加到八十本，印数累计二十二万册。

虽然这些数字显示白罗斯语言和文学的发展有了突破，但与帝国境内其他语言出版品的情况相比，仍旧非常没有看头。例如，光是一九一一年当年，俄罗斯语书籍就有两万五千五百二十六本、波兰语书籍一千六百六十四本、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书籍九百六十五本。乌克兰语书籍以两百四十二本位居第四位。白罗斯人因为从来没有为他们语言受到的歧视发起过够长期的斗争，所以只能在出版品数量上远远落后。

一间印行乌克兰语和白罗斯语作品的印刷厂恰好和俄罗斯帝国第一个议会同时出现。在一九○六年第一届杜马选举中，帝国的乌克兰人省分选出了六十二位代表，其中四十四人结成联盟，相约在议会中以促进乌克兰人的政治和文化利益为目标。白罗斯人议员企图做一样的事。对此，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报人和俄罗斯民族主义领导人之一的缅希科夫写道：「这些白罗斯人受到愚蠢传染，竟然想要仿效乌瓜，也在杜马弄一个自己的『小圈子』。由此可见，一样有白罗斯分离主义者存在。这种事足以让一只猫笑出来……」214一票白罗斯人议员最终谈不拢，无法组成党团，各人按照自己的政治倾向行事：要么支持其他党派鼓吹的自由主义法案，要么支持俄罗斯民族主义法案。

杜马的乌克兰议程大都是由格鲁舍夫斯基推动，他是利沃夫大学歷史教授和加利西亚亲乌克兰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毕业于基辅大学的他密切关注俄治乌克兰的政治和文化发展，但拒绝放弃俄罗斯公民身分。他在一九○六年春天抵达圣彼得堡主编《乌克兰先驱报》，作为乌克兰党团的喉舌。《乌克兰先驱报》以俄文出版，不仅因为俄罗斯语是党团大多数成员的日用语言，也因为有需要在俄罗斯人或讲俄罗斯语的议员和公众中把乌克兰人的观点和政治目标传播出去。当杜马在一九○六年五月开始审议法案时，格鲁舍夫斯基制定的乌克兰运动纲领已经不仅追求以乌克兰语作为教学语言，还追求乌克兰的领土自治。

乌克兰独立的想法早在十九世纪末叶已经在奥地利统治的加利西亚获得支持，而到了一九○○年，这个观念也被短命的「乌克兰革命党」引入乌克兰。但格鲁舍夫斯基和主流的乌克兰领导人追求的并非独立，而仅是自治。格鲁舍夫斯基认为，乌克兰的需要仅透过帝国的结构调整便能获得满足。他把乌克兰领土自治问题放在「解放俄罗斯」这个更大的架构之内，致力于把俄罗斯帝国转化为君主立宪国家。对格鲁舍夫斯基来说，乌克兰问题不是俄罗斯族群问题的一部分（他举出的帝国科学院主张并不存在一种「全俄罗斯语」作为政治论证），而是帝国民族问题的一个面向，重要性不亚于波兰问题和芬兰问题—波兰人和芬兰人的领袖都要求更大自治权，因此该用同一种方法解决。

不令人意外，格鲁舍夫斯基的主张得到杜马其他非俄罗斯人地区代

表的同情。因此，杜马里的乌克兰人议员和这些人组成了「自治联邦主义者联盟」。那是一个大杂烩，成员既有俄罗斯哥萨克的自治主义者—他们要求不以民族为基础的地方自治权，也有非俄罗斯人的联邦主义者—他们想要在俄罗斯帝国的架构内建立一个诸民族的联邦。波兰人议员在自己的圈子里组织起来为前波兰王国地区恢復自治请命，格鲁舍夫斯基准备跟进，起草了一个让乌克兰自治的提案，却无法提出，因为帝国当局在一九○六年七月八日解散第一届杜马—从其开议到被解散，寿命仅仅七十二天。

沙皇认为一票议员的观念和行动非常有破坏性。他在解散杜马的宣言中说：「这些国家的代表不思投入制定有益的法案，反而闯入他们能力所不及的领域，搞一些让地方自治的法案，又对基本法215的不完备指指点点—要知道，这些法律只有皇帝的意志可以修改。」216乌克兰人议员在短命的第二届杜马（一九○七年二月至六月）成功组成四十七人的党团，再次高嗯乌克兰自治的口号。但第二届杜马旋即被解散—沙皇对这二届杜马的不喜欢尤甚于第一届，接着选举法受到更改。新的选举法对大地主有利，让亲乌克兰派的代表难以当选，因为他们的支持者往往是农民。

第三届杜马（一九○七至一九一二年）和第四届杜马（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七年）都没有乌克兰党团。这不仅让乌克兰自治的计画胎死腹中，也让把乌克兰语引入公共领域这个温和得多的企图幻灭。一九○八年，一个主张把乌克兰语引入学校的提案受到大多数票否决，另一个主张在法庭上使用乌克兰语的提案亦在一九○九年被否决。亲乌克兰派的领导人别无他法，只好选择和其他政党合作，以保住他们在革命时期取得的成果为优先目标。他们把主要希望寄託在「立宪民主党」217，这是一个自由派政党，代表的是俄罗斯人中的都市知识分子。

立宪民主党获得帝国西境的波兰裔和犹太裔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也是杜马中唯一不否定少数民族自治愿景的政党。这个政党在乌克兰人各省大受欢迎，很多亲乌克兰人的活动家都加入其阵营，但该党一九○五年发表于基辅的党纲，并没有提及乌克兰问题或乌克兰人问题。立宪民主党准备好要採纳波兰人和芬兰人的自治憧憬，却疏远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的类似憧憬。

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陆续发表的一批文章中，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的司徒卢威表达了他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许多人相信，这也是其党团的立场）。他的第一次表态是在一九一一年一月，目的是回应敖得萨人和犹太復国主义者亚博廷斯基的一个主张：后者在文章中质疑司徒卢威把俄罗斯帝国当成一个俄罗斯人的民族国家，认为有鑑于大俄罗斯

人在全国人口中仅占百分之四十三，俄罗斯帝国只能算是个多民族的帝国。司徒卢威不同意此说，指出民族国家的关键不在于民族而在于文化，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也属于大俄罗斯人阵营。在司徒卢威看来，俄罗斯就像美国和英国，是个还在打造中的国家。他心目中的俄罗斯民族不是由民族性统合起来而是由文化—俄罗斯文化。他坚称，俄罗斯文化不是大俄罗斯文化，而是全俄罗斯文化，因此除了大俄罗斯人以外，小俄罗斯人和白罗斯人亦是其核心成员。

乌克兰人活动家曾经欢迎帝国科学院否定有一种全俄罗斯语存在的主张，但他们发现司徒卢威有一种全俄罗斯文化存在的主张，对他们打造自己民族的目标构成更难以克服的障碍。一九一一年五月，知名乌克兰律师基斯佳科夫斯基在司徒卢威主编的杂志《俄罗斯思想》为文反对司徒卢威的见解，论证乌克兰的语言和文化皆独树一格。司徒卢威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以一篇长文回覆，内容很有揭露性。他写道：「我深信，在全俄罗斯文化和语言面前，小俄罗斯或乌克兰文化是一种地方或外省文化。『小俄罗斯』文化和『小俄罗斯』语的这种地位是由俄罗斯歷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决定，不可能改变，除非由歷史形塑而成的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彻底瓦解。」他进一步认定，硬要改变这种局面后果堪虞：「如果知识分子相信的『乌克兰人』观念在普罗大众头脑里生根，将会对俄罗斯民族构成威胁，导致闻所未闻的分裂。」218

虽然司徒卢威提出这种警告，但不认为那样的情况有可能发生。在司徒卢威认定的理想境界中，帝国文化由两个层次构成，较高层次是使用「全俄罗斯语」，较低层次则是由地方语言包括小俄罗斯语提供服务。他相信，在乌克兰和白罗斯文化的两种可能运作方式中，一种是以作为地方文化运作，一种是以作为充分发展的高级文化运作，第一个选项更实际。他坚称，乌克兰和白罗斯的高级文化还没有发展起来。在这样的情形下，它们的语言可用于作为提供群众初步教育的手段，但他们想要得到高级文化的浸润，便只有接受靠俄罗斯语作为媒介的高阶教育。

这种主张等于倒退回到十年前的「埃姆斯敕令」，那时德拉加曼诺夫认为乌克兰语在帝国教育系统的功能是作为俄罗斯语的辅助。司徒卢威也乐于把自己的一些论证表现为德拉加曼诺夫思路的推论。只不过，乌克兰人活动家会愿意让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处于从属地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埃姆斯敕令」已经不再生效，而司徒卢威的立场也很快便为立宪民主党制造出难题，因为这个政党非常仰赖亲乌克兰派活动家的支持。所以，党本部与司徒卢威的「全俄罗斯文化」概念划清界线，声称该主张仅代表他的个人意见。

立宪民主党对乌克兰问题的党版路线是由党魁─着名歷史学家米留科夫─拍板定案。一九一二年，在为第四届杜马选举做准备时，他前往基辅会见亲乌克兰人领袖，包括格鲁舍夫斯基，讨论双方结盟的事宜。这次会面中，米留科夫保证立宪民主党将会支持文化自治的原则：即支持各民族都有权利发展自己文化，用自己的语言和国家打交道。这意味着，立宪民主党支持在教育和司法系统引入乌克兰语。格鲁舍夫斯基方面则是向米留科夫保证，乌克兰运动并非以分离主义为目标：「我们不是以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愿景作为指导原则，不认为乌克兰民族有朝一日会升格为主权。」219不过，他没有在领土自治和联邦主义的议题上让步，指出乌克兰活动家的目标「是按照联邦主义的基础重构一切」。他告诉米留科夫，这是他们未来的目标。

就这样，文化自治成为了双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能够共事的平台。它是格鲁舍夫斯基及其支持者的近期目标，也是米留科夫对乌克兰人民族愿景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作为双方这种合作的象徵，米留科夫一九一四年二月在杜马发表演讲，抗议政府禁止基辅举行庆祝舍甫琴科百岁冥诞的活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阶段，立宪民主党和乌克兰活动家的主要政治对手是君主主义者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这两批人有力主宰了第三届和第四届的杜马。在西部省分，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最初会被动员起来，是为了遏阻波兰地主阶级对当局的威胁。进入二十世纪之交，当局虽然在帝国西境大力推行政治和文化的俄罗斯化，但该地区的真正主人仍是波兰地主。他们的影响力充分显现在第一届杜马的选举结果：他们当选议员的人数明显比他们所有票数加起来所能够支持的多，反观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推出的候选人则在波兰人和自由派的联手下被封杀。

正是为防止波兰贵族利用新的选举制度在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中得利，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发起了自己的竞选攻势。他们面对的难题除了波兰菁英阶层传统的高投票率外─有些人会专程远从巴黎回国投票，还有选举法有利于大地主的现实。小地主─主要是乌克兰农民─只有把选票联合起来才可望突围。所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想要压倒波兰地主，必须走入农民中间，把农民组织起来。他们很快就找到可资依赖的下层结构和组织基础：一直和在地天主教竞争的东正教会，再来是地区内得到教会和政府支持的众多民族主义组织。

在一九○五年革命期间应运而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组织中，最热门的一个是「俄罗斯人民联盟」。该联盟在莫斯科举办第一次集会时，吸引到近两万人参加。一九○五年十二月，尼古拉接见联盟的代表团，对他们的活动给予祝福。打着现代民族主义的旗号和靠着当局的撑腰，俄

罗斯人民联盟在动员民众支持君主制一事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根据联盟的章程，祖国的安康有赖于「坚定地维持东正教、无限制的俄罗斯式专制和民族的生活方式」220。换言之，乌瓦罗夫在一八三○年代制定的公式─君主专制、东正教和民族性的三位一体─復活了，而且这一次受其鼓动的除了帝国官僚，还有贩夫走卒。

俄罗斯人民联盟所代表的俄罗斯不仅限于大俄罗斯。它在章程中指出：「本联盟对大俄罗斯人、白罗斯人和小俄罗斯人一视同仁。」事实上，西部省分特别是乌克兰还成了联盟的主要行动基地。其最大的分支位于乌克兰人省分沃里尼亚，集中在波恰耶夫修道院。据一九○七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该联盟在沃里尼亚有超过一千个支部，成员超过十万人。如果这份由总督汇整的报告可信，就表示光是沃里尼亚一省，就涵盖了该联盟四分之一的成员。人数规模紧追在后的是其他右岸乌克兰的省分，特别是基辅省。

西部省分这种盛况归功于每个支部都是由东正教教士所组织和领导。在教士的鼓动下，堂区教民纷纷加入联盟。一份警察厅的报告把沃里尼亚的情况描绘如下：「其成员都是当地东正教堂区教民，很多都是半文盲，甚至有完全不识字的，所以不可能是自动自发。联盟地方支部的主持人大都是从堂区教士选出，他们为了强化俄罗斯的基础而把爱国情感灌输给农民。」221

把宗教忠诚转化为爱国忠诚和灌输一种「全俄罗斯人」身分认同只是俄罗斯人民联盟在西部省分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根植于农民日益强烈的社会和经济需求。在沃里尼亚和波多利亚，每个农民拥有的土地平均只有三点六公顷，反观南方各省的平均土地占有率却是十六公顷。对土地的飢渴驱使很多农民离乡背井，往帝国的东部另谋发展。但留下来的那些却准备好被动员起来，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发声，而俄罗斯人民联盟提供他们一个现成框架。

东正教教士和联盟的宣传士把农民的苦恼归咎于波兰地主和作为农产品中盘商的犹太人。警察厅的调查报告指出，联盟分子「在农民中间散播对所有非俄罗斯人和地主的敌意，让农民觉得有必要参加联盟，相信唯有它可以实现他们的各种美梦：包括强行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他们，让他们摆脱所有对政府的依赖，等等」。222

农民显然把联盟的支部看成真正可以代表他们利益的机构，因为他们曾多次拒绝服从政府官员的命令，表示只接受联盟领导人的指挥。联盟这种蜕变为土地革命工具的现象引起当局忧虑，因为对当局来说，维持边界省分的秩序与稳定比动员群众支持君主制更加重要。因此，各省

的警察厅得到命令，必要时得关闭俄罗斯人民联盟的支部。

俄罗斯人民联盟象徵君主制和农民的结合，仰赖的黏合剂是仇外心理、反犹太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但这个成立于一九○五年革命期间的组织不到几年便开始瓦解。癥结是土地问题。俄罗斯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往往是大地主，希望当局从地主购买土地，分配给农民，但政府却苦于资金不足，无法照办。于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土地问题上变得一筹莫展。在一个以农民为大宗的国家，这点对那些想要把忠君感情转化为民族感情的人构成了重大障碍。多年以后，「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最极端一个分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在回顾时指出，俄罗斯民族主义组织的活动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好处：「黑色百人团223之类的政治组织让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而那些被鼓动起来的农民首先是按黑色百人团所要求的要求，继而是要求得到地主的所有土地。」224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在西部省分面对的敌人除了波兰人和犹太人，还有乌克兰运动的推手，他们的力量在一九○五年革命中获得大增。一九○七年，由语言学家弗罗伦斯基和布季洛维奇执笔，反对承认乌克兰语为独立语言的阵营人出版了一批小册子，设法证明乌克兰语不过是全俄罗斯语的一支。论战在一九一一年随着首相斯托雷平在基辅遇刺身亡而白热化。当时第四届杜马选举在即，而司徒卢威也是在这一年开始对乌克兰问题发表意见。不过，立宪民主党的主要领袖却注意到，乌克兰运动在乌克兰人省分的都市知识分子中愈来愈受欢迎。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基辅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俱乐部召开会议，这是帝国内同类型俱乐部中最大的一个。讨论应该怎样看待小俄罗斯人的民间传说、传统和爱乡情怀的问题。这个问题相当棘手，因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会在乌克兰产生，正是为了反制一八四○年代出现的乌克兰／小俄罗斯文化觉醒。辩论表明，基辅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不准备放弃自身的政治、文化甚至语言传统。俱乐部领导人之一的萨文科宣称，他对乌克兰的爱是他的小俄罗斯人身分认同的一部分。他写道：「我是小俄罗斯人，有关小俄罗斯人的一切我都不陌生225。我热爱我的乡土，即热爱乌克兰，本质上是个旧意义下的亲乌克兰派。乌克兰的个性，她的歷史、语言和日常生活是我所一往情深。」226他在论述的最后引用舍甫琴科的话作结。

既然基辅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继续对乌克兰款款情深，那他们对乌克兰运动的领导人又是什么看法？他们称后者为「分离主义者」，又愈来愈称之为「马泽帕主义者」—马泽帕是一七○八年起而反抗彼得一世、投入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阵营的哥萨克盖特曼。帝国当局曾在一九○九年大肆庆祝波尔塔瓦大捷227两百週年纪念，目的是让大众记取马泽帕

和十八世纪分离主义的下场。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阶段，乌克兰政治领袖都认为他们要争取的不是民族独立，而是乌克兰人在帝国内的自治。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理论家看得更透彻。萨文科写道：「马泽帕主义者清楚意识到，倘若小俄罗斯人作为完全独立民族的概念深入人心，那么不可避免的歷史演化将会把余下的工作给完成。」228 在他看来，后果也许是一次俄罗斯民族的分裂和一场摧毁帝国的兄弟阋墙战争。

虽然认定乌克兰运动是对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重大威胁，但俄罗斯民族主义领导人又认为它成不了气候：争取乌克兰自治的想法只存在于学生和知识分子之间，受其感染的普罗大众特别是农民不多。为扭转这种局面，乌克兰活动家从一九○五年起走入农村，仿照加利西亚的模式创建了「启蒙」之类的文化会社，对农民展开社会主义宣传攻势。他们还为农民创办乌克兰语报章。但随着一九○七年革命的活跃阶段结束，乌克兰活动家的影响力受到政府严重遏制，而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席捲乡村，受欢迎程度是非俄罗斯人党派可梦不可求。

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让非俄罗斯人的活动家兴起热望，而他们大部分人都认为，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是不可分离的议题。在乌克兰和白罗斯的情况中，激进的社会要求和民族愿景齐头并进，因为这两个运动中较年轻的活动家都是秉持社会主义观点。他们的对手利用这个事实来诋毁乌克兰活动家，促使当局查封了第一份白罗斯语报纸。但革命的后续效应让乌克兰人能够透过杜马运作，利用议会选举活动动员支持者，高举自治和联邦主义的旗帜，创办杂志和报纸，在西部省分的知识分子中间传播自己的观念。

但乌克兰和白罗斯活动家，尤其是后者，从俄罗斯主流政党得到的同情和支持并不多。就连属于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他们是最同情非俄罗斯人愿景的俄罗斯人政党，一样在「俄罗斯问题」上产生分裂：一边是司徒卢威一派，另一边是实用主义取向的米留科夫一派。司徒卢威因为憧憬把俄罗斯帝国转化为一个「正常」欧洲国家，必须把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留在文化意义上的「俄罗斯民族」里。米留科夫则选择了一个公民模式的俄罗斯民族，愿意为非俄罗斯文化的发展留出足够空间。但即便是米留科夫一派，对于乌克兰运动的主要战略目标–把乌克兰语引入教育系统，也顶多是给予象徵性支持。杜马从未通过允许乌克兰人各省使用乌克兰语教学的法案。

及至一九一四年，君主制看似已安渡革命，能够把自身调整得适应新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向君主立宪制的过渡业已开始，一个议会业已成立，而朝廷也找到了一个只让大体忠于它的人当选议员的方法。透过对

非俄罗斯民族做出若干文化让步，朝廷重新把这些民族置于掌控之中，而在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奔走下，沙皇在大部分子民心目中也变得前所未有地德隆望尊。容许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用自己的语言出版书报的政策并没有如过去所一直担心的那样，引起帝国东斯拉夫核心229的分裂。民众贊同俄罗斯国家暨民族不可分割的态度热烈如昔，甚至在传统上麻烦多多的西部省分一样有更多人是这种态度。

在在看来，如果说一九一四年八月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会为俄罗斯帝国带来任何改变，那就是强化它虚拟的民族统一性，为它把国土扩张至原有边界之外创造出条件。

211 Khrestomatiia po istorii SSSR, ed. Yurii Korablev (Moscow, 1988), 42.

212 Theodore Weeks, Nation and State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Nationalism and Russifcation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DeKalb, IL, 1996), 180.

213 Zaborona ukraïns’koho slova v Rossiï, introduction by Mykhailo Hrushevs’kyi (Scranton, PA, 1916), 33, 43.

214 D. Kotsiubinskii, Russkii natsionalizm v nachale XX veka: Rozhdenie i gibel’ ideologii Vserosiiskogo natsional’nogo soiuza (Moscow, 2001), 310.

215 基本法是一九○六年五月颁布的国家基本大法，类似宪法。

216 Primary Sources in Russian History 1801-1917, ed. John Etty (Corby, UK, 2009), 77.

217 立宪民主党（Constitutional Democrats）成立于一九○五年十月，成员为中产阶级，歷史学家米留科夫和思想家司徒卢威属之。主张君主立宪、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土地转让给农民，由政府补偿地主的损失。

218 Petr Struve, “Obscherusskaia kul’tura i ukrainskii partikuliarizm: Otvet ukraintsu,” Russkaya mysl’, no. 1 (1912): 66.

219 S. Breiar, “Partiia kadetov i ukrainskii vopros, 1905-1917,” in Issledovaniia po istorii Ukrainy i Belorussii, vyp. 1 (Moscow, 1995), 89-110.

220 Rossiia, 1900-1917: Dokumenty, materialy, kommentarii, ed. I. K. Kir’ianov (Perm, Russia, 1991), 130.

221 I. V. Omelianchuk, “Chislennost’ Soiuza russkogo naroda v 1907-1914 godakh v pravoberezhnykh ukrainskikh guberniiakh,” in Belorussiia i Ukraina (Moscow, 2006), 156.

222 同上，159.

223 黑色百人团（Black Hundred）是一个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组织。

224 Politburo TsK RKP(b)—VKP(b) i Kommintern, 1919-1943 (Moscow, 2004), 64.

225 此句话改自罗马共和时期作家泰伦提乌斯说过：「我是人，有关人的一切我都不陌生。」

226 Kotsiubinskii, Russkii natsionalizm, 303-304.

227 一七○九年的波尔塔瓦战役是彼得一世击败查理十二世决定性的一战。

228 同上，305.

229 指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这三支构成帝国核心的东斯拉夫人。

第十一章　君主制的垮台

一九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签署一道诏书，把首都圣彼得堡更名为彼得格勒（原名称是彼得大帝所取），让这个城市的名字从纪念一位圣徒改为纪念它的创建者。更重要的是，用俄文的「格勒」（grad）取代德文的「堡」（burg）标志着俄罗斯想要切断它和中欧的密切连结。一个逐渐疏远西方的过程于焉展开，它将会在一九二○年代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时彼得格勒再次更名为列宁格勒，并在下一个十年史达林主政期间达于高峰。

这个更名之举发生在俄国对德奥宣战的几天后，是受泉涌的爱国热情所驱使。沙皇没有和几个主要部长商量太多便做出决定，更多是为了回应群众而非内阁的期望。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俄罗斯首次和一个西方强权发生军事冲突。类似的事情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屡见不鲜，只不过那时候没有人想过要给首都重新命名。时代正在发生变化。在不久前重划的边界线两侧，民族主义情绪都大为高涨，而最能满足民族主义胃口的莫过于战争。俄国人相信这场战争必然是速战速决，以胜利收场，给首都更名之举并非临时起意，却也引起了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热烈欢腾。当时一份报纸这样说：「一件伟大的歷史事件发生了：两百多年来被称为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帝国首都因为一纸诏书而更名为彼得格勒。在这个对日耳曼主义斗争的伟大时代里，最美好的亲斯拉夫派梦想获得了实现。」230

几星期前的八月二日，数以万计公民涌入冬宫前的广场。九年前的一九○五年革命就是在该广场点燃，但这一次，群众并不是前来抗议和要求什么，而是为了表现爱国热情和忠君心迹。世界知名的俄国歌剧演唱家夏里亚宾带领群众合唱〈天佑沙皇〉。当尼古拉二世出现在阳台时，群众跪了下来。他把前一天向奥地利宣战的诏书读了一遍，解释说政府此举是为了回应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攻击。宣战诏书上称：「忠于自己的歷史使命，俄罗斯从不曾弃同一信仰与血脉的其他斯拉夫人的命运而不顾。」231沙皇继而解释，随着德国对俄国宣战，事情攸关的已经不仅止于斯拉夫人的团结一致。「我们（WE）坚定不移地相信，」他说，「我们所有的（all OUR）忠诚子民都会和谐和无私地起而为保卫俄罗斯土地而战。让我们在这个接受考验的可怕时刻忘掉内部纷争。愿沙皇及其子民的团结比从前任何时候更加强固。」

他不是把战争说成欧洲两个帝国之间的斗争，而是说成俄罗斯人和他们领导的斯拉夫世界对日耳曼民族的角力。冬宫殿前的群众高举着横

幅和沙皇画像，位于最中央的两面横幅一面写着「俄罗斯和整个斯拉夫国度胜利」，另一面写着「解放喀尔巴阡罗斯」。虽然俄罗斯帝国打着泛斯拉夫的旗号对德奥宣战，但俄罗斯问题从一开始便深深被捲入其中。战争最直接的目标之一是要把基辅罗斯最后尚未收復的祖产纳入沙皇的长臂之下，也就是收復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232—在俄罗斯的官方术语里，它们被统称「喀尔巴阡罗斯」。收復这些土地将会完成「俄罗斯」全域重归统一。

八月十七日，俄军越过德俄边界，进入东普鲁士。官方宣传集中在强调俄国有必要粉碎野心勃勃的条顿武力。次日，俄罗斯指挥官亦率领军队，越过奥地利边境，号称此举是为了解放长期以来遭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俄罗斯人」。发生在战线南区的战争被说成是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俄罗斯问题，让所有俄罗斯人重归沙皇怀抱。它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让当局可以粉碎崛起中的乌克兰和白罗斯民族运动，确保「俄罗斯民族」的完全统一。

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在战争头几个月空前高涨，让俄罗斯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对战争期望更殷。他们长久以来都力挺加利西亚的亲俄罗斯派，又不遗余力斗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给他们贴上俄罗斯民族叛徒的标籤。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日子终于到来。

一九一四年八月入侵加利西亚前夕，俄军总司令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在宣言中把这次行动说成是为解放长期受苦的一支俄罗斯人：「父老兄弟们，上帝的审判已经降临到我们！抱着基督徒的谦卑心态，俄罗斯人几个世纪以来默默在外国枷锁下承受折磨。但不管是甜言蜜语或迫害都没能折断他们对自由的盼望。就像一条等不及要与大海匯合而冲破沿途岩石的溪流，没有力量能够阻止俄罗斯人追求统一的决心。让世界上再没有『受宰制的罗斯』。」233这个宣言还用了更传统和更歷史的论据合理化俄罗斯的入侵：「愿圣弗拉基米尔的国度，愿雅罗斯拉夫．奥斯莫梅斯尔、丹尼尔亲王、罗曼亲王的土地234，摆脱枷锁，高举伟大、单一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的旗帜。」最后，宣言呶吁哈布斯堡王朝的乌克兰子民，为俄罗斯帝国的光明未来，起而反抗他们的政府。「长期受苦的罗斯兄弟们，起而欢迎俄罗斯军队吧。被解放的俄罗斯兄弟们，你们将会在母亲俄罗斯的胸脯上找到一个位置！」

「重新统一」是宣传机关在战争初期主打的口号，被用来凝聚帝国境内的民心和鼓动国外的「俄罗斯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235。如果说奥地利官员当初不确定俄罗斯会不会在将临的战争中打亲俄罗斯牌，那么现在他们再无疑议。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宣言让他们有充分理由可以围捕和拘留亲俄罗斯派分子。

在战争的头几星期，数以千计被指为亲俄罗斯派的人—包括知识分子、教士和村干部，被送往施蒂里亚的露天拘留营塔勒尔霍夫。在它的两万囚犯中，有大约三千人将会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许多被送入塔勒尔霍夫或另一个奥地利拘留营泰雷津的人事实上不是亲俄罗斯派，而是亲乌克兰派。这是因为，很多居心不良的人都利用战争引起的恐慌气氛向当局诬陷他们的敌人。乌克兰活动家相信他们是被波兰人诬陷。有些个案确实如此，但他们有时也会是被自己人诬陷，又或者因为在不恰当的时候说了不恰当的话。典型的情况是，他们被人听见他们说俄罗斯人的统治可让地区内的生活条件改善。大部分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居民将很快知道此说是否属实。而他们许多人都失望了。

战争头几个月带给俄罗斯很高期望，但也带来了一些最初的失望。坏消息从前线的北部地区传来。俄军在东普鲁士取得最初的成功之后，一九一四年八月下旬遭遇大败。另一支军队亦被迫撤退。但在加利西亚，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取得节节胜利。九月三日，俄军列队进入利沃夫，把它的名字从德文的 Lemberg 改为俄文的 Lvov。同一个月稍后，俄军逼近普热梅希尔，那是一个古老的罗斯中心，设有坚固碉堡，奥军在此顽强抵抗了快半年。一九一五年三月，疲惫的奥地利驻军弹药用尽，被迫投降。至此，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完全落入俄罗斯控制之下。俄方计画取道匈牙利平原，直取布达佩斯和维也纳，让奥匈帝国无法再战。当时很少人会怀疑，普热梅希尔和加利西亚的其余部分将永远是属于俄国。下一个目标将会是匈牙利统治下的奥匈帝国的一个地区外喀尔巴阡，在俄罗斯的官方用语中是「外喀尔巴阡罗斯」。只要取得外喀尔巴阡，「收復」基辅罗斯全域的大业便会全部完成—根据俄罗斯史书记载，这大业是由第一位自称沙皇的俄罗斯统治者伊凡三世发端，时为十五世纪。

一九一四年秋天，新征服地区交由加利西亚总督博布林斯基伯爵管理。他是俄罗斯裔，把推行俄罗斯化看成自己的主要任务。他一上任便宣称：「我将让俄罗斯语言、法律和制度在这里扎根。」236负责促进总督这目标的是他的祕密助手和侄子小博布林斯基。小博布林斯基是杜马的成员和「温和右派」的领袖之一，自一九○七年起是「加利西亚慈善协会」会长，一向不遗余力支持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两地的亲俄罗斯派，又游说俄罗斯政府做同样的事。他主张，政府只要在桑河237—奥治乌克兰的重要水道，稳住亲俄罗斯派的阵脚，就可以在聂伯河稳住阵脚，否则，如果加利西亚的亲俄罗斯运动崩溃，小俄罗斯的亲乌克兰运动必然会声势大涨。现在，在他叔叔的力挺和杜马一票盟友包括霍尔姆大主教叶甫洛吉的联手下，小博布林斯基获得实现自己想法的难得契机。

除了利沃夫的名称被改为俄罗斯语，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城镇的街道和广场也比照办理，纷纷被冠以普希金和其他俄罗斯文化或政治名人的名字。俄罗斯语被引入教育系统，最终目标是取代乌克兰语。当局为「俄罗斯裔」教师开设专门课程，让他们更能掌握俄罗斯语。乌克兰语报纸遭查封，以「小俄罗斯方言」撰写的书籍被禁止出版。即使以乌克兰语写的书信一样会被取缔。亲乌克兰派的组织被关闭，数以十计的亲乌克兰派分子被捕。都主教舍普季茨茨基，是希腊天主教联合教会首脑，一九一四年九月遭拘留，接着流放至俄罗斯中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一间东正教修道院度过。

反之，亲俄罗斯派分子和组织却获得支持。小博布林斯基亲自到新占领土地每一座监狱释放被奥地利当局监禁的亲俄罗斯派分子。自此，亲俄罗斯派大力鼓吹支持「白沙皇」，号称他的保护业已延伸至长期受苦的「红罗斯」（加利西亚的中世纪名字）。早在战前便活跃于地区内的俄罗斯慈善团体此时更是迁入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打着「全俄罗斯人」的旗号为农民提供援助。

但战争环境限制了小博布林斯基的俄罗斯化大业。一票军方将领，特别是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他在军中的受欢迎程度尤胜于沙皇，相信应该把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立刻整合到帝国里面，但政府却希望等到和平条约签订再进行整合事宜。双方最后达成妥协，同意把全面整合推迟至战争结束，但在这之前，朝廷会把军方的需要放在优先位置。当局想要的是稳住占领区，避免进行会引起不满和抵抗的大刀阔斧改革。因此，东正教教会的活动受到限制，规定大主教叶甫洛吉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方能接收希腊天主教的教区：一是该教区乏人主持（很多希腊天主教教士不是已经逃走就是被奥地利当局逮捕），二是有大多数教民同意（至少要有百分之七十五同意）。尽管有这些严格要求，改教的人仍然很多。据报章报导，光是占领的头几个星期，就有三万名联合教会的信徒转而皈依东正教。

在加利西亚居民中间，因为占领政策而吃最多苦头的是犹太人。在德军手中吃过几轮败仗之后，俄罗斯军队和社会开始疑神疑鬼，把犹太人看成是最大的隐患，主张把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犹太人宣布为俄国子民，把他们移转到其他地区。但由于政府拒绝立刻把加利西亚併入帝国，军方便改而禁止犹太人在前线附近的地区从事任何活动。此举有效杜绝犹太人的商业活动，破坏了犹太社群在该地区的经济基础。补给欠佳的俄军后来还强徵甚至抢夺犹太人的存粮，让他们成为受害者名单的最大苦主。在俄军来到前便逃走的犹太人被没收家财，这政策对奥地利人和波兰人一体适用。

俄罗斯为对付德、奥所打的民族牌充满矛盾。在加利西亚的情况，它有两套政策直接产生冲突：一是承诺实现波兰人的民族愿望，另一是把加利西亚视为俄罗斯的原有土地。当局向波兰裔承诺，战后将会把波兰裔的聚居地重新统一，让他们独立建国，新的国家还会包括属于奥地利的波兰人土地。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于入侵奥地利和东普鲁士前夕在宣言中这样告诉波兰人：「让那些把波兰人民切割得四分五裂的边界消灭吧。让它在俄国沙皇的权杖下重新统一自己。在那权杖之下，波兰将会获得重生，能够自由选择信仰、用自己的语言和有自己的自治政府。」238由于占领加利西亚的俄罗斯当局想要表现出说到做到的姿态，所以容许某些地方的法院系统继续使用波兰语。占领初期被关闭的波兰语学校也重新开放，容许波兰语与俄罗斯语一道被用作教学语言。

这让加利西亚的亲俄罗斯派有被出卖的感觉。他们不被允许在占领当局任职，而这些职位通常是由来自帝国和资格不够的官员滥竽充数。最重要的是，原来叛逆的波兰人被当局看成是盟友，而加利西亚的「俄罗斯人民」反而再次受到二等公民对待。

亲俄罗斯派的担忧被他们在俄罗斯民族主义阵营的盟友认真看待，后者也常常在杜马为亲俄罗斯派抱不平。这些议员反对任何和他们民族主义愿景不符的占领政策，认为俄罗斯是奋斗了好几百年才达到目前快要重新统一的状态，不应该对有敌意的西方—以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波兰人为代表—有所姑息。反观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自由派却欢迎政府以宽容态度对待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波兰人。但就像战前一样，立宪民主党人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也是分裂为两派。

司徒卢威认为，取缔加利西亚的乌克兰运动可以让帝国境内的乌克兰运动无疾而终。米留科夫不同意这位党同志的意见，暗示自己对加利西亚的乌克兰运动研究有素，主张这种现象不可能通过军事占领消灭。他对立宪民主党的中委会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要求政府「结束在被占领地区进行俄罗斯化政策，重新开放封闭了的民族机构，并严格保护民众的人身和财产权利」239。但他的提案没有获得通过。有些学者主张，米留科夫此举只是要安抚他在亲乌克兰派中间的支持者和盟友：如果是这样，他是白忙了。

不管怎样，帝国境内的乌克兰运动家对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在加利西亚的侵略性行为都难有多少作为。他们自顾不暇：他们必须竭尽所能证明他们本身忠于帝国，因为他们在俄罗斯民族主义阵营的敌人质疑这一点，又把乌克兰运动说成是一个德国人、波兰人和犹太人一起弄出来的阴谋。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认定，加利西亚是乌克兰运动的中心。早在战争爆发好一段日子之前，基辅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便提出警告，说乌

克兰有可能会脱离俄罗斯，加入奥匈帝国。战争爆发后，当局按照俄罗斯民族主义阵营的担忧和疑心病採取行动，查封乌克兰语出版品例如以基辅为基地的报纸《议会》，骚扰乌克兰人的组织和活动家。他们被政府贴上「马泽帕主义者」的标籤，能够对大众表达意见的机会少之又少。

格鲁舍夫斯基是大战期间乌克兰运动在俄、奥两国命运的缩影。他是加利西亚亲乌克兰派的领袖之一，自然也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眼中钉。战争初期，奥地利当局怀疑他有亲俄情感（他从未放弃俄罗斯国籍），命令他离开前线地区，往西而去。他在维也纳待了一些日子，期间受到警察监视。他离开奥地利几天后，当局便对他发出逮捕令。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他抵达基辅，却又被俄罗斯警察以亲奥的罪名逮捕。警察在他的行李中搜出「罪证」，其中包括一本题为《沙皇如何欺骗人民》的乌克兰语小册子。但这只是表面理由，因为逮捕格鲁舍夫斯基的命令早在俄国攻占利沃夫未几便下达。当时，当局在利沃夫找到格鲁舍夫斯基和一些乌克兰活动家的合照，而根据线报，照片中的乌克兰活动家是为奥地利政府工作，反对俄罗斯。

警方断定格鲁舍夫斯基是加利西亚马泽帕主义者的领袖，计画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但因为一些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说情，这些知识分子背景分歧，既包括为科学院就乌克兰语撰写备忘录的沙赫马托夫，也包括立宪民主党的司徒卢威，因而当局改变主意，把流放地改为辛比尔斯克。后来流传一个笑话，说之所以会有这种改判，是因为格鲁舍夫斯基的支持者动了手脚，在判决书上改了几个字母，把 Siberia（西伯利亚）改成 Simbirsk（辛比尔斯克）。辛比尔斯克是伏尔加河河畔的一座小城，靠近莫斯科，但离乌克兰仍然很远。此举有效让格鲁舍夫斯基和整个乌克兰运动为之噤声。自此，政府和支持它的那些「不折不扣俄罗斯人」240便可以放开手脚，在帝国边界的内外按自己的民族打造工程纲领行事。

一九一五年三月，当格鲁舍夫斯基在流放地辛比尔斯克安顿下来的同时，皇帝尼古拉二世计画访问新占领的加利西亚。三月九日，普热梅希尔的陷落给了他一个沐浴在军事荣耀中的机会。这不是他第一次造访前线区域，却是他第一次在战争期间走出帝国的边界之外，因此让他的近卫军相当恐慌。同样反对沙皇出巡的还有以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为首的一票军方大老，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守不守得住新占领的地区。他们也担心，随着沙皇踏上被报章称为俄罗斯所固有的土地，他们在接下来势必艰辛的一九一五年夏季战役中，有可能会被迫把政治考量置于军事考量之上。

但尼古拉坚持出巡，他的近卫军和将领只好配合。这相当于一场媒体政变，因为他此举的一大目的是扭转自己在军中受欢迎程度远不及亲族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现象。俄罗斯民族主义报章对出巡计画欢呛喝彩，认为沙皇此行不仅标志着俄罗斯的军事胜利，还标志着其民族理念的胜利。沙皇的行程包括造访利沃夫、普热梅希尔和布罗迪。当时是四月，正值復活节期间。按照传统，沙皇为了表示亲民，每年復活节会跟朝廷直属的官员和士兵及水手交换復活节彩蛋（和亲吻）。他会用陶瓷彩蛋–当然不是法贝之家所制造的那种保留给皇室成员的復活节彩蛋，但以当时标准而言也是极其奢侈的彩蛋–换取士兵赠送的手绘水煮蛋。现在，这一套被带到加利西亚的部队，以象徵帝国的神圣空间向西延伸。

远游期间，尼古拉常常感觉自己就像还留在帝国境内。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们走得愈远，这个国家的景色就愈美丽。路上看到的聚落和居民会让人强烈联想起小俄罗斯。」241造访过利沃夫之后，他又写道：「好漂亮的一座城市，会让人微微想起华沙。好多花园和纪念碑，到处都是俄罗斯军队和俄罗斯百姓。」在利沃夫迎接他的除了加利西亚总督博布林斯基伯爵，还有地区内的最高宗教领袖大主教叶甫洛吉。

沙皇莅临前夕，叶甫洛吉接到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短柬，请求他不要在欢迎致词中涉及「政治」。他不知所措，问送来短柬的首席随军牧师：「我是否不可以说『陛下您是以最高主宰身分踏入这片土地』之类的话？」得到的回答是：「对，不可以。战争还没有结束，没有人知道沙皇以后还会不会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叶甫洛吉拒绝接受大公的忠告，在致词中说：「皇帝陛下，您是第一个踏入这片古老罗斯土地的沙皇。它是罗曼亲王和丹尼尔亲王传下来的祖产，之前从未有俄罗斯君主踏足过。许多年来，这片受宰制的罗斯土地长期受苦，唉声叹气了好多年，现在终于可以向您发出一个胜利的欢呛。」242

尼古拉龙心大悦。当地亲俄罗斯派的热情接待也让他印象深刻。当晚，在总督府举行晚宴时，突然来了一群叶甫洛吉教区的东正教教民。他们举着圣像和教会的横幅，突破外围的安全戒护，出现在总督府的前广场，高声合唱〈人民之歌〉，即〈天佑沙皇〉歌。尼古拉走出阳台对人群讲话，情形让人回想到一九一四年八月他在圣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上的一幕。他感谢群众的热情接待，并用让叶甫洛吉和其他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大为受用的措词结束简短讲话：「让我们拥有一个强大和不可分割的罗斯！」243沙皇的妹妹奥尔加日后回忆往事时表示：「这是我最后一次感受到，有一条神祕纽带把我们的家族和人民连结在一起。」244

尼古拉在一九一五年復活节的加利西亚之行被一支俄罗斯摄影队摄

入镜头，而他在当地庆祝復活节的场面后来也成了油画和明信片偏爱的主题。这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梦想的象徵性高点：长年以来，他们都梦想着把基辅罗斯曾经有过的土地收復回来，建立一个帝俄民族，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构成，让君主、宗教和民族为国家服务。任何曾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九日目睹过利沃夫总督府广场上那一幕的人都很难不去相信，俄罗斯帝国在经过长期转化后，终于成功蜕变为民族国家。因为它不但没有被兴起中的民族主义撕扯得四分五裂，反而成功地把疆土扩张到原有边界之外，把所有俄罗斯人纳入怀中。

俄罗斯「统一主义者」的热望和梦想是被俄军快速击败奥军所燃起，但它们破灭的速度比燃起的速度更快。一九一五年五月，即沙皇以胜利者之姿进入利沃夫后不到一个月，德国的师团便开抵奥地利前线，对加利西亚的俄罗斯守军发起攻击，一举夺回普热梅希尔并迫使俄军撤出利沃夫。九月底，俄军失去了大部分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一大部分、所有的波兰、白罗斯西部和大部分波罗的海省分。

一九一五年八月，愤怒的尼古拉自任作战总指挥。此举固然有助于提高士气，但他也等于把战争胜败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战况持续走坏，耗尽俄罗斯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一九一五年夏天，在春季和夏季战役败北不久之后，杜马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联合米留科夫的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十七日联盟」中的君主主义者组成一个「进步集团」，要求朝廷成立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言下之意要让他们来组成政府。沙皇拒绝所请。在一九一五年的余下日子和一九一六年一整年，俄军在对德奥的阵地战中消耗日益加剧，但朝廷与杜马始终处于对立。

一九一七年二月，首都严重缺粮，面包店外面大排长龙，到处出现群众示威，军队也因为拒绝镇压示威而发生譁变。社会主义者创建的「苏维埃」（议会）成为彼得格勒的真正力量，让沙皇政府变得无足轻重。杜马的领导阶层也成立了一个自己的政府，但未能安抚人心和控制住局面。最终，他们决定，拯救国家的唯一途径是逼沙皇退位。他们得到军方支持，因为一票将领就像许多大臣和议员那样，相信沙皇已经与现实脱节，只是德裔妻子亚歷山德拉的傀儡。盛传，皇后希望俄国撇下盟友英国和法国，单方面和德国签署和约。

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为首的军方反对缔结独立和约，认为此举不仅违反俄罗斯对盟友的义务，也会导致帝国解体，因为它在战时落入德国的领土势必会继续被占领。他们还担心这样的和约会动摇军队士气，引起前线部队叛变。现在，看见彼得格勒的街头叛乱和士兵兵变，他们知道尼古拉非下台不可。杜马的领导阶层表示同意。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日，杜马派出两位代表，执行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告诉沙皇已经没

有人欢迎他留在皇位上。被委以此重任的两人一个是知名议员舒利金，一个是新政府的海陆军部长古契科夫。

身在白罗斯莫吉廖夫陆军大本营的尼古拉得知彼得格勒发生革命之后，急着取道普斯科夫返回首都。他也知道了杜马派代表见他的事。他有些随从相信，舒利金的出面对沙皇和君主制的未来都是好兆头。

因为众所周知，舒利金不仅是知名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理论家，也是忠诚的君主主义者，而这时候的君主制用得着它能找到的所有支持。舒利金毕业于基辅大学法学院，父亲是全俄罗斯人派在乌克兰的喉舌报《基辅人》报的创办人维塔利．舒利金，但自幼丧父，由《基辅人》报下一位主编尤泽福维奇养大。舒利金后来接替主编职位，又在一九○六年秋天的杜马选举中初试啼声，当选议员。任职杜马期间，他成了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右翼主义者的领袖之一。他同时是一九一○年年初创建的群众组织「全俄罗斯民族主义联盟」的领导者。

一九一七年三月，舒利金自告奋勇，扛下谒见沙皇的使命。他认为，若能说服尼古拉逊位，将可保住君主制度。他的同行者古契科夫也是抱持一样观点。就像包括新任外交部长米留科夫在内的许多政府成员那样，古契科夫相信，沙皇主动逊位会有利于十二岁的儿子阿列克谢接班。此举可安抚人民的怒气，让杜马和临时政府从彼得格勒苏维埃手中夺回主导权。以变成立宪君主制为代价，俄罗斯君主制可望安渡危机。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日黄昏，舒利金和古契科夫抵达沙皇的驻跸地普斯科夫，下火车后先求见北方面军司令官鲁斯基。先前，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已经取得各个方面军司令官的同意，採取一项形同政变的行动。他对控制着普斯科夫的鲁斯基下达命令，要他利用一切劝说手段说服沙皇逊位。鲁斯基和杜马的领导阶层一直保持密切接触，并像其他高级将领一样希望看见沙皇下台。他以令人钦佩的效率完成使命。舒利金和古契科夫没有见到鲁斯基，而是直接被带到沙皇的火车厢。鲁斯基稍后出现，低声告诉舒利金，逊位的问题已经搞定。

尼古拉用他一贯的冷静态度告诉舒利金和古契科夫，他同意退位，但不打算让儿子阿列克谢继位：阿列克谢的严重健康问题245让他必须留在父母身边。取而代之，尼古拉想要传位给弟弟米哈伊尔。犹豫了一下之后，两位客人同意了沙皇的建议。舒利金甚至认为，这是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因为未成年的阿列克谢不能合法地宣誓效忠宪法─宪法在舒利金的俄罗斯君主制愿景中是一个重要元素，而米哈伊尔却是成年人，有资格这样做。舒利金请求沙皇在逊位诏书上补充一点，表明米哈伊尔将会对「全体人民」246发誓，保证会密切配合代表他们的机构，

意即杜马。尼古拉表示同意，但把「对全体人民发誓」改为「发出不可违反的誓言」。显然，他仍然努力想要让君主不为人民所缚。

但是，部分人民—至少是那些在彼得格勒街头起义的人民—更清楚知道他们对君主制是什么感想。舒利金和古契科夫回到首都之后才发现，那里的人既不想要尼古拉，也不想要君主制。由杜马领导阶层组成的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人民的意愿。「当然继承人」米哈伊尔也是如此，他在尼古拉退位第二天便签署一项声明，表示除非制宪会议向他要求，他才会接受皇位，制宪会议是预定要用来决定俄罗斯政府政体的组织，其代表由人民选出。米哈伊尔的声明起到了预期效果。在「彼得格勒苏维埃247」的同意下，杜马政府组织了一个俄罗斯「临时政府」，负责筹备制宪会议的选举事宜。新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结束政治迫害，引入民主自由，并承诺取消「所有土地、宗教和民族上的限制」。这表示所有俄国人民在法律前面人人平等。至此，君主制空有其名。

舒利金、他的杜马同仁和一票将领都感到失望，但不得不接受现实。不过，让他们放下心头大石的是临时政府并未宣布打算和德国签署和约。很明显的，临时政府准备要把仗继续打下去，以恢復帝国领土的完整性。在这一点上，它获得了政治菁英和军事菁英的充分支持，因为他们都把俄罗斯的统一和不可分割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对帝国统一性的威胁更多不是来自德、奥军队，而是来自帝国内部的革命力量。

君主制的垮台和彼得格勒的权力真空状态导致自由派的临时政府和社会主义者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发生激烈竞争，这又让各民族运动的领导者有了可乘之机，民族主义运动在大战爆发后一度退潮。首先对这种革命新形势加以利用的是那些在十九世纪经歷过某种形式自治的民族。其中之一是芬兰人，芬兰在一八○九至一八九九年之间曾享有自治权，他们立刻要求让他们原有的宪法恢復过来。临时政府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日—即尼古拉逊位不到三週—予以同意。九天后，波兰人得到承诺，他们将会获准独立建国，条件是建国后与俄罗斯缔结军事同盟。这一切会等到制宪会议召开后正式拍板定案。不过，在波兰的情况，临时政府的承认徒具形式。在那段日子里，彼得格勒的市民喜欢打趣说：「承认波兰独立就等于是允许月亮独立。」248这是因为，波兰在一九一五年夏天便不再由俄国控制，目前是处于德国占领状态。

对帝国的西部省分来说，波兰问题从来不是存在于真空状态。每一次的波兰起义都会鼓励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提出自己的要求，从而把「单一俄罗斯民族」的想像体砍去一些。在一九一七年春天，乌克兰人

和白罗斯人并未要求独立，但急于争取文化和领土的自治，还有争取俄罗斯转型为联邦制国家。现在，根据临时政府的宣布，构成这个国家的不是帝国子民，而是俄罗斯公民。

但临时政府不愿意让帝俄民族两个较小分支圆梦。这不仅是因为它希望把 一切有关政体和国家结构的问题拖到召开制宪会议再解决，也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力阻—在一九一七年春天，立宪民主党是政府内最有影响力的政党。像司徒卢威之辈的立宪民主党人仍然反对分裂帝俄民族，主张民族是由语言与文化界定，不是由血统界定，而像米留科夫之辈的立宪民主党人则只准备给予非俄罗斯人个人自主权，即只允许他们发展语言和文化，不是允许他们拥有自治领土或政府。

但后者正是乌克兰领导人和一些白罗斯领导人向彼得格勒政府要求的。在接下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盪中，史称俄国革命，他们将会把声音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迈出他们原来不敢想像的大步。

230 Petereburgskii listok, August 19, 1914.

231 Viacheslav Shatsillo, Pervaia mirovaia voina,1914-1918: Fakty, dokumenty (Moscow, 2003), 89.

232 外喀尔巴阡是今日乌克兰最西一州。

233 M. K. Lemke, 250 dnei v tsarskoi stavke, ed. L. M. Suris (Moscow, 2015), vol. 1, 31.

234 雅罗斯拉夫．奥斯莫梅斯尔是「加利奇公国」的亲王，其领土后来成为「加利西亚 - 沃里尼亚公国」，而丹尼尔和罗曼为后者的亲王。

235 事实上是乌克兰人。

236 P. S. Romanov, Rus’ (Moscow, 2015), vol. 2, 314.

237 比喻奥地利控制的乌克兰地区。

238 Lemke, 250 dnei v tsarskoi sravke, 30.

239 S. Breiar, “Partiia kadetov i ukrainskii vopros, 1905-1917,” in Issledovaniia po istorii Ukrainy i Belorussii, vyp. 1 (Moscow, 1995), 89-110.

240 这里应该是指乌克兰人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

241 Perepiska Nikolaia i Aleksandry Romanovykh, 1914-1915 gg. (Moscow, 1923), 164.

242 Put’ moei zhizni: Vospominaniia mitropolita Evlogiia (Georgievskogo) (Moscow, 1994), 248.

243 Sergei Sergeev-Tsenskii, Preobrazhenie Rossii (Moscow, 1956), 282.

244 Ol’ga Aleksandrovna: Memuary (Moscow, 2003), 159.

245 皇太子阿列克谢遗传自外曾祖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而患有血友病，不良于行。

246 Pavel Miliukov, Istoriia vtoroi russkoi revoliutsii (Moscow, 2014), 49.

247 「彼得格勒苏维埃」，指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新历）与「临时政府」同时成立的议会（苏维埃，意为议会），由四天前成立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扩大为「工人及士兵代表苏维埃」，其与临时政府并存，形成「双元政权」。

248 E. Ketola, "Revoliutsiia 1917 goda i obretenie Finliandiei nezavisimosti: Dva vzgliada na problemu," 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6 (1993): 29.

第十二章　俄国革命

要理解俄国史，八成没有一个概念比「俄国革命」更重要。但这个概念又是错综复杂，常常会引起混淆。问题首先在于一九○五至一九一七年之间，俄罗斯共发生过三次革命，其中两次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先是二月推翻沙皇政府的一次，再来是让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十月得以接管国家权力的一次。让问题更复杂的是，这两次革命发生的月份通常都是照俄罗斯帝国使用的「儒略历」计算，所以被分别称作「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不过，如果根据从一九一八年开始採用的公历计算，它们分别是发生在三月和十一月。再者，还有这场革命持续了多久的问题。学者一般把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之间发生在俄罗斯境内的内战和国际冲突—死者数以百万计—归入「俄国革命」这把大伞之下，但也有些学者把一九二○年代很大一部分时间算入其中，甚至还有些学者把整个苏联时期算在内。

「俄国革命」一语最容易让人混淆的一点，在于它发生在多民族俄罗斯帝国的事实。正因为这样，过去几十年来的歷史学家才会老是把乌克兰人或其他非俄罗斯人的革命说成俄国革命的一部分，或是把它们说成凑巧同时。但不管我们怎样界定「俄国革命」，被它根本改变了的不仅止于罗曼诺夫王朝前子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还改变了原帝国境内各民族的关系—被改变得最激烈的莫过于三位一体帝俄民族的三个分支，即大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和白罗斯人。所以，「俄国革命」在某个意义上其实是「俄罗斯人」的革命。

临时政府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上台后尽力维持一个「全俄罗斯民族」的门面，却有一个政治党派完全愿意承认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是独立民族，不反对给予他们自治权甚至独立权。这个党派就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249，它原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小分支，但迅速壮大。就像当时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布尔什维克谴责资本主义，反对私有财产，相信未来属于无产阶级—产业工人阶级，矢志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但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在一九○三年确立为一股独立政治力量的布尔什维克相信，无产阶级想要上升到权力巅峰，靠的不是歷史演化，而是发动革命。他们需要夺取国家政权以确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带领全世界走向社会主义。但布尔什维克又认定，在以农民为大宗的俄罗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注定失败，除非是先在中欧和西欧点燃世界革命之火，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有发达组织，被认为准备好迎接社会主义的来临。

列宁和一群同道在组成和远景上都是国际主义者。他们厌恶帝俄民族主义，宣称准备好承认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是独立民族。虽然只是少数派，但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分子对民族问题和俄罗斯问题的想法却出人意表地变得无比重要。这是因为，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儒略历十月二十五日）晚上，他们透过一场基本上不流血的政变，废黜了临时政府，自立为俄罗斯共和国的新政府。至于该共和国的边界何在则尚有待界定。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一向坚持社会阶级才是首要政治问题，民族问题仅属次要，所以有一段长时间几乎对民族问题完全置之不理。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随着民族运动在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风起云涌，列宁和同道才被迫在民族问题上表态。一九一二年，列宁委託乔治亚人史达林制定党对民族问题的立场，当时除高加索人以外基本上没有人知道有史达林其人。这个立场是透过反驳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表达出来，但只懂俄罗斯语和乔治亚语的史达林无法阅读原着。他是靠着列宁的帮忙和指导，才把自己领袖的观点充分表达在一篇长文里。文章在一九一三年发表，后来又独立成小册子出版，题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小册子里的观念在列宁自己写于一次大战头几个月的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主张，俄罗斯帝国的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包括有独立权。但其中有一个蹊跷，那就是，「自决」是否意味独立要由每个民族的工人阶级来决定−说得白一点，就是由布尔什维克党来决定。如果独立符合一民族无产阶级的利益，该民族就有权脱离帝国。反之，它就应该留在帝国内，以确保工人阶级可以打败敌人。

这些写在纸上的原则简单明瞭，但它们是否有实际可行性？第一个考验紧接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夺权成功后来到。作为对政变的反响，基辅的一票政治人物宣布乌克兰独立建国，而且声称国土范围除了涵盖乌克兰中部各省，还涵盖其他乌克兰人传统聚居区，如哈尔科夫、敖得萨和东乌克兰的北顿内茨河盆地，而彼得格勒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乌克兰人拒绝与彼得格勒新政府合作。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认为，这种种表现都是反革命的证据。

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日，乌克兰各路人马的活动家组成了一个中央议会，乌克兰语称为「中央拉达」（Central Rada）。它的使命是协调所有乌克兰人组织，不管是政治还是非政治组织的活动。在成员的政治背景上，拉达的色彩与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相似，即主要是由与「立宪民主党」走得近的活动家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构成，后者的影响力愈来愈大。它最初的要求相当温和，而且可以和立宪民主党在民族问题上

的立场并存不悖。拉达的最终目标只不过是乌克兰活动家已经要求了几十年的事情：把乌克兰语引入教育系统。但当流放俄罗斯多年的格鲁舍夫斯基在三月中旬回到基辅并当选拉达的新领袖后，他有了更高的愿景：乌克兰的领土自治。

一九一七年三月下旬，格鲁舍夫斯基写了一篇题为〈不容走回头路〉的纲领性文字，在其中威胁说，如果临时政府不答应给予乌克兰领土自治，就必须准备好目睹乌克兰完全独立的后果。他写道：

给予乌克兰广泛自治和主权在乌克兰人民—这是我们目前时刻的纲领，不容走回头路。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或俄罗斯社会的统治圈子对这个目标的任何障碍和延宕，都会改变天秤的平衡，使之往乌克兰独立主义的方向倾斜……在当下，对那些支持独立，或更精确地说是自足的人，乌克兰同意拥有广泛民族与领土自治和联邦担保其拥有主权的情况下，继续留在一个共同平台上。独立乌克兰的旗帜仍然摺起。但如果在联邦制、民主制俄罗斯共和国内有全俄罗斯集权主义者想要扯下乌克兰自治旗帜的话，那上述的旗帜会不会被抖开来呢？难说。250

格鲁舍夫斯基的这个纲领很快便成为中央拉达的纲领，受到很多农民代表大会和士兵代表大会的支持，在二月革命之后几个月，这些大会是合法性和权力的真正基础。在帝国的俄罗斯各省，农民是为反对地方贵族而造反；在高加索和中亚，革命表现为土生土长的人口驱赶俄罗斯人殖民者。但在乌克兰，农民会愿意接受活动家的动员却是为了支持领土自治。在尼古拉二世逊位一事上扮演过一角的舒利金这时已回到基辅，据他指出，乌克兰活动家蛊惑农民的方法是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接受乌克兰人身分认同和支持乌克兰领土自治，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和防止外国人特别是俄罗斯农民染指乌克兰的农地。士兵也支持拉达，视之为唯一能结束战争的机构，相信它在重新分配土地之日将会让他们解甲归田。

受到这些人民支持的鼓舞，格鲁舍夫斯基和拉达在一九一七年六月片面宣布乌克兰领土自治。临时政府为了把联邦主义和民族分裂的精灵收回瓶子，派出几位部长前往基辅，劝拉达改变主意。面对拉达的拒绝，而这拒绝受到包括犹太裔和波兰裔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少数民族所支持，几位部长再退一步，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临时政府承认拉达和被称为「总祕书处」（General Secretarict）的政府为临时政府在乌克兰的代表。就这样，乌克兰自治以截头去尾的形式，在它与彼得格勒中央政府的第一回交手中存活了下来。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协议勃然大怒，认为临时政府几位社会主义者

部长的作为是在断送俄罗斯民族的利益。舒利金率先发难。他早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初就在《基辅人》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如果说旧政权迫害过非俄罗斯人，那新政权将会对付俄罗斯人，把国家变成一座囚禁俄罗斯人的监狱。舒利金准备好容忍拉达的统治，他称之为「一帮有组织土匪的专制统治」，但前提是它的领导人必须支持战争的努力。然而，拉达却选择了和平。它也想要获得自治，这在舒利金的眼中形同背叛，是在给忙着对抗德、奥的俄罗斯背后捅一刀。他声称，一个独立的乌克兰轻易就会成为德国的俎上肉。

但舒利金的着眼点是在大俄罗斯民族的统一性。他认为临时政府认可乌克兰的有限自治是一种背叛俄罗斯民族的行为，因为乌克兰（小俄罗斯）和它的居民是俄罗斯民族的基本组成部分。他坚称，俄罗斯人在乌克兰占了大多数，他会有此一说，是因为他是根据书面语而非口语来界定何谓「俄罗斯人」，而基辅报纸的读者又以俄罗斯人为大多数。在舒利金看来，最要不得的还不是废除君主制，而是把小俄罗斯人「重新归类」为乌克兰人。

与舒利金不同，列宁从不在乎俄罗斯民族会分裂。一九一七年六月，他特别去了乌克兰一趟，以示对拉达的支持，期间不仅承认乌克兰人是独立民族，还贊成给予乌克兰人自治甚至独立的权利。他这样说：「立宪民主党人的临时政府是一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政府，它没有履行最起码的民主主义义务，即没有表示贊成乌克兰自治，也没有表示乌克兰完全有自由独立。」251

列宁把拉达视为可以和他联手攻击临时政府的潜在盟友，而双方也真的曾经一度合作，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把临时政府的支持者赶出基辅。但事情在布尔什维克夺权成功之后发生了激烈转变。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乌克兰苏维埃大会在基辅召开，会上，基辅的布尔什维克设法取得大多数支持，以便重演在彼得格勒发生过的事件：打着苏维埃的旗号在乌克兰夺权。但他们发现自己是少数派。至此，拉达从布尔什维克的盟友变成了敌人。基辅的布尔什维克分子转移到哈尔科夫，一个接近俄罗斯边境的工业中心，宣布成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称拥有的国土范围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重叠，后者是拉达在布尔什维克政变失败后宣布成立。

作为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拉达拒绝承认同路人布尔什维克，也拒绝支持列宁对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斗争。这超过了列宁和他的党内同志可忍受的程度。在他们看来，拉达已经滥用了乌克兰人民的自决权利。在党内第二号人物托洛茨基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史达林的协助下，列宁草拟了〈告乌克兰人民书和给中央拉达的最后通牒〉。但这份文件

在说法上自相矛盾，因为它一方面承认乌克兰人民有自决权，另一方面又基于革命的名义否定他们有这种权利。他们一开始表示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肯定它「有权完全脱离俄罗斯或是选择与俄罗斯建立联邦性质或其他类似的相互关系」252。但接着又撤回承认，理由是乌克兰政府採取了一项「立场模棱两可的政策，这使得我们无法承认拉达是乌克兰共和国工人和被剥削群众的全权代表」。

根本问题在于，中央拉达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政府和前俄罗斯帝国军队将领之间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当时，前帝国将领已在南俄罗斯的顿河地区建立起基地，并继续效忠临时政府。列宁希望拉达停止解除乌克兰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武装，阻止反布尔什维克势力进入顿河地区，进而和他的政府联手对抗乌克兰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对者。这是列宁所能容许的「自决」程度，当时他已经不再是临时政府的反对派，而是掌权者。拉达拒绝了。由于乌克兰本身没有多少军力，列宁于是派当过临时政府保安队长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司令穆拉维约夫中校，率领俄罗斯部队出兵基辅。

一九一八年一月，穆拉维约夫的部队开始向基辅推进。二月初，在发射了一万五千枚砲弹后，他占领了这个乌克兰首府。砲兵瞄准的其中一个目标是格鲁舍夫斯基的房舍。房子起火燃烧，格鲁舍夫斯基年迈的母亲被烧死。他和中央拉达全体成员撤离基辅，临走前不忘宣布乌克兰完全脱离布尔什维克俄罗斯而独立。名义上，穆拉维约夫代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于基辅成立的乌克兰苏维埃政府执行行动，所以是受该政府军事委员科楚宾斯基—他是乌克兰杰出的现代主义作家马赫洛．科楚宾斯基之子—的节制。但科楚宾斯基根本管不住穆拉维约夫的人马：他们只要在基辅街上听到谁用乌克兰语交谈就会对谁开枪，认为那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反革命的表现。一九一八年二月，当过列宁私人祕书的乌克兰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札通斯基一样因为在街上说乌克兰语，被穆拉维约夫的部下逮捕。所幸士兵在他口袋里找到一份列宁签署的文件，他才逃过一死。

有好几个星期，基辅的全部移民都笼罩在随时可能被逮捕和处决的阴影中，人人自危。这种「红色恐怖」为日后布尔什维克的残暴行径开了先河。穆拉维约夫进入基辅之后要求五百万卢布作为军队的给养，又下令部队「无情地摧毁基辅的所有官员、干部、军职人员（乌克兰军事编队的成员）、君主主义者和革命的敌人」253。根据一些估计，有近五千人因为涉嫌效忠旧政权或中央拉达而被穆拉维约夫的暴徒杀害，其中包括基辅都主教弗拉基米尔。一九一八年二月初，穆拉维约夫在发给列宁的报告中得意地表示：「基辅的秩序已重新恢復，包括人民祕书处

和工农代表苏维埃在内的革命当局已从哈尔科夫抵达。『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在精力充沛地运作中。」254

基辅的新布尔什维克主子逮捕了舒利金—他在一九一七年春天回到故乡，被捕的理由仅因为他从前的政治活动。舒利金侥倖渡过灾劫存活了下来。当局原定要把他押解到莫斯科，但局势的改变让这个行动变得不可能：德国和奥地利的部队已经开进了乌克兰。有一天，调查单位的负责人把他叫去，通知他他将会获释，条件是下次一传唤他，便要马上回监狱报到。他答应照办后获释。这项奇怪要求的理由很简单：布尔什维克必须赶在德国军队打到之前撤离，但又不确定要怎样处理囚犯。最终，布尔什维克政权将学会把带不走的囚犯一律处决，但那是后话。所以，舒利金不但活了下来，还得到了自由。随着他获释，「全俄罗斯民族」方案有了一线生机。

舒利金认为一九一七年十月发生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政变是一场民族灾难。得知消息之后，他在《基辅人》报为文主张十月革命是一场亲德国的政变。在他看来，到了现阶段，外国敌人已经不仅在帝国边缘推进，甚至已经夺取了首都。舒利金建议，如果一个德国政府在彼得格勒成立，那么就必须在他处建立一个俄罗斯政府。舒利金在该年年底前离开基辅，前往俄罗斯南部的顿河地区，在那里，前帝国陆军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和将军科尔尼洛夫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反击布尔什维克和继续对德作战。

白军是指前帝国将领在顿河流域建立的军队，有此称嘚是因为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红军。白军运动源于科尔尼洛夫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发动的一场政变。当时，他眼见彼得格勒苏维埃愈来愈强大，便计画先推翻临时政府，再解散彼得格勒苏维埃。政变以失败告终，却在无意中帮了布尔什维克一把，让他们可以同时控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地的苏维埃，然后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上演了自己的政变「十月革命」。

支持科尔尼洛夫的军官在政变失败后被临时政府监禁在白罗斯小城贝霍夫。被囚期间，他们详细讨论了未来的战略和战术。他们的总体目标是防止俄罗斯解体，认为事态紧迫，因为临时政府随时都有可能和德国单独媾和。后来，利用十月革命和临时政府倒台引起的混乱，这批军官逃出了贝霍夫，去到顿河地区，跟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顿河和库班的哥萨克人结成联盟。一个致力恢復俄罗斯统一的新权力中心于焉形成。但要达成这目标还言之过早。

如果一九一七年是以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告终，那么一九一八年就是以德国和奥地利的入侵展开。他们占领了前俄罗斯帝国的西部省分，占

领的法理基础是一九一八年二月和三月签订的两份条约，一份是和中央拉达签订，一份是和布尔什维克签订，地点都是布列斯特 - 立陶夫斯克255。第一份条约容许德奥联军占领名义上独立的乌克兰国的领土，又规定拉达必须提供大量农产品作为占领军的给养。德奥联军随后向东推进。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因为自知抵抗不了德国的强大战争机器，在三月一日撤出基辅，两天后，布尔什维克和德奥媾和，同意让出俄罗斯帝国欧洲属地一半领土，北至波罗的海，南至乌克兰，以及向柏林和维也纳赔款六十亿卢布。此一条约让德国的势力一路延伸至南俄罗斯的塔甘罗格，控制了整个乌克兰和克里米亚。

德国战争策略和东方政策的总设计师鲁登道夫认为，支持民族主义运动和在德／俄边境创立一批附庸国可以确保德国新占领的土地，把未来的俄国挡在门外，不管是不是布尔什维克主政。在德国的授意下，芬兰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宣布脱离俄罗斯独立，并与德国建立密切联繫。十个月后，一位德国亲王被选为芬兰国王。同样的事也发生在立陶宛：它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宣布独立，八个月后也是一位德国亲王当选立陶宛国王。另外，一个独立的「波罗的海联合公国」在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领土上被创建，而它也是和德国保持紧密联盟关系。

一九一八年二月和三月，由德国人支持的下一场民族打造工程在乌克兰上场。对乌克兰有自己打算的奥匈帝国加入了这场工程，派遣皇室成员威廉大公主持其事。威廉对成为未来乌克兰国国王有志已久，曾经学习乌克兰语和指挥奥地利军队中的乌克兰人部队。去到乌克兰之后，他在那里被称为红王子，他争取到在地菁英的友谊，又尽力保护乌克兰农民，不让德、奥占领军对他们太过分。德国人想要他走人，担心会发生一场有利于奥地利的政变，但威廉（当地人称他为瓦西里亲王）坚持留下来。

德军统帅部最初对中央拉达被社会主义者把持的现象抱持容忍态度，但拉达迟迟无法履行对德国军队供应农产品的承诺最终让德国人失去耐性，在一九一八年四月策画了一场政变，把社会主义者统统赶下台，让保守分子取而代之。新政府的领导人是有着乌克兰血统的俄罗斯贵族斯科罗帕德斯基。还是一九一七年六月的时候，舒利金曾经把斯科罗帕德斯基列入小俄罗斯出身的俄罗斯人，但不是乌克兰人的名单中。但现在，斯科罗帕德斯基因为急于从德军手中接过权力，态度丕变，让舒利金对俄罗斯人的定义，即光是由语言界定，吃了一记闷棍。

事实上，斯科罗帕德斯基不是唯一做出这种政治选择的人，反而代表着一种在讲俄罗斯语的乌克兰人中间愈来愈流行的态度：在文化上认同俄罗斯但在国家和民族上忠于乌克兰。一上台，他便自封为乌克兰国

家的「盖特曼」，宣布每个住在乌克兰的人都是乌克兰公民。这种包容政策受到了舒利金和两个与他志同道合的伙伴之抗议。

但并非所有支持俄罗斯人统一性者都是舒利金那样的死硬派。斯科罗帕德斯基治下的乌克兰成了前帝国政府官员、政治人物和军官等任何试图逃离布尔什维克政权（它已在俄罗斯中部建立起来）者的避风港。许多立宪民主党人都支持新盖特曼的政权，甚至加入其政府。由于俄罗斯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接管，立宪民主党人把一个由前俄罗斯贵族领导的乌克兰国家看成是復兴传统俄罗斯的基地。独立的乌克兰被认为应该拯救俄罗斯，然后用独立交换与俄罗斯成为联邦关系的形式。一九一八年十月，斯科罗帕德斯基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发表了如下声明：「如果乌克兰在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继续置身事外，将永远不会被它的邻居原谅。另一方面，如果它帮助俄罗斯击败布尔什维克，它就能确保自己在与俄罗斯的联盟中得到自由发展。」256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德军的撤出迫在眉睫，斯科罗帕德斯基果然选择了和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未来俄罗斯结盟。他宣布撤销乌克兰独立，在宣言中说：「全俄罗斯国家从前的活力和力量必须是在联邦原则的基础上得到恢復。乌克兰有资格在联邦中扮演一个主导角色，因为它的法治是全国的楷模，而前俄罗斯那些被羞辱和压迫的公民也是第一次在它的边界内找到庇荫。」257乌克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起初对他的意向还有所怀疑，但继而纷纷加入他的军队。他们其中一个是舒利金自己的儿子瓦西里科，后者将会在基辅近郊为捍卫斯科罗帕德斯基垂危的政权时，被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杀死。

德国在东欧的民族打造工程不限于支持乌克兰脱离俄罗斯，而是还对白罗斯人的民族打造工程起过重大作用。白罗斯民众的茁壮也让「单一俄罗斯民族」的想像体更加千疮百孔。

帝国政府在一九一五年的春季和夏季战役之后失去白罗斯西部。德国占领当局起初不知道白罗斯人是一个独立民族和有着各种民族组织存在。要过了几个月，当他们想到找一些本土干部来限制波兰菁英的影响力时，才发现这是两回事。在一份研议德国对白罗斯民族政策称为《东部领地》的报告中，撰文者指责波兰人阻碍了白罗斯人的民族发展，指他们「像寄生虫那样寄生在这些失去方向感的人身上，从他们中间吸收自己民族的成员」。报告最后指出：「德国人在这片土地的未来依赖于白鲁塞尼亚人的復兴和对抗波兰人。」258

白罗斯民族的復兴后来确实发生过。该地区的德国指挥官鲁登道夫将军下令创建白罗斯语学校来取代俄罗斯语学校。截至一九一七年年

底，在白罗斯西部，用白罗斯语教学的小学老师共一千七百人，学生七万三千人。一九一六年二月，得到德国的支持和经济资助（指提供纸张），白罗斯语报纸《迴声》创刊，销路是三千份，在当时和当地来说，非俄罗斯语和非波兰语的出版品能有这种销路相当惊人。鲁登道夫认为白罗斯人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民族，所以还帮助他们创建了一家白罗斯语剧院–根据一份德国报纸以大家长式纡尊降贵的姿态形容，这剧院的戏码体现出「戏剧感性的最早阶段」259。

不管德国报纸是什么态度，鲁登道夫所见无误。不过，要在白罗斯西部形成一个现代的白罗斯民族仍然因为一件事情受到重大障碍：大批大批的白罗斯人因为不愿生活在德国占领之下出逃。他们会这样做，往往是受积极参与俄罗斯民族主义组织的东正教教士所唆使。这些教士告诉他们，德国人是野蛮的条顿民族，一心只想要杀死和折磨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有近一百五十万白罗斯人离开白罗斯西部，让民族打造工程无法在基层扩大，因为乡村的政治、知识和经济权力主要掌握在波兰贵族手里，而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犹太人。这种情况让白罗斯活动家不愿意把建立一个白罗斯人国家订为政治目标。他们选择让白罗斯和立陶宛联合起来的构想。

在俄罗斯帝国境内的白罗斯人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的民族动员是到了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之后才转趋殷切，而且是从帝国政府在战争期间推广的全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的茧中蜕变出来。在彼得格勒爆发的布尔什维克政变迫使白罗斯活动家和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社会主义者（大都是俄罗斯裔）支持白罗斯人的民族动员，希望藉此创建一个白罗斯人的国家。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他们召开了「第一届全白罗斯代表大会」。大会承认苏维埃对俄罗斯的统治，但不承认其对白罗斯的统治。由大会选出的「大白罗斯拉达」自称是白罗斯（指非德国控制的白罗斯部分）唯一合法政权权威，又宣布计画创建白罗斯军队。但要达成这目标还言之过早。

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掌权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受到俄德前线的白罗斯部门各个士兵委员会的强力支持，闻讯后马上解散了代表大会。他们看不出来不受莫斯科控制的白罗斯人政府有什么用。他们根本没有看到白罗斯政府的需要。他们在涵盖白罗斯和前帝国的波罗的海各省的「西部地区」创立「委员会苏维埃」取而代之。然而，就像在基辅的情形一样，布尔什维克在明斯克的胜利是短暂的。不久之后，他们便被迫与德国人签署《布列斯特 - 立陶夫斯克条约》，德国人随之占领了包括明斯克在内的白罗斯中部。

至此，整个乌克兰和大部分白罗斯（唯一例外是其东部）都落入德

国和奥地利控制之下。但德国对待这两个民族的方式有所不同：「同盟国」愿意和乌克兰拉达在布列斯特单独媾和，却不愿意把白罗斯拉达邀请到谈判桌。换言之，乌克兰有着一个为柏林和维也纳承认的政府，但白罗斯被德国部队当成无主之地占领—这是因为《布列斯特 - 立陶夫斯克条约》明文禁止德国承认任何出现在前俄罗斯帝国领土的新国家。这情形有点像是十七世纪中叶戏码的重演：当时乌克兰是在俄罗斯和哥萨克人经过谈判之后成为沙皇领土，但白罗斯却是直接被莫斯科部队占领，所以没有得到任何优待。

在德国于一九一八年二月下旬拿下明斯克之后，两群白罗斯活动家聚在一起，一群是一开始就与德国合作；另一群是前一年在俄罗斯境内创立，经过激烈辩论后决定不要创立「立陶宛 - 白罗斯联邦」，而是成立独立于俄国的白罗斯国家。他们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即白罗斯民族共和国的拉达，今日挣脱了俄罗斯沙皇制加诸这片自由而独立的土地的最后枷锁。」260在这个新的白罗斯拉达中，支持发表白罗斯独立宣言的票数只是一个微弱多数，象徵意义要大于实质意义。它想要道出的是：白罗斯人已经不再仅仅想要得到自治或平起平坐的联邦一员地位，还想要完完全全独立。

德国占领当局批准拉达的声明，但柏林的德皇政府既拒绝承认白罗斯是一个国家，也拒绝承认拉达为其代表。这让白罗斯拉达陷于两头不到岸状态。就像当初在乌克兰把保守派的斯科罗帕德斯基拱上台一样，这一次德国人也把一个保守派地主斯基尔蒙特拱为白罗斯拉达的掌舵人。德国人没有把重要权力下放给拉达，只把它作为占领当局和在地居民的中间人，负责为德国军事指挥官提供建议和管理最地方层次的事务。白罗斯拉达既不是民选又没有德国占领当局的力挺，权力基础薄弱，不过它的存在本身还是有助于促进白罗斯为一独立国家的观念。

正是在这一段时期，白罗斯弄出了自己国家的象徵物：一面白、红、白横条纹的国旗和一个以持剑骑士为主体的盾形纹章，这纹章的构图可追溯到立陶宛大公国的时代。白罗斯拉达在维尔纽斯、基辅、柏林和其他欧洲国家首都设有外交代表机构，发行邮票，支持文化和出版项目。白罗斯运动领导者之一的拉斯图斯基写出《每个白罗斯人必须知道的事情》一书，指出白罗斯人民族「信仰」的基础何在。这本书大肆攻击宗教，试图让白罗斯农民用来思考身分认同问题的范畴从宗教改为民族。

拉斯图斯基这样写道：「第一个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是这个：我们是谁？如果我们问我们的同胞：『你是什么信仰？』那么天主教堂区的教民会回答：『我是波兰人。』而东正教堂区的教民会回答：『我是俄

罗斯人。』」「但真的是这样吗？」261拉斯图斯基继续写道。他的回答是「否」。「所有上天主教教堂的人不是波兰人，不是法国人，不是义大利人，而是天主教徒。凡是上〔东正教〕教堂的人不是属于俄罗斯信仰，而是属于东正教信仰……当有人问你们：你们是属于什么信仰，你们是什么民族？你们应该如此回答：我们是白罗斯人！─因为我们是讲白罗斯语。」拉斯图斯基主张，除了语言，白罗斯人身分的另一个指标是血统、共同祖先和住在同一片祖居地。在血统这件事情上，拉斯图斯基的同道中人和第一本白罗斯语地理学着作的作者斯莫利奇主张，他的国人同胞是血统最为纯正的斯拉夫人，因为俄罗斯人的血液已经受到蒙古人和芬兰人污染，乌克兰人的血统则受到了鞑靼人的污染。

从一九一七年三月至一九一八年三月短短的一年间，白罗斯民族运动就像乌克兰民族运动一样，做出了一个巨大跳跃：从仅要求文化自治改而要求完全地独立。尽管强度不同，乌克兰民族运动要强很多且更成熟，两个民族运动都是受惠于德国的占领政策。俄罗斯民族主义领袖和自由派政治人物都没有把它们当一回事，认为那只是德国人的阴谋。这两群人在一九一七年年底和一九一八年初离开基辅，在南俄罗斯的顿河地区找到下一个避风港，得到了最后一次恢復俄罗斯国家统一性的机会。他们将对新形势做出充分利用。

一九一九年一月，义勇军─即由前帝国将领一九一七年晚期在顿河地区组成的白军，开始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中部推进。率领大军的是将军邓尼金，他是在科尔尼洛夫和阿列克谢耶夫于一九一八年相继去世后取得白军的军事和政治控制权。

虽然有着一半波兰人血统，邓尼金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论的坚定支持者。他有各种理由痛恨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放弃了一些歷史上原属俄罗斯的领土。他也反对他的前同袍斯科罗帕德斯基，指他不该与德国结盟。在邓尼金看来，乌克兰运动是一种威胁，不管那是发生在乌克兰还是在他自家后院，即俄罗斯南部的库班地区：那里的乌克兰哥萨克人正在梦想与乌克兰统一。一九一八年夏天，为防库班先一步为布尔什维克或斯科罗帕德斯基政权所得，邓尼金派兵进入库班。一九一八年秋天，他解散库班哥萨克人的拉达，处决亲乌克兰的领导层，从而解决了自身内部的乌克兰问题。

就理论上而言，白军的领导人和任何特定党派都没有牵扯，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政府形式也没有既定立场。但实际上，这些领导人和前杜马中的进步集团成员关系密切，也仰赖他们政治和思想上的支持。进步集团除了包括立宪民主党人，还包括舒利金之辈的君主主义者。舒利金在

一九一八年秋天回到顿河地区，成为邓尼金将军重要政治顾问，不仅帮忙制定白军的乌克兰政策，还负责执行。

随着邓尼金在一九一九年八月攻占基辅，舒利金有机会把他对乌克兰问题的解决方案用于乌克兰其他地区。他是邓尼金进入基辅前夕发表的纲领声明〈告小俄罗斯居民书〉的主要起草人。声明中提到，俄罗斯语会被定为国家机关和教育系统的用语，但这并不表示「小俄罗斯语」会被视为非法。「小俄罗斯语」会被允许在小学中使用，以帮助学生掌握俄罗斯语。此外，私立中学和法院系统也被允许使用「小俄罗斯语」。这种路线和立宪民主党在一战前倡议者非常相似，又特别是与司徒卢威的思路相似，因为司徒卢威虽然反对禁止乌克兰的语言和文化，但认为它们只适合用来服务社会的下层阶级，较高的文化领域应该单独保留给俄罗斯语。

这种由舒利金制定和获得邓尼金批准的官方政策对乌克兰人的文化是一大打击，在中央拉达或斯科罗帕德斯基积极扶植本土文化的政策的对照下尤显贫乏。事实上，白军的领导人根本不愿意履行邓尼金在声明中的承诺—给予乌克兰大众使用乌克兰语的最低自由。在基辅和其他为白军所控制的城市，义勇军查封乌克兰语报纸、学校和事业单位。舒利金的长期盟友萨文科被委任为宣传机构负责人。在他的雷厉风行下，乌克兰语店招牌匾一律被俄语店招牌匾取代，凡是坚决这样做的楼宇业主都会被罚款。

乌克兰人把白军对乌克兰文化的侵犯一状告到法国和英国的首都。这两个西方强权支持邓尼金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努力，但仍然设法约束义勇军军官反乌克兰语的狂热。他们的最优先目标是让乌克兰和白军形成联合阵线，一起对付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白军因为攻打莫斯科失败而撤退之后，因而这个反布尔什维克联合阵线的目标更加必要。面对布尔什维克的步步进逼，白军最终在克里米亚和南乌克兰的接壤地区找到栖身之所。一九二○年三月，将军弗兰格尔接替邓尼金的总司令职位：他指责他的前任太狂妄，犯了同时对布尔什维克和乌克兰人作战的错误。虽然白军形势日挫，但弗兰格尔只愿意比照对待顿河哥萨克人的方式，给予他的潜在盟友乌克兰人领土自治权。一九二○年秋天，在弗兰格尔政府的控制土地缩小到只比克里米亚半岛多一点之后，它愿意做出的最大让步仍然只是答应把乌克兰问题交由未来的乌克兰制宪会议解决。就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来说，这个让步意义不大。

一九二○年十一月，布尔什维克军队进入克里米亚，迫使弗兰格尔带着他十五万人的部队投奔伊斯坦堡。决定留下来的志愿军近五万名士兵悉数被布尔什维克屠杀。随白军消失的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观念，而

杜马的进步集团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推出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方案亦沦为一纸空文。现在，俄罗斯问题轮到由战胜的布尔什维克来解决，他们控制下的是一个领土缩小但幅员仍然非常辽阔的多民族国家。

249 「俄罗斯社会民主劳工党」于一八九八年成立，至一九○三年分裂为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和马尔托夫领导的「孟什维克」（意为少数）。

250 Mykhailo Hrushevskyi, Na porozi novoi Ukrainy: Statti i dzherel'ni materialy (New York, 1992), 146.

251 Vladimir Lenin, Polnoe sovranie sochinenii (Moscow, 1969), vol. 32, 350.

252 同上，vol. 35, 144.

253 Nikolai Azovtsev, Direktivy komandovaniia frontov Krasnoi armii, 1917-1922 (Moscow, 1971), 45.

254 Viktor Savchenko, Avantiuristy Grazhdanskoi voiny (Moscow, 2000), 53.

255 《布列斯特 - 立陶夫斯克条约》是苏俄与同盟国签订的和约，苏俄在签订和约后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

256 Anna Procyk, Russian Nationalism an Ukraine: The Nationality Policy of the Volunteer Army During the Civil War (Edmonton, 1995), 73.

257 同上，74.

258 Anders Rudl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Belarusian Nationalism, 1906-1931 (Pittsburgh, 2015), 73.

259 同上，74.

260 Nicholas P. Vakar, Belorus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A Case Study (Cambridge, MA, 1956), 103.

261 Rudl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Belarusian Nationalism, 90.

第五篇　牢不可破的联盟

第十三章　列宁的胜利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是寒冷冬日，两千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女聚集在莫斯科大剧院的正厅。同年稍早，在经过漫长讨论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决定不关闭莫斯科大剧院。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用得着它来表演芭蕾舞和歌剧（这些东西当时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文化的颓废产物），而是党和苏维埃的会议得使用这些大型场地。一九二二年最后几天在它里面举行的代表大会是歷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它身负一个划时代的任务：创建新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262。

大多数与会者都是二十来岁，经歷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最近的革命洗礼，其中近百分之九十五是共产党员，即「全俄罗斯社会主义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成员或候选成员。他们分别代表四个名义上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其中三个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罗斯）属于前革命时代的帝俄民族。俄罗斯人代表共一千七百二十七人，占总数二千二百一十五人全体代表中的绝对多数。所以，这个会议虽然被称为「全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实际上却是一个俄罗斯人的大会，其他的非俄罗斯人代表只是用来妆点。这个大会也形同橡皮图章，作用是为党中央已经做出的决定背书：宣布成立一个领土涵盖大部分俄罗斯帝国的联邦制国家。全部代表按照吩咐投票，十二月三十日遂成了苏联的诞生日。

大会选出列宁为名誉主席，发言的代表也纷纷向他致上敬意，但列宁本人却不在现场。这位五十二岁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几个月来为创建苏联殚精竭虑，此时正待在克里姆林宫。从他的住处到莫斯科大剧院没几步路，但他就是到不了。八天前的十二月二十二日，他严重中风，双腿和右手瘫痪。两天后，以史达林为首的党干部委员会严格限制他的活动范围，有效地把他孤立起来。这些限制除了是防止列宁健康进一步恶化，也是别有政治用心。

史达林（列宁对这位身兼党总书记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即部长〕的同志愈来愈不客气）在大会上做了两个主要报告，一个是关于苏联的创立，一个是关于各共和国的缔盟条约。报告遵循列宁的方针，但列宁依然不信任他，担心他会因为捨不得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而暗中动手脚。史达林原本希望乌克兰、白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包括亚美尼亚、亚塞拜然和乔治亚）仿效巴什科尔托和克里米亚这些自治共和国的例子，加入俄罗斯联邦。这样，它们的地位将会在莫斯科的俄罗斯政府之下。但因为遭到这些共和国的抗议和列宁的施压，他不得不放弃计

画。列宁坚持要创建一个包括俄罗斯在内、各共和国平起平坐的联盟。

因为无法出席大会又担心史达林不贯彻他的路线，身体部分瘫痪的列宁决定把自己有关民族问题的想法口授下来，交给党的领导层过目。十二月三十日，也就是代表大会通过创建苏联的同一天，列宁开始口授他对民族问题看法的最后文章，至第二天完成。题为〈关于民族或「自治化」的问题〉，文章以书信体的形式抨击史达林的民族政策，批评联盟的缔盟条约赋予各共和国的权利不足以阻止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在列宁看来，俄罗斯帝国民族主义构成了对苏联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威胁。他想建立的是一个脱下帝国形式的政府结构，至于要不要保留帝国实质则是另一回事。

列宁对苏联的构想源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宰制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打着俄罗斯人民联盟或其他民族主义组织旗号进行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动员。他从不相信有「全俄罗斯民族」存在，所以已经准备好把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视为各自不同的民族。在他看来，大俄罗斯人一直处于宰制地位，而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虽然被认为是「单一俄罗斯民族」的成员，却一直处于被压迫地位。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前，列宁的民族政策和声明都是着眼于争取非俄罗斯民族的支持以推翻现有政权，不是为了管理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秋天接管的那个多民族国家。不过，想要在野的布尔什维克承认非俄罗斯人拥有自决权很容易，但想要他们在夺权成功之后保持一贯立场却大不易。

列宁对待中央拉达的立场和政策反映出他对民族性问题的思考在一九一七年经歷了哪些转变。一九一七年夏天，当时布尔什维克仍然在野，列宁发声支持中央拉达，认为临时政府对乌克兰的态度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但在十二月布尔什维克夺权成功之后，他却一改态度，否定中央拉达有自决权或有权脱离俄罗斯，又指控它推行资产阶级的政策，拒绝承认其为劳动群众的合法代表。

列宁和他的同志花了好一阵子才摸索出他们应该採取哪种民族政策。对一个领导阶层以非俄罗斯人居多的政党来说，这件事情极不容易。托洛茨基出生在乌克兰的犹太家庭，史达林则是乔治亚人而且以自己的母语开始其文学写作生涯，他们都是最杰出的非俄罗斯裔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起初就投身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事业，而非选择投身本土反帝国主义运动所提供的民族主义事业。但党高层还有其他人，对这些人而言，要他们恢復国际主义信仰极为困难。身为训练有素的战术

家，列宁为党及其支持者制定了新的路线。

列宁最后为布尔什维克制定的民族政策，是为了回应乌克兰在一九一九年之局势的一条新路线。那年夏天，在白军将领邓尼金和乌克兰「执政内阁」—中央拉达的继承者—的军队联手下，布尔什维克军队被逐出乌克兰。布尔什维克中的乌克兰人把这次军事和政治失败称为「一九一九年的惨痛教训」，归咎于党的民族政策阙如。有鑑于此，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九年年底夺回乌克兰之后，觉得必须改弦易辙，才能长治久安。于是，一个充门面的独立「苏维埃乌克兰」被恢復过来，但上次的「惨痛的教训」让他们知道还必须做更多事方可安抚难驾驭的乌克兰农村地区，以获得其信任。在大城市，布尔什维克获得俄罗斯裔或俄罗斯化的无产阶级支持，但操乌克兰语的村庄一贯以来都对无产阶级革命抱有敌意。

乌克兰农民在革命的头几年经歷了快速的民族动员。中央拉达和后来的执政内阁（两者都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成功地把他们原有的小俄罗斯人身分认同转换为乌克兰人身分认同。这种转换让农民的政治态度丕变：一战前，他们在杜马选举时会把票投给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但现在却乐于让子弟加入乌克兰军队，对抗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想要把农民争取过来。他们发现，农民关心乌克兰，喜欢别人用乌克兰语对他们说话，但很少布尔什维克政委懂得说这种语言。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主要是俄罗斯裔或犹太裔，还有四分之一是高度俄罗斯化的乌克兰人。正如列宁看出的，党想要得到乌克兰人的支持，就必须吸纳更多乌克兰干部和重视他们的语言及文化。

现在，布尔什维克必须也会说乌克兰语。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上旬，列宁在中委会讨论如何统治乌克兰时，敲定了一个特别决议。他提醒他的同志，乌克兰人在沙皇统治下备受迫害和歧视，啕吁他们想办法让农民在政府各级机关都可以用乌克兰语洽公。绝不可让歧视继续存在。他写道：「应该马上採取措施，确保所有的苏维埃机关都有足够数量会说乌克兰语的工作人员，并确保未来所有工作人员都能够用乌克兰语达意。」263

当然，有鑑于布尔什维克的成员构成样态，这件事说易行难。雪上加霜的是，同一个决议又禁止政府机关任用属于城市中产阶级的乌克兰人—这是因为党中央不信任这些人对党的忠诚度，但十之八九也是因为不想让乌克兰的社会主义者能够控制当地的政府机关。不过，在乡村，列宁欢迎新的政府机关纳入贫苦农民（传统上他们是党的有力支持者，以及纳入拥有中等面积土地的地主），这样的地主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他写道：「必须让苏维埃机关和乌克兰土着农民保持紧密的联繫，

为此规定：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即使在刚成立、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应当保证劳动农民的代表在这些机关里占多数，并且要保证贫苦农民代表能起决定作用。」264

列宁固然形式上承认苏维埃乌克兰为一独立共和国、鼓吹当地机关起用乌克兰农民为干部，并在语言和文化的问题上让步，但这并不意味他准备在关键议题上让步，也就是说，他不准备让乌克兰独立。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下旬起草和一九二○年一月发表在布尔什维克喉舌报《真理报》的〈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中，列宁没有隐瞒他不乐于看到乌克兰独立，明白表示他偏好的选项是「各族人民的自愿联合」。不过，在当时，他不想和他在乌克兰的新盟友「斗争派」就这个问题争吵。斗争派是「乌克兰社会主义革命党」的一个分支，之前曾与布尔什维克联手对付邓尼金。列宁写道：「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有人主张乌克兰完全独立，有人主张建立较为密切的联邦关系，也有人主张乌克兰和俄罗斯完全合併。为这些问题而发生分歧是不能容许的。这些问题将由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来解决。」265

列宁愿意让乌克兰独立的议题保持开放性，是为了避免乌克兰的反邓尼金阵线发生内部矛盾。不过，一旦局势变得较为稳定之后，他便利用得到的第一个机会粉碎他一些盟友所支持的乌克兰独立运动。一九二○年二月上旬，列宁起草了一个党中央决议，下令苏维埃乌克兰的政府（称为「革命委员会」）准备好肃清斗争派，它现在已被定性为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决议指出必须把斗争派视为「一个以鼓吹分散兵力和支持盗匪活动来破坏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党派，它的所作所为正符合白军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利益。他们反对『与俄罗斯联邦结成紧密或最紧密联盟』的口号，这同样是有违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必须系统性和毫不动摇地致力的目标，是在不久的将来肃清『斗争派』」266。

肃清命令在翌月即一九二○年三月下达，斗争派随即被解散，它的其中四千名成员，约为原有人数的四分之一，加入了乌克兰布尔什维克，但不是以团体的方式加入，而是以个人的方式，因此完全是听命于莫斯科。在独立的乌克兰共和国和联邦结构的俄乌关系的门面背后，是高度极权的布尔什维克，其成员也完全听命于莫斯科。虽然乌克兰共产党也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但他们对党政策的发言权没有比俄罗斯外省的地方机关多多少。列宁愿意保持乌克兰国家的外观，并给予当地居民尤其是农民语言和文化权利，以便把他们融入布尔什维克机构。如果布尔什维克的「土着化」是把真正土着纳入布尔什维克的必要代价，列宁愿意付这个代价，但土着干部不被容许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整合性指手画脚。这些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年底和一九二○年年初制定的原则将成为

布尔什维克民族政策的基石，也界定了列宁和史达林两人对苏联结构的构想。

苏联的形成之路开始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地点是拉帕洛，那里是义大利一处度假胜地，离热那亚半小时车程。拉帕洛是苏联代表团到热那亚参加国际会议的落脚处。在会议上，三十四个国家一致同意，它们的银行回归金本位制，试图以这个方法遏制战后的通货膨胀和振兴各国备受战争蹂躏的经济。会议开始于四月十日。六天后的四月十六日晚上，德国代表团住宿处的电话响起。来电者是一名苏联外交官，他建议德国和苏联签署条约，同意放弃对彼此求偿的权利，以此重启贸易和经济合作之路。德国代表通宵达旦讨论这个建议，第二天去到苏联代表团在拉帕洛的住宿处，签署协议。这对布尔什维克政府来说是一大突破，因为这是第一次有国家承认它是俄罗斯帝国尚余领土的合法继承人。英国和法国相继在一九二四年承认布尔什维克政府，但美国会迟至一九三三年才跟进。

《拉帕洛协议》是苏联外交委员奇切林的一人之功。他不但需要克服国际的阻力，还得克服国内的阻力。因为他除了代表俄罗斯签字，还企图为其他名义上独立的共和国签字。这个企图引发后续反应，导致在哈尔科夫的乌克兰政府和在莫斯科的俄罗斯政府发生冲突。根据双方的军事同盟协定，在未得到乌克兰政府同意下，俄罗斯当局无权对乌克兰机构发号施令。但俄罗斯当局老是这样做，不仅插手乌克兰的国防、经济、运输和金融这些核心领域，还插手贸易、农业、司法和摆在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国际事务。

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提出抗议。莫斯科为此成立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在发现投诉成立后做成决议，谴责奇切林的人民委员部。作为一项特殊安排的一部分，乌克兰和白罗斯这两个名义上独立的共和国，连同乔治亚、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在内的外高加索联邦，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加入了《拉帕洛条约》。正式独立的共和国有权管理自己的外交事务，却管不了国内的经济和金融事务，这一次的情况让苏联国内外的人都看得煳里煳涂。苏联军事指挥官伏龙芝（他也是负责调查乌克兰对奇切林投诉的人）在回顾时认为，这事件就是最终促成创建苏联的起点。

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后，乌克兰问题取代波兰问题，成为了中央政府在民族政策上最关键的议题。在莫斯科控制的地区乌克兰人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是继俄罗斯人之后最大的族群，构成了联盟中近一半的非俄罗斯裔人口。第三大民族是白罗斯人，占整个苏联人口略低于百分之三。乌克兰人也表现出独立的强烈愿望，而且就连在莫斯科领导层，也有主张让乌克兰独立的乌克兰人存在。

不过，在一九二二年夏天，不满意俄罗斯把其他共和国看成下属的不仅止于乌克兰人。乔治亚的共产党人一样主张，他们应该拥有如同独立共和国一样的权利。正是这个冲突导致的谈判促成了苏联的形成。乔治亚人抗议把他们纳入外高加索联邦的做法，这是列宁所倡议，为的是把巴库的石油生产与乔治亚的运输系统连结起来。一九二○年八月，史达林和他在高加索的左右手奥尔忠尼基泽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研议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一套相互对待的新模式，呈交给中央委员会定夺。身兼党总书记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史达林主持该委员会。正如可预期那般，史达林因为对俄罗斯政府和其他共和国政府的关系有欠清晰而感到沮丧，且被深深捲入两者的冲突中，他竭尽所能创造出一个不仅可以消除模煳还可以强化中央的构想。

史达林的这个构想称为「共和国的自治化」，内容直截了当。所有名义上独立的共和国都将会被整合到俄罗斯联邦，拥有如同克里米亚和巴什基尔267等自治共和国的自治权。俄罗斯联邦的政府将成为苏联的中央政府，直接对各共和国发号施令。但有几个共和国不买帐。乔治亚人是率先反对史达林构想的急先锋，称统一的时机尚未成熟，而乌克兰人也表示宁愿维持现状。白罗斯人则说，他们愿意接受乌克兰愿意接受的任何关系模式。

史达林拒绝让步，想要强推他的自治化计画，后来受到列宁制止才作罢。尽管有这样的冲突，两人对民族问题的态度基本上大同小异。两人都不怀疑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应该高度集权，不管採取任何官方政策都是主要管治机构。双方也一致认为，对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必须让步，俾使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合流。两人的不同更多是在战术而非战略方面。史达林坚持各共和国在俄罗斯里面自治，这和白军弗兰格尔将军的政府给予乌克兰人、顿河哥萨克人，以及其他地区的自治无太大差别。反观列宁则愿意再往前走一步，为各民族提供一个联邦制国家，俄罗斯作为其中的一个自治共和国，而这多多少少就是格鲁舍夫斯基和乌克兰中央拉达在一九一七年主张的路线。

当共产党官员在一九二二年夏天争论应该给予各共和国何种权利时，列宁决定站在乔治亚人和乌克兰人一边。在他看来，把各共和国纳入俄罗斯联邦，特别是在违反他们领导人意愿的情况下，会让俄罗斯人显得是个帝国主义主子，有违「各族人民自愿联合」的理念。列宁对共和国未来的想法深受他想要团结全世界各民族工人阶级的愿望影响。他深信，苏维埃的生存有赖世界革命的成功，而世界革命的成功又有赖德国、法国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崛起，以及有赖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国、印度和亚洲西方殖民地的崛起。所以，想要取得全球范围的革命成功，必须

满足各共和国的自治愿望。

所以，列宁不打算扩大俄罗斯联邦，而是建议欧洲和亚洲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缔建一个联盟。其成员理论上是平起平坐，由一个全联盟的政府负责治理。史达林固然也承认，像这样扩大的俄罗斯联邦会让人印象不佳，但仍主张直接把俄罗斯政府升格为全联盟（all-Union）的政府。在他看来，没有必要让多一层的官僚机构存在。但列宁不肯让步，因为对他来说，成立联盟是原则问题，不是一种权谋。必须用某种办法去安抚上升中的非俄罗斯民族主义，但史达林的构想却是走昔日民族不平等的老路，而俄罗斯帝国就是因此被推翻，因而苏维埃国家一样也有可能因此被推翻。

一九二二年九月，有见于史达林与各共和国之间的冲突日益严重，列宁把包括史达林和乔治亚共产党领导人姆迪瓦尼在内的一批官员找来，讨论关系正常化的计画。他成功说服史达林接受他的联盟方案。在写给布尔什维克领袖之一卡米涅夫的信中，列宁说出他的动机：「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去摧毁他们的独立性，而是再建一层新楼–权利平等的共和国联邦。」268一九二二年十月上旬，他给卡米涅夫写了另一封短信：「卡米涅夫同志，我宣布我要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一决死战……绝对要坚持，全联盟中央执委会的主席要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乔治亚人等轮流担任。」269史达林、卡米涅夫和其他人同意以列宁的观念为基础，创建一个联盟。此议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获得全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通过。

虽然这是列宁愿景的重大胜利，他并没有什么好庆祝的。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只能躺在床上的他狂热地口授他对民族问题的观点，又对于苏联是否可以把各共和国团结在一起表示怀疑。原因很简单：虽然史达林表面上顺着他的愿望，列宁却意识到这位党总书记的作为不仅威胁着联盟的基本原则，还威胁着他本人的权力。

史达林用来对付不听话乔治亚共产党人的武器不仅止于党的决议，还加上拳头。他在高加索的打手奥尔忠尼基泽曾揍了一个反对史达林的乔治亚领导人一顿。乔治亚人一状告到党中央之后，史达林任命亲信捷尔任斯基调查此事。捷尔任斯基是祕密警察首脑，调查后主张错不在奥尔忠尼基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列宁和捷尔任斯基一席长谈后因为心情愤慨，突然中风，导致几天后身体部分瘫痪。他现在躺在床上，试图向党的领导层说明史达林的政策有何不妥，以及他们该怎样改革苏联才能抵消史达林的坏影响。

这就是他在十二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对祕书口授的主题。在他看

来，他的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而是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他称其为大国沙文主义，认为俄罗斯化的非俄罗斯人比俄罗斯人更热中推广大国沙文主义，一个例子是史达林的走狗奥尔忠尼基泽：「这个乔治亚人对事情的这一方面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地随便给人安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不仅是不折不扣的『社会民族主义者』，还是粗暴的大俄罗斯恶棍），不知道自己的作为实质上破坏了无产阶级团结的利益。」270列宁在乎的不是奥尔忠尼基泽和史达林冒犯他们自己乔治亚人的民族感情和限制乔治亚人的民族权利。重点是，这两个人都代表着中央，因此有可能害中央背上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罪名。

列宁有见于俄罗斯人在党和国家机器占有主宰地位，可能会用权力来欺压非俄罗斯民族，才会把俄罗斯沙文主义看成对国家统一的主要威胁。他在口授的文章中吆吁善待非俄罗斯人的共和国：「对施压迫的民族或说『大』民族271（其实他们只在『大施暴者』的意义下为大）来说，国际主义不应只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还应该自甘处于一种不平等状态272，以抵消现实中一定会形成的不平等。」

列宁攻击的主要是由史达林控制的政府机器，声称它主要是继承自旧政权，到处渗透着俄罗斯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想要让它不能为所欲为，方法是挪去它部分权力，转移给各加盟共和国。列宁建议取消已通过成立的苏联，用一个结构较松散的联盟取而代之，在其中，中央政府的权力只能及于各共和国的国防和国际关系事务。加盟共和国虽然拥有「退出苏联权」，这是在缔盟条约中明订的，但列宁感觉这项权利也许不足以反制俄罗斯民族主义，所以建议在下一次全联盟的代表大会上进行改革，让中央政府只剩下上述两项权力。根据原通过的决定，苏联中央除了可以主管加盟共和国的军事和国际事务，还可以主管它们的经济、金融和通讯。

事实证明，〈关于民族或「自治化」的问题〉不仅是列宁谈民族问题的最后作品，也是他写给党领导层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直到一九二三年三月才被公开。史达林不遗余力地把列宁隔离于党的其他领导人，为此不惜与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撕破脸，指责她不应该把政治消息传递给丈夫，因为此举会威胁列宁的心灵平静，有碍其健康。史达林一度对她这样说：「我们要看看妳是列宁的哪种太太。」言下之意是，如果她是个好太太，列宁就不会曾经有婚外情。列宁听说克鲁普斯卡娅受辱后勃然大怒，要求史达林道歉。史达林回信说他已经道过歉，但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因为他只不过是在尽力保护领袖，让其不会产生不必要的焦虑。列宁的焦虑指数在得知史达林把大批人马安插在民

族院[273]之后明显升高。盛怒的他试图把托洛茨基拉过来帮他一起斗争史达林，但未获对方回应。一九二三年三月六日，列宁口授了他写给乔治亚共产党人的打气信。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份文件，因为翌日他第三次中风，落入完全瘫痪状态。

在列宁的施压和各共和国的反抗下，史达林放弃了他的自治化方案，接受了联盟选项。但他坚决拒绝邦联制[274]。在一九二三年四月的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和他的人马成功粉碎以乔治亚和乌克兰为首的发难者。乌克兰政府领导人拉科夫斯基发言时引用列宁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的问题〉里的话，抨击党和政府机器已沦为大国沙文主义的代理人，建议把中央政府九成权力转移给各共和国。

拉科夫斯基声称民族问题攸关社会主义革命的成败：「这会影响到能否让有革命精神的俄罗斯无产阶级和六千万非俄罗斯人农民团结在一起。」[275]史达林不为所动，这样回应：「把伟大的俄罗斯无产阶级放在一个比从前被压迫民族低下的位置是荒谬的……如果我们不惜牺牲无产阶级地区而向边区的农民区太过倾斜，那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也就会出现一道裂痕。」[276]赢得这一仗的是史达林和他人马。直言不讳的乌克兰领导人很快就会被拉下马，下放到伦敦当大使，过上体面的流放生活。

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支持各共和国本土文化的政策，想用这种小甜头安抚各加盟共和国政府因为权力被剥夺和联邦主义原则被侵犯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制定这种政策的季诺维也夫把党的用心说得很清楚：「在乌克兰和类似的地方，我们不能採取中立的立场，即不能说：那里有两种文化正在发生冲突，我们会静观其变。特别是在我们的党掌权的现在，这不是我们的立场。我们应该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我们想要做到的是这样：例如，当亚塞拜然农民看到一间以母语教学的学校在他们的土地出现时，会想要感谢的是共产党人，特别是俄罗斯共产党。」[277]

在第十二次党代会大会，史达林也接受了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国家统一性主要威胁的列宁观点，但拒绝让非俄罗斯民族主义坐大。在总结发言时，他强调：「我们的建设工作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望成功，那就是进行一种两方面的斗争，一是斗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它是建设工作的根本威胁，二是斗争地方沙文主义。因为没有这种两方面的斗争，就不可能指望把俄罗斯和其他民族的工农团结起来。否则就有可能会助长地方沙文主义，而奖励地方沙文主义是一种我们不能容许的政策。」[278]

列宁没有出席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他从一九二三年三月中风后从

未出现康復迹象，并于翌年一月去世。列宁逝世五天后的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全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但大会没有像列宁当初所期望那样能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他们只是直接通过原订的新宪法和聆听史达林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宣誓效忠。他这样发誓：「和我们永别时，列宁同志嘱咐我们要强化和扩大这个共和国的联盟[279]。列宁同志，我们向你发誓，我们一定会光荣地实现你的遗命！」[280]列宁认定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国内政治的主要威胁，而这一点将会是接下来十年史达林民族政策的主要方针。所以，他确实有忠于列宁的思想，只不过不是全部。

史达林採纳列宁的联盟构想，但把它按照自己的需要捏塑。他的共和国「自治化」政策现在穿戴成一个联盟的样子。即使是全联盟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其宣布苏联的创建），事实上也是一个俄罗斯的苏维埃大会，其他共和国的代表只是花瓶。苏联议会的民族院有三分之二的成员是俄罗斯人。更重要的是，在史达林布局下表面上是改变了，但是苏联权力结构的真正统治是布尔什维克党。它继续是称为「全俄罗斯」共产党和由莫斯科控制。反观其他共和国的党组织并没有比俄罗斯的地方党组织有更多权力。乌克兰共产党人拥有的自治权就像他们在克里米亚或巴什基尔的同僚一样多，或说一样少。

在邦联制的议题上，列宁并没有如愿，我们无法确定他对邦联制的钟情是真心实意还是藉它来跟史达林针锋相对。但他还是在联盟结构的问题上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最终对俄罗斯民族的影响将会大于对其他共和国的非俄罗斯人。列宁的胜利在联盟内为俄罗斯人创造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让他们有了自己的领土、机构、人口和一种不同于联盟整体的身分认同。在史达林所设想的国家里，俄罗斯人会继续分享帝国时代的许多特徵，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帝国更名为联盟；但在列宁设想的国家里，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开始寻找一种不同于帝俄时代的身分认同。几乎是预设的那样，列宁成为了现代俄罗斯民族之父，而苏联成为了这民族的摇篮。列宁的胜利在敲碎革命前的「单一俄罗斯民族」观念起了重要作用。其结果是，不管是俄罗斯人看待自己还是别人看待他们的方式，都将发生重大转变。

262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简称「苏联」（USSR，或者 Soviet Union）。

263 Vladimir Lenin, Polnoe sovranie sochinenii (Moscow, 1969), vol. 39, 335.

264 同上。

265 同上，vol. 40, 45.

266 同上，vol. 39, 251.

267 即今日俄罗斯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

268 同上，vol. 45, 212.

269 同上，vol. 45, 214.

270 同上，vol. 45, 360.

271 这里的「大」民族原指「伟大」民族。

272 指俄罗斯联邦应该让别的共和国占一些好处才算真正的平等。

273 相当于美国的参议院，其依照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民族区选出一定比例的代表。

274 指他坚拒列宁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的问题〉中所建议的，把苏联改为一个「结构较松散的联盟」。

275 Dvenadtsatyi s’ezd Rossiisk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Moscow, 1923), 529.

276 同上，596.

277 同上，604.

278 同上，598.

279 指苏联。

280 Propagandist, no. 21 (1939): 22.

第十四章　民族共产主义

碰面地点是近苏联边境一个波兰小镇的火车站餐厅。一个中年男子向一个年纪更大和蓄灰色鬍子的男子出示作为信物的火柴盒。蓄鬍男子是出生于基辅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舒利金，他曾在让尼古拉二世逊位一事上出过力，后来又当过白军将领邓尼金的顾问。前几星期他都待在如今是波兰一部分的沃里尼亚，为祕密进入苏联做准备。另一个男人是负责把他偷渡过边界的人蛇头子。

舒利金此行是要跟一个祕密君主主义者组织的领导层会面，该组织和欧洲俄罗斯流亡人士圈子已经建立起联繫。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深夜，舒利金越过波／苏边境，先后去了基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见到了俄罗斯君主主义者的领袖。他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离境，事后把所见所闻写成《三个首都》一书，在流亡西方的俄国人圈子引起轰动和诋毁。舒利金偷偷进入苏联不仅为了评估这国家的政治气候，还想要了解它新採行的称为「本土化政策」的民族政策带来何种结果。书中，他批判了苏维埃政权，但认为布尔什维克思想正在退潮：列宁在内战以后重新引入一些带有市场经济成分的「新经济政策」，让国家恢復健康，使人对俄罗斯能重新伟大起来怀抱希望。舒利金力主：「俄罗斯没有死去。它不仅仍然活着，还丰沛多汁。」281

舒利金有所不知的是，他在基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整个行程都是由苏联祕密警察GPU「国家政治管理局」所安排，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不管是帮助他偷渡边界的人或是与他会面的君主主义组织的领袖，全是GPU的特工。整个骗局原是为了把白军运动最后一位领导人弗兰格尔诱至苏联，予以逮捕。看见弗兰格尔没有一道来，GPU决定利用舒利金来影响那些反共产主义流亡者的看法，让他只看见布尔什维克实验中最光明灿烂的一面。舒利金果然中计，离开时深信俄罗斯正在復兴，认定布尔什维克在无意中促成了伟大俄罗斯国家的重生。事实上，他的书在出版以前甚至经过GPU「校对」。不过，虽然受到GPU愚弄，但舒利金在评估「本土化运动」的强项和弱项时却是卓有见地。

本土化政策的总设计师和推动者是史达林，他先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后又当上党总书记。尽管史达林和列宁对于苏联应该採取何种结构持不同看法，但这两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致认为，民族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愈早让民族主义蓬勃发展，一个社会便愈能迅速通过该阶段，迈向国际主义社会的更高境界。

本土化政策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政治和社会部分，另一是文化和

语言部分。该政策是在一九二三年四月的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当时列宁虽已离开政治舞台，但该政策是根植于他谈乌克兰问题的着作，特别是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的那一批，当时红军刚从邓尼金的军队和彼得留拉领导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手中收復乌克兰。在这些文章中，列宁主张把本土干部纳入苏联的机关中。本土化政策追随这个方针，採取积极行动把非俄罗斯人吸纳到加盟共和国的党部和政府，要以此创造出一批忠于莫斯科的地方菁英。本土化政策的文化部分要求促进在地的语言和文化，一开始是支持在教育、出版和戏剧表演上使用在地语言，最终是党和政府机关的在地语言化，先是在地方的层次推行，渐次及于大城市和首都。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让新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到以非俄罗斯人占大多数的前帝国周边地区。

史达林会拥护本土化政策，不仅因为他就像列宁一样，认为民族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从政治的角度看，吸收本土干部明显可以克服非俄罗斯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敌意━这种敌意在内战期间非常明显，以及减低布尔什维克党结构的中央集权色彩。根据缔盟的条款，乌克兰和乔治亚等名义上独立的共和国必须交出关键的自主权，包括国防和外交的自主权。作为补偿，它们被容许提高本国党部的本土干部人数，以及在行政、教育和公共生活的其他领域促进本土语言。此外，史达林用得着各共和国干部来支持他在莫斯科的权力斗争。作为掌管非俄罗斯人民族事务的党领导人，他有绝佳条件可以把亲信安插到各加盟共和国的党高层，让他们帮助他对抗政治局中的众多对手，例如托洛茨基、卡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在史达林的政治算计中，没有哪个加盟共和国比乌克兰更重要。乌克兰共产党构成了苏联第二大的「自治」党组织，规模仅次于俄罗斯人「拥有」的「全联盟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前称为「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直到一九二三年为止，乌克兰的政府首脑都是托洛茨基的盟友拉科夫斯基，而他也不遗余力利用乌克兰自治主义者的愿景挑战史达林在权力中心的地位。但他在一九二三年春天的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受到排挤，不久以后又被下放至伦敦当大使，此后，史达林使出浑身解数以确保乌克兰布尔什维克的忠诚。一九二五年四月，他把亲信犹太裔乌克兰人卡冈诺维奇任命为乌克兰党部的最高负责人。

乌克兰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之后经歷了一个被称为「奉旨乌克兰化」的阶段，因为这期间当局发布一道又一道命令，要求快速在教育、文化和政府机关各方面推行乌克兰化。如果说在媒体和出版两方面把俄罗斯语转换为乌克兰语的进展迅速顺利，那么在行政管理上改用乌克兰语的进展却是牛步蹒跚。当局把完成任务的最后期限一延再延后仍然无

法达标。抵抗乌克兰化的阻力来自党高层：在一九二四年，其成员有百分之四十五是俄罗斯人、百分之三十三是乌克兰人，百分之十四是犹太人。

乌克兰中委会第二书记列别德提出了「两种文化的斗争」理论。他认为俄罗斯语言和文化代表城市属性，也因此代表工人阶级属性，反之乌克兰语言和文化却是代表农村属性。他主张，在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共产党人必须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而不是站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一边。尽管他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本土化策略之前便被迫停止公开宣传他的理论，但党领导层很多人都同意此说。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造访基辅时，舒利金获得了用亲眼所见评估「奉旨乌克兰化」成果的机会。新政策的迹象随处可见。革命前，基辅火车站前的大道是以在一八三七至一八五二年之间任基辅总督的比比科夫的名字命名；现在却被称为舍甫琴科大道，以尊荣这位于一八四七年在基辅被捕的诗人，当时的总督正是比比科夫。另外，原本屹立在大道上的博布林斯基纪念碑（他是俄罗斯伯爵，基辅地区糖业的奠基者），亦已换成一座纪念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金字塔形纪念碑。政府机关匾额和商店招牌现在都是以乌克兰语书写。

另一件事情同样让舒利金不自在：一九一七年乌克兰革命的领导者格鲁舍夫斯基是他的宿敌，在流亡中欧多年后已经回到基辅。舒利金在基辅必须用爱德华．施密特的化名隐瞒身分，反观格鲁舍夫斯基却是堂而皇之住在基辅。他受到布尔什维克当局欢迎，也是乌克兰科学院的院士。舒利金参观了格鲁舍夫斯基旧居的遗址，原先盖在上面的房子一九一八年一月被布尔什维克的砲火夷为平地。舒利金在旅行日志中写道：「不过，那个时候同样已经过去了。那么，格鲁舍夫斯基先生本人呢？他欣欣向荣。他还活着，是条打不死的老狗……除了失去了共和国的首都，格鲁舍夫斯基本人失去的不多。他的家固然被毁了，但那真的只是一场『误会』。」282何以见得是「误会」？因为他已经和苏联和解，回到了基辅，用黑巫术的语言对苏联歌功颂德。显而易见，歌颂建立「乌克兰共和国」。

不过，舒利金在基辅也遇到了强烈反对本土化政策的人。在从基辅到莫斯科的火车上，他听到有人批评乌克兰化。「我的几个小女儿应该学一种对她们有点用的语言。你说说看，乌克兰语能有什么用！」283一个犹太人女子说，她生于乌克兰，但现在住在莫斯科。舒利金很高兴能在基辅的街头听到有人说俄罗斯语，认为这不单反映着乌克兰化方案的失败，还反映着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失败。事实上，不管布尔什维克政府有多卖力把城市名字和商店招牌改为乌克兰语，或有多么卖力把乌克

兰语引入教育系统，但众人用来交谈的主要还是俄罗斯语。

语言乌克兰化缺乏进展的情形在俄罗斯裔和高度俄罗斯化的工人阶级中间尤其严重，让舒姆斯基耿耿于怀，他原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中斗争派的成员，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二○年代初期成为乌克兰的教育委员284。一九二五年，在史达林让卡冈诺维奇掌管乌克兰党部几个月后，舒姆斯基上书吁请史达林对工人阶级进行乌克兰化，并把党部负责人换成丘巴尔；丘巴尔是乌克兰裔，也是当时乌克兰政府的领导人。舒姆斯基一直对乌克兰化的进度缓慢感到不快，多次要求卡冈诺维奇把乌克兰化政策从党部和政府延伸至工人阶级，皆未获搭理。那个让舒利金感到愉快的现象却让舒姆斯基感到震惊：虽然基辅的商店招牌和许多报纸都是使用乌克兰语，但民众主要还是用俄罗斯语交谈。

卡冈诺维奇这边也向史达林投诉舒姆斯基。一九二六年四月，史达林写了一封信给乌克兰政治局，表明自己支持卡冈诺维奇的立场。信中，他指出舒姆斯基犯下两大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不懂党部和政府的情况不同于工人阶级。有鑑于这种不同，乌克兰化在党部和政府必须按原定计画继续进行，但在工人阶级中间必须停止。「我们绝不可强迫俄罗斯工人集体放弃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史达林写道285。舒姆斯基所犯的第二个所谓错误在于拒绝承认，因为乌克兰党部的本土干部太少，乌克兰化政策现在都是由知识分子主持，所以很可能会让乌克兰化变成「一场让乌克兰文化和社会疏离于全联盟文化和社会的战争，一场反对俄罗斯文化战及其最高成就—即列宁主义—的战争」。

史达林的信不是要攻击乌克兰化政策本身，而是坚持不能在工人阶级强推这种政策，造成他们离心。同样重要的是，乌克兰化的推行必须小心翼翼，避免引起乌克兰公众对俄罗斯的不满。为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史达林命令卡冈诺维奇加快文化上乌克兰化的步伐。一九二六年五月，乌克兰中委会批准了一批相关的新法令，并由卡冈诺维奇本人亲自监督法令的落实。一九二七年，犯上的舒姆斯基被撤去教育委员之职，由老布尔什维克战士斯凯里波尼克接替。斯凯里波尼克将用他全部的布尔什维克热忱和信念推动乌克兰化政策。

正如党的法令，乌克兰化应该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大量，对地方干部的招聘，另一是让既有的机关在语言上乌克兰化。第一个趋势反映在乌克兰裔党干部的大举增加。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间，乌克兰裔在党干部中间变成了多数，占比从百分之三十七增至百分之五十二。与此同时，俄罗斯裔干部掉至百分之三十，而犹太人—乌克兰第二大少数民族—的百分比基本上保持不变，从百分之二十下降至百分之十八。这个对党的乌克兰化行动由卡冈诺维奇亲自领导，他以乌克兰语向一九二

七年的中委会报告此事。

乌克兰语报纸的比例也是大幅增长，从一九二五年的百分之四十增至一九二七年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这期间，乌克兰语书籍的占比也从百分之四十上升为百分之五十四。党和政府官员学习乌克兰语的压力愈来愈大，因为卡冈诺维奇发出威胁说，要是谁没有学好乌克兰语就要开除谁。超过二百五十人因此丢了工作。文化乌克兰化在教育领域的表现最为抢眼：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有近百分之九十八的乌克兰裔小学生在课堂上是用乌克兰语学习。乌克兰化的驱力也影响了大学的教学，如科学和高级文化的领域，乌克兰语课程的占比在一九二七年是百分之三十三，至一九二九年提高为百分之五十八。

不过，在基辅的街头，乌克兰化政策殊少效用。因为乌克兰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甚少，所以大众交谈时十之八九还是用俄罗斯语。这又导致了那些离开村庄到城市打工的乌克兰农民逐渐被俄罗斯化。阻力还来自那些已经俄罗斯化的乌克兰人，尤其是少数民族，他们是乌克兰人口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舒利金有机会在一九二八年再访基辅，八成会发现街头的情况差别不大━一九二八年是卡冈诺维奇离开乌克兰的一年，也是党中央全力推动乌克兰化的最后一年。

本土化政策在不同的共和国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这是因为各地的文化发展参差不齐，文化菁英和公众能够被动员起来支持本土化政策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在乌克兰和乔治亚，党中央必须调整政策以适应众人争取文化与政治自治愈来愈高的吆声。但在其他地方，文化政策是由上向下强加，是一种硬性规定。这时期，莫斯科忙于创造新的民族实体，大力推广用书面语尚未创造出来的当地语言教育在地菁英，发展尚未存在的在地文学。尤其是在北方民族，以及在北高加索和中亚一些民族。在前帝国的西部边区，受益于莫斯科民族打造政策最多的是白罗斯人━在帝国时期，它是三位一体俄罗斯民族的基本一环。

布尔什维克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宣布白罗斯共产党和白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当时德军刚撤出。根据由俄罗斯代表白罗斯签署的《里加条约》（一九二一年），这个共和国把一半以上的领土让给了波兰。虽然只剩下以明斯克为中心的一片狭长土地，白罗斯对莫斯科来说仍然是不可少，因为靠着它，可以遏制由毕苏斯基领导的新波兰国家在乌克兰和白罗斯创建保护国的野心。为了不让波兰人有可乘之机，苏联必须承认白罗斯人为一独立的民族。这是苏联领导层特别是史达林已经准备好踏出的一步，哪怕此举会受到它负责控制该地区的干部的抗议，他们都相信「单一俄罗斯民族」观念。

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闭幕于《里加条约》签订的几天前，史达林竭尽所能让那些不相信白罗斯人是独立民族的党官员闭嘴。他诉诸的是乌克兰人的例子和歷史的必然轨迹。他告诉与会代表：「我听到有人说，白罗斯民族这回事是我们共产党人杜撰出来。这不是事实，因为白罗斯人有自己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和俄罗斯语不同。因此，白罗斯文化只能靠自己的语言得到提升。大约五年前也有人就乌克兰民族说过一样的话。直到不久之前，仍然有人说乌克兰共和国和乌克兰民族是德国人弄出来的把戏。然而，现已清楚的是，乌克兰是一个民族，而帮助它发展自己的文化是共产党人的责任。我们不能和歷史轨迹背道而驰。」286

当局对白罗斯民族的界定是根据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研究，特别是根据卡尔斯基于一九一七年出版的民族学地图。根据该地图，苏联境内的白罗斯人不单存在于属于白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明斯克一带，还存在于莫吉廖夫、维捷布斯克、戈梅利和斯摩棱斯克一带，而这些都是俄罗斯联邦的土地。卡尔斯基地图是苏联的民族工程师之所本，因为他们相信，如果想让波兰人对白罗斯不敢小觑，就必须扩大其疆域。因此，莫吉廖夫和维捷布斯克在一九二四年被划入白罗斯共和国，让其人口一下子增加一倍，从一百五十万人突增为三百五十万人。戈梅利在一九二六年被划入白罗斯。不过，斯摩棱斯克始终留在俄罗斯，因为这地区自一六五四年便一直是莫斯科沙皇国的一部分。

很多时候，这种领土转移不仅没事先谘询当地居民，甚而有违他们的意愿。因为有些操白罗斯语的居民是认同于俄罗斯。和史达林是亲密盟友兼亲戚的叶努基泽谈到这些情况时指出：「这对当地人口是一个打击，而我能够理解白罗斯人的恐惧。他们的孩子对俄罗斯语的掌握胜过白罗斯语，而且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在牺牲这些人的利益……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是受政治考量的指导：我们必须扩大白罗斯，让外国不敢小看它。」287

不过，在莫斯科的外交政策考量中，扩大白罗斯领土的计画不纯粹是防卫性质。有鑑于《里加条约》让白罗斯失去许多土地，这个计画还带有强烈的进攻成分。正如乌克兰的情况一样，布尔什维克希望把白罗斯粉饰成为民族復兴的灯塔，让波兰境内的白罗斯人受其吸引。白罗斯化政策是在一九二一年初，就在签订《里加条约》的几个月前首次成为党的方针。该年一月，三十二名白罗斯共产党人发表了一项声明，吆吁把白罗斯分散开来的领土统一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在共和国的教育和文化生活上推行全面的白罗斯化。当时，白罗斯语、俄罗斯语、波兰语和意第绪语同属共和国的官方语言。而作为共和国最大的民族，白

罗斯语被赋予首要地位，并合法化苏维埃白罗斯的创建和存在。

一九二三年四月的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把本土化政策定为官方政策，让白罗斯化的推力大大增强。在白罗斯，本土化的舵手是伊赫纳图斯基，此君原是白罗斯社会革命党成员，一九一九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一九二○年成为白罗斯的教育人民委员，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之间掌管白罗斯中央委员会的宣传部，一九二八年后担任白罗斯科学院院长。伊赫纳图斯基的前布尔什维克生涯和他的乌克兰同僚舒姆斯基并无不同，因为后者也属于社会革命党的左翼，是领头的民族共产主义者。

由伊赫纳图斯基及其在白罗斯民族共产党人中的盟友所推广的白罗斯化，类似于在邻国进行的乌克兰化，而结果也类似：在把本土干部吸收进新政权各机关一事上表现甚佳，在文化层面去「转变」城市民众这一点乏善可陈。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七年之间，白罗斯共产党的白罗斯裔干部增加了两倍多。自白罗斯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报纸在一九二七年改为以白罗斯语发行之后，以白罗斯语作为官方宣传主要用语的进展取得显着进步。即便如此，白罗斯的语言和文化仍然没能做到独霸印刷媒体的程度：在当时发行于共和国境内的九份报纸中，有四份是用俄罗斯语，三份用白罗斯语，用波兰语和意第绪语的各一份。

白罗斯语推广者不仅在工人阶级和党机关遇到阻力，也在教育系统中遭遇到。问题的根源是白罗斯人，特别是操白罗斯语者在城市占比偏低。一九二二年，犹太人占了白罗斯大学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而白罗斯人只占百分之三十一。党官员决心改变这种局面，方法是把学不会白罗斯语的学生开除，又设法把白罗斯裔大学生的比例拉高至近百分之六十。这种对白罗斯人的厚待意味着对犹太人的歧视，他们占白罗斯城市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而在大学的占比也会相当。强制推广白罗斯语的措施，还有强势扶持多半来自农村的白罗斯人学生的做法，常常引起城市居民的负面观感，他们很多人从一开始就对白罗斯化政策心存疑虑。

就像革命时期一样，一九二○年代中央政府在前帝国西境的民族政策主要是受波兰问题的形塑。但此中仍然有一个重大区别：在一九一七年之前，在地人口是被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旗帜动员起来，目的是对抗波兰人的威胁，但这一次的动员力量却是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的民族主义。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和一九三○年代初期，中央政府的战略将发生进一步的演变：其时，地方民族主义会被搁到一边，部分被传统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一种变体所取代。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舒利金在和一个苏联人谈话时，听到了一个反

对本土化政策的论证。这论证既政治正确又有效：「在我看来，弄出许多小小的民族就是在通向国际主义的道路上设下障碍。同一种语言涵盖的人数愈多和地域愈大，要过渡到国际主义就愈容易。虽然党暂时同意设立独立的共和国，让它们说各自的语言。不过，每一个道地的共产党人员都应该设法恢復俄罗斯语在日常生活的支配地位，让它成为苏联全境的主要语言。」288

很多反对本土化政策的党官员不同程度上也是这种思路。民族议题在党内斗争是一件热门利器，例如，所谓「左派反对派」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就攻击史达林把乌克兰化搞得太过火。但史达林不为所动，继续允许乌克兰化大步前进。这种政策在一九二五和一九二六年维持不变，官方也没有重新评估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威胁孰轻孰重—前者继续被视为主要威胁。但不出几年后，苏联的民族政策开始改变，变得更靠近季诺维也夫对本土化的批评而不是史达林对它的辩护。讽刺的是，这个转变是从史达林解决掉季诺维也夫这个政治对手之后开始。一九二七年秋，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党籍，罪名是从事反党活动。一起被开除党籍的还有托洛茨基、卡米涅夫和他们的支持者。一九二八年，卡冈诺维奇被召回莫斯科。乌克兰化的戏就此唱完。

战胜「政治局」内的对手意味着史达林较用不着加盟共和国的支持，无须再用民族问题上的让步去讨好它们的领导人。GPU奉命去准备对有旧时代背景的知识分子进行第一次大审。这次被抓的人被诬为一个所谓「改变地标」运动的成员，往往是些有着民族意识的老干部，善于利用本土化政策来推进自己民族的利益。史达林和他派到各共和国的新领导人使出浑身解数营造一种印象：在民族政策上，他们不打算追随新近被他们打败的反对派的脚步。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准备好给本土化踩煞车和开闢一条斗争地方民族主义的新战线。

党领导层的权力变化只是民族政策发生改变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要到苏联的边界之外寻找。列宁当初制定的民族政策是着眼于世界革命，是考虑到这可以让未来出现在欧洲和亚洲的共产国家会愿意加入苏联大家庭。但一九二○年代晚期的史达林却没有这种幻想。就像当时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那样，史达林相信，苏联想要在资产阶级敌国的环伺下求生存，唯一能靠的只有自己。

一九二六年，苏联西面边界以外发生了两起保守派政变：第一次政变让布尔什维克的宿敌毕苏斯基得以在波兰当权，第二次政变则让斯梅托纳得以在立陶宛建立独裁政府。史达林和其他党领导人在公开谈话时开始谈到，苏联和西方和平共存的日子也许即将结束。这引起了战争恐慌，人人纷纷囤积粮食和消费品。史达林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宣称，苏联

政权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发生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翌月，英国情报部门突击搜查了苏联设在伦敦的贸易公司「全俄合作协会」，找出证据证明，苏联以该贸易公司作为掩护，搜集有关英国的情报。英国政府宣布中断它和苏联建立不到三年的外交关系。

战争看似一触即发，但红军将领一致表示国家的备战工作尚未完成。祕密警察发现边区的农民对政府愈来愈不满，盼着白军、波兰人或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到来。这种局面让很多人担心，即将在一九二七年秋天上场的苏联十週年国庆也许会是它的最后一次国庆。战争恐慌后来虽然过去，却对苏联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许多学者认为，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之间的战争恐慌归咎于史达林的专制（最终成了独裁统治）、苏联经济现代化的开启，以及工业化和集体化改变了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各加盟共和国继续保有自己的共产党结构和新生的议会，称为「最高苏维埃」并支持当地文化，但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决策权愈来愈出自莫斯科。这些决定将会蚕食各共和国统治阶层的自主权，最终将被整合成一个巨大的金字塔管理中心，并从全联盟中心发出。

大约同一时间，莫斯科政府在民族政策上变得更小心谨慎，尽量不推行可能会让大多数俄罗斯人离心的政策。它也不再认为，非俄罗斯人的文化和政治动员是它可藉以动摇接壤国家和在中欧及西欧引发世界革命的工具，反而愈来愈担心这些动员会被外国拿来充当侵略苏联的据点。这种威胁，不管是真实也好，是幻想出来也好，成为推动党中央重新检讨西部边区民族政策的主要因素。非俄罗斯民族主义得到的支持因此被削减，以防它们会被西方特别是波兰所利用而对中央不利。

把民族政策和国际形势的连动性表现得最明显的莫过于「苏维埃白罗斯」。这个国家的民族政策更多是为了回应国际压力而非国内需要。随着一件和白罗斯直接有关的事件，战争恐慌在一九二七年六月达到高峰：苏联驻华沙大使伏伊科夫遇刺身亡。刺客卡韦达是个十九岁的大学生，隶属一个亲波兰的白罗斯人组织。就这样，波兰境内的乌克兰和白罗斯民族主义一瞬间在苏联眼中从一个机会变成一个威胁。许多党官员开始怀疑，英国正在策动与苏联接壤的国家反对苏联，而这些国家又利用反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罗斯人和波兰人组织动摇苏联国家。

一九二八年，莫斯科派乌克兰领导层的札通斯基前往白罗斯，视察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作为一个善观风向的「公司人马」，札通斯基交出的是一份充满杀伤力的报告。他声称，党队伍中的白罗斯文化復兴运动领袖都是把目光放在农村的狭隘世界，而且很多都和非共产党人的知

识分子过从甚密，其中很多是最近才从波兰流亡而来。札通斯基对白罗斯民族政策的批判导致了对白罗斯党机关、政府机关和科学院的整肃，目的是把民族主义根除。一九二九年年底，教育委员巴利茨基和党新闻部负责人阿达莫维奇以进行民族主义的罪名被革职。加起来有近百分之十的党干部被撤职。其中许多人将会在开始于一九三○年十二月的另一次整肃中被捕和被判处长期监禁。一个受害者是白罗斯化政策的设计者之一，也是科学院院长的伊赫纳图斯基。他在一九三○年去职，一九三一年自杀，预示着一些乌克兰本土化运动领袖的命运−他们在几年后将会落入与他一样的处境。

乌克兰化在莫斯科的眼中没有好多少，札通斯基批评白罗斯时认为它是对乌克兰有样学样。一九二九年秋天，在白罗斯本土化政策的领军人物纷纷被拉下马的同时，GPU对许多有旧时代背景的知名乌克兰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开刀，指控他们是民族主义者，进行了一场广为宣传的大审。共有四百七十四人被指称为子虚乌有的「乌克兰解放联盟」的成员，串通好毕苏斯基和流亡西方的乌克兰人要在乌克兰发动一场起义，使其从苏联分离出来。包括乌克兰科学院副院长叶夫列莫夫在内，四十五位被告罪名成立，被判关进劳改营，刑期从两年至十年不等。格鲁舍夫斯基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和流放。他将会在一九三四年死于俄罗斯，死因可疑。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讨论一批政策时（这批政策将会在几星期后导致「乌克兰大饥荒」，让近四百万人饿死），史达林攻击在一九二七年取代舒姆斯基成为乌克兰教育委员的斯凯里波尼克，指他大力推行乌克兰化是一种反党行为。史达林指出，农民会反抗农业集体化和一九三二年的谷物收购政策，都是毕苏斯基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间谍在背后煽动。接下来几年，史达林和他的宣传机器将会宣称，乌克兰化政策一直受到外国特务和民族主义者的劫持，利用它来不利于党，以之离间广大农民和莫斯科的关系。

政治局下令停止对乌克兰境外进行乌克兰化，所谓的「乌克兰境外」主要是指俄罗斯联邦的库班和远东地区，都拥有可观的乌克兰裔人口。这一决定导致报纸、学校和教师培训机构被关闭，最终又导致几十万乌克兰裔被俄罗斯化。在乌克兰，史达林把党和祕密警察的负责人换成自己人马。除了对俄罗斯化无产阶级的措施喊停，他也终止了对隶属苏联部会的机构和企业的人员的俄罗斯化。乌克兰大饥荒就发生在史达林动手对付乌克兰政治菁英和乌克兰语言及文化之时−这种「凑巧」让今日很多人认为大饥荒是一个种族灭绝阴谋，除了是要剷除农民，还要剷除整个乌克兰民族。

乌克兰化政策的终止和对党官员及知识分子的整肃导致了一波逮捕潮，期间有多位知名的乌克兰政治和文化人物自戕。斯凯里波尼克由于担心被捕，一九三三年七月自杀身亡。两个月之前，作家暨诗人赫维廖维饮弹自尽：早在一九二六年，史达林便抨击他煽动乌克兰作家背离莫斯科、心向西欧。舒姆斯基在一九三三年被捕，罪名是包庇赫维廖维，他将在一九四六年由史达林下令谋杀：祕密警察在半夜进入他的火车厢，用可以让他看似死于心脏病的毒药将他毒杀。

在乌克兰和白罗斯，本土化政策的喊停带来了本土语言和文化发展的停滞，而这个时候又正值愈来愈多农民因为农业集体化政策而被迫离开农村，迁入城市。这些为数几百万操乌克兰语或白罗斯语农民受迫于大环境的压力，被转化成讲俄罗斯语的工人或知识分子。乌克兰和白罗斯农民在一九三○年代的俄罗斯化速度是帝国时代的民族工程师连想也不敢想。

但语言和文化上的俄罗斯化并未让几百万乌克兰和白罗斯的城市新住民成为俄罗斯人。在官方的认定里，他们仍然是非俄罗斯人，受到的也是非俄罗斯人的对待。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将继续存在，虽然明显是处于一种从属地位。本土干部继续会被吸纳到党部，也继续有可能晋升到高位。扶持本土干部的政策一直维持到一九三○年代。这一类政策鼓励了一些不谙或不大懂乌克兰语或白罗斯语的俄罗斯裔在报户口时把自己说成是所寄居国家的主体民族的成员。他们其中一个是布里兹涅夫，他出生于乌克兰小城卡缅斯科耶，双亲都是俄罗斯人，但他选择当乌克兰人。当他在一九六四年成为共产党头头和最有势力的苏联领袖之后，官方文件将会改说他是俄罗斯人。本土化政策的矛盾遗产将会持续回响几十年。

281 Vasilii Shulgin, Tri stolitsy: Puteshestvie v krasnuiu Rossiiu (Moscow, 1991), 417.

282 同上，100.

283 同上，204.

284 即教育部长。

285 Terry Martin, The Af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Ithaca, NY, 2001), 214, 216.

286 Desiatyi s’ezd Rossiisk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Moscow, 1921), 213.

287 Anders Rudl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Belarusian Nationalism, 1906-1931 (Pittsburgh, 2015), 140.

288 Shulgin, Tri stolitsy, 207.

第十五章　俄罗斯的復返

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日，苏联第一大报《真理报》头版登出一幅史达林的照片，它后来成为了最为人熟悉的史达林肖像之一。照片中，这位独裁者面带微笑，抱着一个刚献给他一大把鲜花的快乐小女孩。这张照片被广为转载，出现在苏联的众多报纸、杂志和海报上。同一幕还被塑成五公尺高的雕像，摆设在莫斯科地铁站，上书：「为我们快乐的童年谢谢您，史达林同志。」《真理报》的照片除了把史达林呈现为苏联幸福大家庭的慈爱家长，还把他提升为苏联各族人民的父亲。

照片中的小女孩是布里亚特人，是西伯利亚原住民的最大一支。照片发表的三天前，即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史达林、他的主要副手暨内阁总理莫洛托夫289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接待布里亚特 - 蒙古自治共和国的代表团。欢迎仪式隆重庄严，其中一环是向该地区的工人和农民赠送礼物。仪式进行到一半时，布里亚特共和国农业委员的六岁女儿吉莉亚．马尔基佐娃因为听腻了集体农场农人的冗长发言，突然站起来，提着妈妈准备的两篮鲜花，向前面走去。别人问她要去哪里，她回答说：「找史达林。」看见她走过来，史达林把她抱起来，让吉莉亚双手钩住他的脖子。一个苏联摄影师用相机捕捉住这一刻。

高规格接待布里亚特 - 蒙古代表团有着特别用意。虽然这个位于贝加尔湖附近的自治共和国人口不到五十万–苏联的总人口是一亿五千万，却对莫斯科有着重大战略意义。该共和国和满洲国接壤，而满洲国是日本控制的傀儡。苏、日发生过许多边境事件，关系一向不睦，随着日本和纳粹德国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签署了针对苏联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苏日关系更是降至新低点。克里姆林宫把布里亚特人的领导层找到莫斯科，是为了显示它重视该地区，以此确保其民众对史达林政权的忠诚。

上述的《真理报》照片是搭配一篇题为〈各族人民组成一家人〉的文章。文章把布里亚特人的民族解放归功于「十月革命」，把他们的经济发展归功于农业集体化，并强调俄罗斯人在这两件事情上扮演的角色。未署名的文章作者这样说：「靠着俄罗斯无产阶级的积极协助，布里亚特 - 蒙古走上了进步的道路，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和民族文化壮大的各种的可能性。」290布里亚特 - 蒙古共和国有约一半人口是俄罗斯裔或东斯拉夫裔，三分之一是布里亚特人，他们定居在蒙古、苏联和满洲国三者边界的蒙古裔社群的一部分。为加强该地区的安全，必须同时确保布里亚特 - 蒙古共和国内俄罗斯人和布里亚特人的忠诚，《真理报》

就是为了协助达到这个目的而写。

除了为俄罗斯与该共和国的关系背书，文章又称赞俄罗斯人是苏联的领头羊民族，勐烈抨击那些质疑俄罗斯人这个角色的人 。「这个民族曾把罗蒙诺索夫、罗巴切夫斯基、波波夫、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门捷列夫这些天才人物带给世界，也曾带来过列宁和史达林之辈的人类巨人。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这民族曾筹备和执行十月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那些说话不负责任的人才会称这样一个民族为『奥勃洛莫夫之流民族』。」[291]奥勃洛莫夫是十九世纪一本小说的角色，人格特徵是懒惰和优柔寡断。把奥勃洛莫夫和俄罗斯民族扯上关系是列宁起的头，因为他把俄罗斯人的歷史和民族性格的负面特徵形容为深具奥勃洛莫夫色彩。

虽然《真理报》的攻击不是直接针对列宁而发，仍然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对待俄罗斯人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是高度权威的《真理报》歷来第一次不是把俄罗斯人，特别是在革命前的俄罗斯人，当成帝国主义民族和剥削者，而是呈现为一个文学和文化名人的民族。除了带来十月革命，俄罗斯民族也带给了世界列宁和史达林这样的巨人（事实上史达林并不是俄罗斯人而是乔治亚人）。因此，俄罗斯民族在苏联的所有民族中鹤立鸡群，身负带领其他民族走向共产主义光明未来的使命。任何不同意此说者都将会被斥为「不精通列宁主义而只爱天花乱坠的人」。

《真理报》会称赞俄罗斯人是苏联各族人民的领头羊，既是受到苏联与德、日愈来愈紧张的关系所促使，也是史达林与党内对手斗争的白热化使然。不过，这位苏联领导人会重新评估俄罗斯民族在帝国歷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扮演的角色，却是酝酿已久。

从一九三○年审判所谓的「乌克兰解放联盟」成员开始，党中央不遗余力打压乌克兰和白罗斯的民族主义，终结了把大国沙文主义看成对政权主要威胁的官方政策。类似的审判也在俄罗斯本身上演，被称为「学院案件」：一九三○年，学院人士普拉东诺夫和其他老派俄罗斯歷史学家被指控为君主主义者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但与有超过四百人涉案的乌克兰案件不同，「学院案件」只有近一百人被捕。另外，一般大众只能在新闻片中看见审判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经过，换言之，审判不公开。但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审判却是开放给民众旁听，而且事前大肆宣传。透过这种对比，苏联宣传机器用响亮而清晰的声音向社会发出一个信号：非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才是苏联政权的主要威胁。

一九三○年，史达林和他在政治局的人马开始採取步骤，不再把革

命前俄罗斯的一切都说成负面的一贯作风。当年十二月，史达林为首的书记处做成决议，谴责苏联着名讽刺作家「穷人杰米扬」292—他曾经把俄国农民抵制集体化的现象归咎于传统俄罗斯人的懒惰和落后。决议指出：「他所犯的错误在于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诋毁『俄罗斯』和『俄罗斯事物』」293，认为他事实上不仅攻击不肯集体化的农民，还攻击了「最积极和最有革命精神的全球工人阶级的分遣队」，即俄罗斯工人。而试图给他们戴上「懒骨头」的帽子注定只能是一种粗糙的谬误。在写给杰米扬的亲笔信中，史达林指责他「诽谤我们的人民，诋毁苏联，诋毁苏联的无产阶级，诋毁俄罗斯的无产阶级」294。

把非俄罗斯人民族主义视作苏联主要威胁的政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的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中完全定案。史达林断言：「这种偏差会在众人停止斗争它和允许它发展到威胁国家的程度时构成主要危险。」295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直到很近期，在乌克兰出现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偏差仍然没有构成主要危险。不过，当众人停止斗争它，允许它发展到与干涉主义者紧密相关时，这偏差便会危及国家。」他没有提俄罗斯沙文主义。史达林和党在大会后几个月所做的决定表明，党准备要为帝俄时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一些元素做出平反。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委会决定筹备普希金逝世一百週年纪念活动，这位诗人前十年备受官方冷落。换言之，有赖反对帝国和沙皇而夺权和有赖攻击帝俄歷史而建立声誉的布尔什维克，如今开始自视为沙皇的文化打造和国家打造传统的延续者。一九三四年六月，在中委会一纸命令下，自一九二○年代被废除的歷史课程在学校里重新开张。几个月前，在政治局一个讨论歷史教科书的特别会议中，史达林决定增加「苏联歷史」这门新课程，又要求这门课要特别强调俄罗斯的歷史使命：「在过去，俄罗斯人聚集了其他人民。现在，它又开始了一个类似的聚集。」296帝俄时代的歷史重新获得青睐，与之一起重新受到重视的是「祖国」（motherland）概念，因为这对打造俄罗斯民族主义至关重要。

《真理报》在题为〈支持祖国〉的文章中报导了恢復歷史课程的决定。它宣称，爱祖国是苏联公民的主要美德之一。与这个被平反概念配对的是另一个关键的史达林概念：叛国。「谁举起手反对祖国谁就是背叛，凡背叛者必须被消灭。」297负责高举党旗的《真理报》这样砲声隆隆地说。但这样的说法却违背了共产主义祖师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因为他们曾在共产主义的奠基文件《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宣称：「工人无祖国。」为了自圆其说，《真理报》指出，马克思主义两位创始人的着作是写于俄国革命以前，而俄国革命大大改变了工人的处境，也赋予了他们一个祖国（fatherland）。这种论证方式是由史达

林首开先河，因为他曾在一九三一年公开表示：「在过去，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祖国。但现在，既然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权力已经属于人民，我们便有了一个祖国，也将会捍卫它的独立性。」

史达林还直接批评恩格斯的思想。在〈俄罗斯沙皇国的对外政策〉（一八九○）一文，恩格斯曾宣称俄罗斯帝国「同时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中流砥柱、最后堡垒阵地和后备大军」。史达林认为此文有很多可议之处。他在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信上说：「沙皇统治的俄罗斯是全欧洲（乃至亚洲）反动势力的强大堡垒之说不容怀疑，但它是不是这些势力的最后堡垒也许有再商榷余地。」298史达林把文章的这些可议处称为「缺点」，又把整篇文章形容为「片面」一这还是苏联有人批评恩格斯的头一遭。但史达林拒绝把他的信登在党的主要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以防它会被看成官方路线。史达林的拒绝在当时被接受了，文章没有发表。

史达林的修正主义措施反映着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是如何影响着他对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想法。德国对布尔什维克而言是个无比重要的国家。在一九三三年的大部分日子里，尽管希特勒的反共产主义言论极为恶毒，史达林仍然设法维持苏联和德国在前十年所建立的密切经济联繫，甚至想要维持政治联繫。但他到一九三三年年底终于明白，希特勒没兴趣和他合作。他也看出，德国除了是苏联一个心腹大患，也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对象。希特勒用发狂似的民族主义把全德国团结在他四周这一点让共产党的领导层印象深刻。随之而来是苏联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一系列变化。

希特勒振奋、团结和动员了德意志民族。但又有哪个民族是史达林可动员的？是俄罗斯人？苏联人？无产阶级？如果说答案是「以上皆是」，那么，这三种成分又应该是什么关系？有一段时间，这个问题不得其解，然后，随着时光流转，史达林和原是他老盟友的死对头布哈林发生了意见分歧。布哈林在一九二九年便被逐出党的领导层，但一九三四年初被任命为苏联第二大报《消息报》的总编辑，得以重返公众舞台。虽然坚定信仰国际主义和反对一切民族主义，包括俄罗斯民族主义，布哈林在一九三四年七月谈到党中央恢復歷史课程的决定时，却是谨守党的路线，赞扬了「苏联祖国」和「苏联爱国主义」的概念。不过，他对后者的定义又是充满国际主义色彩：「爱工作、爱文化和爱人类的歷史前途，也爱这时代的所有最崇高观念。」299

布哈林是「苏维埃人」（Soviet people）概念的主要推手之一，而他心目中的苏维埃人并无任何民族色彩。所以，他喜欢攻击那些他认为是俄罗斯人或苏维埃其他民族的负面特徵。史达林对此感到不快。一九

二九年，史达林写了一篇重要文章，反对那些认为一个国家各民族有可能在世界革命成功前便融为一体的主张。史达林力主，民族是形成于「十月革命」之前，也继续存在于革命胜利之后；苏维埃人是一个由各族人民构成的大家庭，而负责团结和领导他们的是俄罗斯民族。他不止一次公开把俄罗斯人和苏维埃人当成同义词使用，然后随着时光流转，他又开始把俄罗斯人看成苏维埃人的精粹部分。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一个作家会议上举杯祝酒时，他说：「敬苏维埃人，敬最苏维埃的民族，敬那个比任何其他民族更早带来革命的民族。」接着又补充说：「有一次我告诉列宁，俄罗斯人民是最优秀的人民，是最苏维埃的民族。」300

对史达林而言，攻击苏联的俄罗斯人乃至攻击歷史上的俄罗斯人，都等同于攻击全部的苏维埃人。他第一次对布哈林和负面对待帝俄的布尔什维克传统开砲，是在《真理报》那篇报导克里姆林宫接待布里亚特人代表团的文章301。导火线是布哈林在《消息报》纪念列宁百岁冥诞时，藉着列宁说过帝俄时代的俄罗斯人流露出奥勃洛莫夫的一些人格特徵，把俄罗斯人称作一个「奥勃洛莫夫之流民族」。史达林在《真理报》的回应让人再无怀疑，党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在一九二○年代会得到列宁本人或布哈林认可的事情，至而今的一九三○年初变成了是对列宁主义的颠覆。

激动的布哈林直接写信给史达林，认为自己会被攻击其实毫无道理。他说：「我很明白您（ty）〔布哈林用的是亲暱的词『您／ty』，而非拘谨的词『你／vy』〕是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进行决策，是要为这个国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进行准备，所以才会把包括伟大民族传统在内的一切最有用的东西兼纳进来。这就是为什么『奥勃洛莫夫之流民族』的说法会特别让您受伤。但我别无居心，只是想要特别强调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中扮演的角色。」302布哈林是明白史达林转向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动机，却没认识到，党在引入任何新路线时都需要找出一些「敌人」来修理，藉此大肆宣传。史达林纡尊降贵，在布哈林的信上写了「大宝贝」（big　baby）三个字。几个月后，布哈林被指控从事反党活动。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被捕，一九三八年三月旋即遭枪决，罪名是受僱于外国势力，阴谋推翻党国，准备分裂国家。

布哈林不是史达林在一九三六年初发起的「捍卫俄罗斯史」运动的唯一靶子。下一个受害者是杰米扬，这位讽刺作家先前已经在一九三○年因为批判俄罗斯民族传统而被责备过。一九三六年秋天，苏联政府首脑又是史达林亲密盟友的莫洛托夫观赏了杰米扬编的歌剧《英雄们》。该剧拿帝俄歷史叙事的重要人物弗拉基米尔大公开玩笑，又取笑基辅罗

斯的受洗。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政治局决议禁止《英雄们》继续演出。杰米扬的剧本被认为是「企图否定基辅罗斯是一股正面的革命力量」。它除了中伤受欢迎的俄罗斯英雄，还用「不符歷史事实和嘲弄的方式描写罗斯的受洗。实际上，这事件在俄罗斯人民的歷史上是正面的里程碑，促进斯拉夫人和其他文化更高的人民更靠近」303。

这个决议标志着党的许多早期政策出现大转弯，因为它不仅认可帝俄的象徵符号，还赞扬基督宗教，它在一九二○年代晚期和一九三○年代初期是党中央发起的激烈反宗教运动的主要靶子，否定前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人形同土匪的旧观念。根据祕密警察的报告，禁止《英雄们》演出的决定得到艺术界普遍贊同。许多俄罗斯艺术家乐见俄罗斯的歷史和俄罗斯民族得到平反。一个演员说：「伟大俄罗斯人民的歷史不容被扭曲。」304据说，着名的苏维埃剧作家特列涅夫亦表示：「该决议让我极为开心。我以身为俄罗斯人自豪。不容许任何人往我我们的脸上吐口水。」另一位剧作家韦什涅夫则说：「这是歷史给出的一个教训：别碰我们的人民。歷史将会被证明是有用的，而且那一天将很快来到。歌剧《米宁与波札尔斯基：把人民从干预主义者手中救出》正在筹备中。」

这里提到的歌剧是讴歌帝俄时代的两大英雄：波札尔斯基亲王和「市民」米宁，他们是一六一二年把波兰占领军驱逐出莫斯科的「救世主」。十九世纪初期，帝国政府曾把两人的雕像竖立在红场，供人瞻仰。不过，在一九二○年代，他们曾受到许多布尔什维克作者嘲笑，例如杰米扬便曾指控波札尔斯基亲王贪污受贿。但潮流再次逆转：深受史达林喜爱的俄罗斯作家布尔加科夫在一九三六年夏天为这两个旧英雄写出了新剧本《米宁与波札尔斯基》。但这齣戏后来并未上演，因为布尔加科夫被指控把波兰人写得太正面，也没有对俄罗斯人流露出足够的爱。真正的俄罗斯爱国主义反而是在旧歌剧《为沙皇献身》找到，其作者为帝俄时代的格林卡。它在一九三九年二月上演，大获好评，但换上一个政治正确的剧名：《伊凡．苏萨宁》。伊凡．苏萨宁是剧中的主角，是一名俄罗斯农民，据称曾为了救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重获青睐的不仅止于俄罗斯歷史和它的众英雄，还包括前此备受布尔什维克宣传臭骂的沙皇。他们不但出现在书籍和文章，还出现在当时苏联最有效的宣传工具电影当中。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史达林在接待他的国防委员时表示：「俄罗斯沙皇……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把一直延伸至堪察加半岛的偌大一个国家搞得乱糟糟。我们继承了这个国家。是我们布尔什维克首先把它黏合和强化为一个不可分割国家的人，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造福工人，造福构成这个

国家的各族人民。」[305]同年，电影《彼得一世》上映，剧本是改编自白俄流亡者[306]托尔斯泰[307]的一部小说。拍摄这电影的计画得到史达林亲自批准。

翌年，又有另一部讴歌往日俄罗斯统治者英雄事蹟的重磅电影推出。由优异的苏联导演爱森斯坦执导，这齣《亚歷山大．涅夫斯基》的主要角色是被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封圣的涅夫斯基亲王。电影把十三世纪对抗瑞典人和条顿骑士国的战争呈现为保护俄罗斯土地的英勇战争。剧中的涅夫斯基在谈到他的西方敌人时这样说：「凡对我们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句话后来常见于苏联的宣传品，不是真的出自涅夫斯基本人，而是取材自《马太福音》记载的耶稣之言：「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史达林不以《亚歷山大．涅夫斯基》为满足，要求助手再为视西方为寇雠的沙皇恐怖伊凡拍一齣电影。俄罗斯帝国的荣耀会得到恢復，纯粹是因史达林和他的圈子想要动员俄罗斯民族主义，以为一场他们认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对资本主义西方的大战做准备。

一九三九年，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邀请莫斯科市民和游客参观它庞大收藏品中的帝俄艺术精品。大众的反应非常热烈，因为能够与祖国的帝国歷史重新连结起来而倍感幸福。这种感觉对老一辈参观者而言并不陌生，却让自小在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耳濡目染下的年轻一辈感到困扰，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俄罗斯歷史认同。十几岁的女学生妮娜．科斯捷里纳在日记里写道：「昨天晚上，我参观完展览之后走过市中心，沿着红场步行回家。我走过克里姆林宫，走过过去处决人犯的地方，走过圣巴索大教堂，然后我突然再一次感到，我与在展览看到的油画有一种深深的血缘相连性，感到我是个俄罗斯人。这种想法起初让我觉得害怕，担心沙文主义情感是否在我心里蠢动。但不是，那不是沙文主义情绪，我仅仅是觉得自己是俄罗斯人。当我望向安托科利斯基雕刻的彼得大帝和恐怖伊凡的宏美人像时，我因为想到自己就像他们一样是俄罗斯人而自豪，为之潸然落泪。」[308]

史达林政权对帝俄政治和文化某些方面的肯定有助于动员俄罗斯民族主义来为苏联服务，也有助于巩固俄罗斯人作为苏联主导民族的地位。

一九三六年五月，《真理报》在社论中赞扬苏联各族人民的爱国心和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但又特别强调俄罗斯人的作用：「在平起平坐各族人民中居先者是俄罗斯人，是俄罗斯工人和劳动者，其在整个伟大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已经非常大，从第一场胜利到今天的辉煌发展时期，他们都居功厥伟。」[309]这种论调得到曾任苏联书报审查官的沃林进一步发展。一九三八年秋天，时任《歷史月刊》总编辑的他在

《布尔什维克》（史达林曾经阻止恩格斯相关文章在这里出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伟大的俄罗斯人民领导苏联各族人民为争取人类的幸福和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苏联各族人民对居先民族的友谊和爱日甚一日。」310从此之后，俄罗斯人将不仅会被称为「平起平坐各族中的居先者」，还会被称为「伟大的俄罗斯人民」。

苏联宣传用来界定苏维埃国家关系的官方公式是各族「人民的友谊」。但是，在官方心目中，某些族的人民却来得比其他族的人民可靠。随着俄罗斯人重新获得信任，其他民族变得不被信任。党中央准备打一场世界革命战争的日子已然远去。在二战爆发的前几年，史达林忙着为可能的入侵备战和清理未来前线区内的潜在叛徒—他们被称为「第五纵队」。这时，民族成分取代阶级，成为当局区分谁是爱国者谁是叛徒的判准。

因为俄罗斯人被认为是可靠公民，那些有传统祖居地或在苏联境外有大量侨民的非俄罗斯民族便被当局视为潜在的叛徒，在一波波镇压行动中，最高峰是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之间的「大恐怖时期」成为被锁定的对象。史达林对党和国家机关的整肃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半夜被捕，接受由一位党官员、一位祕密警察和一位检察官组成的「三人小组」审讯。大部分被捕者都是被送进「古拉格」集中营网络监禁，或是送到其他偏远地区採金、採铁矿砂和伐木，刑期从十年到二十五年不等，没有假释的可能。但被送到「古拉格」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至少有六十万人是草草审讯后便迳行处决。整个社会人人自危，深受创伤。那些有家人被枪毙或下狱的人被贴上「人民公敌的家人」的标籤，只能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双亲被捕的小孩会被送到领养家庭接受「再教育」。

清洗名单的第一批人是德裔、波兰裔、日本裔或远东裔的苏联公民，因为当局相信，他们可能会因为苏联和他们的母国发生冲突而起异心。在一九三七年的八、九两个月，有超过五万五千名德裔被史达林的祕密警察逮捕和判刑。他们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其中近四万二千人被祕密警察的行刑队枪决。接下来轮到波兰人。一九三七年秋天，近十四万波兰裔苏联公民被控进行反苏间谍活动，其中超过十一万人被枪杀。同样被锁定的还有罗马尼亚裔、保加利亚裔、拉脱维亚裔、芬兰裔、希腊裔和其他民族的成员。加起来，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之间，苏联政权判处超过三十三万五千人在所谓的「民族行动」中被逮捕，其中近二十五万人被处死，占比百分之七十五。

大清洗的受害者包括布里亚特 - 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农业委员马尔基

佐夫，也就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献花给史达林那个小女孩吉莉亚的父亲。马尔基佐夫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逮捕，一九三八年六月被枪毙，罪名是加入一个子虚乌有的泛蒙古人组织，试图煽动布里亚特 - 蒙古共和国脱离苏联。吉莉亚作为一个小明星的生涯在八岁那年戛然而止，此前她不断被邀请到各学校亮相，而苏联各地都有小女孩模仿她的髮型。如今刻画她和史达林抱在一起的海报和雕像继续留着，但这个小女孩身分被宣传机关说成是马姆拉卡特，一个因为在集体农场表现杰出而获颁列宁勋章的塔吉克女孩。吉莉亚写信给史达林为父亲喊冤，结果却是害母亲也被抓走。母女两人一起被流放到哈萨克。两年后，吉莉亚的母亲去世，得年三十二岁。根据一个说法，她是死于自杀；但另一个说法却是她被祕密警察暗杀，以防她进一步让当局难堪。流放哈萨克期间，母女两人仍然收藏着史达林所送的礼物和他与吉莉亚的合照。

俄罗斯在一九三○年代的重返优越地位是以牺牲苏联很多其他民族作为代价。这是一个零和游戏，开始于一九二七年可能是波兰爆发战争引起的恐慌所致，并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战爆发前那几个月达到高峰。这段时期很多对外政策的转换都是由两件事情引起：一是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初的上台，二是德日在一九三六年秋天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当时，史达林已经放弃一九二○年代有关赤化世界的共产主义梦想，开始准备打一场两个方向的战争：在西边迎战德国，在东边迎战日本。至此，苏联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他们原先被视为未来世界革命的急先锋，在史达林政权眼中变成了潜在的背叛者。确保苏联最大民族俄罗斯人的忠诚成了备战工作的重中之重。

俄罗斯人会从待罪的帝国民族摇身变为苏联的领头羊民族，是受到史达林在一九二○年代晚期打败所有政敌和在一九三○年代大权独揽所助长。因此，「祖国」和「爱国主义」等传统观念的復兴，离不开史达林政权把俄罗斯国家形容为重中之重的强调。而这些立场又伴随着恢復俄罗斯沙皇等强者崇拜，其中最明显的是彼得一世和恐怖伊凡。尽管俄罗斯民族主义经常是穿着帝俄的外衣回到政治舞台，但一般人在一九三○年代后期对俄罗斯人的理解却不同于一九一七年之前：这一次，小俄罗斯人或白罗斯人并没有被包含在「俄罗斯人」观念中。他们现在被官方承认为独立的乌克兰民族和白罗斯民族。这使得二战前阶段的俄罗斯民族和一战前阶段的大俄罗斯人在族裔和领土上重叠起来。大战的震撼将会测试俄罗斯民族的这个新定义，并测试其成员对创造它的国家有多忠诚。

289　苏联内阁总理的正式职称是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后改称「苏联部长会议」。「部长会议主席」类似西方国家的「总理」。

290 “Edinaia sem’ia narodov,” Pravda, January 30, 1936.

291 同上。

292 「穷人杰米扬」（Demian Bedny，一八八三至一九四五）是作家普里德沃罗夫（Yefim Pridvorov）的笔名。

293 Soviet Culture and Power: A History in Documents, 1917-1953, eds. Katerina Clark, Evgeny Dobrenko, Andrei Artizov, and Oleg V. Naumov (New Haven, CT, 2007), 69.

294 Benedikt Sarnov, Stalin i pisateli (Moscow, 2008), 495.

295 Iosif Stalin, Stat’i i rechi ob Ukraine (Moscow, 1936), 223.

296 David Brandenberger, National Bolshevism: Stalinist Mass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1931-1956 (Cambridge, MA, 2002), 34.

297 “Za rodinu,” Pravda, June 9, 1934.

298 Iosif Stalin, “O stat’e Ėngelsa ‘Vneshniaia politika russkogo tsarizma,’ ” Bol’shevik, no. 9 (May 1931): 1-5.

299 Aleksandr Vdovin, Russkie v XX veke: Fakty, sobytiia, liudi (Moscow, 2004), 78.

300 同上，103.

301 文中提到「只有那些说话不负责任的人才会称」俄罗斯人为「奥勃洛莫夫之流民族」。

302 同上，89.

303 Viktor Danilov, Vlast’ i formirovanie istoricheskogo soznaniia sovetskogo obshchestva (Moscow, 2005), 116.

304 Vlast’ i khudozhestvennaia intelligentsia, eds. Oleg Naumov, Andrei Artizov (Moscow, 1999), 337.

305 Vdovin, Russkie v XX veke, 407.

306 「白俄流亡者」指一九二○年代爆发革命及内战后迁居国外的俄罗斯人，大多数是白军的支持者。

307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一八八三至一九四五年），歷史、科幻小说家，于十月革命后不久，离开俄国，侨居巴黎、柏林，一九二三年回国。

308 Brandenberger, National Bolshevism, 106.

309 同上，43.

310 Boris Volin, “Velikii russkii narod,” Bol’shevik 9 (1938): 34.

第十六章　伟大爱国战争

要怎样找到适当的旗帜让人伤透脑筋。苏联不缺红旗或红色布料，但在一九三九年的莫斯科，要找到一面中间有白色圆圈和卐字符号的红旗却大不易。希特勒上台后废除威玛共和国的黑、红、黄三色旗，而以黑、白、红三色国旗取而代之。一九三五年，他再次把国旗改为红底，中间是一个白色圆圈围住的卐字符号。从那之后便没有德国高官造访过苏联，所以，当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临时决定要到莫斯科一趟时，不管是外交人民委员部或是克里姆林宫的礼宾局都没有现成的德国国旗可用。最后，他们好不容易在莫斯科一家电影公司找到一批符合需要的旗帜，而它们原本是用来拍摄反法西斯宣传影片的道具。

里宾特洛甫的飞机降落在莫斯科机场之后，迎接他的除了卐字旗和仪仗队，还有表情友善的苏联官员。八月二十四日凌晨，里宾特洛甫和他的苏联同僚莫洛托夫签下互不侵犯条约。在记录这一刻的照片中，史达林一脸幸福的表情，肖像画里的列宁和蔼可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311的签订标志着国际政治形势重大改变，意味着苏联把英国和法国甩到一边。

希特勒和史达林在条约中约定如何瓜分波兰和东欧其余地区。瓜分行动随着德国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攻击波兰揭开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亦随即爆发。史达林相信，透过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他将可促使希特勒把矛头对准西方，推迟苏德对决的时间。他还相信，透过把摩尔达维亚、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大部分地区纳入势力范围（有必要的话还会加以占领），他已经把苏联的最前防线推往更西，让自己国家的地缘战略形势获得大大改善。

与纳粹德国的协议不仅导致苏联外交词令的改变，也大大改变了它的国内政治宣传路线。一向以希特勒和德国为攻击对象的宣传品固然一夜间消失了，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大大影响了史达林政权的民族政策，因为它现在不仅有必要向国内外证明自己和希特勒结盟是有正当性，还得证明自己即将进行的兼併行为是有正当性。一九三○年代，在苏联国境外大量非俄罗斯民族的苏联同胞都被视为一种负债，但随着政府的外交政策从防御改为进攻，这些民族突然变成了资产，因为它们可以被用来破坏邻国的稳定和合理化苏联即将进行的侵略行为。这有点类似回归到一九二○年代的政策，那时党高层预期将会有一场向西进军的革命远征，用得着非俄罗斯民族扮演重要的辅助

角色。苏联这种外交政策转变的直接受益者是乌克兰和白罗斯这两个苏维埃共和国。

当苏联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要兼併波兰境内的乌克兰裔和白罗斯裔聚居区时，所持的理由是自己有责任解放被压迫的同胞，与他们重新统一。自此而下，史达林必须在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和少数民族的需求和期望之间找出平衡点，又特别是驾驭好作为苏联核心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的关系。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红军越过波／苏边境，向业已落入德国控制的波兰中部推进。莫洛托夫透过收音机向国人和世人解释，苏联为什么要跟反民主和反共的纳粹政权携手合作，出兵波兰。他有必要解释，因为在许多国人眼中，更不用说其他国家的人，苏联此举是一次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他的解释出奇地简单：红军越过边界是为保护东斯拉夫人同胞，即保护住在波兰东部省分的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他声称：「苏联政府不可能对血亲的命运坐视不管。波兰的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一直毫无权利可言，现在更是完全孤立无助，只能任由变幻莫测的命运摆布。苏联政府认定，对住在波兰的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手足伸出援手是它的神圣义务。」312

这种说词是史达林和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薛伦堡经过漏夜商议敲定。后者是在九月十七日凌晨被召到克里姆林宫。一星期前，莫洛托夫告诉薛伦堡，苏联政府准备「宣布波兰正在分崩离析，苏联有必要前往那里帮助『备受德国威胁』的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又指出这种说词「是为了让苏联的干预能够被大众接受，同时也是为了让苏联不致显得是个侵略者」313。薛伦堡表示抗议，但莫洛托夫拒绝让步。据说他这样告诉薛伦堡：「很遗憾，苏联政府看不出有其他方法可以解释自己的出兵动机。因为迄今为止，苏联并未关心过波兰少数民族的困境，所以必须用某种方式说明它这一次出兵干预的理据。」

后来，史达林自己决定取消「备受德国威胁」字眼，但保留苏联出兵是要拯救波兰境内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的说法。但这张拯救清单并不完整，因为它漏掉的不仅止于犹太人—在即将被「重新统一」的省分里住着不少犹太人，还漏掉了波兰人：因为根据一九三九年八月签订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分到的除了乌克兰裔和白罗斯裔占大宗的波兰领土，还包括部分的华沙省和卢布林省（它们被划归苏联这一边），而这两个省的居民都是以波兰人为主。史达林不提他要拯救犹太人显然是不想惹恼希特勒，而他不提波兰人则是因为「从波兰人手中拯救波兰人」这种说法不通。史达林只想得到某些民族，不想要另一些民族，对他而言，波兰人的挑战，不单是合法性问题。

苏联因为想要促进全世界的共产革命，老早就放弃了争取波兰和其他邻国国内乌克兰裔和白罗斯裔的忠诚。到德国成为一股威胁之后，它又不再把苏联境内的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看作未来进攻西方时的盟友，反而视之为苏联的潜在威胁。这种威胁最近期出现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国摧毁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东部的外喀尔巴阡乌克兰314宣布独立，让莫斯科大为紧张，唯恐希特勒会用重新统一乌克兰人领土的名义对苏联宣战。希特勒最后决定不打乌克兰人牌，把外喀尔巴阡乌克兰赏了给匈牙利人，让他们去粉碎该地的独立运动。但史达林学到了教训。从此，他不愿意再看到有任何乌克兰人或白罗斯人地区存在于苏联之外，也不想和他的新盟友「分享」任何族群，特别是波兰人。

九月中旬，史达林决定重启谈判，改变德苏原议定的东欧势力范围划分方式。他要求里宾特洛甫再到莫斯科一趟。一支苏联摄影队拍下了这位纳粹外交部长九月二十七日抵达莫斯科的画面：他穿着皮革长外套，对迎接他的几位苏联指挥官行了一个纳粹敬礼。第二天，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地图上重新划界，然后他和史达林分别用红色笔和蓝色笔在新协议上签字。在新的安排下，史达林把华沙和卢布林四周的波兰裔地区给了德国，换来波罗的海的立陶宛。这意味着，苏联将会占领的波兰地区仅限于那些以乌克兰裔和白罗斯裔占大宗的土地。大部分东斯拉夫人地区，包括曾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之间被沙皇军队短暂占领的城市利沃夫，都将落入史达林的控制。帝俄时期一代代民族工程师始终无法实现的梦想至此美梦成真。

从东方而来的新占领者打着苏维埃乌克兰共和国的旗帜开入利沃夫—这个改变反映在参与行动的红军现在被称为「乌克兰方面军」。类似的情况，在白罗斯的红军现在也是被称为「白罗斯方面军」。为合理化苏联加入二战和兼併波兰部分领土之举，史达林回归一九二○年代的修辞策略，即部分回归民族共产主义，对乌克兰和白罗斯民族主义的文化面向让步。一九三九年秋天，波兰几个东部省分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被划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另一部分被划入白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此举被称为苏联民族政策的胜利和「苏联诸人民友谊」的体现。为了在西乌克兰和西白罗斯打民族牌，莫斯科恢復它在一九二○年代实行过的政策：即扶植两地的民族文化建设。

但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俄罗斯民族主义如今已是苏联新身分认同的核心，所以其他东斯拉夫民族主义动员都必须受这个新现实制约。那些把前波兰领土整合到乌克兰和白罗斯的法律把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称为「伟大民族」，在这之前，苏联境内只有俄罗斯人具有「伟大民族」地

位。尽管如此，有些「伟大民族」仍然显得更伟大，而且表现出要把其他「伟大民族」吞灭的趋势。有鑑于此，一九二○年代当过明斯克大学校长的皮切塔如今决定，他还是只当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比较安全，过去他曾经同时支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白罗斯民族主义，而因此在一九三○年被捕坐牢。苏联兼併波兰东部之后，他在一本大量流传的小册子中对此举表示欢迎，认为那是俄罗斯固有领土的重新统一。

史达林手下祕密警察所写的报告（如果可信的话）显示，苏联的参战受到很多苏联人的热情支持。年轻一代自小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洗脑和暴露在反法西斯宣传之下，误以为那是一场苏德战争的开始，是他们期盼已久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大决战。很多俄罗斯知识分子会乐见苏联参战，则是因为认为当局可以藉这个机会收復「古代的俄罗斯土地」—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被同样的梦想沖昏头。最后，许多苏联的乌克兰和白罗斯知识分子会欢迎战争，则是因为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让他们的民族重新统一的机会。史达林主义的教条、新称霸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再兴的乌克兰和白罗斯民族主义，这三种力量在日后的彼此抗衡将会让苏联的官方民族政策出现许多次纠结和转折。

一如既往，新一套民族论述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乌克兰人。乌克兰的传统歷史叙事特徵是对哥萨克国引以为傲，在二战前几年开始获得平反，此举主要是要为战争做准备，但不让人意外地也是为了给俄罗斯的帝国叙事平反。所以，只有那些符合革命前帝国叙事的乌克兰人描述才会被收纳进来。

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歷史叙事的新态度缩影在十七世纪哥萨克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所受到的对待。在一九三○年代中期的苏联文学，赫梅利尼茨基一贯受到谴责，被指为「乌克兰农民的叛徒和殷切敌人」，说是他一手策画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封建领主结合」。基辅市中心有一座赫梅利尼茨基纪念碑，每逢共产主义者举行示威和考虑把它拉倒，当局就会用木板把它围起来。但赫梅利尼茨基同样是俄罗斯帝国史上的大英雄，因为正是他带来「罗斯的重新统一」。这成了他得以在苏联歷史论述中获得平反的关键因素。不让人意外地，赫梅利尼茨基的平反在莫斯科开始，而不是在基辅，而且是得到最高层的授意。

一九三七年八月，苏联报章登出了一份官方声明，批评歷史教科书对于上述哥萨克盖特曼的评价落伍过时：「作者们没有看到赫梅利尼茨基的行动在十七世纪有着积极作用，他是要把乌克兰从波兰领主和土耳其苏丹的占领下解放出去。」315这项声明的执笔者不是别人，正是史达林本人。他接着说，与被其他外国强权併吞相比，乌克兰和乔治亚被併入俄罗斯是「较小的恶」。认定乌克兰和乔治亚的传统叙事，可以荣

耀与俄罗斯的重新统一，如今受到青睐。

随着莫斯科的政策发生变化，乌克兰作家开始放胆拥抱至少一部分的乌克兰文化遗产。年轻乌克兰剧作家考纳丘克迅速写就《赫梅利尼茨基》一剧，为这位哥萨克盖特曼当年反抗波兰的壮举欢呼喝彩。仍然相信阶级史观的人对考纳丘克展开攻击，但莫斯科的领导层支持这位有着敏锐政治嗅觉的作者。一九三九年，《赫梅利尼茨基》在莫斯科的玛丽剧院上演，接着风风光光到苏联各地巡迴演出。电影版的《赫梅利尼茨基》在一九四一年推出，获得了最高文艺奖项史达林奖。与亚歷山大．涅夫斯基、米宁和波札尔斯基一道，赫梅利尼茨成为了苏联英雄祠的一员。

在苏联兼併利沃夫和西乌克兰之后，《赫梅利尼茨基》被带到那里演出。考纳丘克成了苏联乌克兰文化在新占领土地的全权代表，在把当地文化乌克兰化一事上扮演重要角色，前此波兰文化不仅占支配地位，还占垄断地位。一九三九年秋天，波兰语戏剧和歌剧迅速被乌克兰语和俄罗斯语作品代替。当局接着推动报纸与教育系统的乌克兰化。行政、文化和教育机关的波兰裔受到清洗。波兰裔政治家、警察和退伍军人集体被捕，很多人被监禁起来或流放到苏联偏远地区。

虽然有些在地的乌克兰裔知识分子被吸纳到行政、教育和文化机关，协助推动去波兰化和乌克兰化，但重要职位都保留给来自东方[316]的干部。例如，利沃夫大学的新校长马尔琴科就是空降部队，原任职于基辅的乌克兰歷史研究所，是该所里封建主义史组的组长，正在撰写一篇谈十七世纪下半叶乌克兰 - 波兰战争的论文。在马尔琴科的整顿下，波兰裔教授被免去行政职务，大学里引入乌克兰文课程，乌克兰裔学生人数大大增加，校名也更名为弗兰科民族大学━弗兰科是一战前的重量级乌克兰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前此，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九年之间，大学的正式名字一直是卡西米尔大学。

马尔琴科受到波兰裔教授痛恨，因为他让他们很多人不单丢掉行政职务，还丢掉教职。但马尔琴科自己很快就受到当局怀疑。他在一九四○年春天被摘去校长职位，回到基辅之后受到警方监视，最终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被捕，罪名是暗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马尔琴科领导下利沃夫大学的兴衰，即是在新兼併领土上的乌克兰化兴衰的缩影。一九三九年秋季和一九四○年春季之间，莫斯科虽然一直尽全力在西乌克兰推动乌克兰化，支持晋用乌克兰裔干部，取代波兰裔干部，但这种政策到夏天发生了变化。此后，波兰人继续受到迫害，但当局也採取了一些容纳他们的措施，反观乌克兰裔虽然受到文化政策青睐，却很容易会被抨击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者。在莫斯科看来，党内那些卖力推行乌克兰化的

干部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必须要加以监视，以防他们偏离党中央的路线。

民族政策的改变和镇压规模的扩大，是战争轨迹的变化和史达林的外交政策盘算有以致之。巴黎在一九四○年五月的陷落让史达林大吃一惊，因为他原以为西线的冲突会旷日持久。现在的情势变化让希特勒可以把矛头转向东方，随时对苏联发起进攻。史达林相信，苏联如果把边界更往西边推会更安全。于是，他马上按照一九三九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去领取他应得的战利品。他迅速占领波罗的海三国，向罗马尼亚索要摩尔达维亚和其他乌克兰裔聚居区。他还对芬兰开战，但芬兰拒绝步波罗的海三国后尘，做出强烈抵抗，让红军伤亡惨重，占得的领土减少到最低程度。但占领领土只是工作的开始，史达林的微积分作业是：想办法在德国人入侵时保住它们。

如果希特勒向西乌克兰和西白罗斯推进的话，谁是他可以信得过的？–这是史达林和他的安全团队在巴黎陷落后那个月苦苦推敲的问题。波兰裔固然仍旧不忠顺，但他们不会是亲德国派，因为德国在波兰中部和西部处决了数以千计波兰政治、文化和知识领袖一事，在波兰人圈子里几乎不是祕密。但乌克兰裔却是不同的态度：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殷切期盼德国人的到来。在老一辈之中，这种心情是出于缅怀奥地利统治的时代，该政权为乌克兰人的自主创造了许多机会。很多年轻的西乌克兰人则不仅讨厌波兰人统治，也讨厌苏联的统治，所以纷纷加入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他们对纳粹寄与厚望，认为纳粹会帮助他们独立建国。因此，苏联占领当局除了不信任西乌克兰的前共产党成员（他们被怀疑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或不忠于史达林），也把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当成苏联占领当局的主要靶子。

民族主义领导人对德国人的同情和配合，例如一九四一年初，他们在德国军事情报机关的羽翼下，偷偷组成了两个团的特种部队，这本身就让苏联有理由对付他们。尤有甚者，他们提倡的那种民族主义强调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完全不同，这让本来就因为史达林重新拉抬俄罗斯民族主义所引起的民族紧张关系更加加剧。几组遭递解出境者的数据更能说明苏联对西乌克兰和西白罗斯的民族政策。一九四○年二月，在第一波大规模递解行动中，有近十四万波兰裔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他们包括前波兰政府的官员、警察、退伍军人和家眷。后来又有更多的递解行动，对象是波兰人、犹太人，最后是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一九四一年五月，有超过一万一千名前波兰领土内的乌克兰裔被送往苏联。

「祖国」（rodina / motherland, otechestvo / fatherland）的概念要晚至一九三四年才在苏联获得完全平反。而到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

二日之后，即希特勒因为无法入侵英国改而把矛头转向他的前盟友苏联之后，共产党领导层更是把「祖国」用作团结全民的口号。

得知德军入侵那一天，史达林因为震惊得几乎无法言语，便找左右手莫洛托夫代他读出经他过目和修改的告国民书。他因为一时间不知道要到哪里找到鼓舞民心士气的说词，便往歷史中寻找。由莫洛托夫读出的告国民书这样说：「这一次不是我们国家第一次被迫迎战狂妄敌人的攻击。当年，拿破崙入侵俄罗斯之时，我们的人民用一场爱国战争予以回应，将其打败，使其垮台。对我国发起新侵略的狂妄希特勒必然也会是这种下场。为祖国计，为荣誉计，为自由计，红军和全国人民将再次发起一场必胜的爱国战争。」317日后，这场德苏冲突将会被苏联称为「苏维埃人的伟大爱国战争」318。

莫洛托夫发表讲话几天后，作曲家亚歷山德罗夫和诗人列别杰夫．库马奇合写了后来形同「爱国战争」精神象徵的〈神圣战争〉。从一九四一年秋天直到战争结束为止，苏联电台每天开台时都会播这首歌曲，其头两句作：「起来，巨大的国家，起来战斗，至死方休。」这首歌中提到祖国，却没提共产党。一个臆测认为，歌词的真正作者不是库马奇，而是一个外省小学老师伯德写于一九一六年一战期间。库马奇涉嫌改换了原歌词的几个字眼，包括把「条顿」改为「法西斯」，把「我们的俄罗斯祖国」改为「我们的伟大联盟」。歌词在主题和意象上都是返回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它可以不理会党，却必须考虑到苏联的多民族构成样态，致力凝聚的不仅是俄罗斯人的爱国心还有其他民族的爱国心。

这也是史达林第一次就战争发表讲话时的主旋律，时为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在解释过自己为什么有必要与希特勒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他把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称为「鬼魅和食人魔」。史达林把听众称唿为「兄弟姊妹们」，试图营造出苏联各族人民是一家人甚至有着宗教弟兄情谊的感觉。史达林指出，德国入侵的目的是「重新建立地主的统治，重建沙皇制度，摧毁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罗斯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摩尔达维亚人、乔治亚人、亚美尼亚人、亚塞拜然人和苏联境内其他自由人民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把他们日耳曼化，让他们沦为德国王公贵族的奴隶」319。

这种唿吁没多少直接效果。德国师团强力向东推进，粉碎了红军的抵抗。红军会快速溃败，部分原因在于作为军队骨干的农民饱受农业集体化的摧残，对苏联政权殊少忠爱之心。西境的非俄罗斯裔居民都是被纳入苏联不久，毫无向心力，也倾向于把德国人视为解放者（他们将很快知道自己搞错了）。到了秋天，红军撤出波罗的海和白罗斯，又在基

辅附近因为受到包围而失去六十万将士。至此，西境所有非俄罗斯人省分几乎完全丢失，红军只能退到俄罗斯人地区进行最后的生死战。

这一定就是史达林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在红场对开赴前线部队讲话时绝口不提非俄罗斯人的原因之一，当时的「前线」离莫斯科只剩几十公里。对他来说，这场战争已经变为一件俄罗斯人自家的事。「你们将要进行的是一场解放战争，一场正义之战。让我们的伟大先辈━涅夫斯基、顿斯科伊、米宁、波札尔斯基、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列宁的胜利旗帜保护你们！」320此中提到的英雄无一是非俄罗斯人，有些甚至是早些年常常被苏联宣传品嘲笑的帝国时代人物。即使提到列宁时也是带有宗教色彩，因为俄罗斯动词oseniat（保护）往往也可解作「祝福」或「画十字架」。随着政权面临背城一战，史达林只能祭出曾被他丢弃和亵渎的符号与半神。

在在看来，强调俄罗斯的帝国传统而牺牲马克思 - 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是有效的做法。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从远东调来的师团帮助史达林守住了莫斯科，把德军击退。一九四三年一月，在史达林格勒激战方酣之际，史达林重新引入帝国时代的军事肩章。较少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也让苏联可以和英美这两个老敌人重修旧好。用英国首相邱吉尔的话来说，三者结成了一个对抗德国的「大联盟」。

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通过租借计画提供大量武器装备给苏联，让其得到喘息。但史达林想要得到更多：在欧洲开闢第二战场。为获得西方公众的支持，他不得不脱下发了疯似想要赤化世界的无神论共产主义者形象。一九四三年，在准备前往德黑兰与西方国家领袖会面时，他解散了「共产国际」，在西方大众眼中，共产国际是致力推翻全世界民主社会的主要组织。除此以外，史达林还对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做出重大让步，允许它选出自一九二○年代布尔什维克进行反宗教运动之后便悬缺的俄罗斯牧首。随着俄罗斯东正教获得了新生命，俄罗斯帝国歷史和身分认同的一个重要元素开始回到了公众意识。

对帝国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回归和文化回归在废除〈国际歌〉之时达到高峰━〈国际歌〉是十九世纪晚期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最着名的歌曲，也是苏联的国歌。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政治局批准了亚歷山德罗夫作曲填词的新国歌。新国家的旋律非常近似亚歷山德罗夫的另一首热门歌曲〈布尔什维克〉，但后者无一处提到俄罗斯，反观新国歌却无一处提到党。歌词头两句作：「伟大俄罗斯，永久的联盟，独立共和国，自由结合成。」歌词是经过史达林亲自修改和批准。现在，为了抗击外国侵略者，联盟中的非俄罗斯人共和国必须集结在俄罗斯人四周。

在战争最艰难的头几年，当莫斯科领导人忙着煽起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火焰时，加盟共和国（特别是德国占领的那些）被允许甚至被鼓励把自家的民族主义最大化，以鼓舞前线后方的反德力量和红军中的本民族弟兄。

莫洛托夫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发表过告国民书后不久，乌克兰作家就发现，乌克兰歷史上有过的「爱国战争」一样可以鼓舞人心。他们显然不认为对抗拿破崙的是他们的战争，拿破崙的军队从未进入乌克兰。在写给史达林的一封信中，乌克兰文化界的代表表示，在近代早期，乌克兰哥萨克人一样发起过对抗波兰人和德国人的爱国战争。乌克兰的歷史学家和宣传人员也在十三世纪的加利奇的达尼洛亲王321身上找到了乌克兰版的涅夫斯基。讽刺的是，涅夫斯基是与西方的势力战斗322，反观达尼洛亲王却是在西方盟友的帮助下击退蒙古人，甚至还是由教皇加冕。不过，为了效法俄罗斯老大哥和为战争宣传出力，没有人会把这些歷史细节当一回事。

在白罗斯，最知名的民族诗人库帕拉也往歷史寻找鼓舞人心的元素。他把自己的民族称为「我勇武的白罗斯人民」，说他们在史达林的领导下表现出凛凛雄风。他吆吁对侵略者发起一场农民起义：「游击队员，游击队员，白罗斯的诸子们！为了打破枷锁，为了解除桎梏，杀尽邪恶的希特勒族，让他们永得不超生！」323位于莫斯科的白罗斯游击队总部把任何现成的白罗斯民族主义象徵符号统统拿过来用。例如，他们把一支游击队取名「卡利诺斯基」─虽然卡利诺斯基原是一八六三年反俄罗斯人起义的领袖，而且还是波兰人，但单是强调他是为白罗斯人民而战的战士这一点并不难。上述的游击队是活跃于白罗斯境内最知名的游击队之一，核心成员是一九四三年的春天空投到西白罗斯的祕密警察。

虽然非俄罗斯裔英雄能够鼓舞本民族的人心，他们在全苏联的层次却没有什么能见度。一九四二年年中，史达林批准创立授与红军军官的新军事勋章。新勋章有三种：涅夫斯基勋章、苏沃洛夫勋章和库图佐夫勋章。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都是帝俄时代将领，前者在十八世纪后期粉碎科斯丘什科率领的波兰人起义，后者在一八一二年把拿破崙大军逐出俄国。换言之，三种勋章都是以俄罗斯英雄命名。非俄罗斯英雄完全没有这种待遇，就连赫梅利尼茨基也没有。拜大战前夕一部电影之赐，他在红军中的受崇拜程度不亚于涅夫斯基。乌克兰文化界人士为之气结。

这种情况要直到一九四三年秋天红军在乌克兰和白罗斯开始发动攻势才有所改变。先前，在夏季尾声，乌克兰最知名的电影制作人多夫任科吆吁乌克兰的党老大赫鲁雪夫设立一个以赫梅利尼茨基命名的高级军

事勋章。赫鲁雪夫徵询史达林的意见，主张此举有助于提高红军内外的乌克兰人的士气。他在信中说，赫梅利尼茨基因为曾经为乌克兰的解放而战与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的联盟，在乌克兰非常受欢迎。史达林同意了。一九四三年十月，莫斯科宣布创设一个由乌克兰艺术家设计的勋章，上面的「赫梅利尼茨基」字样将会採取乌克兰语而非俄罗斯语的拼写方式。《真理报》报导这消息的同时，在社论强调赫梅利尼茨基是伟大的政治家，深明乌克兰人民只有和兄弟民族俄罗斯人联合在一起方可生存的道理。

这还只是转变的开始。几天后，史达林下令把在乌克兰战斗的四个集团军更名为乌克兰方面军。在一九四四年春天，在白罗斯战斗的三个集团军也获得了「白俄罗方面军」的番号。到了这时候，乌克兰、白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亦已有了自己的国防委员和外交委员。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德黑兰跟罗斯福和邱吉尔会面时，史达林得到了一个他期盼已久的承诺：盟军将会在欧洲开闢第二战场。他同时听说英美准备筹组那个后来被称为联合国的组织。为了在未来的联合国争取更多席位，史达林启动宪法修改，弄出更多名义上独立的共和国。虽然这些共和国不是真正独立的国家，甚至并不拥有内政、军事和外交上的自治权，但史达林还是成功说服同意让乌克兰和白罗斯与苏联（被理解为俄罗斯）一道进入联合国大会。就这样，「单一俄罗斯民族」重返国际舞台，而且这一次是有三张嘴巴而非一张。

同时动员俄罗斯和非俄罗斯民族主义对抗德国，让莫斯科得面对一个挑战：想办法不让非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光芒盖过俄罗斯民族主义。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党中委会宣传部门的负责人亚歷山德罗夫出言批评乌克兰作家一封恭贺基辅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的信。亚歷山德罗夫认为，这封信暗示着「苏联有两个领头羊民族，即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指出这个主张违背了一个「普遍被接受的事实：俄罗斯人在苏联大家庭中是老大哥」324。

亚歷山德罗夫是贊成不把史达林奖颁给《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的党官员之一，理由是该书对俄罗斯帝国多所诋毁。他写道：「这本书是反俄罗斯人的，因为它的几位作者是站在那些起义反抗沙皇主义的人一边，并没有努力为俄罗斯开脱。」325《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由着名苏联歷史学家潘克拉托娃领头的一组莫斯科人和哈萨克人执笔，于一九四三年出版。而潘克拉托娃和她的同仁最终没有获颁史达林奖。

但在当时的环境，要在阶级原则和民族原则之间或在俄罗斯民族主义和非俄罗斯民族主义之间找到平衡点，绝非易事。只要战争持续一

天，则苏联境内任何民族的民族主义都有利用价值。所以，虽然亚歷山德罗夫和其他与他志同道合的党官员努力让天秤向俄罗斯倾斜，但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被容许把倾斜的天秤推回。乌克兰作家和歷史学家抗议俄罗斯人企图把达尼洛亲王说成是俄罗斯亲王或是把西乌克兰说成是古代罗斯或俄罗斯固有领土。潘克拉托娃向更高层级的党官员上诉，指出党绝对不能为沙皇的殖民政策平反，因为如果革命之前的年代不存在压迫，就根本不会有革命的出现。

为了解决这个纷争，政治局资深成员马林科夫和日丹诺夫找来一批歷史学家讨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想要平息纷争。会议没有明确结论，而党也把它的决定拖到战争结束后才宣布。一九四五年八月，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谴责哈萨克一九四三年歷史的决议，下令哈萨克歷史学家进行修改。如果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明确授意，哈萨克斯坦当局会通过这样的决议乃是难以想像。

苏联在二战中的胜利标志着它那套源于一九三九年《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民族政策走向终结。非俄罗斯民族的地位从此急剧下降，俄罗斯人的主导地位获得重新确认。这种政策是由史达林自己放出风声。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史达林在克里姆林宫向一众苏联军事指挥官祝酒时这样说：

身为苏联政府的代表，我要举杯敬祝苏维埃人民健康，首先是敬祝俄罗斯人民健康。我首先敬俄罗斯人，是因为他们是最杰出的民族。我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在这次战争中被公认为苏联各族人民的领导力量。我举杯祝俄罗斯人健康，不仅因为它是领头羊民族，还因为它有着清晰头脑、良好政治判断力和坚忍不拔的性格。

这番祝酒词经小幅修改后翌日刊登在苏联各大报。未来几年，它将会被一再转载，标志着党中央民族政策的新转向。因为剧本《赫梅利尼茨基》而获得史达林奖的考纳丘克早在这番祝酒词发表前便意识到风向的改变，因为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初，他的得奖剧本在一个亲苏联的波兰代表团访问过乌克兰之后被取消演出。当时仍是史达林最喜爱剧作家的考纳丘克吓坏了。他抱怨说，《伊凡．苏萨宁》的内容要比《赫梅利尼茨基》反波兰得多，但没有人反对让它在莫斯科上演。但他投诉无门。他的戏剧受到批判，无处可演，反观改编自帝俄时代的《为沙皇献身》之《伊凡．苏萨宁》却继续留在舞台上。

为了改善苏联与波兰人的关系，莫斯科已准备好遏制乌克兰民族主义，但没打算遏制势力更强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随着爱国战争结束，各种品牌的爱国主义不再一律受欢迎。

311　这条约的正式名称是《莫洛托夫 - 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本书也是採用这个称嘂，为了减少累赘，译文改用俗称。

312　Serhii Plokhy, “The Call of Blood: Government Propaganda and Public Response to the Soviet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Cahiers du monde russe 52, nos. 2-3 (2011): 303-304.

313　同上，295.

314　即前面提过的外喀尔巴阡，原属奥匈帝国统治，经过一些演变后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一省，德国势力进入后更名「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其居民以乌克兰裔为大宗。

315　Serhy Yekelchyk, Stalin’s Empire of Memory: RussianUkrainian Relations in the Soviet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oronto, 2004), 15-26.

316　指原即为苏联一部分的东乌克兰。

317　“Vystuplenie po radio V. M. Molotva 22 iiunia 1941 g.,” Khrestomatiia po istorii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comp. V. E. Lebedinskaia (Moscow, 2015), 37.

318　「爱国战争」一译「卫国战争」。

319　“to reestablish the rule”: Iosif Stalin, O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Sovetskogo naroda (Moscow, 1948), 13.

320　同上，40.

321　就是前面提过的加利奇公国丹尼尔亲王，达尼洛（Danylo）系以乌克兰语拼写。

322　指十三世纪时对抗瑞典和条顿骑士团的入侵。

323　Ianka Kupala, Izbrannye proizvedeniia (Moscow, 1953), vol. 2, 222.

324　David Brandenberger, National Bolshevism: Stalinist Mass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1931-1956 (Cambridge, MA, 2002), 158.

325　同上，125.

第十七章　苏维埃人

史达林殁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四天后，作为告别死者仪式的一部分，他的遗体被放置在红场陵墓中列宁棺椁旁。他不仅以政府首脑的身分，还以全世界劳动人民领袖的身分受到哀悼。

东欧、中国、北韩共党政府的领袖，还有西欧国家义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应邀出席在陵墓举行的悼念仪式。发表悼词的包括史达林亲近的成员和苏联知识分子的代表，特别是作曲家萧斯塔高维奇和作家暨战争诗人西蒙诺夫。现场却看不见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身影—他们在苏联层级系统的地位太微不足道。对史达林的接班人来说，最重要的议题是如何把共产主义输出到全球，不是国内的民族问题。根据官方说法，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被史达林亲自解决。

新领导人马林科夫在致词时指出：「社会发展史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即民族问题，其解决方案和史达林同志的名字相连在一起。有史以来第一次，最了不起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即史达林同志，在一个多民族和巨大国家的层次让年深日久的民族争议有了终结的可能。」马林科夫接着解释苏联民族问题是怎样被解决：「在史达林同志的领导下，本党成功克服了原先受压迫人民的经济和文化落后状态，把苏联各民族统一为形同手足的大家庭，锻铸出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326

引人注目的是，马林科夫赞扬史达林在民族问题上的成就时，并没有突出俄罗斯的地位。事实上，苏联民族政策的俄罗斯中心主义正是史达林对列宁民族政策主要的修正。显然可见，史达林的一群接班人还不确定他们该怎样对待他的这部分遗产。

官方说法和苏联各族人民不尽融洽的事实之间的落差很快就被贝利亚的行动反映出来。他是新政府安全事务的主管，大权一把抓，是史达林各个接班人中最有实权的一位。在葬礼上讲话时，他不仅谈到苏维埃人，还谈到苏联各族人民。不久之后，他发起动议，主张终止反犹太主义运动，停止把犹太人看成外人和西方间谍。被他从监狱释放的犹太人包括当朝排名第二的人物莫洛托夫的妻子热姆丘日娜，她是史达林亲自下令逮捕，繫狱已经四年，这段期间她丈夫继续保有官职，诚惶诚恐为大老闆办事。

一九五三年六月，经党中央的批准，贝利亚推出了一批以终止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化为目的的政策，包括规定各加盟共和国的党委第一书记必须是当地主体民族的成员，召回所有不会说在地语言的干

部，所有公务信函都改用在地语言书写。这听起来像是苏联民族政策的一次重大变革，是要从史达林时代的俄罗斯中心主义回归一九二○年代的本土化政策。

我们无法得知贝利亚原准备在修订民族政策一事走多远，因为他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底前便因为主要对手赫鲁雪夫设计而被捕，并在年底枪毙，罪名是为英国工作的莫须有罪名。他还被控企图在各共和国内恢復资产阶级色彩的民族主义元素，藉此破坏苏联各族人民和「伟大俄罗斯人民」之间的友谊。在在看来，史达林的俄罗斯中心主义又再次占上风。但事情没有这般简单。因为贝利亚虽然被处决，但他抑制在加盟共和国进行俄罗斯化的计画并未被推翻。这些措施中有一些会到了苏联最后的日子还继续有效。

尽管史达林几个继承人陷入激烈权力斗争，但这位独裁者的死总的来说还是让国内的政治肃杀气氛缓和不少。二战结束后，史达林重新收紧党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控制，并恢復俄罗斯和俄罗斯人在苏联民族层级系统中的优位性。在这段「日丹诺夫时期」（得名自史达林的首席理论家日丹诺夫），官方对自由主义或一切偏离党中央路线的表现毫不留情。凡是有亲西方之嫌的事物或不符官方认可文学模式的作品—即不符古典俄罗斯文学模式的作品，都会受到勐烈批判。被波及的不仅止于作家和艺术家，还包括二战期间权大势大的宣传机关首脑亚歷山德罗夫：他所着的《西方哲学史》被指为对观念论谴责不足。着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也受到批评，指他不应该在《恐怖伊凡》的下集让这位沙皇显得软弱和头脑混乱，而电影的上集曾受到史达林推崇。

当「冷战」在一九四八年揭开序幕之后，日丹诺夫规划的意识形态运动有了新的动力，目的是维护俄罗斯中心主义。新一波国际冲突，由史达林在东欧扶植一批共产政权之举和土耳其及伊朗的地缘政治角逐引起，苏联和它的前盟友英美翻脸成仇。随着新创建的犹太人国家以色列成了双方争夺全球霸权的战场之一，克里姆林宫开始不信任国内的犹太人，怀疑他们心向西方。新一轮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之一是攻击「无根的世界主义」—当局用这个词语来掩盖它对犹太人的迫害和鼓励众人用一种仇外及反西方心态诠释俄罗斯的文化传统。

回归俄罗斯中心主义意味着在加盟共和国回归反民族主义的政策。自一九四六年起，党中央通过一个又一个决议，致力打击加盟共和国表现的所谓民族主义偏差。在乌克兰和白罗斯，文学史成为了主要箭靶。有一部乌克兰文学史被指控为把苏联白罗斯文学的源头说成是「波兰乡绅」和「旧日的西化主义者和自由派」，忽略了白罗斯和俄罗斯在民主文学和文化两方面的歷史渊源。在乌克兰，党的意识形态家也开始在文

学史上揭发「谬误」，谴责《赫梅利尼茨基》之类的歌剧未能把俄罗斯人民表现为一股进步力量。乌克兰最知名的电影制作人多夫任科也受到攻击，被规定只能待在莫斯科，不得前往乌克兰。一九五一年，当局对优秀乌克兰诗人索休拉在一九四四年发表的〈爱乌克兰〉一诗发起批判。这首诗在二战期间备受推崇，但此时却被谴责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

在赫鲁雪夫掌管乌克兰期间（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为止），他参与了对乌克兰文化界名人的攻击。但一等史达林在一九五三年归西，他便持续偏离这位独裁者的政策。在这方面，他和他的主要对手贝利亚是同道，不是对头。在后史达林的领导班子里，赫鲁雪夫和贝利亚是大位的两大角逐者，但正如前面提到，赫鲁雪夫未几便智取贝利亚，在一九五三年年底之前将其枪毙。政治局其他成员愿意支持剷除贝利亚，是因为见他权力愈来愈大，担心他会用手下的祕密警察对他们不利。赫鲁雪夫以集体领导制作为回报。接下来，他花了快十年才除去他在政治局的其他潜在对手，包括苏联政府首脑马林科夫、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国防部长又是「爱国战争」大英雄的朱可夫。

赫鲁雪夫当权的岁月以一批雄心勃勃的改革知名。这些政策包括把经济决策权下放给地方、试图透过支薪给农民让苏联农业復甦，以及大量兴建都市住房。但他的倡议很少有比他的「去史达林」化运动更加引起瞩目。他谴责史达林反党和反国家（但不包括反人民），释放古拉格集中营大部分政治犯，发起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的公共辩论。一九五○年代晚期这种对意识形态箝制的放松后来被称作「赫鲁雪夫解冻」。

寻找一种新的民族政策也是赫鲁雪夫改革路线的一部分，也密切关联于他去史达林化的更大目标。他起初在民族政策上颇为犹豫。他对这问题的早期思维方式和思想局限清楚显示在他对苏联国歌所做的更动上。在一九五五年的修订版国歌里，提到史达林的部分被删除，史达林参与编写的原歌词没提到党而现在被提到，藉此显示国家大政将会出自党的集体领导和智慧，不是一个大权独揽的领导人。不过，歌词的其余部分，包括一开始提到的苏联各族人民是团结于大罗斯人之下则原封不动。

一九五四年一月，赫鲁雪夫推出了他任内第一个大型公共活动：以铺张方式庆祝赫梅利尼茨基接受俄罗斯为宗主国的三百週年纪念。配合这个活动，当局推出了一本名为《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重新统一》的小册子，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出要在马克思主义修辞和苏联式「人民友谊」的旗帜下把俄罗斯的帝国叙事和非俄罗斯的民族叙事相结合会碰到

哪些困难。顾名思义，《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重新统一》是把一六五四年的佩列亚斯拉夫会议，即乌克兰哥萨克人作成投靠莫斯科沙皇决议的会议，看成让乌克兰和俄罗斯重新统一的关键。

「重新统一」的说法源自帝国时代的「罗斯重新统一」史观。这种史观在帝国时代讲得通，因为俄罗斯人一贯相信，基辅罗斯是由同一个民族构成，后来这个民族被蒙古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切割开来，要到了十六和十七世纪始才在莫斯科沙皇的努力下重归统一。问题是，苏联歷史学家一直声称，俄罗斯和乌克兰是相互独立的民族，不是同一个民族的两个分支。两者怎么能够「重新统一」是一个苏共宣传人员从未试图解释或解决的弔诡。但不管怎样，当局会採取「重新统一」的说法，在在显示出「单一俄罗斯民族」的观念重新受到青睐。

党中央在批准《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重新统一》出版时这样说：「透过把他们的命运永远连结于兄弟民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民将得以挣脱外国的征服，确保自身的民族发展。另一方面，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团聚大大有助于强化俄罗斯国家，提高其国际威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劳动人民的友谊在联合斗争共同敌人的过程中愈发牢固和强大。这些敌人包括沙皇国、拥有农奴的地主，资本家和外国侵略者。」327

就这样，一件事在一九二○年代因为强大的沙皇统治而被苏联歷史学家谴责为「绝对的恶」，到了一九三○年代在俄罗斯统治下却被改而说成「较小的恶」的事件328，如今变成了完全是好事一桩。因为沙皇的领土野心固然可恶，却在无意中促成了俄罗斯和非俄罗斯劳动群众的结合。苏联的宣传人员变了个漂亮的戏法，让俄罗斯帝国主义终于找到方法用阶级论述来合理化自己在苏联的復出。

三百週年庆的重头戏是由莫斯科领导层代表一个兄弟民族，把一件超级大礼送给另一个兄弟民族：把俄罗斯联邦对克里米亚半岛的管辖权转移给乌克兰共和国。此举固然是为了表现两个民族间的互信，但也是为了表达，莫斯科当局愿意把行政管理和经济的考量置于其他考量之上：由于战争的蹂躪和史达林在一九四四年放逐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政策，克里米亚的经济迟迟没有起色，现在，透过与它依赖甚深的乌克兰整合，克里米亚将可望受益。

庆祝俄罗斯和乌克兰统一的官方活动也带有斯拉夫人联合起来对付非斯拉夫人的味道。因为莫斯科始终拒绝让克里米亚鞑靼人返回家园，所以乌克兰接收克里米亚等于是参与了俄罗斯对一个少数民族的非法放逐和歧视。尤有甚者，莫斯科宣布，这个庆祝活动不仅对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一件大事，也是苏联其他民族的一件大事。事实上，直到苏联

解体为止，《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重新统一》所勾勒的俄、乌歷史关系都被套用到俄罗斯和苏联其他民族的关系。

现在，乌克兰的非官方地位被提升为第二重要的苏联共和国。事实上，掌管乌克兰超过十年的赫鲁雪夫非常仰赖他在乌克兰的亲信来强化他作为苏联唯一领导人的地位。在一九五七年夏天确定打败党内对手之后，他开始把他在乌克兰的人马调到莫斯科，给他们加官晋爵。乌克兰中委会第一书记库里申科成为莫斯科中委会有实无名的第二书记。他在基辅的继任者皮得戈尔尼在他下台后被提拔为中委会的祕书。当过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政委书记的布里兹涅夫也被提拔为苏联议会主席。及至一九六○年代初期，乌克兰派系已经成了苏联帝国领导班子的资深成员。虽然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必须由在地主体民族担任的政策继续有效，但莫斯科会派出自己的人，一律是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盯住这个当第一书记的当地人。

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雪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发表的非公开讲话中，宣布他要发起一个大型运动，推翻史达林在公共生活各方面的遗产。他指控史达林创造和促进个人崇拜，迫害党和红军的忠实干部。虽然他没有提及或公开承认史达林对国内其他民族的暴行，但私底下採取措施，为二战中受到史达林「惩罚」的个人甚至整个民族平反。一九五七年，赫鲁雪夫在俄罗斯联邦内重新恢復卡巴尔达 - 巴尔卡尔、卡尔梅克和车臣 - 印古什三个自治共和国，容许这些当初被史达林指为勾结德国而予以放逐的少数民族返回祖居地。但平反政策不是全面性：德国人、朝鲜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都没有获准返乡。尽管如此，他们在流放地所受到的监视还是明显放松。

赫鲁雪夫和他的人马设法在史达林主义的遗产和他们所谓的列宁主义准则—即一九二○年代的民族政策—之间取得平衡。赫鲁雪夫其中一个源出列宁主义准则的举措是在一九五○年代晚期发起反宗教运动。二战期间，史达林一方面停止迫害宗教信徒，另一方面又把宗教组织严格置于政府监管之下。这种变化的主要受益者是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它后来也成了国家对西部边区进行俄罗斯化和苏维埃化的代理人。一九四六年，史达林着手清算加利西亚和白罗斯的乌克兰天主教会（原称联合教会），用的是帝国时代的模式，即让它和俄罗斯东正教教会「重新统一」。就像十九世纪那样，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被统一在俄罗斯东正教教会里。不过，在官方说词里，此举是为了让乌克兰民族在地域和文化上重新统一—大多数乌克兰人传统上都是东正教徒。

赫鲁雪夫也像史达林一样，把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用作国际政策的工具。他允许东正教会代表参加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甚至允许他们作为观

察员出席一九六二年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但在国内，他没有多少用得着他们的地方。此外，他也无法容忍既有的宗教信仰挑战他建立的新信仰：共产主义天堂。他在一九六一年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宣布党在接下来二十年的主要目标是要为共产主义社会打下基础，又承诺将来会透过电视让大家看看，苏联最后一个信教的人长什么样子，这充分反映出赫鲁雪夫深信科技进步可以粉碎对超自然的信仰。在反宗教狂热的驱使下，政府关闭了全国一半东正教堂区。原有的四十七间东正教修道院中，只有十六间被允许继续运作。对于基督新教团体，如浸信会和五旬节派，因为拒绝屈服于政府的压力和继续从事地下活动，受到更严厉的对待。

赫鲁雪夫的反宗教运动无意中打击了俄罗斯人传统身分认同中的宗教元素。它另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增加了乌克兰神职人员在东正教教会的重要性。因为政府虽然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罗斯的传统东正教地区大量关闭东正教教堂，却不敢对西乌克兰下太重手，唯恐信徒会被迫抛弃受政府控制的东正教信仰，加入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乌克兰天主教。在反宗教运动中倖存下来的东正教堂区大概八千个，大多数坐落在乌克兰，又绝大部分是位于从前的联合教会地区。

俄罗斯东正教最有联合教会色彩和乌克兰裔信徒最多的时代莫过于赫鲁雪夫当权的时代。乌克兰人曾经在十八世纪的俄罗斯东正教全体主教中居多数，而这一次却变成是乌克兰人在全体教徒中占绝对多数。看来没有人担心这种新发展对民族政策的可能影响。毕竟，政府里没有几个人相信，在赫鲁雪夫力推的共产主义新社会里，宗教或民族性还有未来可言。

一九六一年标志着赫鲁雪夫政治生涯的最高点，他位于苏联金字塔顶端的位子看似不可动摇。如果不是大权在握，他不会敢于下令把史达林的遗体移出红场陵墓并把史达林格勒更名为伏尔加格勒。当年四月，苏联把世界上第一个太空人送上太空。苏联除了在太空竞赛中领先美国，拥有的飞弹亦足以威胁美国。苏联固然还面临一些问题，包括经济计画未能完全落实和干旱对农业的威胁等，但其整体经济仍然以稳健的步伐增长，每年至少百分之五，长远来看前途光明。

赫鲁雪夫利用十月召开的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宣布一项改造苏联社会的雄心勃勃大计。他和一票助手致力于此已经多年。他在致词的最后做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承诺：「党在此要雄赳赳地宣布，目前一代的苏联人将会生活在共产主义中！」329他向国人和世人保证，苏联政府在二十年内将会把共产主义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建造完成，奠定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民族差异会在共产主义制度底

下消失。还是一九二九年的时候，史达林曾拒绝即时合併苏联各民族的要求，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民族差异的存在乃属理所当然。但现在，随着社会主义走完它的歷史道路和共产主义近在眼前，没有理由继续维持苏联各民族的区别，反而应该加速它们的匯流。

新的党纲虽然保证让各民族自由，但仍充分反映出赫鲁雪夫的新思路。他在党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宣称：「一个有着共同特徵和由各族人民构成的新的歷史共同体已经在苏联形成，它就是苏维埃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社会主义祖国─苏联；有一个共同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共同的社会阶层结构；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共同目标─建造共产主义。不管在精神面貌或在心理上，这个民族都有许多共同特徵。」330「苏维埃人」的概念并不新鲜，布哈林曾在一九三○年代提倡过，史达林本人也经常使用这词语，但这一次它被寄与厚望和委以重任：在二十年内消弭所有的民族差异。

赫鲁雪夫疏远史达林对民族的看法，即不认为民族主要是由共同的语言、文化和领土界定。国家、经济、阶级和意识形态是新的苏联政治国家的主要标志。虽然新党纲承诺捍卫和发展苏联各族人民的语言，但事实上当局在打造新的苏维埃人一事别无选择，只能以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为其基础。可反映出这一点的是它提到了一个业已存在的现实：「非俄罗斯民族自愿在母语以外也学习俄罗斯语，是正在发生的现象，而这现象有正面意义，因为它可以促进经验的交流，让所有大、小民族吸收苏联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就和世界文化。俄罗斯语事实上已经成为苏联各民族交流和合作的共同语言。」331

赫鲁雪夫会热情拥抱「苏维埃人」的观念，不单纯是因为相信共产主义境界指日可待和意识形态狂热作祟。一些学者把他的民族政策分为两个时期，分界线是一九五七年。在这一年之前，他在莫斯科的权力尚未巩固，所以他尽力讨好各共和国的领导层，给予他们比史达林时代更多的行政和经济自主权。透过在各共和国设立一些主管经济事务的部会和创立一些地区性的经济会议，他削减了中央对经济决策权的控制。拜这个政策之赐，乌克兰的工业产值从百分之三十四增加至百分之九十七。该共和国也获得了更大的文化政策自主权。这一套让各共和国的领导层在莫斯科的权力斗争中支持赫鲁雪夫。除了他在乌克兰的班底，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也把他看成是自己人。

第二个时期的政策截然不同。一九五七年之后，赫鲁雪夫在党中央的地位已屹立不摇。这时，他开始整肃中亚、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领导班子，又推出了一些致力于边区俄罗斯化的新举措。乌克兰和白罗斯的领导层逃过了整肃，但没逃过俄罗斯化政策的冲击。一九五八

年，苏联议会通过一项法律，解除非俄罗斯人的小孩必须用母语学习的规定，改为容许家长自行决定儿女以何种语言接受教育。由于大部分大学都是用俄罗斯语教学，而高薪的工作又只会请会说俄罗斯语的人，苏联教育系统的快速俄罗斯化变得势不可免。

受新法规打击最重的是斯拉夫人的共和国，因为在地语言和俄罗斯语之间的语言障碍很容易跨越。白罗斯语的情况特别岌岌可危。乌克兰在一九五三年便有了一个土生土长的领导人，白罗斯却要等到一九五六年才开始有第一个操白罗斯语的党领袖：马祖罗夫。但马祖罗夫一口流利的白罗斯语对他并无好处。在一九五九年年初，马祖罗夫在白罗斯建国四十週年庆祝活动时以白罗斯语发表讲话，引起在场的赫鲁雪夫不悦。赫鲁雪夫在乌克兰待过很多年，当然不会听不懂另一种东斯拉夫语，所以重点不在这里。在参观白罗斯国立大学时，他表示：「我们愈早全用俄罗斯语说话，共产主义便能愈早建成。」332几十年后，当时苏联仍然存在，当这所大学想要聘一个能用白罗斯语讲授白罗斯史的教授时，竟然找不到胜任人选。

没有一个乌克兰领导人曾经因为用乌克兰语发表讲话而受到训斥—他们直到一九七○年代还是这样做，但马祖罗夫的事情已足以让他们学到教训。在一九五八年，乌克兰出版的所有书籍中有百分之六十是用乌克兰语写作，但这个数字在一九五九年降至百分之五十三。之后继续下降：一九六○年是百分之四十九，一九六五年是百分之四十一。与乌克兰语出版品锐减齐头并进的是俄罗斯语出版品的激增。在白罗斯，母语出版品的减少甚至更加快速：从一九五○年的百分之八十五下滑至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三十一。

俄罗斯语出版品的激增反映着教育系统的俄罗斯化。一九五一到一九五六年之间，在乌克兰语学校学生在全体学生的占比从百分之八十一降至百分之六十五。同一时期，俄罗斯语学校的学生从百分之十八提高至百分之三十一。大都市的情况尤其令人担忧。在一九五九年，基辅只有百分之二十三学生是用乌克兰语学习，却有百分之七十三是用俄罗斯语学习。随着对教育系统俄罗斯化的步伐加快，愈来愈多俄罗斯语学校甚至拒绝开白罗斯语或乌克兰语课程。在一九六○年代末的明斯克，百分之九十的学生从来没有上过白罗斯语的课。

乌克兰俄罗斯化的速度之所以与白罗斯的情形不同，其中一个因素是兼併自波兰领土后的文化政策所发挥的作用有关，这兼併以一九三九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基础，后来又在一九四五年的雅尔达会议得到英、美的追认。西乌克兰的乌克兰人拥有发达的民族意识，其中以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为最，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略逊一筹，这使得俄

罗斯化的西乌克兰和共和国其他地区的步伐被拖慢。为了把西乌克兰整合到苏联，莫斯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对它下手太重。

西白罗斯的情况却相反。它的城市居民比东白罗斯的城市居民更不眷恋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和歷史。这是因为东部地区毕竟在一九二○年代经歷过短暂的白罗斯化，反观被波兰统治的西部地区却没有任何类似经验。在一九五九年，住在西白罗斯城市的白罗斯人有百分之二十三自认俄罗斯语为母语，而居住在西乌克兰城市的乌克兰人只有百分之四这样认为。到了一九七○年，前一个数字增至百分之二十六，后一个数字却降至百分之三。这是因为有大量乌克兰农民迁入城市，而他们又拒绝放弃母语。

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转向随着赫鲁雪夫被以布里兹涅夫为首的一群前亲信赶下台之后发生。这场发生在一九六四年十月的宫廷政变是由党和国家领导层的保守派分子发起，他们相信赫鲁雪夫的改革政策已经威胁到俄共政权的稳定。新的统治者抛弃了赫鲁雪夫的一些政策，包括不再下放权力给各共和国，也不再对共产主义痴迷。布里兹涅夫宣布，苏联社会是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必须暂时以此为满足。他没有宣布共产主义社会何时会到来。新的领导层删除党纲中「目前一代的苏维埃人将会生活在共产主义中」的说法，但没有抛弃原有的党纲或它的单一苏维埃民族概念。

及至一九七○年代初期，布里兹涅夫已经把苏维埃民族的观念安置到他的民族政策核心。官方发起宣传运动提倡苏维埃的生活方式，又在新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给了「苏维埃人」一个新定义。新定义去掉共产主义是苏维埃人共同目标，但保留他们共同信仰马克思 - 列宁主义和共同使用俄罗斯语的部分。新定义另外引入了公民的观念：「在苏联之下苏维埃人处于同一批国家权力与国家管治的最高机构之下，每个人都拥有公民权。」333《苏联大百科全书》这么叙述：「在苏联国与国之间沟通的共同语言是俄罗斯语。」

在文化上俄罗斯化自此成了官方政策。把非俄罗斯语边缘化和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行动始于一九七○年的一纸命令：它规定所有学生的毕业论文都必须用俄罗斯语撰写并得到莫斯科的通过。一九七九年，有关部门在塔什干举行了一场全苏联的会议，就如何提高俄罗斯语教学的品质进行讨论。从一九八三年开始，当局给予在以非俄罗斯语教学学校的俄罗斯语老师额外津贴。文化上俄罗斯化的步伐开始加快，因为它被认为攸关苏联民族打造工程的成败。

在打造单一苏维埃民族一事上，布里兹涅夫从赫鲁雪夫那里继承而

来的是一笔自相矛盾的遗产。赫鲁雪夫的去史达林运动，导致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解冻」，让一批不相信共产主义可能达成的政治活跃分子可以走到前台。他们认为，与其建造共产主义，不如改革社会主义，让它的政治和文化变得多元化。他们又因此得到应该让各民族文化自由发展的结论。正是在这个解冻时期，索忍尼辛的着作开始为读者所熟悉—他日后将成为俄罗斯反对派的精神领袖。

保存歷史古蹟包括宗教古蹟的议题和生态关怀开始出现在一些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中。又因为常常把焦点放在饱受农业集体化摧残的俄罗斯农村，他们后来被认为是一种叫「乡村散文」的新文类的代表。类似的关切也见于包含乌克兰和白罗斯在内的其他共和国作家的作品。驱使他们这样做的不是对苏联土地或民族的感情，而是对自己共和国的民族和认同。党中央是在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基础上打造单一苏维埃民族，各共和国的作家却是在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各自组织起来，用民族文化术语来定义他们的关注点。

在俄罗斯，「赫鲁雪夫解冻」带来的文化復兴让作家和艺术家分裂为两个政治和文化上对立的阵营。第一个阵营以文学刊物《青年近卫军》为中心，鼓吹一种以保守主义和反自由主义为特徵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其成员既为俄罗斯农村和文化的命运鸣不平，又支持追求国家强大的理念和提倡没多少掩饰的反犹太主义。另一个阵营是俄罗斯自由派，他们也有自己的刊物，最知名的一本是《新世界》。《新世界》也刊登很多「乡村散文」，却是持反民族主义立场。两派人马的冲突在一九六○年代晚期白热化。当时，俄罗斯保守分子在他们的刊物指控对手一心想要把俄罗斯文化美国化。自由派反过来指控对手表现出俄罗斯民族主义，渴望保存帝俄的传统，企图把俄罗斯文化孤立于全世界。

一九六九年，《新世界》一系列攻击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文章迫使当局插手干预。两本杂志的总编辑都在一九七○年被撤职。虽然《青年近卫军》总编的去职标志着党宣传机关见习领导人雅科夫列夫的胜利，但这胜利为时短暂。一九七二年，他因为发表文章攻击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文学和文化生活的表现，丢了在中央委员会的职位，被外放到加拿大当大使。十年后的一九八○年代中期，他将会被苏联政治的明日之星戈巴契夫发现并带回莫斯科，成为戈巴契夫改革计画的设计师之一。

在一九七○年代中期，党中央当初会选择牺牲雅科夫列夫，是为了安抚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愈来愈得势的民族主义势头，更重要的是为了吸收一些内奸，让该趋势处于党的控制之下。不肯就范的人会被赶出国，例如俄罗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非正式领袖索忍尼辛在一九七四年被撵走。其他人—例如《青年近卫军》的新总编和「乡村散文」健将伊

凡诺夫，则必须调整他们的文化纲领去配合党领导层强加给他们的指导方针。

党将会继续支持对苏联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俄罗斯化、贊助出版伊凡诺夫和其他俄罗斯民族主义作家的作品（前后有几千万册），和接受他们的一些文化倡议。根据其中一个倡议，当局在一九八○年举办了纪念库里科沃战役六百週年的活动。虽然在该战役中被打败的是来自东方的侵略者蒙古人，但苏联媒体却把它反过来用，藉它来激发俄罗斯社会的反西方情绪。贯穿整个一九七○和一九八○年代，在边区省分进行的俄罗斯化和反西方主义都是让苏联忠贞党员和俄罗斯民族主义作家可以携手合作的两大意识形态元素。

莫斯科愿意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温和派讲和，却绝不容忍各共和国特别是乌克兰的非俄罗斯民族主义。「民族共产主义」的观念一度在一九六○年代的乌克兰復兴，而根据这种观念，打着国际主义幌子推行俄罗斯化乃是一种对列宁政策的背叛。民族共产主义在一九二○年代的几个领军人物陆续于一九五○年代晚期和一九六○年代初期获得平反，其中一位是斯凯里波尼克，他在一九三三年被指控犯了民族偏差错误之后自杀。早期支持民族共产主义的重要文化界人物，包括诗人图奇纳和电影制作人多夫任科，此时又活跃起来，帮称为「六○年代的一代」的作家和艺术家，提供灵感、支持和政治掩护。一九六○年代的那些人鼓吹苏联各族人民自由发展，反对合流，代表人物有德拉奇、丽娜．柯斯登科和斯特斯，斯特斯后来被捕送往古拉格，死在那里。一些乌克兰学者也开始把他们对歷史趋势和当前文化局势的分析写成备忘录，呈交给党官员过目。这些备忘录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政策建议书，挑战了俄罗斯中心主义史观ー以一九五四年的《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重新统一》为代表，对乌克兰教育、文化和政治的俄罗斯化做法表示抗议，指出那是对列宁民族政策的偏离。

一九七二年五月，随着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舍列斯特遭免职，乌克兰民族復兴运动戛然而止。舍列斯特是个意志力强大的第一书记，掌管乌克兰近十年，期间不仅容忍还支持乌克兰文化的发展和乌克兰人的身分认同。布里兹涅夫在莫斯科政治局与许多对手斗争那段期间，舍列斯特予以大力支持。作为回报，布里兹涅夫不大过问乌克兰的经济和文化事务。不过，一等布里兹涅夫边缘化自己在政治局的主要对手前KGB首脑舍列平，舍列斯特的日子便屈指可数。

就像史达林在消灭政治对手之后便用不着一九二○年代的乌克兰的党领袖，舍列斯特也成为了消耗品。在这两个情况中，紧接着乌克兰党领导人去职而来的是乌克兰文化復兴运动遭到攻击。舍列斯特被调到莫

斯科，起初担任政治地位微不足道的部长会议副主席，不多久就被指控美化乌克兰哥萨克国和犯了其他民族偏差错误。与此同时，KGB动手逮捕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对乌克兰机关进行清洗。在布里兹涅夫的忠仆谢尔比茨基的整顿下，乌克兰成了各共和国的模范生。既然异议分子都被送到了古拉格，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苏维埃民族打造工程的大步前进，而在乌克兰，这工程意味着打着社会主义幌子復活「单一俄罗斯民族」。

如果说有哪个共和国领导人用不着莫斯科的指示便知道哪种民族政策适合布里兹涅夫统治下的苏联，那么这个人非马舍罗夫莫属。从一九六五年开始直到他一九八○年因为车祸去世为止，他掌管白罗斯共和国长达十五年。据说马舍罗夫受到苏联总理柯锡金的支持，但和布里兹涅夫及其人马不睦。与舍列斯特不同，马舍罗夫在意外身亡之前始终保有官位。虽然捍卫本共和国的经济利益，他从来不做復兴白罗斯语言和文化的事。马舍罗夫与舍列斯特的另一个不同处是公开讲话时从不使用母语。他也没有对本国在前现代的歷史表现出任何兴趣。二战期间，他是游击队战士，一九四四年时年二十六岁获得了最高荣誉的「苏联英雄勋章」。唯一让他感兴趣的是「伟大爱国战争」的歷史。

马舍罗夫为二战的英雄和受害者建造纪念碑，把游击队抵抗纳粹的歷史转化为白罗斯苏维埃国的建国神话。与总是以哥萨克国和基辅罗斯为荣的乌克兰人不同，白罗斯人没有自己的建国神话，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接受「伟大爱国战争」这个全苏联神话。马舍罗夫与包括贝科夫在内的本国知识分子相处融洽。贝科夫才华极高，但大部分精力都是花在描写二战经验。那也是马舍罗夫的主要兴趣所在，是他用来创造白罗斯人和苏维埃人紧密关系的凭藉。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产生出一大群又一大群的民族主义异议分子，但白罗斯人却始终对莫斯科保持忠诚和感激。

到了一九八○年代初期，赫鲁雪夫曾经承诺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共产主义黎明仍无处可寻。不过，它的其中一个元素，一个称为「苏维埃人」的单一政治民族已经取得真正进展。把这一点表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该民族的通用语（即俄罗斯语）涵盖幅员的大肆扩张。在一九七○年，苏联人口中有百分之七十六自称俄罗斯语流利。在一九七○到一九八九年之间，声称对俄罗斯语有良好掌握的非俄罗斯人从四千二百万人增加至六千九百万。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功，主要是在东斯拉夫人的共和国里取得。

操俄罗斯语者的人口增加是以不平均的方式分布。在二亿九千万苏联公民中，有近七千五百万不认为自己俄罗斯语流利，而他们大部分是住在东斯拉夫人构成的核心区之外。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情况让中央政

府特别担心：这些地方的居民俄罗斯语欠佳，让从它们徵来的新兵很难有效地被整合到正在阿富汗作战的苏联军队。这些地区的非俄罗斯人继续聚族而居，族外通婚都是例外情况而非通则。只有东斯拉夫人和高度都市化的犹太人会自由通婚。大多数在普查员面前自称俄罗斯语流利的非俄罗斯人都是乌克兰人、白罗斯人和犹太人。在一九八九年的普查中，六千五百万自称俄罗斯语流利的苏联公民中有五千五百万是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

在一九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的过程中，俄罗斯化在东斯拉夫人的共和国中加速进行。这不仅导致了在职场和学校使用俄罗斯语的情况激增（西乌克兰是一个显着例外），还大大降低了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的民族意识，这是透过受访者是否认同母语来判定。认俄罗斯语为母语的乌克兰人在一九五九年是百分之六，在一九七九年是百分之十，到了一九八九年是百分之十六。白罗斯人的民族意识衰退得更严重，前述三个年份的数字分别为百分之七、百分之十六和百分之二十。每五个白罗斯人就有一个自认为是俄罗斯人，哪怕他们的护照不是这样说。

所以，要把斯拉夫人和非斯拉夫人熔铸为一个单一苏维埃民族虽然明显困难重重，但从东斯拉夫人打造出一个大俄罗斯民族的工程却明显上了轨道。在在看来，要实现帝俄时代民族工程师的旧梦–建立一个「全俄罗斯」民族，并不存在障碍。作为这些工程师的接班人，苏联领导层唯一需要的是时间，只可惜，到了一九八○年代晚期，他们的时间已然耗尽。

326 “Rech’ tovarishcha G. V. Malenkova,” Kommunist, no. 3 (1953): 12.

327 “Theses on the Tree-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the Reunion of Ukraine and Russia,” in Toward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kraine, eds. Ralph Lindheim and George S. N. Luckyj (Toronto, 1996), 303-304.

328 前面提过，史达林说过：与被其他外国强权併吞相比，乌克兰和乔治亚被併入俄罗斯是「较小的恶」。

329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Moscow, 1962).

330 XXII s’ezd KPSS—Steniografcheskii orchet (Moscow, 1962), vol. 1, 153.

331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332 Mamasharif Nishanov, Obnovlenie dukhovnoi zhizni natsii (Tashkent, 1992), 30.

333 S. T. Kaltakhchian, “Sovetskii narod,” in Bol’shaia sovetskaia ėntsiklopediia (Moscow, 1970), s.v.

第六篇　新俄罗斯

第十八章　红旗倒下

三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在短短几年内相继过世。统治国家十八年的布里兹涅夫殁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他的接班人是前KGB首脑安德罗波夫，也在一九八四年二月病逝；下一位接班人契尔年科亦步亦趋，卒于一九八五年三月。老态龙钟的苏联早已耗尽新观念，而到了此时，它耗尽所有坚决维护旧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模式的领导人。

新一代的领导人中，五十四岁的戈巴契夫是热中尝试新事物的一位。摆在他面前最主要的挑战，是彷佛自由落体的苏联经济。一九三○年代苏联的收入年平均增长率约百分之十四，一九五○年代慢了下来降至约百分之十，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更是掉至近百分之五。这还只是官方数字。据中情局（CIA）估计，一九八○至一九八五年之间苏联的收入增长率仅接近百分之二，而「后苏联」时代算出来的数字还要更低。与此同时，苏联的人口却以快得多的速度增长，在一九五○年代突破一亿八千万人，至一九八○年代中期更是达到两亿八千万人。到了戈巴契夫一九八五年三月上台时，出现短缺的不仅是消费品，还包括粮食。振衰起敝，刻不容缓。

这位新领导人面对的另一个难题是党和党高层权力正当性、合法性的流失。共产党靠的不仅是高压统治和手段，也靠着许人民以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这个未来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完成，而在民众心目中，共产主义的完成意味着丰衣足食。赫鲁雪夫曾经承诺，共产主义天堂会在一九八○年代初期实现。但这种天堂境界迟迟没有出现，反而是经济不断衰落，让人民对将临天堂及其先知的信仰跌落谷底。当局对比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就，声称社会主义的经济表现注定会胜过资本主义。但这个预言从未实现。此说如果在一九五○和一九六○年代还多少可信，当时苏联的国民生产毛额增加超过两倍，美国只增加一倍，但到了一九七○年代，苏联的经济已不再有竞争性。一九七○年苏联的经济规模体约为美国的百分之六十，此后规率地下滑，到一九八九年更是剩下不到美国的一半。

一九七○年代晚期和一九八○年代初期，两大超级强权的冷战进入白热化。当时，苏联在阿富汗泥足深陷，它在一九七九年出兵阿富汗支持一场社会革命，藉此阻止西方的推进，反观美国却开始从越战的心理震撼和一九七○年代的能源危机恢復过来，在词令和对外行动上都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在雷根总统的带领下（他一九八一年一月入主白宫，当了两任总统），美国不仅在阿富汗也在波兰挑战苏联。波兰的工人示威催

生出「团结工联」，而这个组织不但反对波兰共产党的统治，也反对苏联的政治控制。雷根恢復军备竞赛，用「战略防卫倡议」（后来被称为「星战计画」）威胁苏联，摆出要武装化外太空的态势。计画中的反飞弹系统因为据信可以解除苏联飞弹对美国的威胁，具有改变原有的权力平衡局面的潜力。虽然科技难题最后让这个计画沦为纸上谈兵，但雷根当初却深信其为可行。苏联人也是一样，只不过他们缺乏资源，无法在下一轮军备竞赛追赶美国。

所以，戈巴契夫必须赶快採取行动，应付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权力正当性危机，以及应付来自国外的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竞争。在国际舞台，他企图透过谈判，与美国签署一批裁减军备协议，以缓和紧张关系。此举既可让苏联省下军费从事民主改革，也可确保西方愿意出手相助，挽救苏联摇摇欲坠的经济。戈巴契夫同时设法透过从阿富汗撤军，减轻苏联的经济负担和改善苏联的国际形象。他在一九八八年落实撤军行动，又容许东欧的苏联卫星国自行决定採取何种政体。这个决定导致它们的共产政权在一九八九年夏天和秋天被一连串大体和平的革命推翻，有效结束中欧和东欧地区的冷战敌对情势。

但最大的改变是发生在苏联本身，引起这种改变的是戈巴契夫推动的「重建」政策，或说是苏联社会的激进重建。他从两个方面对旧体制发起攻势，一是把私有财产和市场元素引入苏联的经济空间，另一是打开政治辩论的空间。因为看见党内老人抗拒经济改革，戈巴契夫利用政治改革软化或者粉碎对手。改革开放政策的关键观念是「开放」（glasnost），即透过一系列措施松开对政治辩论的束缚，让党官员不得不落入媒体和公民的监督。

一九八九年，苏联举行了自一九一七年革命以来第一次相对自由的选举，苏联的政府体制开始产生变化。那年春天，苏联公民把他们的代表选入一个新的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翌年，戈巴契夫利用大会修宪，终结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和创立总统职位，苏联总统成为国家最高领袖，高于党总书记之上。大会把戈巴契夫选为第一任总统，但他维持党总书记的职位，用这个职位来瓦解共产党的势力。党官员只有在地区议会或苏联议会当选方能保有权力。这一招不仅终结共产党一党专政，还动摇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地方官员自此更依赖选民的拥护而不是莫斯科上级的赏识。

民选出来的政治人物一旦开始倾向选民心声，苏联就开始瓦解。在每个加盟共和国，从爱沙尼亚到俄罗斯到乌兹别克，和它们内部的每个自治共和国，选民都希望能够当家作主。刹那间，所有共和国的国民都觉得自己的国家一直受到莫斯科欺负。歷史、语言、文化和民族主义都

成了政治动员的有力工具，把不同的共和国推向不同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轨迹。引入自由选举转化了苏联社会，让多民族国家苏联的结构乃至整合性都受到了质疑。这种变化远比戈巴契夫所预期的激烈，乃至不到数年间，崩溃的便不仅止于共产党政权，还包括整个苏联。

在瓦解苏联一事上，很少共和国比俄罗斯联邦扮演更重要角色，日后也很少有一个苏联民族比俄罗斯人更感觉到自己被苏联政体的崩溃出卖。史达林在一九三○年代喜欢称俄罗斯人为「最苏维埃的民族」，而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也肯定占有这种地位。事实上，他们还变成了党想要打造的「苏维埃人」的核心。他们也准备好把其他人整合到这个核心里。及至一九七○年代，俄罗斯人只有极少数，约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八，坚持同族通婚。当然，大部分对民调人员表示愿意嫁娶族外人的俄罗斯人，都是抱着他们将会把配偶俄罗斯化的预期心理，而不是反过来。至此，布里兹涅夫致力推广「苏维埃人」和俄罗斯语的政策终于开花结果（晚至一九九八年，即苏联解体的七年后，仍有百分之五十二俄罗斯公民表示他们拥护「苏维埃人」的观念）。

但是，一九七○年代也是各个非俄罗斯人共和国抗拒布里兹涅夫政策的时代。一九七八年，当莫斯科试图修改乔治亚宪法，删除乔治亚语为该共和国官方语言的条文时，学生走上首都第比利斯街头表示抗议。莫斯科最终让步。既然乔治亚人被容许在自己的宪法中把母语明定为官方语言，其他加盟共和国当然不甘居于人后，要为自己的母语争取同样地位。这些共和国内的俄罗斯裔和操俄罗斯语者如果拒绝学习在地语言，会开始发现自己受到歧视。

这种情况让人回想起一九二○年代，当时莫斯科推行本土化政策以作为对非俄罗斯人的让步。然而，一九二○年代那时候，俄罗斯人在苏联的首要性不会受到质疑。现在的情形却是截然不同。现在他们是落入守势，被迫要么用苏维埃人的概念来减少自己的俄罗斯人色彩，要么把非俄罗斯人看成是平起平坐而非低一等。这让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有一种在自己国家中被围困的感觉，开始表达不满。随着当局把俄罗斯人说成是「最苏维埃的民族」，他们被迫放弃他们革命前传统身分认同的很多元素，包括君主主义和宗教。革命前的俄罗斯民粹主义者认为这些元素是以乡村为基础，也是受到乡村的维持。现在，在索忍尼辛和一批「乡村散文」作者带领下（他们的出版品我们上两章讨论过），出现了一个致力恢復和保存传统俄罗斯人身分认同的运动。

那个起而对抗共产政权苏维埃化政策和边区文化自信兴起的「俄罗斯民族」，是根植于革命前的时代。新一代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家常常以帝俄思考模式定义俄罗斯人，即认为俄罗斯人不仅涵盖俄罗斯裔，还

包含乌克兰裔和白罗斯裔。有鉴于俄罗斯语在乌克兰和白罗斯非常流行，上述思考方式相当类似帝国时代的「单一俄罗斯民族」理念。这种想法同时得到俄罗斯文化建制和异议分子的支持。

在官方批准出版的书籍文章里，基辅罗斯的人民常常被称为俄罗斯人或老俄罗斯人，而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的土地则常常被称为南俄罗斯和西俄罗斯。这种回归帝俄论述的现象之所以可能，一大原因是俄罗斯语缺乏区分俄罗斯人和罗斯人–或鲁塞尼亚人的字眼。很多地下刊物也是持一样态度。例如，奥西波夫主编的杂志《市民会议》（Veche，这个词是指中世纪市民议会），一九七○年代初期开始发行，印数五十至一百份，便公然主张三支东斯拉夫人本质上统一，又统称他们为俄罗斯人。

但不管是苏联版本或是帝国时代旧版本的泛俄罗斯民族观念，都在第二大东斯拉夫民族的知识菁英中间踢到铁板。在俄罗斯，一九七○年代的异议运动分子为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两派：前者以沙哈洛夫为代表，他是苏联的氢弹之父；后者以索忍尼辛为代表。不过，在乌克兰，异议分子却是结合在一起，无分自由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都是致力于同一目标。

这种趋势界定了「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的意识形态纲领和文化纲领。该组织是受一九七五年《赫尔辛基协定》启发而建立的人权瞭望组织，致力于责成苏联在人权问题上遵守国际规范。它是在一九七六年秋天不理会当局反对的情况下成立，而不久之后，莫斯科也有了一个类似的组织。虽然其成员没有把乌克兰独立列为直接的政治目标，却强调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文化和政治上应该是平起平坐。对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成员而言，莫斯科不仅是苏联的首都，还是俄罗斯的体现，所以反对苏联就是反对俄罗斯的宰制。他们在一九七七年二月通过的纲领性文件中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我们高度尊重俄罗斯人的文化、宗教和理念，但莫斯科为什么应该在国际论坛（像在赫尔辛基和贝尔格勒举行的那些）处处为我们做出决定和承诺？为什么乌克兰的文化、创意、科技、农业和国际事务应该由一个邻国（甚至是盟国）的首都来定义和计画呢？」334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意识到，乌克兰对他们来说构成一道难题。在当时最重要的地下文学（未经官方授权自行出版和祕密分发）文本《古拉格群岛》中，索忍尼辛既哀叹歷来多次融合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企图未能成功，又不放弃两者终将合流的希望。他写道：「我们在基辅罗斯时期构成了一个民族，但那之后便被硬生生分开，自此生活方式、习惯和语言都各走各路……」335他谴责共产政权，特别是一九三○年代和一

九四○年代的政权是引起乌克兰有出走念头的罪魁祸首。但不管俄、乌之间有多大的差异，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的索忍尼辛还是希望它们会待在一起：

乌克兰的情况将会让人异常痛苦。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他们当前的普遍态度有多么执着。既然这个问题歷经几百年都没有获得解决，我们现在就必须表现出审慎态度。我们有责任让他们自行决议–不管在他们中间最后胜出的是联邦主义者还是分离主义者。不肯让步是愚蠢和残忍之举。我们现在表现得愈是温和、克制和睿智，那么我们在未来恢復统一的希望就愈大。先让他们自己试试看自己的办法。然后他们很快就会看出，分离解决不了所有问题。336

索忍尼辛在一九六○年代预想到的可能在一九八○年代晚期随着戈巴契夫推出开放改革政策而突然变成了现实。他能够预测未来，是因为他了解乌克兰政治活动家的态度，他和他们其中一些人曾经是古拉格的狱友。到了一九八○年代晚期，包括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成员的所有政治犯都被释放了。他们可以自由从事政治活动，对政治觉醒的民众提出经济、政治和民族问题方面的建言。虽然第一个宣布主权独立的（主权独立意味着本国法律凌驾苏联的法律）是爱沙尼亚，但在苏联的东斯拉夫核心中，第一个这么做的却不是乌克兰或白罗斯，反而是俄罗斯这个「最苏维埃」的国家。为什么会有这种事？

答案首先是，把俄罗斯人和苏维埃人划上等号的一贯做法出现了裂痕，因为俄罗斯知识菁英拒绝继续为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失败政策「背黑锅」，拒绝为它过去、现在和未来负责。苏联的经济凋敝和党的失去正当性让非俄罗斯民族起而反抗莫斯科，连带反抗俄罗斯人，因为俄罗斯人即使不是苏联帝国的拥有者，至少也是管理者。但俄罗斯人拒绝为苏联体制的弊端而被要求负责。「乡村散文」派的俄罗斯作家早就认为，共产主义政权的主要受害者是他们的共和国，而不是其他共和国的非俄罗斯人。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他们现在公开反对苏联政权，不甘后人地和他们的指控者争夺「最大苦主」头衔。

「乡村散文」作家别列夫在一九八九年竞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席位时这样说：「三○年代思虑不周的农业集体化不仅害苦了农民，还害苦了整个俄罗斯人民。根据我得到的资讯，俄罗斯人不到这个国家〔人口〕的半数。」337在一九八九年，总数二亿八千六百万的苏联公民中，俄罗斯裔的人口是一亿四千五百万。俄罗斯人在苏联人口的占比确实往下掉，而这是因为一个快速现代化的民族，其生育率不可能竞争得过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共和国。例如，在一九七○和一九八九年之间，塔吉克的人口几乎增加一倍，达到四百二十万。俄罗斯的低生育率被认

为不是现代的特徵和城市化的结果，而是一个可怕的警告，乃至乎是一齣悲剧。

当莫斯科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正在想办法回应摇摇欲坠的帝国所带来的挑战时，帝国外省的俄罗斯人和他们操俄罗斯语的盟友338也开始动员民众。如果说别列夫之辈的莫斯科知识分子是代表一个形成中的主权民族，那他们在非俄罗斯人共和国行动的同侪则是为了捍卫苏维埃帝国。后者的支持力量不是来自俄罗斯的政治领袖，而是苏联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试图在边区动员俄罗斯民族主义，好让苏联可以存活。

一九八九年期间，在宣布自己的共和国是主权独立国家之后，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人民集体走上街头，抗议莫斯科计画修改苏联宪法。这些修改将会让苏联的法律凌驾于共和国的法律之上，有权片面决定一个共和国可否脱离苏联。为了引起触目，波罗的海民族运动（「民族阵线」）在一九八九年八月进行了一场名为「波罗的海之路」活动，以人鍊339把三国的首都—塔林、里加和维尔纽斯连结在一起。活动当天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五十週年：苏联正是以这个条约为口实在二战期间占领波罗的海三国。

在已经失去一切的波罗的海三国党部的支持下，莫斯科进行反击，动员俄罗斯裔和操俄罗斯语者支持苏联。这些地区内的操俄罗斯语人口因为本土语言和文化的復兴而倍感威胁，普遍支持拉脱维亚的「国际阵线」和爱沙尼亚的「国际运动」，两者都是莫斯科支持的政治组织，致力于透过有名无实的民族主义反制主体民族创造的人民阵线。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比立陶宛更禁受不起来自中央的压力。人口两百六十万的拉脱维亚处境最是危险：拉脱维亚人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二，其次是俄罗斯人占百分之三十六，然后是乌克兰人占百分之四点五和白罗斯人占百分之三点五。在爱沙尼亚，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一同构成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波罗的海三国的俄罗斯裔和东斯拉夫裔居民大都是二战之后才迁入，在莫斯科建立和营运的工业企业工作。每当民族阵线朝主权独立甚至政治独立的目标往前推出多远，国际阵线就会往回推多远。

在俄罗斯，第一波政治动员始自一九八九年春天苏联超级议会的半自由选举，一路延续至一九九○年的俄罗斯议会选举。就像上一个十年的异议运动那样，这一次的异议运动也是分裂为两派：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后者在经济和社会议程上持保守心态，强调共产主义政权对俄罗斯人有很多不是，但与此同时又对共产主义表示忠诚和支持波罗的海国际阵线之类的运动。

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俄罗斯的匯流表现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创立，戈巴契夫一直反对和阻扰这事情，唯恐一个独立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会导致苏联共产党的瓦解，最终导致苏联本身的瓦解。从列宁开始，维持一个苏联共产党的门面就是一贯政策，列宁固然希望有一个共和国的联盟，但也相当乐见俄罗斯人主宰全联盟。但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人现在却要求一个自己的党，以便可以跟乌克兰、白罗斯和其他共和国的共产党平起平坐。他们终于在一九九○年夏天如愿340。自此，俄罗斯保守分子走上了一条和全联盟发生冲突的道路。

另一方向的俄罗斯人动员不是为了反对非俄罗斯人，而是要与他们结盟。在追求民主的愿景上，俄罗斯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波罗的海、乌克兰及一些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族阵线和民族运动有志一同。一九八九年夏天，他们把力量结合起来，在以半民主方式选出的苏联超级议会即人民代表大会内组成「跨区域议员团」。该党团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俄罗斯及苏联其他大型工业城市都找到支持者。它那些有民主意识的议员全都反对共产党的垄断地位，只不过，他们能够主导议程的力量有限，因为跨区域议员团中的非俄罗斯共和国议员总是把民族议题放在第一优先。戈巴契夫则得到来自非俄罗斯人共和国特别是中亚的保守派议员支持。

「民主俄罗斯」是由「跨区域议员团」中的自由派议员组成，在一九九○年三月的俄罗斯议会选举中赢得了一百九十个席位，即赢得约五分之一的席位。这使得俄罗斯自由派能够把主要活动的舞台从苏联议会转移至俄罗斯议会。一九八九年五月，他们成功地让自己的领袖叶尔钦当选无比重要的议会主席职位。五十八岁的叶尔钦原是党的大老，后来因为不满戈巴契夫的改革步伐太慢而另起炉灶。为人特立独行又霸道，叶尔钦热烈支持民主改革的计画。于是，俄罗斯改革派决定运用他们在议会的力量，加快民主和市场改革。一九九○年六月，在三分之二议员的贊成下，俄罗斯联邦宣布主权独立，但名称上仍维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这个构想对自由派和保守派同具吸引力。叶尔钦告诉议会代表：「对于今日的俄罗斯，中央同时是个残忍剥削者和吝于施恩者，不太关心俄罗斯的未来。我们必须终止这种不公道的关系。」341他的这番话是在为兴起中的自由派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发声。这运动的忠诚对象不是由族裔界定奠基在俄罗斯民族的「小」（small）民族或帝国时代的「大」（big）俄罗斯民族，而是一个将会由俄罗斯联邦居民构成的民族。虽然俄罗斯联邦以俄罗斯人占压倒性多数（百分之八十二），但也包含了许多自治共和国和因为各种理由未能成为加盟共和国的地区民族

成员。除东普鲁士（它现在是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地区），俄罗斯联邦的领土从波罗的海边上的列宁格勒（即将更名为圣彼得堡）一直延伸至太平洋边上的海参崴，中间毫无间断。这是形成一个民族的良好条件。只不过，在一九九○年时，这个条件仍面临着许多挑战。

一九九一年六月，叶尔钦竞选新创立的俄罗斯联邦总统职位并获胜，打败了由一度是他恩人后来又成了仇人的戈巴契夫所支持的其他候选人。与一九九○年春天靠着苏联议会选为苏联总统的戈巴契夫不同，叶尔钦是靠着俄罗斯选民获选俄罗斯总统。所以，一上任他就向俄罗斯联邦的公民宣誓效忠，承诺保卫共和国及其人民的利益。

叶尔钦和他的自由派支持者把俄罗斯联邦视为改革整个苏联政治和经济的发动机。但投票给他的民族主义者当初却希望藉俄罗斯联邦来加强俄罗斯人的身分认同、为俄罗斯文化提供支持，并削减对加盟共和国的经济资助，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俄罗斯经济不振的原因。但没有人主张瓦解苏联。一九九一年夏天，透过与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结盟，叶尔钦迫使四面楚歌的戈巴契夫同意对苏联进行改革。一九九一年七月，戈巴契夫、叶尔钦和哈萨克领导人纳札尔巴耶夫议定新的缔盟条约。该条约把大量经济和政治权力交给各共和国的领导人，特别是俄罗斯的领导人。

这协议原定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生效。但就在生效前一天，戈巴契夫的一些助手包括KGB、警察和军队的负责人，因为知道他们将会在重新改组后失势，悍然发动了一场政变，以维护苏联的原有体制。戈巴契夫因为拒绝附从，被政变策画人软禁在克里米亚的度假别墅。政变发生时，叶尔钦和几个顾问刚访问哈萨克回国，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享受悠闲时光，所以完全措手不及。他们决定反击，动员莫斯科市民支持。他太太奈娜劝丈夫不要冒险犯难：「外面有坦克，你出去有什么意义？他们不会让你通过的。」342叶尔钦不予理会，他日后回忆说：「我必须出面。所以我用我想得出来的最好方法安慰她：『我们车上插着一面小小的俄罗斯国旗。看到国旗，他们一定会让我们通行。』」叶尔钦毫髮无伤去到位于市中心的俄罗斯议会大厦「白宫」343，但KGB的特种部队没对他怎样不是因为那面国旗，而是因为没接到要逮捕叶尔钦的命令。但他的支持者仍然认为国旗的作用举足轻重。

到达莫斯科几小时后，叶尔钦在「白宫」前面一辆坦克上面发表讲话。这时，他的助手把一面俄罗斯旗帜高举在他身后。阴谋策画者用的是苏联的红旗，反对政变的人则是以一九一七年俄罗斯共和国的白、蓝、红三色国旗与之互别苗头，以象徵俄罗斯要对抗共产帝国。政变在几天后失败，旧三色旗成了俄罗斯民主制度和俄罗斯联邦的官方旗帜。

叶尔钦的胜利把俄罗斯推向了一条新的轨道，而事态日后的发展显示，那是一条和其他共和国非常不同的轨道。

一九九一年八月的未遂政变企图推翻叶尔钦及其支持者取得的所有成就，但他们成功反击，高举俄罗斯旗帜反对苏联旗帜。叶尔钦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一切，但这胜利一开始一度几乎让「新俄罗斯民族」方案胎死腹中。随着戈巴契夫被助手出卖和惊魂未定，叶尔钦认为自己掌握了莫斯科的实权。他开始接管苏联中央：把自己的人任命为苏联政府总理，又迫使戈巴契夫撤回军队、警察和安全部门新负责人的人事命令，用自己的人马取而代之。至此，叶尔钦不再需要俄罗斯联邦及其机关作为促进自由化改革的载具—从一开始，这种改革就会被设定为全苏联的规模。

后来为俄罗斯经济改革掌舵的盖达尔在当时力劝叶尔钦挽救苏联。他后来写道：「当时，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可能挽救苏联。那就是戈巴契夫马上辞职，把权力转移给苏联最大一个共和国的总统。这样，叶尔钦就可以合法地把联盟置于他的掌管之下，并动用全体俄罗斯人民领袖的无上权力，把两个权力中心统合在一起，这两个权力中心的斗争是带来崩溃的根本原因之一。」344

但为时已晚。其他共和国，尤其是乌克兰，已经决定自行其是，因为对他们来说，由俄罗斯来接管苏联中央甚至比当初的政变更让他们心惊。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苏联第二大共和国乌克兰宣布脱离苏联独立，在当时的环境，这等同宣布脱离俄罗斯独立。到了一週结束，几乎每个还未宣布独立的共和国都追随乌克兰的榜样。叶尔钦慌了，对乌克兰和哈萨克发出威胁，说它们若是坚持独立，就必须把一些领土归还俄罗斯。他还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到乌克兰，动之以情，说之以理。代表团没能达成任务。当代表团成员也是叶尔钦盟友的索布恰克试图大谈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统一性时，他被基辅街头的示威者嘘下台。乌克兰人不想留在俄罗斯。他们不想要什么联盟，只想走人。

随着让俄罗斯接管联盟的计画失败，盖达尔不想再拯救苏联。他的任务变成是要透过快速经济改革，让俄罗斯从全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崩溃中拯救出来。于是，俄罗斯联邦再次成为俄罗斯自由派改革者的焦点。不等其他共和国跟上，叶尔钦和盖达尔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开始实施激进经济改革，而此举有效地打破原先整合在一起的苏联经济空间。俄罗斯虽然在经济上走自己的路，但还是希望和其他共和国维持某种形式的经济联盟。叶尔钦和他的顾问们不理会住在波罗的海三国的俄罗斯裔和操俄罗斯语者的愿望而承认这三国独立。至于前苏联的其他部分，他们希望把它们建构成一个联邦：在他们的如意算盘中，俄罗斯将会在新联

邦中扮演关键角色又不用为其他共和国买单。事实证明，这是痴心妄想。戈巴契夫不可能满足于在一个实际由叶尔钦掌控的联盟当虚位元首，而以乌克兰为首的其他共和国又早已选择了独立。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乌克兰人以选票支持他们的共和国独立。叶尔钦只好向不可改变的事实低头。一个星期后，在白罗斯／波兰边境的别洛韦日，叶尔钦会见了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罗斯议会议长舒什克维奇。三人达成协议，解散戈巴契夫领导的苏联，以一个叶尔钦相信将会由其领导的「独立国协」345取而代之。就这样，苏联不见了，被一度构成一个「大」俄罗斯民族的三个共和国的领袖所瓦解。

几个月前没有人可能料到这种结果。虽然没有宣布独立—甚至没有想过要独立，俄罗斯却在事实上独立了。当联盟的「音乐」停止播放，叶尔钦和俄罗斯自由主义者惊讶地发现俄罗斯联邦只剩下一具空壳子，其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内容都犹待填上。再来还有新成立的独立国协带来的问题，很多俄罗斯人都把它视为苏联的延续。夹在俄罗斯联邦和独立国协中间，俄罗斯的政治和知识菁英必须想办法摸索出俄罗斯人的政治身分认同。

在一九九○年代，叶尔钦多次要求他的顾问想出一个俄罗斯民族的新定义。这任务相当不容易。在一九九一年六月的第一次俄罗斯联邦总统就职典礼上，叶尔钦承诺捍卫人民的权利。这也是戈巴契夫在上一年的就职演说中使用的公式，叶尔钦只是把该演说提到的「苏联」一词换成「俄罗斯联邦」。他的简短演说中没提俄罗斯人民或民族。在一九九六年的第二次总统就职典礼，叶尔钦固然承诺他会忠实为「人民」服务，却没有具体说明「人民」是指什么人。不单是叶尔钦，其他俄罗斯官员也一样不愿意从民族的角度定义俄罗斯的国民。在官方声明中，俄罗斯联邦的居民极少被称为俄罗斯民族。

很少有人比季什科夫对「民族」这个词被废弃更加感到失望。他是苏联科学院（后称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一九九○年代初期曾率先提倡「俄罗斯公民民族」，主张无分族裔和文化背景，俄罗斯联邦所有公民构成同一个民族。他把该民族称为 rossiiskaia（俄罗斯国民），不称之为 russkaia（俄罗斯民族）。前者是帝俄时期的形容词，后者是一个充满族裔色彩的字眼，较为狭隘地指大俄罗斯人（Great Russian）或三支东斯拉夫人构成的俄罗斯民族。

季什科夫是在一九八九年开始发展他的这个想法，当时正值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自由派以跨区域议员团的形式组成反对党。他

把 rossiiskaia 视为一个跨族裔和跨文化的民族，共通处在于服膺同一套价值观和制度。这个民族的象徵符号应该是出自自由派的革命而不是帝国的歷史往昔。季什科夫反对「多民族俄罗斯人」的说法，认为它不仅自相矛盾，还带有政治上的危险性，因为它否认「俄罗斯公民民族」的政治正当性，让不同的族群有权以身为独立民族为由建国，这种事在苏联解体时就发生过。他的一些观点，如反对以民族为基础的联邦制和偏好领土自治，都可以回溯至立宪民主党人在一九一七年的思想。

俄罗斯独立后的头两年，当局积极推广公民模式的俄罗斯人身分认同。季什科夫被任命为民族部长，而他的观念也成了一九九一年十一月通过的公民权法令的基础。这些法令把俄罗斯公民称作 rossiiane 而不是 russkie，规定公民资格不以申请者的族裔或语言为考量。但季什科夫提出的身分认同新模式很快就碰到严重困难。一九九三年秋天，叶尔钦动用武力镇压反对他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势力：在他的一声令下，坦克砲轰反对派的大本营「白宫」，两年前叶尔钦和他的支持者就是在「白宫」对抗政变，而季什科夫也建议把它列为新俄罗斯的象徵之一。击败对手后，叶尔钦修改宪法，把权力从议会搬到总统府。此举不仅让新俄罗斯的象徵受到损害，还让民主的理念蒙受重大打击，此后不曾完全復甦。

再来还有发生在莫斯科之外的问题。俄罗斯联邦中那些以族裔为基础的自治单位并不乐于被纳入一个由 rossiiskaia 组成的公民民族。车臣人想要完全独立，而其他自治共和国如鞑靼共和国则要求更多权利。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叶尔钦下令俄军进入车臣，结束其实质独立。车臣人发动反击，迫使俄军在一九九六年八月求和。俄罗斯将会在二○○一年才回头解决车臣地位的问题346。另一方面，固然有些俄罗斯联邦境内的飞地不愿成为联邦的一部分，可也有些位于其境外的飞地想要加入。这包括在摩尔多瓦片面宣布独立的「聂斯特河沿岸共和国」，以及在乔治亚片面宣布独立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

俄罗斯人碰到的是其他帝国主义民族熟悉的问题：帝国的内爆让一批公民失去了公民权，他们要么认为自己是前支配民族的成员，要么认为自己曾充分配合前支配民族，以致生活在独立后的前殖民地有一种不安全感。俄罗斯的公民权法令容许这些人移民俄罗斯或是拥有双重国籍，而此举固然强化了俄罗斯人身分中的文化和法律成分，却也弱化了其中的地域成分。据一些人估计，有近三千万认同俄罗斯的俄罗斯裔和操俄罗斯语者是住在俄罗斯联邦境外。他们有许多人，特别是住在波罗的海三国和克里米亚的那些人，都渴望取得俄罗斯公民权，但这种渴望又与所在国的公民权法令冲突，这些法令不欢迎甚至会禁止拥有双重国

籍。法律冲突把后苏联空间变成了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

334　Osyp Zinkevych, Ukrains’kyi pravozakhysnyi rukh (Toronto, 1978), 22.

335　Aleksandr Solzhenitsyn, Arkhipelag Gulag (Moscow, 2000), books 5-7, 47.

336　同上，49.

337　Roman Szporluk, Russia,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 2001), 194

338　指在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

339　指由波罗的海三国人民手牵手构成的一条「长鍊」。

340　实际上「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四日，第一任党主席是久加诺夫（Gennadii Zyuganov），至今仍是他担任主席，是俄罗斯最大在野党。

341　Serhii Plokhy,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2014), 37.

342　同上，95.

343　俄罗斯联邦国会大厦，因为外表为白色，故被称为白宫。

344　Iegor Gaidar, Dni porazhenii—i pobed (Moscow, 1996), 81.

345　概念类似大英国协。

346　普丁在一九九八年出兵车臣，粉碎其独立地位。

第十九章　俄罗斯世界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疾病缠身的叶尔钦利用新年讲话的机会，宣布了一个让人意外的消息。他要辞去俄罗斯联邦总统之职。他的讲话和随后的广播明明白白道出，他属意的接班人是四十八岁的总理普丁。后者紧接在叶尔钦之后发表了讲话。

直到他第一次向全国发表谈话当时，普丁还是个讳莫如深的人，没多少人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是几个月前的一九九九年夏天才进入政治高层，被叶尔钦任命为总理，跌破许多人眼镜。总理的任务只是管理经济和日常行政事务，和国家大政无多少关系。普丁早期是个情报官，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之间主管「联邦安全委员会」，是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祕密警察，而他会被叶尔钦相中，是因为叶尔钦的亲近圈子认为他有能力反制那些准备好在下一次选举把叶尔钦赶下台的政敌。大位的一个角逐者是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他大打俄罗斯民族主义牌，多次高调访问塞瓦斯托波尔，那是俄罗斯舰队在乌克兰的基地，把自己打扮成国外俄罗斯人的捍卫者。他还资助一批社会和文化方案，为莫斯科大学开了一间分校。

另一个竞逐者是普里马科夫。此君是俄罗斯一九九八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叶尔钦的总理，一向主张重新整合后苏联空间，让其处于俄罗斯控制之下。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担任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负责人和外交部长任内，普里马科夫改变俄罗斯原有的亲西方政策，认定增加俄罗斯在「近邻」的地位是恢復俄罗斯强权地位的先决条件。「近邻」是莫斯科用来指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用语。普丁的总统之路受到一群与叶尔钦过从甚密的财阀支持，其中一位是亿万富翁别列佐夫斯基。就像普丁的其他支持者一样，别列佐夫斯基认为普里马科夫的整合计画成本太高，有违俄罗斯的经济利益。

叶尔钦曾协助创建俄罗斯国家，但这个国家尚未完工，有待他的后继者去定义它的性格和确定它的边界。在二○○○年除夕那次令人惊讶的讲话中，叶尔钦称嗯听众为「俄罗斯国民」（rossiiane）347。他属意的接班人普丁则除了把听众称嗯为「俄罗斯国民」，还称作同胞。到底他心目中的「同胞」只是指俄罗斯联邦的公民，抑或还包括国外的俄罗斯人和操俄罗斯语者，不是那么清楚。

还是一九九三年秋天的时候，保护波罗的海地区和独立国协其他共和国内的俄罗斯人和操俄罗斯语者是俄罗斯政坛的热门话题，也是让反叶尔钦的民族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集结起来的口号。作为反击，叶尔钦

下令军队进攻被反对派领袖占领的议会大厦，把这些人统统关起来。然后，他利用一九九四年新年讲话的机会，表示政府并未遗弃在「近邻」的俄罗斯人。他称他们为「同胞」，即分享同一个祖国的人。但要怎样照顾他们却不清楚。叶尔钦政府最初想要让这些「同胞」享有双重国籍，但受到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抵制，因为它们不承认双重国籍。

然后叶尔钦的顾问团想出了独立国协公民权的构想—类似的想法在一九九一年便提出来过，但被乌克兰否决。这一次，除白罗斯表示有意愿配合以外，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还是不买单。一九九七年，叶尔钦和白罗斯的新领导人卢卡申科签署一份两国缔结联盟的宪章，是以普遍的俄罗斯 - 白罗斯公民权为发想。在当时，白罗斯已经恢復一种苏维埃风格的国旗，也已经重新把俄罗斯语定为官方语言之一。即便没有完全终止原有的民族化计画，但比例缩小。白罗斯和俄罗斯的联盟提出了一个更加挑战俄罗斯国籍的公民典范。

俄白联盟始终没有落实，不曾出现过共通的政府机关和共通的公民权。为缔结联盟所进行的谈判主要为满足为数不少俄罗斯人对苏联的缅怀心理。他们很多人还未能从失去一个更大国家和身分认同的震撼中恢復过来。俄罗斯领导层不愿按照「东斯拉夫人统一体」的观念创建一个单一的「俄罗斯人」国家。因为就像一九九一年戈巴契夫的苏联那样，少了乌克兰，这个国家将不会完整。而乌克兰的动向恰恰和明斯克的新政府相反。当叶尔钦和卢卡申科在一九九七年签署联盟宪章时，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在谈判正式离婚的条件。双方最后议定，乌克兰把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租借给俄罗斯，以换取俄罗斯承认乌克兰的版图和答应不再支持克里米亚的亲俄分离主义分子。这让东斯拉夫人联盟的破局成为定局。

至此，俄罗斯领导层只能在俄罗斯联邦的政治基础上建构一个新的俄罗斯民族。这是一个即便不是不可能也仍旧困难重重的任务。一九九七年一项民调显示，百分之八十五的俄罗斯联邦公民仍然钟情于族裔意义的俄罗斯民族观念，百分之七十一青睐公民意义的民族观念，百分之五十四的人强烈眷恋苏维埃人的观念。一九九六年，叶尔钦吁请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帮忙找出一个新的俄罗斯民族定义。大多数的回应都是建议以国家为基础打造新俄罗斯人的身分认同。348但也有人抱持其他想法。重新抬头的俄罗斯共产党，它的受欢迎程度对政府是主要的威胁，它设法维持俄罗斯人的全联盟身分认同，又强调东斯拉夫人的统一性和东正教元素。激进民族主义者鼓吹一种排除非俄罗斯裔公民的纯净俄罗斯民族。较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推动一种以文化为基础的东斯拉夫人身分

认同，把俄罗斯联邦境外俄罗斯裔和操俄罗斯语者纳入。

一九九六年，歷史人口统计学家卡布珊出版了他对俄国境外俄罗斯裔和操俄罗斯语者分布状态的研究结果。他把俄罗斯人视为一个族裔和文化实体，所以在他的俄罗斯人分布图里的俄罗斯人地区还包括东乌克兰、南乌克兰、北哈萨克、部分爱沙尼亚和部分拉脱维亚。卡布珊希望这些地区要么回到俄罗斯，要么在各自的所在国形成自治的单位，拥有语言和文化的特权。他还建议把非俄罗斯人为主的地区分离出去。他的主张不仅有利于车臣的分离主义者，还有利于那些主张建立一个俄罗斯民族国家的人。这种以文化为基础的俄罗斯民族观让很多政府的反对者浮想连翩，不过他们没几个人准备要放弃俄罗斯联邦的任何一片领土。他们希望扩张—即使不是扩张领土也是扩张治外法权，好让那些被他们认为是自己民族成员的人得到保护。

普丁在二○○○年三月赢得总统选举，该年五月就任。他会得胜，一大原因是原定六月举行的选举因为叶尔钦的突然辞职而提前，让他的对手猝不及防。二○○○年十二月，一件事情透露出普丁虽是叶尔钦属意的接班人，却未必是其理念的继承人：普丁批准让原苏联国歌的音乐和部分歌词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国歌。叶尔钦任内曾通过採取十九世纪作曲家格林卡的一首爱国歌曲作为国歌的曲子，但在歌词上一直无法确定：俄罗斯的政治和文化菁英始终无法就歌词内容达成共识，而这反映的显然是俄罗斯对自己的身分定位还在摸索之中。有违叶尔钦公开表达过的意愿，普丁透过回归苏联国歌解决了这个难题。

八十六岁的诗人米哈尔科夫被请来修改歌词，他曾在一九四三年参与写作国歌歌词。这是他第三次做这种事—前两次分别是在一九五六年受赫鲁雪夫委託和在一九七七年受布里兹涅夫委託。经修改后，原歌词中提到列宁、史达林、党和共产主义的部分皆被「上帝」一词取代。歌词一开头提及俄罗斯所编造的「牢不可破的联盟」一语，被改成「俄罗斯，我们神圣的国家」。所有版本的国歌歌词米哈尔科夫都保留赞颂祖国的部分，未作修改。一九四三年原始版本歌词：「光荣属于你，我们的自由祖国。」二○○○年被重新填写回去。紧接着提及的「各族人民友谊的坚固堡垒」被改为「兄弟民族的古老联盟」。换言之，联盟和构成联盟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再度受到青睐。至于这里的联盟，是指前苏联的各族人民抑或俄罗斯联邦里的各族人民，则随人猜想。

在后苏联空间的政策上，普丁继承了普里马科夫的愿景：俄罗斯应该是一个强权，而这一点有赖于把后苏联空间整合起来。普丁相信俄罗斯有权主宰后苏联空间，把它纳入势力范围，但又希望这是透过政治和经济手段达成，无须诉诸族裔、语言和文化等观念。一九九九年，议会

讨论了许多侨民法的版本，最终采纳了其中一个，但它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普丁对乌克兰和白罗斯的政策铺陈在一份题为《俄罗斯战略：二○○○年总统议程》的文件中，负责起草的是「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会议」。

它的几位撰文者包括叶尔钦时代的西化主义者和普里马科夫类型的现实主义者，声称与「近邻」的关系应该顾及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对后苏联空间的政治和经济整合应该从下而上，即让俄罗斯企业利用前加盟共和国因购买俄罗斯天然气而债台高筑的窘境，收购它们的天然气管线和企业的部分所有权，达到控制这些国家的目的。这种策略可以在各种层次实施：国与国之间、次区域之间，这可以挑少数几个国家进行或挑大部分国家进行。关键是要赢得新政府和在地菁英的信任。不管是把俄罗斯人说成是一个被分裂的民族，还是动员国外俄罗斯裔或操俄罗斯语者去达成整合目标，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这种新取向在二十一世纪头几年被称为「俄罗斯自由帝国」方案349。它的意识形态浓缩在二○○三年一篇由丘拜斯执笔的文章。丘拜斯是叶尔钦的私有化改革的设计师之一，后来担任俄罗斯的寡头电力公司负责人。他在文章中力主，俄罗斯在新世纪的使命包括建设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以为资本主义经济奠定基础。但事情还有下文。他接着说：「我深信，在可预见的整个歷史未来，俄罗斯的意识形态都应该是自由帝国主义，而俄罗斯的使命是建构一个自由帝国。」350事实上，截至二○○三年，他一直忙于自下而上打造一个这样的帝国。几个月前，他的公司已经控制了亚美尼亚一家核子发电厂的股权，目前眼光放在乌克兰的资产，准备提供融资协助在那里建两座核子反应炉。

丘拜斯是一票财阀的代言人。这票财阀是利用苏联解体引起的经济和政治混乱冒起，方法是比竞争对手更创新和更加不择手段。他们在一九九○年代中期弊端重重的私有化阶段控制了俄罗斯经济油水最多的部分，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作为回报，他们运用自己的经济资源和媒体资源在一九九六年帮助叶尔钦连任成功。一票财阀在普丁二○○○年竞选总统期间也是出钱出力，所以要求普丁听话，但普丁抵死不从。在其第一任总统任内，他有好一大部分精力是花在独揽大权和摆脱财阀的掣肘。在他的严打下，财阀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逃到西方避难，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其他财阀不再敢挑战普丁的统治。

二○○四年三月，普丁竞选连任成功，囊括百分之七十一的选票。各个方面看来他都是春风得意。拜有限度经济改革和高油价之赐，俄罗斯经济表现亮眼，每年以百分之七的速度成长。后苏联空间的整合也已经上路。这个整合由二○○○年创立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打响第一砲，参

加的有白罗斯、哈萨克和好几个中亚国家。乌克兰拒绝加入，但在二○○三年与俄罗斯、白罗斯和哈萨克签订协议，成立一个「单一经济空间」。该协议在二○○四年获得乌克兰议会批准。

「自由帝国」方案想要成功，关键是地区内要能保持政治稳定，参与国的政策能保持一贯。基于这种考虑，独裁政权会更受青睐，因为它们在愈来愈依赖俄罗斯的情况下，政策应该会保持不变。反观民主国家却麻烦得多，因为选举结果总是难以预料。有鑑于波罗的海三国已加入北约和欧盟、白罗斯已有了卢卡申科这个独裁者，而哈萨克和其他中亚共和国，乌克兰和乔治亚民主政治的不可预测性便构成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主要挑战。乌克兰的地位特别重要，因为它是任何后苏联空间整合方案所不可或缺。就像一九九一年的乌克兰那样，二○○四年的乌克兰仍是继俄罗斯之后的最大后苏联国家。

二○○四年秋天，乌克兰总统选举登场。选举结果除了攸关后苏联空间整合的未来，还攸关俄罗斯是否控制得了把俄罗斯和土库曼天然气田连接于东欧和中欧市场的最大管线网络。即将卸任的乌克兰总统库奇马据说答应过把该国天然气管线的大比例股份卖给俄罗斯，以偿还乌克兰欠下俄罗斯寡头天然气公司 Gazprom 的庞大债务。他属意的接班人总理亚努科维奇将会延续这种政策。二○○四年秋天，普丁前往基辅，希望可以拉抬亚努科维奇的声势，帮助他打败支持改革和亲西方的对手尤申科。选举前数週，尤申科遭人下毒，毒药是一种乌克兰没能力生产但俄罗斯有能力生产的戴奥辛物质。他活了下来，但健康情况不容他继续从事竞选活动。

因为受够了库奇马的腐败政权，乌克兰选民完全无意把他和普丁的亲信送上总统宝座。出口民调显示，尤申科赢得了选举。却不是由政府控制的选委会公布的结果：其负责人告诉震惊的乌克兰人民，胜选的是亚努科维奇。「橘色革命」随即爆发–橘色是尤申科竞选活动的代表色，打先锋的是学生组成的年轻人抗议团体：「是时候了！」。

成千上万的人民走上基辅街头，直到政府同意重启选举才愿意散去。新的选举受到大部分来自西方的国际观察员严格监督。一如预期，尤申科获胜。普丁向他道贺，但鲜少有人看不出来，他把橘色革命的发生视为自己的一大挫败。他把发生在乌克兰的事归咎于西方国家和它们在后苏联空间进行的民主化运动。他觉得受到威胁，而这不仅因为一个亲西方的候选人在最大一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当上总统，还因为乌克兰民主运动给在俄罗斯反对普丁独裁的人做了坏榜样。流亡国外的财阀别列佐夫斯基毫不遮掩自己支持「橘色革命」的立场。

所以，有必要同时让国内和国外的俄罗斯菁英重新集结。在国内，普丁模仿「橘色革命」领导人的策略，建立了很多年轻人组织来支持政府。最臭名昭着的一个是由前官员亚坎曼科成立于二○○五年的组织「我们的」。此后，「我们的」用尽各种方法骚扰那些被他们认为是与政府为敌的人。在国外，普丁用尽各种能运用的力量，阻止西方蚕食他的后苏联空间地盘。特别让克里姆林宫担心的是乔治亚，因为二○○三年「玫瑰革命」把亲西方的萨卡什维利送上了总统宝座。乌克兰对莫斯科当然也没有好脸色，因为尤申科太清楚它对他的国家是打什么主意。所以他採取亲西方政策，想方设法让乌克兰可以加入欧盟和北约。

普丁继续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但宣称不反对它加入欧盟。尽管如此，他还是以天然气供应作为武器─很多欧盟成员国都仰赖俄罗斯的天然气，让乌克兰处于其经济控制之下和阻碍乌克兰与西方发展关系。此前，俄罗斯才迫使土库曼（后苏联空间中的第二大天然气产国），答应只能透过俄罗斯出售天然气，又用其他欠下俄罗斯大笔天然气债款的前加盟共和国对乌克兰施压。

二○○五年三月，尤申科宣誓就职后不久，俄罗斯提高对乌克兰出售天然气的价格。二○○六年一月一日，它声称乌克兰偷取俄罗斯透过乌克兰输往欧洲的天然气，切断对乌克兰的所有天然气供应。供应在四天后恢復，但新的危机在二○○九年一月爆发，天然气供应再次被切断。这一次乌克兰被断气二十天，欧洲客户被断气十三天，让处于深冬的东南欧叫苦不迭。把乌克兰说成同时是俄罗斯和欧盟的不可靠伙伴，俄罗斯最终让乌克兰负担的天然气价格还要高于德国。

欧盟成员国资格不是乌克兰的囊中物。因为欧盟除了不愿被切断天然气供应，还得应付二○○四年大规模增加成员国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不过，因为有美国的背书，加入北约却是乌克兰一个可能实现的梦想。二○○八年四月，普丁前往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高峰会，进行一场反对北约接纳乌克兰和乔治亚的宣传战。他得到德国和法国的支持，高峰会宣布把是否接受乌克兰和乔治亚为成员一事推迟至二○○八年十二月再做决定。普丁决定不再等待。从北约高峰会回国后，他宣布跟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建立官方关系，这两个地区是在一九九一年宣布脱离乔治亚，自此一直受到俄罗斯的支持。

二○○八年八月，俄军入侵乔治亚，首先占领了南奥塞梯的分离主义飞地，然后朝乔治亚首都进发。拜西方外交干预之赐，战斗停止，俄罗斯军队从乔治亚撤出。但两个持分离主义的地区继续受到俄罗斯控制，而且被俄罗斯正式承认为独立国家。这是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第一次出兵修理一个不听话的邻国。自由帝国已去，军事帝国将兴。

二○○八年十二月，北约拒绝为乔治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计画排程。美国总统欧巴马在二○○九年一月就职重启美俄关系。所以，普丁虽然在票匭（ballots）的角逐上输给了乌克兰和乔治亚的亲民主派势力，却赢得了子弹（bullets）的战争，阻止了两个不听话的前加盟共和国琵琶别抱。他从「橘色革命」学到的教训之一是，光是搞定前加盟共和国的政府是不够的，还必须搞定街头上的人。就此而言，普丁对手老是主张「俄罗斯人是一个被分裂的民族」，这观念显得非常方便好用，而这个被分裂民族的国外部分很快就会成为普丁新外交政策的棋子。

普丁有一次这样问出生乌克兰的《共青团真理报》记者卡夫坦：「你读过邓尼金的日记吗？」这里的「日记」是指内战期间白军将领邓尼金的回忆录。「没有。」卡夫坦回答说，但答应回家之后会去读。「记得要读。」普丁叮嘱他，然后补充说：「邓尼金讨论了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小俄罗斯就是乌克兰。他指出，没有人被容许在我们的关系之间搅和，那总是俄罗斯的家务事。」351卡夫坦在读过邓尼金回忆录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多处引用回忆录的话。以下这段应该就是普丁指的那段：「没有哪个俄罗斯–不管是反动还是民主的俄罗斯，不管是共和还是独裁的俄罗斯–会容许乌克兰被扯去。『莫斯科罗斯』和『基辅罗斯』之间的争吵总是被外人愚蠢和毫无根据地夸大。那些争吵是内部争吵，不关别人的事，只能由我们自己决定。」352

普丁和卡夫坦的谈话发生在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地点是莫斯科的顿斯科伊修道院。时任总理的普丁去那里是要给一些人的坟墓献花。得到献花的除了前一年死去的索忍尼辛，还有一些人是一九一七年之后流亡和死在国外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邓尼金将军是其中之一。陪同普丁献花的东正教修道院院长吉洪，告诉在场的记者，邓尼金夫妇的坟墓是普丁自掏腰包修建。另外有两位流亡国外知识分子的坟墓也是普丁出钱修建，他们一个是哲学家伊雷林，一个是作家什梅廖夫。俄罗斯已经把它失散已久的孩子接回家，并与他们的思想重新发生连结。

伊雷林的作品特别让普丁印象深刻。他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白军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冷战开始后写过一篇题为〈被肢解的俄罗斯向世人提出的保证〉的文章，指控西方阴谋肢解苏联。他在文中警告西方各个政府说：「俄罗斯不会因为被肢解而灭亡，反而会把它在歷史上走过的道路重走一遍：她会像个巨大的『有机体』那样，再次把她的『各部分』一一收回，会收回她的所有河流、海洋、山脉、煤矿、谷场、油田和铀矿。」353普丁是在二○○六年对俄罗斯议会宣布他的军队改革计画时第一次引用伊雷林的话。

普丁会对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家和将军感兴趣，是因为他经过重新

省思，认定俄罗斯的歷史和文化是确保和增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影响力的重要元素。　　二○○七年六月，他创立了一个特别基金会，称为「俄罗斯世界」。共同创始人是外交部长和教育部长。普丁让莫洛托夫的外孙尼科诺夫担任基金会的执行董事，他是歷史学家，也是和克里姆林宫关系亲密的政治顾问。基金会自称其任务是在海外促进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

根据可考的纪录，普丁第一次谈到「俄罗斯世界」观念是在二○○一的「海外同胞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他说，「俄罗斯世界」是超越俄罗斯国家和族裔的边界。五年后，他的说法更加具体，强调了这个愿景中的语言和文化方面。当时是二○○六年十二月，他的听众是圣彼得堡的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代表。他说：「『俄罗斯世界』能够也应该团结所有珍视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人，不管他们是住在哪里，不管他们是住在俄罗斯的边界之内或之外。」354他又吆吁听众尽可能多提「俄罗斯世界」这个概念。一场长期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战役由此揭开序幕，它将会成为俄罗斯在国外发挥影响力的关键手段。

「俄罗斯世界」一语源自十九世纪中叶，可以在库利什的作品里找到。库利什是圣西里尔与圣美多德兄弟会的成员和亲乌克兰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用「俄罗斯世界」来定义基辅罗斯留下来的人口。因为当时的乌克兰更多的是一项思想工程而不是政治现实，这词语并没有威胁到亲乌克兰运动的基础本身。但情形改变了。俄罗斯人中的亲斯拉夫派将它挪为己用，用它来指俄罗斯帝国境内的族裔和文化共同体。直到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让它变得完全落伍过时。

然后，这个词语在一九九○年代晚期被俄罗斯政治顾问谢德罗维斯基重新发现，他当时负责为处于苏联解体动盪中的俄罗斯政府制定对「近邻」的政策。从二○○七年开始，政府把该年定为「俄罗斯语国际年」，「俄罗斯世界」观念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基本构成部分。据此，俄罗斯的「公民」不仅包括住在后苏联空间的人，还包括在一九九一年之后移民西方国家的人。新概念的推广者用来界定俄罗斯人的认同，除了族裔和公民身分，还包括文化归属，并抬出普希金、托尔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这些文化名人的名字，来动员大众支持俄罗斯政府的政策。

这个观念很快就吸引到俄罗斯联邦前民族事务部长季什科夫的支持，他是苏联解体后负责定义俄罗斯民族的关键人物355。在一篇着作中，他把「俄罗斯世界」界定为一种「跨国家和跨大洲的连结，因心繫特定国家和忠于它的文化而合为一体」356。他如今的立场不无讽刺，因为他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原是鼓吹公民意义的俄罗斯人观念。在苏联

解体后不久，他曾经认定大多数俄罗斯联邦以外的俄罗斯裔和操俄罗斯语人士将不会离开他们的寄居地或同化于在地文化，而是一定会继续保存原有的语言和文化特徵。日后回顾自己这个说法时，他指出：「我当初只是要发声支持一种意见：那些花了几百年时间在乌克兰东部、克里米亚和哈萨克北部定居下来的俄罗斯人，不是为了今日透过所谓的遣返来缩小『俄罗斯世界』而那样做。」357

二○○七年，因为接收到克里姆林宫发出的新讯号，季什科夫策画了一批考察俄罗斯语在后苏联空间中地位的学术研究。翌年，他发表了俄罗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初步研究成果。季什科夫认为语言是「俄罗斯世界」成员国的关键标志。他指出俄罗斯语言正在「近邻」失去它于苏联时代的优越地位，俄罗斯必须採取措施加以保护。季什科夫希望「近邻」国家给予俄罗斯语官方语言地位，让其可以与在地语言平起平坐（俄罗斯语在白罗斯已经取得这种地位，因此可以维持它对在地语言的优势）。

季什科夫建议政府在哈萨克、乌克兰、拉脱维亚、摩尔多瓦和吉尔吉斯为俄罗斯语争取这种地位。他的另一个构想是为这些国家中他称之为「同胞」的操俄罗斯语者争取「个人自治」，即让个人享有决定使用何种语言的权利。季什科夫同时把「俄罗斯世界」看作可达成俄罗斯外交政策目标的手段之一。他主张：「『俄罗斯世界』比今日的俄罗斯要大。它以前就是这样大，也应该是如此。专家的任务是帮助拥抱俄罗斯文化和语言的人为自己和子孙保存他们的精神源头，强化俄罗斯的影响力和权威性。」358

二○○七年，俄罗斯政府透过创立「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用自己的资源力挺「俄罗斯世界」的观念。基金会的第一个大动作是用俄罗斯政府提供的十亿卢布在海外广设「俄罗斯世界」中心。及至二○一三年，全世界共有九十个「俄罗斯世界」中心，分布于四十一个国家，致力推广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基金会的受益者之一是娜塔莉娅．娜罗奇尼茨卡亚的「歷史观点基金」，这是一个在海外提倡俄罗斯民族主义史观的组织。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的其中一个合作伙伴是「国际俄罗斯同胞议会」。这个议会创建于　二○○二年，在五十三个国家设有共一百四十个机构，会长是科列什尼琴科。科列什尼琴科是乌克兰议会的资深议员，由城市塞瓦斯托波尔选出，曾向议会提交近二十个旨在维护俄罗斯语在乌克兰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支配地位的提案。

二○○九年，作为整合主义方案的「俄罗斯世界」观念获得了一个新的热心推广者：六十三岁的俄罗斯东正教新牧首基里尔。他是同年举行的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发言人。前二十年他都是莫

斯科牧首区国际部门的负责人，致力于阻止教会结构在整个前苏联地区瓦解，维持其统一性。

对教会统一性的主要威胁来自乌克兰。在戈巴契夫时代之前，莫斯科牧首区有近百分之六十堂区是设在那里。但当乌克兰天主教会復兴后，西乌克兰有数以千计堂区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年之间消失。天主教会在二战期间受到史达林镇压，但继续维持地下活动，它的重生长久以来都妨碍着莫斯科和梵蒂冈之间的对话，也把原本具反西方色彩的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转化成一座抵抗外在世界的堡垒。

民族观念在后苏联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和信徒之间崛起，对莫斯科牧首区的支配地位构成了另一个挑战，也让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确立为「全俄罗斯人」统一性的看门狗。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从未更改它的正式名称或它对俄罗斯民族的定义，就像帝国时代一样，它认为俄罗斯民族是由三支东斯拉夫人构成。在保持全罗斯统一性一事上，乌克兰再次成为关键变数。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基里尔运用他作为教会国际部门负责人的权力，成功地让想要用乌克兰全部堂区建立一个独立乌克兰东正教教会的基辅都主教菲拉雷特死心。

夹在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乌克兰东正教徒分裂为二，其中三分之二承认莫斯科的管辖权，其余的自行其是。再加上有数以千计的堂区被復兴的乌克兰天主教教会强行抢走，莫斯科益发焦虑它分到的苏联遗产会不保。不过，基里尔成功稳住大部分乌克兰东正教徒的心。莫斯科在波罗的海地区失去为数可观的堂区，但控制住白罗斯的堂区。

在二十一世纪之交，俄罗斯、乌克兰和白罗斯仍是莫斯科牧首区的核心且受其控制，情形和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前无异。基里尔作为「俄罗斯世界」推动者的新角色有助于把东斯拉夫人是统一体的观念放入牧首区的意识形态中心。东正教教会对「俄罗斯世界」概念的贡献是带给它一个押韵的口号：「俄罗斯、乌克兰和白罗斯／在它们里面可以找到神圣的罗斯。」口号作者据说是二战期间一个在被德国占领的切尔尼戈夫復兴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德国对宗教的容忍程度比苏联大很多。基里尔有一次造访基辅时念了这个口号。虽然他的「俄罗斯世界」愿景涵盖哈萨克和摩尔多瓦，但乌克兰始终是他关注的中心。身为牧首，他经常到乌克兰主持东正教节日和週年纪念日庆典。

二○一三年七月，普丁陪同基里尔牧首一道前往基辅，庆祝罗斯受洗一千零二十五週年纪念。此行，普丁第一次公开拥护一个前此都是由教会阐述的观念：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一族人民。「我们明白今日的现实：我们有乌克兰人民、白罗斯人民和其他人民。我们尊重这整个

遗产，但毫无疑问的是，它的基础是我们的共同精神价值观，而这共同精神价值观让我们成为同一族人民。」359

不到两年，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一族人民的见解将会让这位俄罗斯总统和他的军队越过乌克兰边界，先是进入克里米亚，然后是进入乌克兰东部，让俄 - 乌关系乃是国际局势都陷入空前危机。

347 上一章提到的 rossiiskaia 是形容词形式，这里的 rossiiane 是名词形式。

348 叶尔钦要求俄罗斯科学院学者在一年内研究确定，此外，又提拨一千万卢布（两千美元）向民众徵求「我们是谁？」和「我们住在何处？」的解答。

349 「俄罗斯自由帝国」（Russia's liberal empire）方案，这里的自由是指用软性手段建立「帝国」。

350 Anatolii Chubais, "Missiia Rossii v XXI veke," Nezavisimaia gazeta, October 1, 2003.

351 Larisa Kaftan, "Pochemu Putin liubit Denikina," Komsomol'skaia pravda, June 25, 2009.

352 Anton Denikin, Kto spas Sovetskuiu vlast' ot gibeli? (Moscow, 1991), 10.

353 Ivan Il'in, Chto sulit miru raschlenenie Rossii? (Moscow, 1992), 15.

354 Marlene Laruelle, The "Russian World": Russia's Soft Power and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Washington, DC, 2015), 13.

355 季什科夫就是上一章提过那个率先提出「俄罗斯公民民族」观念的学者。

356 V. A. Tishkov, "Russkii iazyk I russkoiazychnoe naselenie v stranakh SNG i Baltiki," in Vestnik Rossiiskoi Akademii nauk 77, no. 5 (2008): 416.

357 同上。

358 同上。

359 "Pravoslavno-slavianskie tsenoosti - osnova tsivilizatsionnogo vybora Ukrainy," Prezident Rossii, July 27, 2013,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8961.

第二十章　俄罗斯战争

二○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俄罗斯大肆庆祝「祖国保卫者节」（原称「红军节」），同一天，世界各地都有电视观众收看索契冬季奥运的闭幕仪式。索契素有俄罗斯亚热带首府之称，俄罗斯藉着这场冬季奥运出尽锋头。它不仅把活动办得有声有色，还取得自我超越：在四年前的温哥华冬季奥运，它的得奖牌数仅仅居第十一名，这一次却一跃而为第一名，成绩还领先第二名的挪威和第三名的加拿大不少。

闭幕仪式让俄罗斯首屈一指的合唱团、管弦乐团和艺术家向世人展示这个国家的欢腾与自豪，一开始是由一个儿童合唱团高歌俄罗斯国歌。那些不会说俄罗斯语但观赏过一九八○年莫斯科夏季奥运的电视观众（二○一四年的表演充满了对一九八○年奥运会象徵的暗示），不会听得出来一九八○年的苏联国歌和二○一四年俄罗斯国歌有什么分别。但这无关要紧。反正普丁殷切想传达给国人和世人的只是这个讯息：俄罗斯已经恢復大国地位。

这个讯息的代价高昂。俄罗斯花在主办冬奥的钱让人瞠目结舌，一共是五百二十亿美元–是原始预算的四倍和温哥华冬奥支出的七倍。据一些人估计，这笔钱有一半是给政府官员和与他们勾结的商人污走。很多建筑项目直至奥运举行之时尚未竣工。但亲自监督建筑和筹备工作的普丁不以为意，对取得的成果倍感满意。他已经证明了，二○一四年的俄罗斯就像一九八○年的苏联那样，有财力和能力举办世界级赛事。

为了向世人表达善意，这位俄罗斯总统在冬季奥运开幕前几个月把一批知名囚犯从前古拉格集中营释放出来。其中之一是被关了超过十年的商业巨头霍多尔科夫斯基。被释放的还有女权主义庞克摇滚乐团「暴动小猫」的成员，他们是上一年企图在莫斯科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演出而被捕。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指控逃税，「暴动小猫」的罪名是耍流氓和煽动宗教仇恨，但很少有人怀疑，他们会被抓，真正的理由是挑战普丁的独裁专制。

许多人都预期普丁会在冬季奥运结束后继续保持善意，至少是摆出一个自由化的门面。但这些乐观派失望了。逮捕反对派的行动重新恢復，其中一个被捕者是反贪腐斗士纳瓦尔尼，他声称有一半的冬奥经费被中饱私囊。索契冬季奥运是经过精心布置，是要显示俄罗斯已经强大到足以重返国际舞台，而且并非以西方合作伙伴的身分重返，而是以桀骜不驯的方式重返。这一点在冬季奥运结束四天后随着俄罗斯展开兼併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而变得明显，克里米亚半岛是俄罗斯在一九五四年

转移给乌克兰，而俄罗斯和国际社会也在一九九一年之后承认它是乌克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丁后来承认，「拿回克里米亚」的决定是他在索契奥运的最后一天二月二十三日凌晨亲自做出。

为兼併克里米亚，俄罗斯对乌克兰东南部发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引起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关系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兼併行动违反了国际规范和包括《布达佩斯备忘录》在内的条约。《布达佩斯备忘录》是一九九四年在美国和英国的见证下签订，在其中，俄罗斯保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以换取乌克兰返还苏联时代的核子武器（当时世界上的第三大核武库存）。这场危机源于俄罗斯人身分认同和俄乌关系的纠结，普丁曾反覆声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一族人民。

究竟在普丁入侵乌克兰的几个月或几年前发生了什么事，乃至于会导致这场危机？

普丁对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愿景及其在后苏联的作用极大地促成了战争的根源和行动。这位俄罗斯总统一直希望乌克兰加入「欧亚联盟」，一个以俄罗斯为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集团。创建欧亚联盟是普丁在二○一一年年底想要达成的主要目标之一，当时他正准备回锅当第三次总统。这一次乌克兰大有希望会点头。这不仅因为普丁的老门客亚努科维奇已经在二○一○年当选总统，还因为俄罗斯在二○○九年一月中断供应乌克兰天然气之后，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被迫签下了一项对乌克兰不利的贸易协议，导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债务飙升。乌克兰政府不想步上白罗斯的后尘：白罗斯政府在二○○七年被俄罗斯切断天然气供应之后，同意把供气管线的百分之五十股权卖给了俄罗斯（明斯克后来在二○一一年失去了全部管道的控制权）。亚努科维奇政府却是另一种做法：同意把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租借给俄罗斯的时间延长二十五年，以获得新天然气的价格折扣。

这位俄罗斯总统想要的更多：他的目标是乌克兰加入欧亚联盟。虽然欧亚联盟的地缘战略目标是继承自普里马科夫，他当初建议利用独立国协确保俄罗斯在「近邻」的支配地位，但它的思想基础却是一九二○年代和一九三○年代一些俄罗斯流亡者主张的「欧亚主义」。在后苏联的俄罗斯，政治哲学家杜金吸收「欧亚主义」，形成一套新欧亚主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杜金的思想有着强烈右倾乃至法西斯主义色彩，让一九九○年代的政治菁英避之唯恐不及，但他却获得普丁的顾问们青睐，从此在新的千年里常常有机会在媒体亮相。杜金想要在全新的基础上打造一个欧亚帝国，反观普丁是设法要把旧的帝国重新整合起来。意识形态对杜金来说是关键，在普丁来说是次要。虽然他们彼此有很多差异，但两人却在一件事情上有志一同：都想利用西方社会的分裂，包括它们

的自由派与极左／极右派的分裂，来凸显俄罗斯是世界上保守价值观的灯塔，是一个捍卫传统欧洲价值观的国家和文明，使之不受后现代的颓废自由主义所扭曲。俄罗斯这个世界新角色的愿景在东正教知识分子提出的「俄罗斯世界」的理念中找到了一个亲密的盟友。

在乌克兰，亚努科维奇虽然已公开宣布放弃加入北约或欧盟的愿望，但乌克兰政府继续准备与欧盟签署一项伙伴协定。普丁在二○一三年七月造访基辅，而他为「单一俄罗斯民族」的背书360正是他阻止乌克兰和欧盟走近的策略之一。第二个月，他在意识形态武器之外又祭出经济武器：宣布对某些乌克兰产品进行贸易战。

二○一三年十一月下旬，迫于普丁的压力，亚努科维奇拒绝签署他早先答应过人民要签署的欧盟－乌克兰伙伴协议。这种突然变卦让基辅街头出现大规模抗议活动，情形类似十年前发生的「橘色革命」。二○一四年二月二十日，数十名示威者被警方射杀，议会随即废除总统使用武力的权力。随着防暴警察撤出基辅，亚努科维奇和他的顾问出逃到克里米亚，在塞瓦斯托波尔军港登上俄罗斯军舰，前往俄国。他们随身带着一大笔不义之财—几星期前普丁匯到乌克兰作为不签署欧盟协议贿款的三十亿美元。

看见自己人马在基辅失势和乌克兰新政府宣称推动乌克兰融入欧洲经济结构，普丁和他的顾问团决定分裂该国。这计画在冬季奥运最后一天获得俄罗斯总统批准，二○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克里米亚首府辛菲洛普付诸行动。一批军服上没有军徽的武装分子旋即占领了议会，自治共和国被拥立的新总理是亲俄派政客，从前竞选克里米亚议会议员时只获得百分之四的选票。在俄罗斯军事单位和僱佣兵的支持下，克里米亚新政府策画了一次禁止乌克兰和西方观察员监督的全民公投。

公投在二○一四年三月十六日举行，开票结果让人联想到前苏联时代的选举：百分之九十二选票贊成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在塞瓦斯托波尔，贊成票数更是一次对民主和常识的侮辱：百分之一百二十三。俄罗斯裔固然是克里米亚人口的大宗，操俄罗斯语的人口更多，但从仅仅一个月前的另一次投票结果判断，大部分克里米亚人其实宁愿留在乌克兰。但不管怎样，克里米亚新政府还是在二○一四年三月十七日即公投第二天宣布脱离乌克兰而独立。同一天，普丁签署了两份文件，一份表示承认克里米亚独立，另一份草拟俄罗斯联邦和独立的克里米亚国家之间的兼併条约。其实，至少在二○○八年布达佩斯的北约高峰会议之后，俄罗斯便备有兼併克里米亚和动摇乌克兰其他地区的腹案，当时普丁曾告诉美国总统布希，乌克兰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而只是一些地区的集合体，又说如果北约接纳乌克兰，将会引起乌东和乌南地区的反抗。

不过，引发二○一四年兼併行动的并不是北约或欧盟的扩张，而是乌克兰坚持要与欧盟签署伙伴协定。普丁这一次敢放胆大干，明显是受到他在二○○八年取得的成功鼓励：当时他入侵乔治亚，实质上兼併了其部分领土，却全身而退。乌克兰和欧盟签署伙伴协定并不保证其会成为欧盟或北约的成员国，却会对普丁的欧亚联盟计画大受威胁，因为少了乌克兰，他的欧亚联盟将会变得残缺。为此，普丁不惜採取激烈措施要阻止乌克兰漂向西方。许多人相信，他的行动产生了反效果，促使乌克兰以本来在克里米亚被兼併之前不能想像的程度更往西方靠过去。

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的莫斯科寒冷阴沉，但大克里姆林宫中，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十九世纪中叶所建的圣乔治厅，却被巨大的水晶吊灯照映得金碧辉煌。讲台上已经布置好两面旗帜，一面是俄罗斯联邦的三色国旗，一面是绣有双头鹰和「屠龙者」圣乔治的总统旗。在场的有俄罗斯联邦会议（上议院）议员、国家杜马（下议院）议员、各部部长和政府控制的民间组织的代表。客人是最近被俄罗斯军队占领之克里米亚新政府的几位领导人。

俄罗斯政治菁英的成员和他们的客人正在等待普丁现身，现在是普丁执政期间的第三个任期，也是他待在这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尖端的第十五年—先是当了两届总统，再当了两届总理，现在再次为总统。他走进来时，大家都站起来迎接他。普丁请他们坐下，开始致词。从西方的观点看，摆在他前头的—提供接管克里米亚的理由—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因为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有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被一个欧洲强权兼併。但普丁看来并不觉得这任务有什么难的。他大部分的论据都无关法理，而是有关歷史与文化。

他宣称，自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便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分裂开来。他把苏联的垮塌视为一段俄罗斯人民受到极不公不义对待的时期：「偌大一个国家消失了。不过，要等到克里米亚成为别的国家的一部分，俄罗斯人才惊觉他们不仅遇到了抢劫，还遇到了洗劫。」他接着说：

我听克里米亚的居民说，在一九九一年，他们就像一袋马铃薯那样被送给了别人。你很难不同意此说。对这件事，俄罗斯国家是什么态度，俄罗斯人是什么态度？是低声下气地接受现实。当时这个国家处于极度艰困之中，所以现实上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人民却始终无法对歷史这种荒唐的不公不义释怀。经过多年之后，公民们和许多公众人物重新提起这个问题，他们说，克里米亚歷史上是俄罗斯土地，塞瓦斯托波尔歷史上是俄罗斯城市。361

俄罗斯的评论家开始把普丁比作希特勒，指出他就像希特勒在一九三八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和兼併奥地利那样，是拿民族问题当藉口。普丁自己并不忌讳歷史类比。事实上，他也是把自己的行动类比于德国人，只不过不是类比于希特勒兼併奥地利，而是类比于一九八九年的东西德统一：指出这两件事情都让一个被分裂的民族重归团圆。然而，他关于需要保护俄罗斯族人对抗潜在威胁的论点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八年，而不是一九八九年。

这位俄罗斯总统声称乌克兰的俄罗斯裔备受威胁，却提不出他们受歧视的任何证据。他还声称他是要保护乌克兰的俄罗斯裔，对抗西方的扩张。普丁说：「在乌克兰，我们的西方伙伴已经越过界线，扮演起熊的角色，以不负责任和不专业的方式行动。他们完全清楚还有数以百万计俄罗斯裔生活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事实，所以，如果他们发现他们遇到了意料之外的后果，只能归咎于他们缺乏政治本能和常识。俄罗斯发现自己已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因此，俄罗斯必须起而保护其边界内外的俄罗斯人，对抗各种现实和可能的威胁，而只要她认定俄罗斯人受到威胁，她就有理由使用武力和兼併领土。但有需要俄罗斯人保护的还不仅止于俄罗斯裔的乌克兰人，还包括那些住在「近邻」的操俄罗斯语人口。「有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和操俄罗斯语人口住在乌克兰，也会继续住下去，而俄罗斯总是会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去捍卫他们的利益。」

在俄罗斯兼併克里米亚前的几个月里，普丁多次主张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一族人民。例如，普丁在二○一三年九月接受电视访谈时说道：

我们是同一族人民。不管我们双方有多少民族主义者会受到这种说法冒犯，它都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我们是同一族人民，是因为我们都是在聂伯河受洗，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歷史根源和共同命运，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宗教。我们也有着非常相似的文化、语言、传统和心灵样态……。当然，我们也有自身的独特性和族裔色彩。顺道一说，乌克兰人的文化，包括他们的语言、舞蹈和音乐都非常美妙，总是让人觉得赏心悦目—我就是其中一个。362

普丁既主张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一族人民，又给不如此认同的人贴上民族主义者标籤。但这样一种主张却有违那个行之有年的苏联和后苏联传统观点：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歷史和文化上关系密切，却是不同的民族，各自独立。因此，普丁的说法不仅挑战了乌克兰人的民族认同，还挑战了现代俄罗斯人的身分认同。认定俄罗斯人构成一个独立民族乃是俄罗斯得以在一九九一年起而反抗垂死苏联的正当性基础，也

是在那之后的俄罗斯联邦的正当性基础。

普丁有关俄－乌一体的思维方式，可回溯至俄罗斯自由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司徒卢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思路。司徒卢威在一九一二年写道：「我开始相信有一种『全俄罗斯文化』和作为其喉舌的『全俄罗斯语』存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俄罗斯』一词不是三个（前缀『大』、『小』和『白』）『语词』的某种抽象『平均值』，而是一股充满文化活力、巨大、发展茁壮中的民族力量。」363司徒卢威不反对发展乌克兰语或民俗文化，但认为应该让这种发展局限在地方和乡村的层次，不应让其影响到高级文化、教育和城市生活。二○一四年，普丁等于是让司徒卢威这些观念在最高的政治层次轮迴转世。

兼併克里米亚之后，普丁的民意支持到达高峰，从他在二○一一年十二月准备回锅总统时的百分之六十六陡增至二○一五年六月的百分之八十九。政府控制主要媒体，以及骚扰和镇压反对派，都是这次支持度陡增的原因。不过，普丁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几乎毫无疑问得到俄罗斯大众的支持。在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发表的讲话中，普丁引用在正式吞併克里米亚前夕得到的俄罗斯民调数据指出：「我们的公民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认为俄罗斯应该保护俄罗斯裔和其他生活在克里米亚的族裔的利益。超过百分之八十三的公民认为，即使俄罗斯此举会破坏我们和某些其他国家的关系，照样应该为之。总计有百分之八十六的公民仍然将克里米亚视为俄罗斯人的土地和我国领土的一部分。」364

普丁在讲话中不仅用歷史理据和民族文化理据合理化其侵略克里米亚的行为，还向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世人保证：克里米亚是一个特例，俄罗斯联邦将不会对乌克兰其他地区提出领土要求。他对那个领土刚被他占去一些的国家的公民这样说：「我希望你们能听到我说话，亲爱的朋友们。不要相信那些想让你们害怕俄罗斯的人，不要相信他们所谓其他地区将会步克里米亚后尘的叫嚣。我们不想要分裂乌克兰，我们没必要那样做。」365

这番话说于二○一四年三月，普丁相信，他不需要进一步蚕食乌克兰领土便足以达到把乌克兰留在俄罗斯势力范围的目标。失去克里米亚的震撼被认为足以让乌克兰的菁英阶层回心转意归回莫斯科，因为通过这个例子已经让该国其他地区明白，不听话可能会有什么后果。本着这种心理，普丁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要求乌克兰进行联邦化，赋予乌国某些地区否决中央政府外交政策的权力。看见基辅拒绝，俄罗斯情报部门从二○一四年四月开始在乌东和乌南的俄罗斯语区煽风点火。反基辅的宣传运动是在保护俄罗斯语和反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称为「新俄罗斯」的缓冲国，新俄罗斯一度是俄罗斯

帝国在该地区的一省。除了诉诸俄罗斯帝国的往昔，宣传运动还诉诸可回溯至「伟大爱国战争」时期的修辞—在俄罗斯，该战争已成了普丁政权的建国神话：凡是支持乌克兰政府的人不仅会被说成民族主义者和颓废西方的代理人，还会被说成法西斯主义者。

虽然有俄罗斯的帝国神话和苏联词令的加持，俄罗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运动并未能风靡设想中的整个新俄罗斯地区，而仅能在乌东的顿巴斯地区大有斩获—该地区是前苏联的一部分，与俄罗斯联邦接壤，是除克里米亚以外乌克兰俄罗斯裔人口最多的地方。俄罗斯情报部门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联手在这地区煽风点火—这种联手具体体现在化名斯特列尔科夫的吉尔金一人身上，因为他既是俄罗斯情报部门的退休官员，又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媒体的活跃撰稿者。吉尔金后来声称，正是通过他的努力，顿巴斯地区的冲突才会白热化，演变成全面性的军事对抗。事实上，就是他和他来自克里米亚的人马率先用自动步枪开火，打死了一名乌克兰安全部门的官员，引发乌克兰做出第一次军事回应。

吉尔金和他的响应者在二○一四年春夏两季大举涌入顿巴斯地区，鼓吹的是一种帝俄品牌的民族主义，即主张无分族裔，只要是操俄罗斯语者就一律是俄罗斯人。他们这种观念的最佳陈述者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报纸《明日报》的主编普罗哈诺夫，吉尔金也是该报的作者之一。普罗哈诺夫认为，乌东和乌南的操俄罗斯语的乌克兰公民业已受到种族灭绝的威胁，因此有权起而反抗，而俄罗斯政府也有责任保护他们。他不认为俄罗斯裔在一个统一的乌克兰里有未来可言，因为那样的乌克兰必然是反俄罗斯人而亲西方的。他坚持，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分裂乌克兰。

这一类观念在二○一四年的几年前便被带进乌克兰，让许多人受到感染。他们后来成了「俄罗斯之春」的活动家，俄罗斯之春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顿巴斯地区起义的称呼，受到莫斯科的指导和资助。他们其中一人是三十岁的古巴廖夫。他原是歷史学者，后来改行经商，成了小企业家；年轻时参加过一个称为「俄罗斯民族统一党」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也有论者称之为法西斯组织。二○一四年四月，在一个有两百名活动家参加的聚会上，古巴廖夫当选顿巴斯地区主要城市顿内茨克的「人民市长」。无论是古巴廖夫抑或吉尔金都不认为顿巴斯未来应该独立建国：他们的愿景是让它成为新俄罗斯的一部分，未来的新俄罗斯当然又会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古巴廖夫把顿巴斯地区的冲突看成反对乌克兰财阀的革命的一部分，这些财阀就像俄罗斯的财阀一样，控制了乌克兰经济最有油水的部分，引起广大贫穷人民的嫉妒和恨意。在古巴廖夫看来，该革命也是「俄罗斯世界」与腐败的西方进行更大斗争的一部分。在二○一四年六月的军事冲突高峰时期，古巴廖夫这样告诉顿巴

斯地区的民兵：「我们所发动的战争得到俄罗斯教会祝福。它是为『俄罗斯世界』而战，是为『新俄罗斯』而战。」[366]

二○一四年春天，经常批评普丁优柔寡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改而全力支持普丁和他的政策。普丁也乐于有他们效劳，并利用这个机会把他们中间最危险的极端分子送出国，让他们死在乌克兰的採矿小城或荒郊野外。但到了二○一四年夏天，随着建立新俄罗斯的愿景迟迟未能实现，当初俄国政府和激进派民族主义者藉着「俄罗斯世界」观念建立起来的联盟关系开始动摇，这时顿巴斯地区两个自行宣布独立建国的共和国[367]，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一个以城市顿内茨克为中心，另一个以城市卢干斯克为中心。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俄罗斯政府把更多的雇佣兵、志愿军、武器和弹药运过乌克兰边境。被送入乌克兰的武器还包括地对空飞弹。这些据说是由俄罗斯人员发射的「山毛榉」飞弹，其中一枚击落了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马航客机MH17，包括八十名儿童和十五名机组员在内，机上二百八十三名乘客全数罹难。由澳洲、比利时、马来西亚、荷兰和乌克兰组成的联合空难调查团查出了飞弹的发射地点、飞弹型号和飞弹发射器从乌克兰撤回俄罗斯的路径。

虽然有克里姆林宫暗中支持，叛军仍不足以承受乌克兰军队的压力。就像克里米亚的情形一样，如果「俄罗斯之春」想要成功，则俄罗斯必须出兵。经过若干犹豫后，俄国政府在二○一四年八月和九月两次派出部队参战，让面临战败关头的叛军转危为安。二○一五年头几个月，休假离开单位的俄国士兵被重新派往战场，在顿内茨克和卢干斯克的关键区域、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铁路枢纽德巴尔切夫击退乌克兰部队。两个叛军成立的共和国固然得救了，但要怎样处理它们却是个难题。它们的存在不仅会继续对俄罗斯的经济和国际声望不利，还会危及「俄罗斯世界」方案的未来以及俄罗斯在「近邻」的政策。

顿内茨克和卢干斯克两个共和国一样对「俄罗斯世界」感到幻灭，因为它们发现自己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而且不管是加入俄罗斯或靠独力存活都希望渺茫。事实上，克里姆林宫有鑑于新俄罗斯方案成本过高，私底下已放弃该计画。「俄罗斯世界」在顿巴斯地区的死心塌地信徒诸如如古巴廖夫之流被解除实权，两个分离主义共和国的权力被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其支持者那里转移到一些没有明确意识形态纲领但完全忠于莫斯科的人手上。当古巴廖夫胆敢挑战一个莫斯科指派的共和国领导人时，他遭到行刺，但幸运逃过一劫。

单是二○一五年一年，就有三个在前一年协助过俄罗斯在顿巴斯地

区闹事的着名地方军阀遭到暗杀，原因是不愿意配合克里姆林宫的新政策。考虑到维持顿巴斯地区的经济负担过重，克里姆林宫已经决定把它推回给乌克兰，但会另想办法让它成为一个对外交政策拥有否决权的联邦单位。古巴廖夫还是不甘心，声称顿巴斯—现在他称之为新俄罗斯，是一支火炬，可引领乌克兰的其余部分回到「俄罗斯世界」。这可是比登天还难的愿景。

兼併克里米亚和顿巴斯战争结束于二○一六年年底，导致近一万人被杀，至少近两万人受伤，数万人无家可归，也让留在战区的几百万人成为难民。这场灾难让「俄罗斯世界」方案在乌克兰和其邻国白罗斯失去所有吸引力。本来亲俄的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二○一五年一月表示：「如果现在这里还有任何人会认为说白罗斯土地是『俄罗斯世界』的一部分乃至近乎是俄罗斯本身一部分的话，忘掉这种说法吧。……以前没有〔独立的白罗斯〕这回事，但现在有了，这是必须记住的。我们不会把我们任何一片领土让与任何人。」368

现在，「俄罗斯世界」一词不仅会让人联想到普希金和俄罗斯语，还会联想到那场让几万人伤亡和数百万人生活陷入混乱的土地争夺战。

兼併克里米亚和把顿巴斯地区搞得天翻地覆之后，普丁发言时继续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一族人民。然而，这种说法不仅在国外受到驳斥，在俄罗斯国内也愈来愈不讨喜。二○○五年十一月和二○一五年三月的两次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公民相信两个民族是同一族人民的比例从百分之八十一掉到百分之五十二。虽然两个民族在歷史上有过互有好感的阶段，但到了二○一四年三月，由于俄罗斯媒体大幅报导发生在乌克兰的事件，大多数俄罗斯人都对乌克兰人产生了负面态度。

类似的结果也出现在乌克兰：到了二○一四年秋天，由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作为，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普遍持负面态度。顿巴斯冲突也减低了一般俄国人对出兵国外的兴趣。二○一四年三月，在克里米亚顺利被兼併的兴奋高峰期，百分之五十八的俄罗斯人贊成使用武力保护当地的俄裔，但这个数字在一年后掉至百分之三十四。一九九八至二○一五年之间，贊成透过兼併领土扩大本国版图的俄罗斯人更是从百分之七十五陡降为百分之十八。

入侵乌克兰让俄罗斯付出高昂人命代价，很多被派到乌克兰东部的士兵和自愿前往作战的人都一去不返。为了作战和资助穷哈哈的克里米亚及两个备受蹂躪的分离主义共和国，俄罗斯把国内需之孔殷的经济和物质资源投放到国外。尤有甚者，莫斯科除了因为入侵行动而国际声望重挫，还得应付国际社会经济制裁带来的寒冬。

第一波制裁由美国在二○一四年三月十七日启动，当天普丁下令属下草拟一分把克里米亚整合进俄罗斯联邦的条约。这些制裁最初只是针对在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协助推翻合法乌克兰政府和兼併克里米亚的个人，但在二○一四年七月十七日，马航客机被击落的一天，扩大适用到企业。翌日，制裁措施进一步扩大，加入制裁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澳洲、纽西兰和欧盟成员国。制裁措施对苏联经济构成极大杀伤力，让俄罗斯的人均GDP从二○一三年的一万五千五百五十三美元掉至二○一五年的九千零五十三美元。无法向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让卢布重重贬值，消费品价格飙涨，俄罗斯人民再次大吃苦头。

我们有很好理由认为俄 - 乌冲突不仅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现代俄罗斯民族形塑过程的一个里程碑。它对歷久不衰的「俄罗斯问题」至少带来了一个清楚的启示：要踩在同一条河流上两次不仅困难，而且是不可能369。帝俄时代建构的「单一俄罗斯民族」已经一去不返，任何修復工程都不可能让它起死回生。为了这个保守乌托邦境界投入再多鲜血和财富都是枉然。

360 这是指前一章最后提到的，普丁在基辅发表讲话时声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一族人民」。

361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Vladimir Putin,” Prezident Rossii, March 18, 2014,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

362 Vladimir Putin, interview with Channel One of Russian TV and the Associated Press, Prezident Rossii, September 4, 2013, http://kremlin.ru/news/19143.

363 Oleh S. Ilnytzkyj, “Modeling Culture in the Empire: Ukrainian Modernism and the Death of the All-Russian Idea,” in Culture, Nation, and Identity: The krainian-Russian Encounter (1600-1945), eds. Andreas Kappeler, Zenon E. Kohut, Frank E. Sysyn, and Mark von Hagen (Edmonton, 2003), 308.

364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Vladimir Putin,” March 18, 2014.

365 同上。

366 “Russkaia tserkov’ blagoslovila DNR na voinu,” Vzgliad, June 12, 2014.

367 分别称为顿内茨克共和国和卢干斯克共和国。

368 “Lukashenko: Schitaiushchie, chto Belorussiia - chast’ russkogo mira - zabud’te,” Regnum, January 29, 2015.

369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你无法踩在同一条河流两次，因为河水已非原来的河水。

跋

俄罗斯边界何在的问题，以及俄罗斯人民由什么人构成的问题，几百年来占据着俄罗斯思想家的心思。苏联在一九九一年解体把这些关注转化为一个影响全世界的巨大「俄罗斯问题」：新的俄罗斯国家和已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还有这些共和国里讲俄罗斯语的飞地，应该是什么关系？

当前的俄－乌冲突只是俄罗斯菁英阶层一贯思考方式的最新一次展现：他们总是把自己和同属东斯拉夫人的邻居看成是生活在同一个歷史和文化空间里，归根究柢是同一个民族。这场冲突重奏了过去五个世纪以来深深影响地区内政治和文化关系的旋律：俄罗斯是一个强权，势力范围超过边界之外；宗教特别是东正教用来界定俄罗斯人的身分认同，也继续形塑着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语言和文化是在地区内推行国家政策的重要工具。更重要的是，这场冲突提醒了世人，现代俄罗斯民族离缔造完成还很遥远。

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无法用软性手段对后苏联空间维持控制，不管是透过独立国协抑或形式上更灵活的俄罗斯「自由帝国」–通过经济权力和文化纽带控制的势力圈，均解释了俄罗斯的领导层为什么决定用武力维持它对这地区的主宰。但为什么俄罗斯人会决定对一个反覆被普丁称为和俄罗斯人是「同族人民」的乌克兰动武呢？

今日的乌克兰位于新的「俄罗斯问题」的最核心。乌克兰的面积、位置，还有最重要的是它与俄罗斯的歷史及文化渊源，都不容俄罗斯菁英分子在思考自身的身分认同和命运时，不把它放在思考的核心。俄罗斯可能有朝一日会变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吗？抑或它始终会是一个被修剪过的帝国，因为念念不忘失去的领土和往日的荣光而不断制造新的冲突？俄罗斯会成为一个民族和帝国与乌克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不仅因为乌克兰是俄罗斯歷史神话的一部分，还因为它是俄罗斯在东欧和中欧扩张领土之所赖，以及俄罗斯人后来重塑自身民族身分之所赖，这个重塑是根据欧洲思想家在近代早期提出的一批观念，而这批观念又是由基辅的文化人传入莫斯科沙皇国。

自基辅的僧侣在十七世纪提出「斯拉夫－俄罗斯人」的观念之后，乌克兰和乌克兰人在莫斯科／俄罗斯寻找身分认同时一直据有核心地位。后来，无论是十八世纪圣彼得堡知识分子发展帝俄计画思想之时、十九世纪俄国帝国当局和波兰革命分子争夺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之时，抑或是二十世纪苏联缔建之时，乌克兰是苏联的关键部分，乌克兰和乌克

兰人继续具有核心重要性。俄罗斯人的帝国愿景、大国地位和民族定位全有赖这个观念：乌克兰有别于俄罗斯，但又是俄罗斯一个基本构成部分。所以，克里姆林宫内外都有很多人把乌克兰脱离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可能性视为对俄罗斯本身的一种攻击。

乌克兰的出走注定会让莫斯科在后苏联空间的帝国企图心无法实现。苏联解体几年后的一九九四年，布里辛斯基在《外交事务》杂志为文指出：「没有了乌克兰，俄罗斯就当不成帝国，但若是乌克兰被收买然后服从，俄罗斯就会自动成为帝国。」布里辛斯基以下的主张让俄-乌冲突对西方所代表的意义更显重大：「俄罗斯要么只能是个帝国，要么只能是个民主国家，不可能两者得兼。」370差不多同一时期，哈佛大学的俄罗斯权威基南主张，如果苏联的解体确实标志着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就必然会导致一场俄-乌战争。二十年后，基南预言的战争发生了，把苏联死亡和俄罗斯帝国瓦解的关联明明白白摆在世人眼前。

乌克兰的出走还会粉碎俄罗斯人的帝俄模式民族观，在该民族观中，乌克兰人继续被视为「单一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人的身分认同想成是由几个同心圆构成。同心圆的圆心是族裔意义的俄罗斯人。第一个同心圆是俄罗斯公民意义的俄罗斯人。下一个圆圈是东斯拉夫人意义的俄罗斯人。最外面一个圆圈是所有分享俄罗斯文化的人，即世界上所有的操俄罗斯语人口。「俄罗斯世界」方案的设计师把俄罗斯人定义为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承载者，无分族裔或国籍。乌克兰人是东斯拉夫人同心圆的核心元素，有了它，可以让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人的身分认同显得是一个跨民族现象。这种身分认同方式因为具有帝国主义性格，威胁到从摩尔多瓦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整个东欧地区的稳定。目前，受到莫斯科鼓励，摩尔多瓦国内的分离主义者业已建立起聂斯特河沿岸共和国，而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虽然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但它们国内相当可观的操俄罗斯语人口，难保不会让莫斯科有可乘之机。

兼併克里米亚和顿巴斯战争让政府内外的俄罗斯国家主义者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联合了起来。在一个缅怀前苏联和东斯拉夫人统一性衰落的时代，这两群人的士气受到发生在乌克兰的事件鼓舞。虽然俄罗斯政府成功动员克里米亚以俄罗斯裔为主的人口支持它的兼併行动，但在大部分以乌克兰裔为主之说俄罗斯语的乌东和乌南地区，它的政治宣传效果不彰。武装民兵把「泛俄罗斯人」的概念带到乌克兰，但在传统上多民族和多文化的东欧接壤地区，这种主张总是销路不佳。所以，俄罗斯能够成功兼併或动摇的都是那些居民自视为俄罗斯裔的地区，无法影响那些只有在文化上认同俄罗斯的地区，因它们大部分居民在族裔和政治

上都是认同于乌克兰。

俄 - 乌冲突的长远后果和它对地区内的民族工程有何影响，目前尚不明朗。但有违其始作俑者所预期的，这冲突加速了一个本来受俄罗斯主宰的歷史和文化空间的解体，强化了双方国内以族裔为依归的民族认同。在把以操俄罗斯语乌克兰裔为主的乌克兰东南部转化为附庸国的计画失败后，俄罗斯政府拒绝考虑兼併顿巴斯地区，决定只兼併一个以俄罗斯裔占大宗的克里米亚。因为它发现，它受到一个与俄罗斯本土分隔开的半岛的俄罗斯裔欢迎，却不受接壤的操俄罗斯语者欢迎。

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引起乌克兰人的同仇敌忾。随着俄罗斯兼併克里米亚（居民以俄罗斯裔占绝大多数）和顿巴斯地区（在顿巴斯的大城市俄罗斯裔占相对多数）一大部分落入叛军手中，乌克兰国家的领土固然是缩小了，但乌克兰裔所占的比例却快速激增。所以，冲突的一个结果是，俄罗斯变得有更多俄罗斯裔，乌克兰变得有更多乌克兰裔。也有愈来愈多不同族裔的乌克兰人拥抱乌克兰文化作为他们身分认同的象徵。

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政治与文化菁英有朝一日会接受「失去」乌克兰的事实吗？这就是当前的「俄罗斯问题」的本质所在。正如近期发生的事件所显示，未解决的「俄罗斯问题」是个不定时炸弹，对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威胁不亚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德意志问题」，后者催生出用武力把所有德意志土地统一为一个强大德意志帝国的构想。

很多人相信，最根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源于未能以和平方法解决「德意志问题」，也有些人把希特勒和普丁打民族牌来动摇和兼併邻国领土的做法相提并论。在东西方关系上，俄 - 乌冲突业已成了冷战结束后最严重的国际危机。到底兼併克里米亚和顿巴斯战争是苏联解体的最后一幕，还是标志着欧洲进入了一个恐怖的新阶段，一个人口和土地被重塑的阶段，仍有待观察。

答案将取决于俄罗斯菁英分子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接受后苏联时期的政治现实，按照后帝国世界的要求调整俄罗斯的身分认同。俄罗斯民族想要拥有光明未来和敦睦邻国，方法不是返回基辅罗斯那样的东斯拉夫人统一体，而是在俄罗斯联邦的边界内打造一个现代的公民民族。这是老牌帝国英国和现代民族国家德国所走过的路道：它们都承认那些不在它们边界之内的英语国家和德语国家是独立国家。不此之图，后果也许是引起一场新的冷战，甚或更糟。

370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Premature Partnership,” Foreign Affairs 73 (March-April 1994): 72.

鸣谢

我写这本书的近因是二○一四年爆发的俄乌战争。但在很多方面，它都是我较早前研究方向即东斯拉夫人身分认同史的延续，该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二○○六年问世的《斯拉夫诸民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以下简称《起源》）。《起源》出版后，我在大学里主持一门称为「东欧人身分认同：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讨论课，让我可以把从《起源》发端的研究推进至十九和二十世纪。俄国兼併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之后，我把有关俄罗斯歷史和身分认同的当前辩论纳入我的研究和写作核心。近期的事件还促使我把一本原来只是纯学术的专着改为兼顾更大的读者群，让其处理一些具有直接政治和文化相干性的问题。

虽然这本书的写作计画酝酿已久，而且有不少部分是奠基于我较早期的作品或专为本书所进行的研究，但我的解释和分析很多都是仰赖其他人的优秀着作。他们很多都是我的朋友和同事，让我受惠良多。

我对莫斯科公国歷史和身分认同的理解来自以下诸位的作品：霍尔珀林（Charles J. Halperin）、基费尔森（Valerie Kivelson）、科尔曼（Nancy Kollman）、奥斯特洛夫斯基（Donald Ostrowski）。对于十八世纪俄罗斯政治，科古特（Zenon E. Kohut）和斯金纳（Barbara Skinner）的专论非常有启发性。比连基（Serhiy Bilenky）、多尔比洛夫（Mikhail Dolbilov）、希利斯（Faith Hillis）、米勒（Alexei Miller）、托洛奇科（Oleksii Tolochko）和佐林（Andrei Zorin）的作品有助我掌握帝俄民族的复杂性和俄罗斯帝国对西部边区的宗教政策。布兰登贝格尔（David Brandenberger）、马丁（Terry Martin）、派普斯（Richard Pipes）、普罗齐克（Ana Procyk）、鲁德林（Per Rudling）、斯波尔路克（Roman Szporluk）和叶克尔彻克（Serhy Yekelchyk）为我对俄国在二十世纪的发展提供了理解的基础。

感谢莱丹（John LeDonne）、普罗齐克（Roman Procyk）和托尔巴科夫（Igor Torbakov）读过手稿后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纠正和意见。我还要感谢沃特曼（Richard Wortman）邀请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他的「俄罗斯帝国史」讨论课发表演讲和感谢该讨论课的一位参与者黎特（Nathaniel Knight）与我分享他找到的一些关于博迪安斯基（Osyp Bodiansky）和纳杰日金（Nikolai Nadezhdin）的材料。承蒙耶鲁大学的斯奈德（Tim Snyder）和「蜂巢地图公司」的韦斯（Jonathon Wyss）惠允本书使用他们的一些地图，在此谨申谢忱。我也要出于相同

原因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多伦多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拜尤尔克维奇（Myroslav Yurkevich）之赐，我的文字得以更像英文。一如往常，我太太奥莱娜（Olena）是本书很多草稿的最仔细和最挑剔的读者，是本书更易为读者亲近的功臣。

非常感谢科尼里姆（Jill Kneerim）建议海默特（Lara Heimert）把本书纳入培基书店（Basic Books）的着名「歴史着作系列」。是海默特的许多宝贵建议和仔细编辑让本书得以以现在的样子问世。能够再一次和培基书店工作团队合作让我倍感愉快，他们包括德耶苏（Betsy DeJesu）、拉布利（Roger Labrie）、马苏德（Alia Massoud）、汤普森（Jennifer Thompson）、斯特克弗斯（Kathy Streckfus）和特雷西（Collin Tracy）。不过，上面提到的诸位无一需要为本书的缺点负责。本书的任何缺点都应该由我本人负责，或说应该由俄罗斯歴史的复杂性本身负责。

参考书目

导论

Tim Baycroft, France, Inventing the Nation (London, 2008); Stefan Berger, Germany, Inventing the Nation (London, 2004);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3d ed. (New Haven, CT, 2009);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d ed. (Ithaca, NY, 2009); Geoffrey Hosking, "The Freudian Frontier,"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rch 10, 1995; Carsten Humlebaek, Spain, Inventing the Nation (London, 2014); Serhii Plokhy, 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 Premodern Identiti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 (Cambridge, 2006); Vera Tolz, Russia, Inventing the Nation (London, 2001).

第一章　沙皇国诞生

Michael Cherniavsky, "Klan or Basileus?: An Aspect of Russia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in idem, ed., The Structure of Russian History (New York, 1970), pp. 75–77. Simon Franklin and Jonathan Shepard, The Emergence of Rus, 750–1200 (London, 1996); I. Gerasimov, S. Glebov, A. Kaplunovski, M. Mogilner, and A. Semyonov, eds., "Novaia imperskaia istoriia Severnoi Evrazii," chapter 5, Ab Imperio, no. 3 (2014): 363–407; Charles J. Halperin, The Tatar Yoke: The Image of the Mongols in Medieval Russia (Bloomington, IN, 2009); Mykhailo Hrushevsky, History of Ukraine-Rus', vol. 1 (Edmonton, 1997); Janet Martin, Medieval Russia, 980–1584, 2d ed. (Cambridge, 2008); Donald Ostrowski, Muscovy and the Mongols: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Steppe Frontier, 1304–1589 (Cambridge, 2002); V. T. Pashuto, B. N. Floria, and A. L. Khoroshkevich, Drevnerusskoe nasledie i istoricheskie sud'by vostochnogo slavianstva (Moscow, 1982); Jaroslaw Pelenski, The Contest for the Legacy of Kievan Rus' (Boulder, 1998); Serhii Plokhy, 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 Premodern Identiti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 (Cambridge, 2006); Daniel Stone, The Polish-Lithuanian State, 1386–1795 (Seattle, 2001).

第二章　第三罗马

Michael Cherniavsky, Tsar and People: Studies in Russian Myths, 2d ed. (New York, 1969); Chester S. L. Dunning, A Short History of Russia's First Civil War: The Time of Trouble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Romanov Dynasty (University Park, PA, 2004); Borys A. Gudziak, Crisis and Reform: The Kyivan Metropolitanate, the Patriarchat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Genesis of the Union of Brest (Cambridge, MA, 1998); Mykhailo Hrushevsky, History of Ukraine-Rus', vol. 7 (Edmonton, 1999); Tat'iana Oparina, Ivan Nasedka i polemicheskoe bogoslovie kievskoi mitropolii (Novosibirsk, 1998); Donald Ostrowski, Muscovy and the Mongols: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Steppe Frontier, 1304–1589 (Cambridge, 2002); Maureen Perrie, Pretenders and Popular Monarchism in Early Modern Russia: The False Tsars of the Time of Troubles (Cambridge, 2002); S. F. Platonov, The Time of Troubles (Lawrence, KS, 1970); Serhii Plokhy, The Cossacks and Religion in Early Modern Ukraine (Oxford, 2001).

第三章　帝俄民族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1992); M. S. Grinberg and B. A. Uspenskii, Literaturnaia voina Tred'iakovskogo i Sumarokova v 1740-kh—nachale 1750-kh gg. (Moscow, 2011); Georg B. Michels, At War with the Church: Religious Diss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Russia (Stanford, CA, 2000); Serhii Plokhy, Ukraine and Russia: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Toronto, 2008); Elena Pogosian, Petr I—arkhitektor russkoi istorii (St. Petersburg, 2001); Hans Rogge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Cambridge, MA, 1960); Tatiana Tairova-Yakovleva, "The Role of the Religious Factor and Patriarch Nikon in the Unification of Ukraine and Muscovy," Acta Polonia Historica 110 (2014): 5–22; Vera Tolz, Russia, Inventing the Nation (New York, 2001); Boris Uspenskii, "Foneticheskaia struktura odnogo stikhotvoreniia Lomonosova (istoriko-filologicheskii ėtiud)," in idem, Izbrannye trudy, 2 vols. (Moscow, 1996– 1997), 2:207–241; V. V. Vinogradov, Ocherki po istorii russkogo literaturnogo iazyka (Moscow, 1982).

第四章　开明女皇

John T. Alexander, Catherine the Great (New York, 1989);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1992); Zenon Kohut, Russian Centralism and Ukrainian Autonomy: Imperial Absorption of the Hetmanate, 1760s–1830s (Cambridge, MA, 1989); John LeDonne,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ussian Empire, 1650–1831 (Oxford, 2003); Jerzy Lukowski, The Partitions of Poland, 1772, 1793, 1795 (New York, 1999); Robert K. Massie, Catherine the Great: Portrait of a Woman (New York, 2011); Barbara Skinner, The Western Front of the Eastern Church: Uniate and Orthodox Conflict in Eighteenth-Century Poland, Ukraine, Belarus, and Russia (DeKalb, IL, 2009); Yuri Slezkine, "Naturalists Versus Nations: Eighteenth-Century Scholars Confront Ethnic Diversity," Representations 47 (Summer 1994): 170–195; Sergei M. Soloviev, History of Russia, vol. 46, The Rul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Turkey and Poland, 1768–1770, trans. Daniel L. Schlafly Jr. (Gulf Breeze, FL, 1994).

第五章　波兰的挑战

Serhiy Bilenky, Romantic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 Russian, Polish, and Ukrainian Political Imaginations (Stanford, CA, 2012); John LeDonn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World, 1700–1917: The Geopolitics of Expansion and Containment (Oxford, 1996); Dominic Lieven, Russia against Napoleon: The True Story of the Campaigns of War and Peace (London, 2009); Alexei Miller, " 'Official Nationality'? A Reassessment of Count Sergei Uvarov's Triad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ism Politics," in idem, The Romanov Empire and Nationalism: Essays on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Research (New York, 2006), 139–160; idem, "Istoriia poniatiia 'natsiia' v Rossii," Otechestvennye zapiski 1 (2012); M. Polievktov, Nikolai I: Biografiia i obzor tsarstvovaniia (Moscow, 1918); Piotr S. Wandycz, The Lands of Partitioned Poland, 1795–1918 (Seattle, 1975); Andrei Zorin, "Zavetnaia triada: Memorandum S. S. Uvarova 1832 goda i vozniknovenie doktriny pravoslavie—samoderzhavie—narodnost', " in idem, Kormia dvuglavogo orla: Literatura i gosudarstvennaia ideologiia v Rossii v poslednei treti XVIII–pervoi treti XIX veka (Moscow, 2001), 337–370.

第六章　为边界战斗

Inna Bulkina, "Politika Nikolaia I v Iugo-Zapadnom krae i

uchrezhdenie Universiteta Sv. Vladimira," Trudy po russkoi i slavianskoi filologii: Literaturovedenie 7 n.s. (Tartu, 1999); Wasyl Lencyk, The Eastern Catholic Church and Czar Nicholas I (New York, 1966); Alexei Miller, " 'Official Nationality'? A Reassessment of Count Sergei Uvarov's Triad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ism Politics," in idem, The Romanov Empire and Nationalism: Essays on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Research (New York, 2006), 139–160; idem, "Istoriia poniatiia 'natsiia' v Rossii," Otechestvennye zapiski 1 (2012), www.strana-oz.ru/2012/1/istoriya-ponyatiya-naciya-v-rossii; Marian Radwan, Carat wobec Kościoła greckokatolickiego w zaborze rosyjskim, 1796–1839 (Lublin, 2004); Aleksei Tolochko, Kievskaia Rus' i Malorossiia v XIX veke (Kyiv, 2012); Stephen Velychenko, National History as Cultural Process: A Survey of the Interpretations of Ukraine's Past in Polish, Russian, and Ukrainian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914 (Edmonton, 1992).

第七章　乌克兰的出现

Olga Andriewsky, "The Russian-Ukrainian Discours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Little Russian Solution,' 1782–1917," in Culture, Nation, and Identity: The Ukrainian-Russian Encounter (1600–1945), ed. Andreas Kappeler, Zenon E. Kohut, Frank E. Sysyn, and Mark von Hagen (Edmonton, 2003), 182–214; Alexei Miller, The Ukrainian Question: The Russian Empire and Nation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2003); Orest Pelech, "The History of the St. Cyril and Methodius Brotherhood Reexamined," in Synops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Honour of Zenon E. Kohut, ed. Serhii Plokhy and Frank Sysyn (Edmonton, 2005), 335–344; Thomas M. Prymak, Mykola Kostomarov: A Biography (Toronto, 1996); David Saunders, "Mykola Kostomarov (1817–1885) and the Creation of a Ukrainian Ethnic Identity," Slavonica 7, no. 1 (2001): 7–24; Andrei Teslia, " 'Slavianskii vopros' v publitsistike M. P. Pogodina, 1830–1850-kh gg.," Sotsiologischeskoe obozrenie 13, no. 1 (2014): 117– 138; Aleksei (Oleksii) Tolochko, Kievskaia Rus' i Malorossiia v XIX veke (Kyiv, 2012); P. A. Zaionchkovskii, Kirillo-Mefodievskoe obshchestvo (1846–1847) (Moscow, 1959).

第八章　大、小和白

Mikhail Dolbilov, Russkii krai, chuzhaia vera: Ėtnokonfessional’naia politika imperii v Litve i Belorussii pri Aleksandre II (Moscow, 2010); Aleksandr Dulichenko, Vvedenie v slavianskuiu filologiiu (Moscow, 2014); Orlando Figes, The Crimean War: A History (New York, 2012); Efim Karskii, Belorussy, 3 vols. (Moscow, 1955–1956); Alexei Miller, The Ukrainian Question: The Russian Empire and Nation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2003); V. Petronis, Constructing Lithuania: Ethnic Mapping in Tsarist Russia, ca. 1800–1914 (Stockholm, 2007); Steven Seegel, Mapping Europe’s Borderlands: Russian Cartography in the Age of Empire (Chicago, 2012); Darius Staliunas, Making Russians: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Russification in Lithuania and Belarus After 1863 (New York, 2007); P. V. Tereshkovich, Ėtnicheskaia istoriia Belarusi XIX–nachala XX vv. v kontekste Tsentral’no-Vostochnoi Evropy (Minsk, 2004).

第九章　消灭语言

Andrii Danylenko, “The Ukrainian Bible and the Valuev Circular of July 18, 1863,” Acta Slavica Iaponica 28 (2010): 1–21; John-Paul Himka, Religion and Nationality in Western Ukraine: The Greek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Ruthenian National Movement in Galicia, 1867–1900 (Montreal, 1999); Johannes Remy, “The Valuev Circular and Censorship of Ukrainian Publications in the Russian Empire (1863–1876): Intention and Practice,”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49, nos. 1–2 (2007): 87–110; David Saunders, “Mikhail Katkov and Mykola Kostomarov: A Note on Petr A. Valuev’s Anti-Ukrainian Edict of 1863,”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17, nos. 3–4 (1993): 365–383; idem, “Russia and Ukraine Under Alexander II: The Valuev Edict of 1863,”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7, no. 1 (1995): 23–50; idem, “Pan-Slavism in the Ukrainian National Movement from the 1840s to the 1870s,” Journal of Ukrainian Studies 30, no. 2 (Winter 2005): 27–50; Anna Veronika Wendland, Die Russophilen in Galizien: Ukrainische Konservative zwischen Österreich und Russland, 1848–1915 (Vienna, 2001).

第十章　人民之歌

Faith Hillis, Children of Rus’: Right-Bank Ukraine and the

Invention of a Russian Nation (Ithaca, NY, 2013); Oleh S. Ilnytzkyj, “Modeling Culture in the Empire: Ukrainian Modernism and the Death of the All-Russian Idea,” in Culture, Nation, and Identity: The Ukrainian-Russian Encounter (1600–1945), ed. Andreas Kappeler, Zenon E. Kohut, Frank E. Sysyn, and Mark von Hagen (Edmonton, 2003), 298–324; D. A. Kotsiubinskii, Russkii natsionalism v nachale XX stoletiia: Rozhdenie i gibel’ ideologii Vserosiiskogo natsional’nogo soiuza (Moscow, 2001); I. V. Omelianchuk, “Chislennost’ Soiuza russkogo naroda v 1907–1914 gg. v pravoberezhnykh ukrainskikh guberniiakh,” in Belorussiia i Ukraina: Istoriia i kul’tura. Ezhegodnik 2005/2006 (Moscow, 2008), 145–164; Richard Pipes, “Peter Struve and Ukrainian Nationalism,” special issue of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3/4, Part 2, Eucharisterion: Essays Presented to Omeljan Pritsak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 by His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1979–80): 675–683; Serhii Plokhy, Unmaking Imperial Russia: Mykhailo Hrushevsky and the Writing of Ukrainian History (Toronto, 2005); George Y. Shevelov, The Ukrainian Languag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00–1941): Its State and Status (Cambridge, MA, 1989); Theodore R. Weeks, Nation and State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Nationalism and Russification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1863–1914 (DeKalb, IL, 1996).

第十一章　君主制的垮台

A. Iu. Bakhturina, Politika Rossiiskoi imperii v Vostochnoi Galitsii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 (Moscow, 2000); Faith Hillis, “Making and Breaking the Russian Empire: The Case of Kiev’s Shul’gin Family,” in Imperiale Biographien: Elitekarrieren im Habsburger, Russischen und Osmanischen Vielvölkerreich (1850–1918), ed. Malte Rolf and Tim Buchen (Munich, 2015), 178–198; E. Ketola, “Revoliutsiia 1917 goda i obretenie Finliandiei nezavisimosti: Dva vzgliada na problemu,” 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no. 6 (1993); Eric Lohr, Nationalizing the Russian Empire: The Campaign Against Enemy Aliens During World War I (Cambridge, MA, 2003); Otrechenie Nikolaia II: Vospominaniia ochevidtsev (Moscow, 1990); Alexander Victor Prusin, Nationalizing a Borderland: War, Ethnicity and Anti-Jewish Violence in East Galicia, 1914–1920 (Tuscaloosa, AL, 2005).

第十二章　俄国革命

Jörg Brechtefeld, Mitteleuropa and German Politics: 1848 to the Present (London, 1996); Mykhailo Hrushevs'kyi, Na porozi novoi Ukrainy: Statti i dzherel'ni materialy (New York, 1992); 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23, rev. ed. (Cambridge, MA, 1997); Anna Procyk,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Ukraine: The Nationality Policy of the Volunteer Army During the Civil War (Edmonton, 1995); Per Anders Rudl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Belarusian Nationalism, 1906–1931 (Pittsburgh, PA, 2015); Timothy Snyder, The Red Prince: The Secret Lives of a Habsburg Archduke (New York, 2008); Nicholas P. Vakar, Belorus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A Case Study (Cambridge, MA, 1956).

第十三章　列宁的胜利

Francine Hirsch, Empire of Nations: Ethnographic Knowledge and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Union (Ithaca, NY, 2005); Terry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Ithaca, NY, 2001); idem, "An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as the Highest Form of Imperialism," in A State of Nations: Empire and Nation-Making in the Age of Lenin and Stalin, ed. Ronald Grigor Sunny and Terry Martin (Oxford, 2001), 67–92; Liliana Riga, The Bolsheviks and the Russian Empire (New York, 2012); Vasyl Shakhrai and Serhii Mazlak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Ukraine, ed. Peter J. Potichnyj (Ann Arbor, MI, 1970); Yuri Slezkine, "The USSR as a Communal Apartment, or How a Socialist State Promoted Ethnic Particularism," Slavic Review 53, no. 2 (1994): 414–452; Ronald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 1993); idem, The Making of the Georgian Nation (Bloomington, IN, 1994).

第十四章　民族共产主义

David Brandenberger, National Bolshevism: Stalinist Mass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1931–1956 (Cambridge, MA, 2002); James E. Mace, Communism and the Dilemma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National Communism in Soviet Ukraine, 1918–1933 (Cambridge, MA, 1983); Ronald Grigor Suny and Terry Martin, eds., A State of Nations: Empire and Nation-Making in the Age of Lenin and Stalin (Oxford, 2001); Stephen Velychenko,

Painting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Red: The Ukrainian Marxist Critique of Russian Communist Rule in Ukraine, 1918–1925 (Toronto, 2015).

第十五章　俄罗斯的復返

David Brandenberger, "Stalin's Populism and the Accidental Creation of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alities Papers 38, no. 5 (2010): 723–739; David Brandenberger and Mikhail V. Zelenov, "Stalin's Answer to the National Question: A Case Study on the Editing of the 1938 Short Course," Slavic Review 73, no. 4 (2014): 859–880; Viktor B. Dënningkhaus, V teni "bol'hogo brata": Zapadnye natsional'nye men'shinstva v SSSR, 1937–38 gg. (Moscow, 2011); Geoffrey A. Hosking, Rulers and Victims: The Russians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 2006); Donald Ostrowski, "Alexander Nevskii's 'Battle on the Ice': The Creation of a Legend," Russian History/Histoire russe 33, nos. 2-3-4 (Summer-Fall-Winter 2006): 309–312; Benedikt Sarnov, Stalin i pisateli, vol. 1 (Moscow, 2007).

第十六章　伟大爱国战争

Olia Hnatiuk, Vidvaha i strakh (Kyiv, 2015); Ianka Kupala, Zbor tvoraŭ, 7 vols., vol. 7, Vershy: Pereklady 1918–1942 (Minsk, 1974); Roger Moorhouse, The Devil's Alliance: Hitler's Pact with Stalin, 1931–1941 (New York, 2014); 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 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ed. Raymond James Sontag and James Stuart Beddie (Washington, DC, 1948); Serhii Plokhy, "The Call of Blood: Government Propaganda and Public Response to the Soviet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Cahiers du monde russe 52, nos. 2–3 (2011): 293–320; 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2010); Iosif Stalin, O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Sovetskogo naroda (Moscow, 1948); Serhy Yekelchyk, Stalin's Empire of Memory: Russian-Ukrainian Relations in the Soviet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oronto, 2004).

第十七章　苏维埃人

Wayne Allensworth, The Russian Question: Nationalism, Modernization, and Post-Communist Russia (Lanham, MD, 1998);

Aleksandr Baigushev, Russkaia partiia vnutri KPSS (Moscow, 2005); Yitzhak M. Brudny, Reinventing Russia: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the Soviet State, 1953–1991 (Cambridge, MA, 2000); Stephen Carter, Russian Nationalism: Yesterday, Today, Tomorrow (New York, 1990); Ariel Cohen, Russian Imperialism: Development and Crisis (Westport, CT, 1996); Michael Confino, “Solzhenitsyn, the West, and the New Russian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6, nos. 3–4 (1991): 611–636; Simon Cosgrove,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Soviet Literature: The Case of Nash Sovremennik 1981–1991 (New York, 2004); Nathaniel Davies, A Long Road to Church: A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Russian Orthodoxy, 2d ed. (Boulder, 2003); John Dunlop, The Faces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Nationalism (Princeton, NJ, 1983); Ivan Dzyuba, Internationalism or Russification? A Study in the Soviet Nationalities Problem, ed. M. Davies, 2d ed. (London, 1970); Kuchkar Khanazarov, Reshenie natsional’no-iazykovoi problemy v SSSR (Moscow, 1982); David Marples, Belarus: A Denationalised Nation (Amsterdam, 1999); Tatstsiana Mikulich, Mova i ėtnichnaia samasviadomasts’ (Minsk, 1996); Nikolai Mitrokhin, Russkaia partiia: Dvizhenie russkikh natsionalistov v SSSR, 1953–1985 (Moscow, 2003); Roman Solchanyk, “Politic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Post-Shelest Period,” in Ukraine After Shelest, ed. Bohdan Krawchenko (Edmonton, 1983), 1–29; Roman Szporluk, Russia,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 2001); Vladislav Zubok, Zhivago’s Children: The Last Russian Intelligentsia (Cambridge, MA, 2011).

第十八章　红旗倒下

Mark R. Beissinger,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Cambridge, 2002); George W. Breslauer and Catherine Dale, “Boris Yel’tsin and the Invention of a Russian Nation-State, Post-Soviet Affairs 13, no. 4 (1997): 303– 332; Timothy Colton, Yeltsin: A Life (New York, 2008); E. N. Danilova, “Izmeneniia v sotsial’nykh identifikatsiiakh rossiian,” Sotsiologicheskii zhurnal, nos. 3–4 (2000); Mark Harrison, “Soviet Economic Growth Since 1928: The Alternative Statistics of G. I. Khanin,” Europe-Asia Studies 45, no. 1 (1993): 141–167; David D. Laitin,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w Abroad (Ithaca, NY, 1998); Marlene

Laruelle,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Russia (New York, 2009); Marlene Laruelle, ed.,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the National Reassertion of Russia (New York, 2009); Emil' Pain, "Imperskii natsionalizm (Vozniknovenie, evoliutsiia i politicheskie perspektivy v Rosii)," Obshchestvennye nauki i sovremennost', no. 2 (2015): 54–71; Petr Panov, "Nation-Building in Post-Soviet Russia: What Kind of Nationalism Is Produced by the Kremlin?"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1, no. 1 (2010): 85–94; Serhii Plokhy,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2014); Peter Rutland, "The Presence of Absence: Ethnicity Policy in Russia," in Julia Newton and William Tompson, eds., Ideas and Leadership in Post-Soviet Russia (New York, 2010), 116–136; Valery Tishkov,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Conflict in and after the Soviet Union: The Mind Aflame (London, 1996); Edward W. Walker, Dissolution: Sovereignty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Lanham, MD, 2003).

第十九章　俄罗斯世界

Ronald D. Asmus, A Little War That Shook the World: Georgia, Russ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New York, 2010); E. N. Danilova, "Izmeneniia v sotsial'nykh identifikatsiiakh rossiian," Sotsiologicheskii zhurnal, nos. 3–4 (2000); M. Golovanova and V. Shergin, Gosudarstvennye simvoly Rossii (Moscow, 2003); Vladimir Kabuzan, Russkie v mire: Dinamika chislennosti i rasseleniia (1719–1989). Formirovanie ėtnicheskikh i politicheskikh granits russkogo naroda (St. Petersburg, 1996); Pal Kolsto and Helge Blakkisrud, eds., The New Russian Nationalism: Imperialism, Ethnicity and Authoritarianism, 2000–2015 (Edinburgh, 2016); Mara Kozelsky, "Religion and the Crisis in Ukra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14, no. 3 (2014): 219–241; Marlene Laruelle, ed., Eurasianism and the European Far Right: Reshaping the Europe—Russia Relationship (Lanham, MD, 2015); Marlene Laruelle, The "Russian World": Russia's Soft Power and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Washington, DC, 2015); Aleksei Miller, ed., Nasledie imperii i budushchee Rossii (Moscow, 2008); Anastasia Nesvetailova, "Russia and Belarus: The Quest for the Union; or Who Will Pay for Belarus's Path to Recovery?" in Contemporary Belarus: Between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ed. Elena A. Korosteleva, Colin W. Lawson, and Rosalind J. Marsh (London, 2003), 152–164; Emil' Pain and Sergei Prostakov, "Mnogolikii russkii natsionalizm: Ideino-politicheskie raznovidnosti (2010–2014)," Polis, no. 4 (2014): 96–113; Hrihoriy Perepilitsa, "Belarusian-Russian Integ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Security of Ukraine," in Belarus at the Crossroads, ed. Sherman W. Garnett and Robert Legvold (Washington, DC, 1999), 81-1-3; Igor Torbakov, "Emulating Global Big Brother: The Ideology of American Empire and Its Influence on Russia's Framing of Its Policies in the Post-Soviet Eurasia," Turkish Review of Eurasian Studies, no. 3 (2003): 41–72; Andrei P. Tsygankov, Russia's Foreign Policy: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National Identity (Lanham, MD, 2006); Andrew Wilson,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2006).

第二十章　俄罗斯战争

Paul Goble, "Russian Support for Putin's View that Russians and Ukrainians Are 'One People' Falling, Polls Show," Window on Eurasia, June 26, 2015; Paul Roderick Gregory, "Deconstructing Putin's Approval Ratings: One Thousand Casualties for Every Point," Forbes, June 8, 2015; Steven Lee Myers, The New Tsar: The Rise and Reign of Vladimir Putin (New York, 2015); Roland Oliphant and Tom Parfitt, "Vladimir Putin Praises Russian Patriotism and Claims: Ukrainians and Russians Are One," Telegraph, March 18, 2015; "Rossiisko-ukrainskie otnosheniia v zerkale obshchestvenngo mneniia: sentiabr' 2015," Levada-Tsentr, May 10, 2015, www.levada.ru/old/05-10-2015/rossiisko-ukrainskie-otnosheniya-v-zerkale -obshchestvennogo-mneniya-sentyabr-2015; Yuri Teper, "Official Russian Identity Discourse in Light of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National or Imperial," Post-Soviet Affairs 32, no. 4 (2016): 378–396; Igor Torbakov, "A Parting of Ways? The Kremlin Leadership and Russia's New-Generation National Thinkers,"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23, no. 4 (Fall 2015): 427–457; idem, "Ukraine and Russia: Entangled Histories, Contested Identities, and a War of Narratives," in Revolution and War in Contemporary Ukraine: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ed. Olga Bertlsen (Stuttgart, 2016), 89–120; Andreas Umland, "Eurasian Union vs. Fascist Eurasia," New Eastern Europe, November 19, 2015; Andrew Wilson, Ukraine Crisis: What It

Means for the West (New Haven, CT, 2014), 118–143.

中外文名词对照及索引

书籍文献

一画

〈一个俄罗斯公民的意见〉 “The Opinion of a Russian Citizen” 140

三画

《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谈话》 A Convers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Little Russia 117

《大纲》 Synopsis 99-100, 108, 149

《小俄罗斯史》 History of Little Russia 179

〈不容走回头路〉 “No Turning Back” 270-271

《上帝的律法，又称乌克兰人民的创世记》 The Law of God, or Books of the Genesis of the Ukrainian People

181

《三个首都》 The Three Capitals 307

四画

《反共产国际协定》 Anti-Comintern Pact 326, 339

〈支持祖国〉 “For the Motherland” 330

〈天佑沙皇〉 “God Save the Tsar” 229, 250, 260

《文字报》 Slovo / Word 219, 221, 223-224

五画

《布尔什维克》 Bol’shevik 330, 337

〈布尔什维克〉 “Hymn of the Bolshevik Party” 354

《布达佩斯备忘录》 Busapest memorandum 425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 Treaty of Brest-Litovsk 277, 281-282, 284

《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441

《古拉格群岛》 Gulag Archipelago 391

《尼斯塔德和平条约》 Nystad Peace Treaty 105

《北方小蜜蜂》 Severnaia pchela / Northern Bee 178

《古与新》 Starina Inovizna / Antiquity and Novelty 120

《弗拉基米尔诸大公的故事》 Tale of the Princes of Vladimir 70

《市民会议》 Veche 390

六画

《艾涅伊达》 Eneïda 177-178, 179, 197, 202, 221

《西方哲学史》 History of Westren Philophy 363

《伊凡．苏萨宁》 Ivan Susanin 334, 359

《共青团真理报》 Komsomol's kaia Pravda / Komsomsl Truth 415

《共产党宣言》 The Commmnist Manifesto 330

《米宁与波札尔斯基》 Minin and Pozharsky 334

《米宁与波札尔斯基：把人民从干预主义者手中救出》 Minin (and) Pozharsky: Salvation from the Interventionsts 334

〈各族人民组成一家人〉 "OneFamilyofPeople" 326

《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 Truce of Andrusovo 98, 194

七画

《沙皇如何欺骗人民》 How the Tsar Deceives the People 258

《吟游诗人》 Kobar / Minstrel 178

〈告乌克兰人民书和给中央拉达的最后通

牒〉　“ManifestototheUkrainianPeoplewithanUltimatumtotheCentralRada”　273

〈告小俄罗斯居民书〉　“TotheInhabitantsofLittleRussia”

285

《占领华沙》　NavziatieVarshavy / Onthe Taking of Warsaw　142

《里加条约》　Treaty of Riga　315-317

《每个白罗斯人必须知道的事情》　What Every Belarusian Needs to Know　283

八画

《亚歷山大．涅夫斯基》　Alexander Nevsky　335

《供阅读的图书馆》　Biblioteka dlia chteniia / Library for Reading　178-179

《青年近卫军》　Molodaia gvardiia / The Young Guard

376-377

《来自波尔塔瓦的娜塔卡》　Natalka from Poltava　177

《东部领地》　Ober Ost　280

《彼得一世》　Peter the First　335

《拉帕洛协议》　Rapallo agreement　296

《拉帕洛条约》　Treaty of Rapallo　296

〈波罗底诺战役纪念日〉　“The Anniversary of Borodino”　142-143

〈两种罗斯民族性〉　“The Two Rus’Nationalities”　199-200

《明日报》　Zavtra / Tomorrow　434

九画

《为沙皇献身》　A Life for the Tsar　334, 359

〈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 “Letter to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of Ukrain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Victories over Denikin” 294

《英雄们》 Bogatyri / Heroes 333-334

《皇室宗谱》 Book of Royal Degrees 71

《信条教导扼要全书》 Brief Compendium of Teaching son the Articles of Faith 89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 History of the Kazakh SSR 357-358

《俄罗斯国家的歷史》 History of the Russian State 140, 156

《俄罗斯歷史笔记》 Notes on Russian History 125-126

〈俄罗斯人民和名称的由来〉 “Origines gentis et nominis Russorum/The Origins of the Russian People and Name” 107

《俄罗斯人祖先家庭生活的谚语》 Sayings of the Russian People About the Family Life of Their Ancestors

195

《俄罗斯杂志》 Rosiiskii magazine / Russian Magazine

120

〈俄罗斯、大俄罗斯、乌克兰和加利西亚文学〉

“Russian, Great Russian, Ukrainian, and Galicaian Literature” 216

《俄罗斯先驱报》 Russian Herald 216

《俄罗斯史》 Russian History 157-158

《俄罗斯思想》 Russkaia mysl’ / Russian Thought 239

《俄罗斯战略：二○○○年总统议程》 Strategy for Russia: Agenda for the President□2000 410

〈俄罗斯沙皇国的对外政策〉 “TheForeignPolicyofRussianTsardom” 330

《咱们的命运》　Nashadolia / Our Destiny　235

《咱们的田》　Nashaniva / Our Field　235

十画

《埃涅阿斯纪》　Aeneid　177

「埃姆斯敕令」　EdictofEms　218-219, 220, 223, 225-226, 233, 240

《迴声》　Homan / Echo　280

《消息报》　Izvestia / News　331-332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269

《根基》　Osnova / Foundation　199, 210-211

《哲学书简》　Philosophical Letters　175, 195

《组织法》　Organic Statute　151

《真理报》　Pravda / Truth　220, 223, 294, 325-327, 330, 332, 336, 356

〈神圣战争〉　“The Sacred War”　351

〈致俄罗斯的诽谤者〉　“To the Salanderers of Russia”

142

〈乌克兰〉　Ukraine　199

《乌克兰先驱报》　Ukraïns’kyivisnyk Ukrain Herald

236

〈被肢解的俄罗斯向世人提出的保证〉　“What the Dismemberment of Russia Promises the World”　416

十一画

「统一法案」　Act of Union　168

《基辅人》报　Kievlianin / The Kyivan　263, 272, 276

《基辅电讯报》　Kyivan Telegraph　219

《莫斯科新闻报》　Moskovskie vedomosti / Moscow News　206

《莫斯科人》　Moskvitiania / The Moscovite　176, 186, 197

〈国际歌〉　“TheInternationale”　354

十二画

《復活节循环週期探论》　Exposition of the Easter Cycle　80

《斯拉夫民族志》　Slovanskýnárodopis / Slavic Ethnography 196-198, 220

《万象》　Vsiakaiavsiachina / Anythingand Everything

120

十三画

〈爱乌克兰〉　“Love Ukraine”　364

《新世界》　Novyimi r/ The New World　376

《农民真理》　The Peasant Truth　203

十四画

《赫梅利尼茨基》　Bohdan Khmelnytsky　348, 359, 364

《领航书》　Kormchaia kniga　93

《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重新统一》　These on the Reunification of Ukraine and Russia　365-367

十五画

《论英语的卓越》　Epistle on the Excellencies of the English Tongue　111

《潘塔德乌什》　Pan Tadeusz　202

十六画

《歷史月刊》　Historical Journal　337

〈亲乌克兰派和波兰人的利益凑巧一致〉 “The Coincidence of Ukrainophile Interests with Polish Interests” 213

十七画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的问题〉 “On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or‘Autonomization’” 291, 302

十九画

《罗斯史》 History of the Rus’ 179, 186, 197

二十画

《苏联大百科全书》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 375

《钟声》 Kolokol / TheBell 122, 198-200

《议会》 Rada / Council 257

人名

三画

大流士 Darius the Great 138

小博布林斯基 Vladimir Bobrinsky 254-255

四画

日丹诺夫 Andrei Zhdanov 358, 363

巴利茨基 Anton Balitski 322

巴斯斯卡泽斯基 Jan Barszcewski 202

巴托雷 Stephen Báthory 73

戈都诺夫 Boris Godunov 83-84, 86

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 377, 385, 387-388, 392, 395-398, 400, 407, 420

戈尔恰科夫亲王 Prince Aleksandr Gorchakov 220-221

戈戈茨基 Sylvestr Gegotsky 194

比比科夫　Dmitrii Bibikov　173-174, 311

什梅廖夫　Ivan Shmelev　416

什皮列夫斯基　Pavel Shpilevsky　203

「市民」米宁　Kuzma Minin　137, 334

尤泽福维奇　Mikhail Yuzefovich　217, 220, 223, 263

尤里大公　Prince Yurii　60

尤申科　Viktor Yushchenko　413-414

丹尼尔亲王　Prince Daniil　252

切尔内绍夫　Zakhar Chernyshev　121, 124

五画

古契科夫　Aleksandr Guchkov　262-264

古巴廖夫　Pavel Gubarev　434, 436

古辛斯基　Vladimir Gusinsky　411

尼凯特恩科　Aleksandr Nikitenko　184

尼科诺夫　Viacheslav Nikonov　417

丘拜斯　Anatolii Chubais　411

丘宾斯基　Pavlo Chubynsky　219

布季洛维奇　Anton Budilovich　244

布希　George W. Bush　428

布尔加克　Iosafat Bulhak　167

布尔加科夫　Mikhail Bulgakov　334

布留洛夫　Kirill Briullov　178

布里兹涅夫　Leonid Brezhnev　324, 368, 374-375, 378-379, 385, 389, 409

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441

布哈林　Nikolai Bukharin　331-332, 333, 371

布图尔林　Vasilii Buturlin　95

卡韦达　Barys Kaverda　321

卡西米尔四世　Casimir IV　64, 66, 68-69

卡利诺斯基　Kastus Kalinoŭski　203, 355

卡夫坦　Larisa Kaftan　415-416

卡冈诺维奇　Lazar Kaganovich　310, 312-314, 319

卡米涅夫　Lev Kamenev　299, 309, 319

卡季科夫　Mikhail Katkov　206, 213-214, 216, 218

卡拉姆津　Nikolai Karamzin　140-141, 156-158

卡利诺斯基　Kastus Kalinoŭski / Konstanty Kalinowski Wincenty Konstanty Kalinowski　203, 355

卡鲁　Richard Carew　111

卡布珊　Vladimir Kabuzan　408

卡尔斯基　Yefim Karski　316

尼古拉耶维奇大公　Grand Duke Nikolai Nikolaevic　251-252, 255-256, 259-260

尼康　Nikon　88-89, 101

加邦　Grigorii Gapon　230

加利奇的达尼洛亲王　Prince Danylo of Halych　355

弗兰科　IvanFranko　348

弗兰格尔　Petr Wrangel　286, 298, 308

弗拉基米尔大公　Prince Vladimir　46-47, 61-62, 65, 162, 333

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　Prince Vladimir Monomachos

70-71

弗罗伦斯基　Timofei Florinsky　244

皮得戈尔尼　Mykola Pidhorny　367

皮切塔　Vladimir Picheta　346

札瓦多夫斯基　Petro Zavadovsky　120, 158-159

札通斯基　Volodymyr Zatonsky　274, 321, 322

司徒卢威　Petr Struve　238-239, 240, 244, 246, 257-258, 266, 285, 431-432

瓦卢耶夫　Petr Valuev　209-210, 212-213, 215, 218

瓦尔德马王子　Prince Valdemar　88

瓦西里二世　Prince VasiliiII　62, 78

瓦西里科　Vasilko　279

瓦迪斯瓦夫四世　Władysław IV　85

丘巴尔　Vlas Chubar　312

六画

多布里扬斯基　Adolf Dobriansky　221-222, 223

多夫任科　Oleksandr Dovzhenko　356, 364, 378

多尔戈鲁基大公　Prince Dolgoruky　46

托尔斯泰　Aleksei Tolstoy　335, 418

托洛茨基　Leon Trotsky　273, 292, 302, 309-310, 319

托马斯．帕拉奥洛戈斯　Thomas Palaeologus　57

伊丽莎白　Elizabeth　15, 106-107, 109-110, 116, 131

伊琳娜　Irina　83, 88

伊西多尔　Isidore　77-78

伊凡（伊凡四世的儿子）　Tsarevich Ivan　76

伊凡三世　IvanIII　9, 15, 29, 49, 57-58, 62-69, 78-79, 80, 131,

伊凡四世 / 恐怖伊凡 /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　Ivan Vasilevich　29, 58, 71, 73-74, 76, 81, 83-84, 85, 97, 107, 336, 340, 363

伊凡诺夫　Anatolii Ivanov　377

伊雷林　Ivan Ilin　416

伊赫纳图斯基　Usievalad Ihnatoŭski　317, 322

安娜　Anna Ioannovna　18, 105-106, 119

安托科利斯基　Antokolsky　336

安德鲁什基　Heorhii Andruzky　182

安年科夫　Nikolai Annenkov　212

安东诺维奇　Volodymyr Antonovych　193

安德罗波夫　Yurii Andropov　385

列别德　Dmytro Lebed　310

列宁　Vladimir Lenin　244, 267-270, 273-275, 289-295, 297-305, 307-309, 313, 320, 327, 332, 339, 341, 353, 361-362, 368, 371, 375, 378, 395-396, 409

米克洛西奇　Frankvon Miklosich　221

米哈伊尔．罗曼诺夫　Mikhail Romanov　85-86, 87, 334

米哈尔科夫　Sergei Mikhalkov　409-410

米留科夫　Pavel Miliukov　239-240, 241, 246-247, 257, 261, 263, 266

吉莉亚．马尔基佐娃　Gelia Markizova　326

吉尔金　Igor Girkin　433-434

吉泽利　Inokentii Gizel　99

吉洪　Tikhon　48, 416

朱可夫　Georgii Zhukov　365

西蒙诺夫 Konstantin Simonov 361

西吉斯蒙德三世 Sigismund III 85

伏龙芝 Mikhail Frunze 297

伏伊科夫 Petr Voikov 321

伏尔泰 Volaire 129, 133, 145

七画

伯德 Aleksandr Bode 352

杜金 Aleksandr Dugin 426

杜宁．马尔辛基维兹 Wincenty Dunin- Marcinkiewicz

202

希什科夫 Aleksandr Shishkov 137, 149

沙哈洛夫 Ivan Sakharov 390

沙赫马托夫 Aleksei Shakhmatov 234, 258

沙发利克 PavolJozef Šafárik 196-197, 220

别列佐夫斯基 Boris Berezovsky 406, 411, 413

别兹博罗德科 Oleksandr Bezborodko 120, 127, 156

别列夫 Vasilii Belov 393

别林斯基 Vissarion Belinsky 184-185

沃林 Boris Volin 337

沃罗滕斯基 Semen Vorotynsky 69

沃洛基米尔 Volodymer 47, 125-126

君士坦丁九世 Constantine IX Monomachos 60, 70

君士坦丁十一世 Constantine XI 57, 78

克维特卡．奥斯诺维亚年科 Hryhorii Kvitka- Osnovianenko
177

克拉夫丘克　Leonid Kravchuk　400

克鲁普斯卡娅　Nadezhda Krupskaia　302

克萨基　Tadeusz Czacki　160

里宾特洛甫　Joachimvon Ribbentrop　341, 344-345, 352

里格尔曼　Nikolai Rigelman　216-217, 220

贝利亚　Lavrentii Beria　362-364

贝科夫　Vasil Bykaŭ　379

门捷列夫　Mendeleev　327

车尔尼雪夫斯基　Nikolai Chernyshevsky　211, 327

考纳丘克　Oleksandr Korniichuk　348, 359

佐西马　Zosima　79-80

八画

阿合马　Ahmed　65-66, 68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Aleksei Mikhailovich　88

阿尔基尔达斯　Algirdas　68

阿尔谢尼　Arsenii　211

阿达莫维奇　Aliaksandr Adamovich　322

阿瓦库姆　Avvakum　100-101

阿克萨科夫　Konstantin Aksakov　206

阿列克谢耶夫　Mikhail Alekseev　262-263, 276, 284

亚歷山德拉　Alexandra　262

（作曲家）亚歷山德罗夫　Aleksandr Aleksandrov　351, 354

格奥尔基．亚歷山德罗夫　Georgii Aleksandrov　357, 358, 363

亚沃尔斯基　Stefan Yavorsky　105

亚坎曼科　Vasilii Yakemenko　413

亚努科维奇　Viktor Yanukovych　412-413, 425-426, 427

亚博廷斯基　Vladimir Jabotinsky　238

波塔波夫　Aleksandr Potapov　217

波札尔斯基亲王　Dmitrii Pozharsky　334

波札尔斯基　Pozharsky　137, 334, 348, 353, 479

波莱特卡　Hryhorii Poletyka　112

波贝多诺斯采夫　Konstantin Pobedonostsev　233

波戈金　Mikhail Pogodin　157, 162, 176, 179, 186-190, 197, 214, 218, 220

波列伏依　Nikolai Polevoi　156, 179

波波夫　Popov　327

波托茨基　Seweryn Potocki　159

波洛茨克人西缅　Simeon of Polatsk　96, 98, 104, 112

舍列平　Aleksandr Shelepin　378

舍普季茨茨基　Andrei Sheptytsky　254

舍列斯特　Petro Shelest　378-379

舍维廖夫　Stepan Shevyrev　176

舍甫琴科　Taras Shevchenko　173-174, 175, 177-178, 180, 182, 184, 190, 211, 223, 241, 245, 311

彼得留拉　Symon Petliura　309

（诗人）彼得罗夫　Aleksei Petrov　128, 139, 144

彼得罗夫　Vasilii Petrov　180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Peter Alekseevick　101

拉祖莫夫斯基　Aleksei Razumovsky　106, 108, 117

拉科夫斯基　Khristian Rakovsky　302, 310

拉夫罗夫　Sergei Lavrov　433

拉斯图斯基　Vatslaŭ Lastoŭski　283

奇若夫　Fedor Chizhov　185

奇切林　Georgii Chicherin　296-297

季诺维也夫　Grigorii Zinoviev　303, 309, 319

季迪斯基　Nikolai Nadezhdin Didytsky　221, 223

季什科夫　Valerii Tishkov　401-402, 418-419

帕斯克维奇．叶里温斯基　Ivan Paskevich- Yerivansky

142

帕纳吉　Paisios　90-91, 93

帕里琴　Palitsyn　137

果戈里　Mykola Hohol’ / Nikolai Gogol　162, 179, 221

奈娜　Naina　397

妮娜．科斯捷里纳　Nina Kosterina　336

佩泰尔　Pavel Pestel　154-156, 194, 207

姆迪瓦尼　Polikarp Mdivani　299

邱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353, 356

尤利娅．季莫申科　Yulia Tymoshenko　425

九画

恰尔托雷斯基　Adam Jerzy Czartoryski　158, 160, 164

恰达耶夫　Petr Chaadaev　175, 195

柯锡金　Aleksei Kosygin　379

威廉大公　Archduke Wilh　277

查理曼　Charlemagne　53

查理十二世　Charles XII　101, 103, 245

科尔什　Fedor Korsh　234

科尔尼洛夫　Lavr Kornilov　276, 284

科内斯基　Heorhii Konysky　121-122, 186

科齐特斯基　Hryhorii Kozytsky　120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　Ivan Kotliarevsky　177-178, 179, 221

科皮塔尔　Jernej Kopitar　196, 221

科雅洛维奇　Mikhail Koialovich　204-205, 206

科斯托马罗夫　Mykola　Kostomarov　173-177,　179-183,　186, 188, 190, 199-200, 204-206, 210-211, 214, 226

科斯丘什科　Tadeusz Kościuszko　123, 127, 130, 132, 135, 356

科列什尼琴科　Vadim Kolesnichenko　419

科楚宾斯基　Yurii Kotsiubynsky　274

约拿　Iona　78

约伯　Iov　82-83, 84

约阿希姆五世　Joachim V　75, 81

约瑟夫二世　Joseph II　126

耶利米二世　Jeremiah II　81

施勒格尔　Karl Wilhelm Friedrich Schlegel　145, 146, 148

洛赫维茨基　Kondratii Lokhvitsky　161

洛里斯．梅利科夫　Mikhail Loris- Melikov　225

契尔年科　Konstantin Chernenko　385

迪沃维奇　Semen Divovych　117

韦什涅夫　Veshnevsky　334

十画

索忍尼辛　Aleksandr Solzhenitshn　48, 376-377, 389-392, 416

索布恰克　Anatolii Sobchak　399

索拉里　Pietro Antonio Solari　58

索菲娅　Sophia　57-58, 63, 79

索休拉　Volodymyr Sosiura　364

纳瓦尔尼　Aleksei Navalny　424

纳杰日金　Nikolai Nadezhdin　195-196, 221, 446

纳札尔巴耶夫　Nursultan Nazarbayev　397

纳济莫夫　Vladimir Nazimov　203-204

马尔基佐夫　Ardan Markizov　338

马林科夫　Georgii Malenkov　358, 361-362, 365

马泽帕　Ivan Mazepa　13, 102-103, 104, 245

马祖罗夫　Kiryl Mazuraŭ / Kiryl Mazurov　372-373

马卡里　Makarii　71

马姆拉卡特　Mamlakat　339

马克西米连一世　Maximilian I　67

马克西米连二世　Maximilian II　72

马克西莫维奇　Mykhailo Maksymovych　160-161, 187-189, 197-198, 200, 214

马克维奇　Mykola Markevych　179, 187

马赫洛．科楚宾斯基　Mykhailo Kotsiubynsky　274

马尔琴科　Mykhailo Marchenko　348-349

马舍罗夫　Petr Masheraŭ　379

班特什．卡缅斯基　Dmitrii Bantysh-Kamensky　179

夏里亚宾　Fedor Shaliapin / Chaliapin　250

夏甲　Hagar　82-83

特列涅夫　Konstantin Trenev　334

特列季亚科夫斯基　Vasilii Trediakovsky　110, 112

库奇马　Leonid Kuchma　412-413

库马奇　Vasilli Lebedev- Kumach　351-352

库图佐夫　Mikhail Kutuzov　138, 353, 356

库里申科　Oleksii Kyrychenko　367

库帕拉　Yanka Kupala　355

（作曲家）格林卡　Mikhail Glinka　409

格林卡　Nikolai Glinka　334

格鲁舍夫斯基　Mykhailo Hrushevsky　236, 237, 240, 241, 258, 259, 270, 271, 274, 298, 311, 322

娜塔莉娅．娜罗奇尼茨卡亚　Natalia Narochnitskaia　419

乌斯迪亚洛夫　Nikolai Ustrialov　157-158, 190, 214

乌瓦罗夫　Uvarov　144-145, 146-147, 148-149, 153, 155-157, 159-160, 161, 175-176, 179, 181, 184, 187, 207, 242

库利什　Panteleimon Kulish　182, 185, 211, 223, 417

留里克　Rurik　8, 28, 59-60, 62, 65, 70-71, 74, 84, 86, 107

茹科夫斯基　Vasilii Zhukovsky　142, 144, 162, 178, 190

十一画

密茨凯维奇　Adam Mickiewicz　181, 201-202

基斯佳科夫斯基　Bohdan Kistiakovsky　239

基南　Edward L. Keenan　441

基佐　Guizot　145-146

基里尔　教名Kirill，本名Gundiaev　48, 420, 421

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　Kyrylo Rozumovsky / Kirill Rozumovsky　108, 110, 117-119

梅德维杰夫　Dmitrii Medvedev　48

梅洛拉多维奇．斯多罗帕德斯卡　Yelysaveta Myloradovych-Skoropadska　223

捷尔任斯基　Feliks Dzerzhinsky　300

捷普洛夫　Grigorii Teplov　108

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　Grand DukeKonstantin Konstantinovich 233, 235

毕苏斯基　Józef Piłsudski　231, 315, 320, 322-323

莫吉拉　Peter Mohyla　89, 96

莫拉切夫斯基　Pylyp Morachevsky　212

莫洛托夫　Viacheslav Molotov　325, 333, 341, 343, 345, 351, 354, 362, 365, 417

十二画

雅科夫列夫　Aleksandr YaKovlev　376-377

普丁　Vladimir Putin　5-8, 22-28, 32, 48, 403, 405-406, 409-417, 421, 423-433, 435, 437-438, 440, 443

普罗哈诺夫　Aleksandr Prokhanov　434

普罗科波维奇　Teofan Prokopovych　103-104, 105, 108, 110, 149

普希金　Aleksandr Pushkin　142-143, 144, 147, 155, 159, 162, 221, 254, 327, 329, 418, 437

普济列夫斯基　Ilia Puzyrevsky　215-216

普鲁斯　Prus　70-71

普拉东诺夫　Sergei Platonov　328

普里马科夫　Yevgenii Primakov　406, 410, 426

博戈柳布斯基　Andrei Bogoliubsky　187-188

博布林斯基　Aleksei Bobrinsky　253-255, 311

博布林斯基伯爵　Count Georgii Bobrinsky　253, 260

博迪安斯基　Osyp Bodiansky　179, 197, 446

斯梅托纳　Antanas Smetona　320

斯莫利奇　Arkadz Smolich　283

斯塔克尔伯格　Ernst Shtakelberg　220-221

斯科罗帕德斯基　Ivan Skoropadsky　278-279, 282, 284-285

斯列兹涅夫斯基　Izmail Sreznevsky　177, 179, 186-187, 197-198

斯凯里波尼克　Mykola Skrypnyk　313, 322-323, 378

斯托雷平　Petr Stolypin　244

斯基尔蒙特　Raman Skirmunt　282

斯特列尔科夫　Strelkov　433

斯特斯　Vasyl Stus　378

凯萨琳二世　CatherineII　16, 18, 115-116, 122, 127, 131, 133, 136, 145, 152, 156, 162, 165, 168

冯比伦　Ernst Johannvon Biren　106

黑格尔　G. W. Hegel　175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　Fedor Ivanovich　74

菲拉雷特　Filaret　86-87, 420

菲洛费　Filofei　80, 83, 93

腓特烈二世　FrederickII　122

舒姆斯基　Oleksandr Shumsky　312-313, 317, 322-323

舒什克维奇　Stanislaŭ Shushkevich　400

舒伊斯基　Vasilii Shuisky　84, 86-87

舒利金　Vasilii Shulgin　262-265, 271-273, 275-276, 278-279, 285, 307-308, 311-312, 314, 318

「智者」雅罗斯拉夫　Yaroslav the Wise　59, 158, 161

十三画

奥古斯都　Augustus　70-71, 72, 107

奥尔洛夫伯爵　Count Aleksei Orlov　173, 180

奥尔加　Olga　260

奥特列比耶夫　Georgii Otrepiev　84

奥勃洛莫夫　Oblomov　327, 332-333

奥列尔科维奇　Prince Mykhailo Olelkovych　64, 68

奥尔忠尼基泽　Sergo Ordzhonikidze　297, 300-301

奥西波夫　Vladimir Osipov　390

叶努基泽　Avel Yenukidze　316

叶尔钦　Boris Yeltsin　22, 396-402, 405-411

叶甫洛吉　Evlogii　233, 254-255, 260

叶夫列莫夫　Serhii Yefremov　322

顿斯科伊　Domitrii Donskoi　353, 416

雷平斯基　Rypiński　201-202

爱森斯坦　Sergei Eisenstein　335, 363

十四画

赫尔岑　Aleksandr Herzen　198-199

赫尔莫根　Hermogen　85-86

赫梅利尼茨基　Bohdan Khmelnytsky　11-12, 15, 17, 19-20, 29, 90-92, 95, 143, 207, 347-348, 356, 359, 364-365

赫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45

赫维廖维　Mykola Khvyliovy　323

赫鲁雪夫　Nikita Khrushchev　22, 32, 356, 362, 364-365, 367-368, 369-370, 371-376, 380, 386, 409

赫伯斯坦　Sigismund Herberstein　71

维亚泽姆斯基　Alexksander Viazemsky　119, 147

维亚泽姆斯基　Petr Viazemsky　119, 147

维吉尔　Virgil　177

维塔利．舒利金　Vitalii Shulgin　263

维涅林　Yurii Venelin　198

盖尔纳　Ernest Gellner　50

盖达尔　Yegor Gaidar　398-399

图曼斯基　Fedir Tumansky　120

图奇纳　Pavlo Tychyna　378

玛尔花．鲍列茨卡亚　Marfa Boretskaia　64, 66

十五画

潘克拉托娃　Anna Pankratova　357-358

邓尼金　Anton Denikin　284-285, 286, 292, 294, 307, 309, 415-416

穷人杰米扬　Demian Bedny　328-329

德米特里　Dmitrii　83-84

德拉奇　Ivan Drach　378

德拉加曼诺夫　Mykhailo Drahomanov　216-217, 219, 223, 240

德莫夫斯基　Roman Dmowski　231

德蕾莎　Maria Teresa　124-125

鲁登道夫　Erich Ludendorff　277, 280

鲁福　Marco Ruffo　58

鲁斯基　Nikolai Ruzsky　263-264

鲁班　Vasyl Ruban　120

缅希科夫　Mikhail Menshikov　236

热姆丘日娜　Polina Zhemchuzhina　362

十六画

霍米雅科夫　Aleksei Khomiakov　175, 185

霍斯金　Geoffrey Hosking　50

霍多尔科夫斯基　Mikhail Khodorkovsky　411-412, 424

卢卡申科　Aliaksandr Lukashenka　407, 412, 436

卢日科夫　Yurii Luzhkov　405

鲍列茨基　Dmitrii Boretsky　64

谢林　Friedrich Schelling　175

谢马什科　Iosif Semashko　20, 164-168, 193, 204, 213, 224

谢德罗维斯基　Shchedrovitsky　417

谢尔比茨基　Volodymyr Shcherbytsky　379

穆拉维约夫　Mikhail Murviev　274-275

十七画

缪勒　Friedrich Max Müller　107-108

薛伦堡　Friedrich Wernervonder Schulenburg　343

十八画

萨文科　Anatolii Savenko　245, 285

萨莫伊诺维奇　Danylo Samoilovych　112

萨卡什维利　Mikheil Saakashvili　414

萧斯塔高维奇　Dmitrii Shostakovich　361

十九画

丽娜．柯斯登科　Lina Kostenko　378

罗巴切夫斯基　Lobcichevsky　327

罗蒙诺索夫　Mikhail Lomonosov　108, 110-112, 327

罗祖姆　Oleksii Rozum　106

罗曼亲王　Prince Roman　252

二十画

苏马罗科夫　Aleksandr Sumarokov　110-111

苏沃洛夫　Aleksandr Suvorov　123, 127, 353, 356

苏菲亚．弗雷德里卡．奥古斯塔　Sophie　Friederike　Augustevon Anhalt- Zerbst- Dornburg　115

地名

三画

下诺夫哥罗德　Nizhnii Novgorod　66

大卢基　Velikie Luki　202

四画

巴库　Baku　297

巴拉克拉瓦港　Balaklavaharbor　191

巴伦支海　Barents Sea　63

巴图林　Baturyn　14, 102

切尔尼戈夫　Chernihiv / Chernigov　12, 16, 60, 67, 69, 98, 119, 140, 155-156, 187, 421

戈梅利　Homel　316

尤格拉　Yugra　58

五画

布兰登堡　Brandenburg　122

布列斯特　Brest　11, 21, 87, 124, 201, 277, 281-282, 284

布列斯特 - 立陶夫斯克　Brest- Litovsk　277, 281-282, 284

布罗迪　Brody　259

布科维纳　Bukovyna　50, 222, 251-255, 257, 374

加利西亚　Galicia　16, 21, 31, 61, 98, 122, 124-126, 140, 182, 189, 196, 202, 204, 216, 219-226, 236, 246, 250-261, 368, 374

加利西亚 - 沃里尼亚　Galician-Volhynian　61, 125, 253

加利奇　Halych　95, 187, 253, 355

加里宁格勒地区　Kaliningrad　396

古拉格　Gulag　337-338, 365, 378-379, 391-392, 424

卡缅斯科耶　Kamenske　324

平斯克沼泽　Pinskmarshes　202

史达林格勒　Stalingrad　353, 370

外喀尔巴阡　Transcarpathia　50, 196, 222, 251, 253, 344-345, 374

弗拉基米尔　Vladimir　29, 46-47, 58-63, 124, 187, 189

六画

安提阿　Antioc　75, 81-82, 83

伏尔加河　Volga River　47, 73, 183, 205, 258

伏尔加格勒　Volgograd　370

七画

别洛韦日　Belavezha　400

贝霍夫　Bykhaŭ　276

克拉科夫　Cracow　126

克列梅涅茨　Kremianets　160

克里姆林宫　Kremlin　7, 46, 57-59, 70, 73, 75-76, 84, 138, 290, 325-326, 332, 336, 341, 343, 358, 363, 413-414, 417-418, 428, 435-436, 440

克森尼索　Chersonesus　7, 48

利沃夫　Lviv　21, 123, 219, 236, 253-254, 258-261, 345, 348-349

辛比尔斯克　Simbirsk　258-259

辛菲洛普　Simferopol　427

沃里尼亚　Volhynia / Volyn　15, 38, 61, 95, 98, 124-125, 126, 130, 136, 140-143, 154-156, 160, 163, 173, 194, 242-243, 253-254, 261, 307, 374

八画

亚歷山卓　Alexandria　75-76, 82

波罗底诺　Borodino　142, 479

波多利亚　Podolia　16, 98, 136, 140, 142, 154-156, 164, 173, 194, 243

波洛茨克　Polatsk　13, 20, 67, 69, 73-74, 96-98, 101, 104, 112, 121, 136, 168-169, 202

波德拉谢　Podliashie / Podlachia　233

波兰门　Polish Gate　60

波尔塔瓦　Poltava　14, 31, 101, 103, 122, 155-156, 177, 235, 245

明斯克省　Minsk　154

姆斯齐斯拉夫　Mstsislaŭ　121

佩列亚斯拉夫　Pereiaslav　12-13, 30, 60-61, 92, 95-96, 366

彼尔姆　Perm　58

彼得霍夫　Peterhof　115

拉帕洛　Rapallo　295-296

舍隆河　ShelonRiver　64

九画

保加尔　Bulgar　58

哈尔科夫　Kharkiv / Kharkov　16, 23, 154-155, 159, 176-177, 179, 186, 198, 219, 234, 270, 273, 275, 296, 409-410

红场　Red Square　8, 59, 334, 336, 353, 361, 370

施蒂里亚　Styria　252

十画

库尔兰　Courland　105-106, 154

库斯克　Kursk　155

库班　Kuban　17, 276, 284, 323

格罗德诺省　Grodno　154, 156

格卢霍夫　Hlukhiv　117

伦贝格　Lemberg　123

纳尔瓦　Narva　74, 101

涅米里耶　Nemyrie　164

桑河　SanRiver　254

索契　Sochi　7, 423-424

泰雷津　Terezin　252

特维尔　Tver　58, 62, 65

乌格拉河　UgraRiver　66, 68

海参崴　Vladivostok　396

十一画

基辅　Kyiv / Kiev　8-10, 12, 14, 16, 19-20, 25, 29-30, 32, 34, 46-50, 52, 58-65, 67-71, 74, 84, 89-90, 92, 96, 98-101, 103, 105, 108-110, 112, 119-120, 124-126, 129, 131, 140, 143, 154-162, 173-174, 180, 184, 186-190, 193, 205, 211-213, 215-217, 219-220, 232, 234-236, 238, 240-242, 244-245, 250, 253, 257-258, 261, 263, 270-277, 279, 281, 283-285, 307-308, 311-312, 314, 333, 347-349, 352, 357, 366-367, 373, 379, 390-391, 399, 413, 416-417, 420-421, 426-427, 433, 440, 443

莫吉廖夫　Mahilioŭ / Mogilev　121-122, 136, 155, 262, 316

梁赞　Riazan　60, 140

第比利斯　Tbilisi　389

十二画

普热梅希尔　Peremyshl　253, 259, 261

普里皮亚季河　Prypiat River　197, 202

普斯科夫　Pskov　58-59, 80, 202, 262-263

斯沃博达乌克兰　Sloboda Ukraine　16, 154

斯摩棱斯克　Smolensk　13, 67, 69, 72, 81, 98, 119, 140, 152, 316

十三画

道加瓦河　Daugava River　121, 124

顿巴斯地区　Donbas　433-434, 435-436, 437, 442

顿内茨克　Donetsk　434, 436

顿内茨河盆地　Donets River Basin　270

奥卡河　Oka River　65

奥尔沙　Orsha　158

塞瓦斯托波尔港　Sevastopol harbor　22, 191

塔甘罗格　Taganrog　277

塔勒尔霍夫　Talerhof　252

叶里温　Yerevan　142

十四画

维亚特加　Viatka　58

维尔纽斯　Vilnuus　124, 142, 159, 164, 203, 235, 283, 394

维斯瓦河　Vistula　151

维捷布斯克　Vitsebsk/Vitebsk　121，136，155，168，187，202，316

十五画

德巴尔切夫　Debaltseve　436

热那亚　Genoa　295

十六画

霍登卡野地　Khodynka Field　229

霍尔姆　Kholm / Chelm　224, 232-233, 254

卢布林　Lublin　9, 38, 73, 126, 232, 344-345

卢干斯克　Luhansk　23-25, 435-436

卢茨克　Lutsk　124

诺夫哥罗德　Novgorod　8，16，36-37，49，58-59，61-68，70，72-73, 120, 140, 156, 196

诺夫哥罗德 - 谢韦尔斯基　Novgorod- Siverskyi　16, 119

十七画

谢德尔采　Siedlce　232

十八画

聂伯河　Dnieper　10, 12, 14, 16, 30, 98, 103, 117, 121, 124, 129, 154, 162-163, 194, 205, 223, 254, 431

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Dnipropetrovsk　368

庞塔斯　Pontic　138, 196

萨拉托夫　Saratov　183

萨克森　Saxony　102

十九画

罗兹　Łódź　232

罗斯托夫　Rostov　86

二十画

苏兹达尔　Suzdal　188

国家、民族、王朝

三画

大帐汗国　Great Horde　64

巴什基尔　Bashkiria　297, 305

比萨拉比亚　Bessarabia　154

白罗斯民族共和国　Belarusian National Repulic　282

白鲁塞尼亚人　Weissruthenen / White Ruthenian　280

布里亚特人　Buriat　325-326, 327, 332

布里亚特 - 蒙古自治共和国　Buriat-Mongol Autonomous Republic　326, 338

加利西亚 - 洛多梅里亚　Galicia-Lodomeria　125

加利西亚 - 沃里尼亚　Galicia-Volhynia　61, 125, 253

立陶宛大公国　Grand Duchy of Lithuania　10, 29, 61, 64, 67-69, 73, 96, 204, 283

卡巴尔达 - 巴尔卡尔　Kabardino-Balkar　368

卡尔梅克　Kalmyk　101, 368

外高加索联邦　Transcaucaian Federation　290, 296-297

札波罗热哥萨克人　Zaporozhian Cossacks　177

西徐亚人　Scythians　138

车臣 - 印古什　Chechen- Ingush　368

克里米亚汗国　Crimean Khanate　12-13, 17, 66, 92

克里米亚鞑靼　Crimean Tatars　68, 73, 367-368

克里维奇人　Krivichian　205

利夫兰　Livland　154-155

利沃尼亚骑士团　Livonian Order　73

阿布哈兹　Abkhazia　402, 415

阿斯特拉罕汗国　Khanate of Astrakhan　72-73, 140

金帐汗国　Golden Horde　9, 29, 62, 64-65, 66, 68, 71-73, 78-79

波罗的海联合公国　United Baltic Duchy　277

哈布斯堡王朝　HabsburgEmpire　51, 53, 72, 220, 222, 251-252

俄罗斯联邦　Russian Federation　20, 32, 49-51, 53, 290, 295, 297-299, 301, 316, 323, 367-368, 388, 395-403, 405-406, 408-410, 418, 428, 431-434, 438, 443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Russian Soviet Federative Socialist Republic　396

南奥塞梯　South Ossetia　402, 415

哥萨克人　Cossacks　10, 17, 90-92, 96, 98, 103, 106, 109, 137-138, 177, 179, 182, 186, 188, 197, 276, 282, 284, 286, 298, 355, 366

哥萨克乌克兰　Cossack Ukraine　102, 207, 222

留里克王朝　Rurikid dynasty　59-60, 62, 65, 74, 84, 86, 107

基辅大公国　Grand Duchy of Kyiv　67

莫斯科大公国　Grand Duchy of Muscovy　49, 63-64, 68

喀山汗国　Khanate of Kazan　72-73, 140

塔什干　Tashkent　375

摩尔达维亚　Moldavian　13, 89, 103, 342, 349, 352

摩尔多瓦　Moldova　46, 402, 419, 421, 441

摩里亚　Morea　57

诺夫哥罗德共和国　Republic of Novgorod　61-63, 140

鲁塞尼亚人　Ruthenian　69, 97, 166, 203, 220-223, 280, 390

独立国协　Common 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23, 400, 406-407, 426, 439

霍霍尔人　Khokhols　197

卢森尼亚人　Rusyns　154

萨莫吉希亚　Samogitia　136

聂斯特河沿岸共和国　Transnistrian republic　402, 441

罗辛人　Rusyn　220

苏维埃白罗斯　Soviet Belarus　317, 32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289

组织机构

二画

人民代表大会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387, 393, 395, 401

人民祕书处　Peoples’s Secreatariat　275

十月十七日联盟　Union of October 17　262

三画

山洞修道院　Cave Monastery　99, 159

中央拉达　Central Rada　270-271, 273-274, 275, 277-278, 285, 292-293, 298

大白罗斯拉达　Great Belarussian Rada　281

工农代表苏维埃　Soviet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Deputies　275

四画

中情局　CIA　385

五画

古文献委员会　Archeographic Commission　162, 174

白罗斯国立大学　Belarusian State University　373

布尔什维克党　Bolshevik Party　20, 31, 269, 298, 304, 309

加利西亚慈善协会　Calician Benevolent Society　254

民族院　Chamber of Nationalities　302, 304

立宪民主党　Constitutional Democrats　238-239, 240-241, 244, 246, 257-258, 261, 266, 270, 273, 278-279, 285, 402

弗兰科民族大学　Ivan Franko National University　348

卡西米尔大学　Jan Kazimierz University　348

北约　NATO　412, 414-415, 426, 428, 441

六画

全俄罗斯民族主义联盟　all-Russian Nationalist Union

263

全俄合作协会　ARCOS　320

共产国际　Communist Interationl　326, 339, 354

西部省份委员会　Committee on the Western Provinces

152-153

自治联邦主义者联盟　Union of Autunomist Federalists

237

七画

杜马　Duma　230-233，236-238，240-241，244，246-247，254，256, 261-265, 285-286, 293, 428

八画

法贝之家　Fabergé　259

彼得格勒苏维埃　Petrograd Soviet　263-264, 265, 276

波恰耶夫修道院　Pochaiv Monastery　163, 242

波兰民族民主党　Polish National Democrats　231

委员会苏维埃　Soviet of Commissars　281

宗教事务管理总局　Synod　104-105，166-167，168，212，217，232-233

九画

帝国美术学院　Imperial Acdemy of Fine Arts　178

军事革命委员会　Militar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275

政治局　Politburo　309, 312, 319, 323, 328-330, 333, 354, 358, 364, 378

是时候了！　Paro! / It’s Time　413

俄罗斯东正教会　Russian Orehodoxy Church　19, 30, 201

俄罗斯民族统一党　Russian National Unity　434

俄罗斯党　Russian party　137

俄罗斯世界基金会　Russian World foundation　419-420

俄罗斯世界　Russkiimir / Russian World　27, 196, 217, 225, 405, 417-418, 419-421, 426, 434-437, 441

俄罗斯社会民主党　Russian Social Democrats　244, 268

俄罗斯人民联盟　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　242-243, 244, 291

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Tretiakov Gallery　336

十画

斗争派　Borot’ba / Struggle　294-295, 312

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　Ukrainian Helsinki Group　390-391, 392

乌克兰革命党　Ukrainian Revolutionary Party　236

乌克兰人斯拉夫会社　Ukrainian Slavic Society　175, 180

乌克兰解放联盟　Union for the Liberation of Ukraine　322, 328

十一画

执政内阁　Directory　292-293

国际俄罗斯同胞议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Russian Compatriots　419

基辅斯拉夫慈善协会　Kyiv Slavic Benevolent Society

216

参政院　Senate　104, 119, 260

十二画

黑色百人团　Black Hundred　244-245

进步集团　Progressive Bloc　262, 285-286

单一经济空间　Single EconmicSpace　412

斯拉夫会社　Slavic Society　175, 180

最高枢密院　Supreme PrivyCouncil　105

最高苏维埃　Supreme Soviet　320-321

十三画

圣西里尔与圣美多德兄弟会　Brotherhood of Saints Cyriland Methodius　175-176，179-180，188，198-199，205，211，215，219，223, 417

圣巴西勒修会　Order of St. Basil　162-163, 165

圣灵学院　Spiritual College　164-165, 167

顿斯科伊修道院　Donskoi Monastery　416

十四画

歷史观点基金　Fundf or Historical Perspective　419

团结工联　Solidarity　386

十五画

欧亚经济共同体　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412

欧亚联盟　Eurasian Union　425-426, 428

欧盟　European Union　8, 412, 414, 426-427, 428, 438, 441

暴动小猫　Russy Riot　424

十七画

联邦安全委员会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40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48

联合教会　Uniates　11, 19-20, 30, 78-79, 87, 104, 128-130, 132, 152, 162-168, 193, 201, 203-204, 224, 232, 254-255, 369-370

十九画

临时政府　Provisional Government　20，263-264，265-266，268，270, 272-273, 274, 276, 292

罗斯理事会　Rus’ Council　221

二十画

苏维埃乌克兰　Soviet Ukraine　292, 294, 345
建筑
多棱宫　Palace of Facets　58
松林门　Borovitsky Gate　47
救世主基督大教堂　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r　424
救世主塔楼　Spasskaia Tower / Savior’s Tower　58-59
黄金之门　Golden Gate　161
圣母升天教堂　Church of Dormition　60
圣母升天大教堂　Dormition Cathedral　57, 76, 84
圣巴索大教堂　St.Basil’s Cathredral　336
圣乔治厅　St.George’s Hall　428
玛丽剧院　Malyi Theater　348
其他
二画
十二月党人起义　Decembrist revolt　141, 154, 175
十一月起义　Novermber Uprising　141-142, 144, 151-152, 192
三画
大公会议　Ecumenical Council　76-77, 81, 89, 369
大联盟　Grand Alliance　352-353
大北方战争　Great Northern War　13, 30, 101, 104-105
大恐怖时期　Great Terror　337
四画
公历　Gregoriancalendar　267
六○年代的一代　sbestydesiatnyky / generation of the sixties 378

五画

白罗斯方面军　Belarusian Front　345

白沙皇　White tsar　254

布列斯特会议　Council of Brest　87

民族统一日　Day of National Unity　48

民族共产主义　national communism　307, 317, 345, 377-378

民族阵线　national fronts　394-395

民主俄罗斯　Democratic Russia　396

卡斯塔皮人　katsapy　174

本土化政策　korenizatsiia / takingroot / indigenization　307-311, 314, 317-319, 322, 324, 362, 389

左派反对派　Left Opposition　319

六画

全俄罗斯人派　all-Russian of party　263

全罗斯的最高主宰和独裁者　sovereign and outocrat of all Rus’　66-67

血腥星期日　Bloody Sunday　230

七画

改变地标　Change of the Landmarks　319

利沃尼亚战争　Livonian War　73-74

泛俄罗斯民族　pan- Russian nation　51, 144, 390

八画

牧首　Patriarch　19, 30-31, 48, 57, 72, 75-78, 81-85, 87-91, 93, 101, 105, 354, 420-421

波罗的海之路　Baltic Way　394

波罗底诺战役　Battle of Borodino　137, 142

波坦金号　Potemkin　230

波兰亲王　Prince of Warsaw　151

东方教会父老　church fathers　90

官方民族性　official nationality　134, 144, 153

玫瑰革命　Rose Revolution　414

奉旨乌克兰化　Ukrainization by decree　310-311

九画

后苏联空间　post-　Sovietspace　403,　406,　410,　412-414, 417-418, 439, 441

红罗斯　Red Rus’　220, 255

红色恐怖　Red terror　275

俄罗斯国民　rossiiane　401, 406

俄罗斯公民民族　Russian civic nation　401, 419

俄罗斯哥萨克　Russian Cossack　237

俄罗斯法　Russian Justice　154

俄罗斯自由帝国　Russia’s liberal empire　411

俄罗斯之春　Russian Spring　434-435

俄国革命　Russian Revolution　50, 53, 246, 266-268, 330

星战计画　Star War　386

十画

库里科沃战役　Battle of Kulikovo　377

特伦特大公会议　Council of Trent　89

特辖制　Oprichnina　73

祖国保卫者节　Defender of the Fatherland Day　423

乌克兰大饥荒　Great Ukrainian Famine　322-323

乌克兰方面军　Ukrainian Front　345, 356

乌瓜　khokhly / topknots　185, 236

租借计画　Lend- Leasaprogrm　353

马泽帕主义者　Mazepists　245, 257-258

虔诚狂热派　ZealotsofPiety　88

十一画

国民大会　Assembly of the Land　84-86

国际阵线　International Front　394

国际运动　International Movements　394

教会斯拉夫语　Church Slavonic　109-112, 156, 188

屠龙者　Dragon-Slayer　428

第一届全白罗斯代表大会　First All-Belarussian Congress　281

第三罗马　Third Rome　19, 29, 75, 80-82, 93-94, 99, 448, 465

都主教　Metropolitan　57，62-63，66，71，75-83，86，89-90，93，95-96, 159, 165, 167, 193, 211, 254, 275, 420

莫诺马赫之冠　Monomakh’ Cap　71, 74

混乱时期　Time of Troubles　84-87, 93, 127, 129, 137, 168

十二画

黑海舰队　Black Sea Flect　22, 191

喀尔巴阡罗斯　Carpathian Rus’　250-251, 253

斯拉夫国度　Slavdom　144, 250

斯拉夫 - 俄罗斯人　Slavo-Rossian　99, 440

十三画

奥尔沙之役　Battle of Orsha　69

奥克语　Occitan　214-215

跨区域议员团　Interregional of Deputies　395-396, 401

爱农民者　khlopomany / peasant-lovers　193

意第绪语　Yiddish　235, 317-318

十四画

欧亚主义　Eurasianism　426

赫鲁雪夫解冻　Khrushev Thaw　365, 376

十六画

学院案件　Academy Case　328

亲白罗斯派　Belarusophile Party　206

亲莫斯科派　Muscophile　221

亲俄罗斯派　Russophile　220-226, 251-252, 254, 256, 260

亲斯拉夫派　Slavophiles　175-177, 179-180, 183-185, 197, 206-207, 218, 221, 250, 417

亲乌克兰派　Ukrainophiles　182, 184-186, 205, 210-211, 213-214, 216-220, 222-226, 233, 238, 240, 245, 252, 254, 257-258

儒略历　Julian calendar　59, 267-268

十七画

总祕书处　General Secretarict　272

总督辖区　vicegerency　119-120

十八画

旧礼仪派信徒　Old Believers　101

庞塔斯斯拉夫语　Pontic Slavic　196

十九画

罗斯重新统一　reunification of Rus’　20, 190, 366

二十二画

鞑靼枷锁　Tararyoke　66